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 95821809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7zhu.com>



华章经管



WILEY

揭示金融市场大众心理的经典之作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混乱中的困惑》

合集



投机与骗局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and
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华章经典 · 金融投资

MARTIN S. FRIDSON

〔美〕马丁 S. 弗里德森 编著

摩根士丹利

《财富》

共同推荐

投资经典读物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投机与骗局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and
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华 章 经 典 · 金 融 投 资
M A R T I N S . F R I D S O N

弗里德森 编著
王娟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Martin S. Fridson.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and 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Copyright © 1996 by Marketplace Book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John Wiley & Sons公司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底贴有John Wiley & Sons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7-04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投机与骗局（珍藏版）/（美）弗里德森（Fridson, M. S）编著；王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4

（华章经典·金融投资）

书名原文：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and 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ISBN 978-7-111-30243-8

I. 投… II. ①弗… ②王… III. ① 资本市场—研究—荷兰—17世纪—史料 ② 股票—证券投资—荷兰—17世纪—史料 IV. F835.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8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章集香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0mm×242mm · 14.25印张

标准书号：ISBN-978-7-111-30243-8

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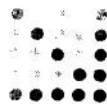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88379210；88361066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88379649；68995259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推荐序

Foreword

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大约发生于300多年以前，但是其中的情节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抑或是今天刚刚发生。投资者长期关注这两本书的原因也正缘于此——世事越是变迁，情况看上去越是恒久不变。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市场里，没有什么与往日有着很大的区别：无论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还是机构投资者的主导地位；无论是纷繁复杂的金融工具，还是过量的信息与全球化，甚至是具有真知灼见的财经理论，都与往日无异。

显而易见，当今社会的绝大多数市场行为与17世纪的市场行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投机商们仍然在干着投机的勾当，而对风险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们也依然在做着套期保值的交易。时光虽然流逝，17世纪投资人的行为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却惊人的相似，不仅如此，即便是交易的工具与结算的机制也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当代的市场是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复杂？”换句话说，“那些早期的市场是否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加复杂一些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请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书中出现的今天不太能够经常见到的戏剧性的情节发生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具有独特特点的几百年间。麦凯与

德拉维加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和《混乱中的困惑》两本书中所描述的事件不会发生于400多年以前，因为400多年以前金融市场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于亨利八世、罗马教皇朱利叶斯二世、查理五世，甚至是16世纪所有的巨人而言，金融市场或许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两本书令人惊讶的一大特点是，它们揭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尚且处在萌芽阶段的市场里的人们的言行举止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是如此的熟悉。

在直至17世纪有记载的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之中，财富总量的增长实在太缓慢。财富的所有权偶尔会有变更，但大多数是被迫进行或是死亡使然，而不是金融交易的结果。自从16世纪哥伦布掀起海外探险的热浪之后，新的财富才开始流入欧洲——新的国土上生产的产品、新的原材料的供给、新的动物资源，更不用说数量惊人的黄金和白银了。技术发展排山倒海般地紧随而来，并且最终带来了工业革命。

现在，不必通过将其他的家庭或者其他的民族搞得更加贫穷，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民族就可以变得更加富有——这是一种最为根本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变。破天荒的头一次，财富的积累不再依靠财产继承或者掠夺他人——换句话说，至少财富的掠夺发生在欧洲以外遥远的国度里。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企业开始成为财富所有权的推动力量，贵族阶层的消亡也自此开始。请读者注意，《混乱中的困惑》一书首次问世的1688年正是英格兰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和君主立宪制开始确立的年头，这种与过去戏剧般的决裂昭示了现代社会真正的开始。

企业需要资本，也就是说，企业必须有资金的支持，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往往远非一个企业家个人所能筹集得到的，而交易有形资产所有权的金融市场能够满足这种需要。金融市场发展的速度之快以及源源不断注入这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资产之充足都有力地见证了17世纪欧洲人发财致富的步伐。

金融资产的求偿权一经问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运作，全然脱离了孕育它们的有形资产，而这正是麦凯与德拉维加在金融市场游戏刚刚开始之际就向我们讲述的故事的寓意所在。麦凯与德拉维加所讲述的故事与后来

金融市场演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其他故事极其相似，这一点证实了故事经久不衰的道德寓意，而我本人对这一特征出现之迅速印象尤为深刻。

在此，我还要向读者强调的一点是，本书包含的精神财富是三篇文章，而不仅仅是两篇。马丁·弗里德森的绪论并不仅仅是麦凯与德拉维加作品的附属与点缀，而是你阅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你阅读这部有关过去岁月的财富史、贪婪史、欺诈史与金融创新史时，它能够带给你许许多多愉快的感受。

彼得 L. 伯恩斯坦

目 录
Contents

推荐序

绪论 /1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密西西比计划 /20

南海泡沫 /68

郁金香狂潮 /113

混乱中的困惑

第一段对话 /149

第二段对话 /160

第三段对话 /172

第四段对话 /193

参考文献 /215

译者后记 /217

绪 论

✓ 一个没有理性的领域

不久前,《金融时代》的一位编辑遴选出10本有关投资的最佳作品,在其列出的名单之中,位居前两位的就是约瑟夫·德拉维加的《混乱中的困惑》(*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与查尔斯·麦凯之《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这位编辑决定将他选取的书籍按照年代的顺序进行编排,这样一来,德拉维加(1688年)与麦凯(1841年)在排序上就有了绝对的优势。不过,即使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在有关证券市场的为数不多的最有价值的几部作品的名单之中都少不了这两部令人敬仰的著作。两本书之中至少有一本注定会出现在标题为“投资者必读书目”“每个投资人必备的书籍”或者“具有金融价值的礼物”之类的文章当中。

投资者们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珍爱德拉维加的《混乱中的困惑》与麦凯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是因为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招摇惑众与坑蒙拐骗。1720年“南海泡沫”破灭时，人们大惑不解。和前人的反应相差无几，1987年10月19日，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508点之时，旁观的局外人亦是不知所以。与此相似，投资者们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日本的“日经225指数”（225只股票的平均指数）在1990年初竟然会比9个月以后要高出91%。

查尔斯·麦凯把这种异常的变化归因于周期性爆发的群众性的疯狂之举。与之相反，约瑟夫·德拉维加透过骚乱看到的是其背后的欺诈，他将价格的跌宕起伏描述为是诡诈的投机商们一手造成的。

如果你热切地想要知道股市为何经常发生没有规律的变动，那么上述的两种解释都值得你仔细考虑。《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与《混乱中的困惑》凝结了麦凯与德拉维加的经典著作中的投资智慧，而书中的至理名言被许多最伟大的权威人士视为无价之宝。

举例来说，《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是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最喜欢的一本书，该书目前享有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位赫赫有名的金融家。巴鲁克曾经鼓励、促成了该书在1932年的再版发行，并且为之撰写了一篇序言。当代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对麦凯的作品同样推崇备至。

如果你热衷于追踪财经新闻的话，你一定会经常看到对《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的溢美之辞。《福布斯》的专栏作家们称该书为“与投资业务有关的最重要的单行读本”、“每个投资人都要收藏的书”、“任何一位投资于证券市场的人都必须阅读的作品”，并有一篇“聪明的金融家们经常喜欢引用其中文句”的专题论文。其他出版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描述文字还有“关于经济领域愚蠢行为的鸿篇巨制”，推荐给“所有那些认为‘这一次会有所不同’的人们”阅读的文章，“一本你希望自己在1987年10月股

市暴跌之前就已经读过的作品”。另一位评论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无论一个人在华尔街干了多久，他总归是要阅读《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这本书的。”

该书首次出版一个半世纪以后，每当出现新的市场繁荣与毁灭，麦凯对投机泡沫的描述就会自然而然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近些年出现的黄金问题、墨西哥股票、食品公司的股票、住房费用、日本地产价格、垃圾债券以及巴林（Baring）银行的倒闭也促成了专家们对《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的援用。

麦凯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金融市场。一份媒体的调查暗示：计算机病毒防护、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听证会、哈雷彗星、赌博的蔓延、13~19岁青少年喜爱的忍者神龟（Mutant Ninja Turtles）以及火力突击队（Power Rangers）都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有着间接的关系。评论家们将麦凯作品中的段落和情节与各种各样的事件相提并论，比如：糟糕的暴力影片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票房成功、倡议减少暴力的运动、有关臭氧层遭受破坏的辩论、有毒水果引发的恐慌、儿童看护中心的虐待事件以及为改善污水处理而进行的各种努力等。本书1992年版的书名是《庞氏阴谋：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以及更加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Ponzi Schemes, Invaders from mars & More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或许同年举办的一次探索“一旦个体不再对自己负责会怎样”问题的名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的艺术展是对麦凯最后的文化礼赞。

说麦凯的著作已经成为传奇之作并非言过其实，但是经过复述的故事已经不可避免地被人加以夸大和粉饰，因此曲解也就在所难免。有资料正确地指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首次问世于1841年，而有些人则说它的首次面世是在1852年（实际上，1852年是第2版问世的时间）。一篇发表于1991年的文章奠定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

书适合大众口味的经典名作 (a cult classic) 的地位，并且说它自从1956年以来已经不再发行。不过，另外一些人提到该书还有1974年版、1976年版、1980年版和1985年版。这种混乱的起因是，麦凯的这部作品的书名变来变去：第1版的书名是《回忆录：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到了第2版就变为《回忆录：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而到1932年再版时又去掉了“回忆录”一词。

很多人说，因为牢记了麦凯的教导，伯纳德·巴鲁克的巨额财富才能历经1929年的灾难而完好无损。与此相反，一本期刊说，巴鲁克忘记了自己曾经对别人做出的忠告，在股市崩溃之前重新投身于股市的汪洋大海之中。事实上，巴鲁克的大部分财产虽经崩市却保存完好。据一位传记作家说，巴鲁克发现，作为一个对于世界末日未卜先知的人，他正在引导人们忽视他的意见。为此，巴鲁克转而公开声明看涨后市行情。由此出现了两种相互抵触的传闻。一方面，巴鲁克的崇拜者们说他早已预见到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部分原因是他记起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所描述的先辈们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正好相反，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援引巴鲁克的乐观评论作为论证麦凯所描述的那种市场的疯狂的准确见证。

对《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的作者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有的将他描述为一位19世纪的律师，有的则说他是英国的一位编年史作家，还有的说他是一位苏格兰记者。实际上，自从格拉斯哥大学 (Glasgow University) 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出生于苏格兰的麦凯就在他的名字上面加上了“LL.D.”，但是他却从未当过专职律师。作为诗人与歌曲作家的麦凯，其名望毫不逊色于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身份，然而，名誉稍纵即逝，有人竟然将他的名字说成是“伯纳德·麦凯”。

一般的投资书籍是不会引发如此持久的错误信息的传播的。正如许多资深的投资经理所言，《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显然应该属于不同凡响的一类，这些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他们会永远把它带在

身边。该书历久不衰广受欢迎的原因并非显而易见，毕竟，麦凯并未制定证券交易的规则也没有给出计算证券价值的公式，但奇怪的是，投资者的阅读书单上必有这部与典型的投资手册如此不同的作品。

当然，麦凯描述的事例本身具有内在的引人入胜之处。读者一定会被他对“荷兰的郁金香球茎热”、“密西西比阴谋”和“南海泡沫”的描写逗得忍俊不禁，虽然撰写这些故事远不止是为了供人消遣和娱乐。麦凯的作品吸引每一个希望证明大多数人错了而自己却能够发达的人。所有的投机商都属于这一类人，这类人还包括那些针对金融以外的更加广泛的问题出谋划策的人们，他们从麦凯的书中找到了“多数人的意见也可能是错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证据。

《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提出的不仅是“有的时候人们都会失去理性”这一理念。麦凯说具有常识的个体很容易觉察到集体的疯狂。如果这一断言是正确的，那么个体将会借此获取巨额的利润。麦凯对此深信不疑，他所描绘的集体判断失误是如此明显，似乎只有傻子才觉察不到。

诚然，对于19世纪中叶的金融评论家而言，生活要简单得多。数学家路易斯·巴切利尔（Louis Bachelier）那时尚未弄清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游走”的股价问题，这一结论使占卜股市未来走势的可行性面临严重的质疑，即便市场已经过于偏高或是过于走低，而且，在麦凯去世多年以后，经济学家们才开始质疑投机泡沫的现实意义。新的理论认为：即便是明显荒唐的价格波动也能反映出资产价值的真实变动。随后，市场失灵学派对此做出了回应，重新肯定了狂热与愚蠢在市场价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之前，复杂深奥的数学方法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对于市场进行解析的尝试因此受挫。

这并不是说麦凯在历史性叙述方面的特长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不过，自他以来，辩论的层次不断提高。分析家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自找麻烦地去考证发表的言论背后的事实，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权威性的引文出处。在这

种变化之中，19世纪更加随意的研究方法对麦凯并无多少裨益。

布朗大学的彼得 M. 加伯 (Peter M. Garber) 的分析表明，麦凯草率地从二手资料中收集到有关“郁金香球茎热”的历史素材。亚伯拉罕·芒丁 (Abraham Munting) 的“关于郁金香热的1 000页的对开本的资料汇编”实际上是一篇植物学方面的论文，其中提到郁金香热的部分最多不超过6页。更有甚者，加伯直截了当地指控麦凯剽窃了18世纪末一位名叫乔安·贝克曼 (Johann Beckmann) 的言论，加伯还说，P.T. 巴纳姆接着又剽窃了麦凯的东西。更加糟糕的是，加伯还诋毁难以计数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的读者最为喜爱的传闻逸事。加伯的研究表明，也许那位吃了一块极其珍贵的郁金香球茎却以为自己只不过吃了一棵洋葱的水手是在1634~1637年的投机热潮之后的某个时刻才享用这顿昂贵大餐的。

加伯做出上述批评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这类诡辩，其剑锋所指“在麦凯编书的年代里，郁金香的价格曾经有过非理性的疯涨”这种观点。通过对市场运动所做的详细研究，加伯指出，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都发生过波幅与此相当的大幅波动。显然，没有节制的投机行为只会影响到更加普通的郁金香品种，而这些普通品种的郁金香的交易是在1636~1637年的冬季，在设在客栈里的非正规的期货市场里进行的。

即便加伯所言正确，区区一块森珀·奥古斯塔斯 (Semper Augustus) 郁金香球茎居然被卖到5万美元，这种事情难道不是显然不合常理的过分之举吗？实际上，加伯提到，一小块百合花的块茎最近竟被卖到50万美元。一块极其漂亮的郁金香球茎能够繁育出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色彩与花型的后代。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 S. 米什金 (Frederic S. Mishkin) 说，总有一天，一块漂亮的郁金香球茎会有几百万这样的后代。

最终的结果是：即使过了100多年，最初那块郁金香球茎的某一个后代的价格也只是最初那块郁金香球茎价格的一小部分，最初那块郁金香球茎卖个高价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这样说的理由是：原始郁金香球茎的子子孙孙们

的价值加在一起，现在也许是个天文数字。

和加伯剥去郁金香热神话色彩的外衣一样，伊利诺伊·厄尔巴纳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的拉瑞 D. 尼尔也向“南海泡沫只不过是一阵狂热，或者说是一场大规模的欺骗”之类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根据尼尔的估计，起初南海公司通过将政府因战争产生的债务转变为流动性较高的低息证券为其自身谋取了好处，但是南海公司后来铸成大错，尼尔说，只是因为南海公司的野心太大并且向公众许下自己无法实现的诺言。

可是，学者们的去伪存真似乎无法阻挡投资者对《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的喜爱。只要人们押宝于他们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加聪明，他们就会喜欢“大多数人会发生周期性的精神紊乱”这样的观点。投机商们总是与基普林（Kipling）的看法一致：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已失去理智时，你仍然能够继续保持头脑清醒，那么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都会成为你的囊中之物。

无论它是否符合当今的经济理论与学术标准，《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都稳居推荐给投资者的书单之上。该书切中了一个永恒问题的要害：究竟有没有明确无误的提示大伙“该买了”或是“该卖了”的信号呢？

麦凯的叙述有力地证明了：当某种价格的变动走过头了，迎合这种趋势的合理分析也会成为多余之物。但是，“显然”已经被高估了的股市有时还会被进一步高估，因此将约瑟夫·德拉维加的冷静计算与麦凯所强调的群体疯狂两个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是个非常不错的主意。

《混乱中的困惑》的作者约瑟夫·德拉维加的视角比较狭窄，他只关注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单一类型证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的交易。此外，在阿姆斯特丹一群被西班牙教廷迫害而背井离乡的难民中长大的德拉维加是以他特有的“诗人兼商人”的气质进行写作的。不过，3个世纪以后，因为其中描述的交易策略仍未过时，《混乱中的困惑》逐渐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

举例来说，德拉维加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股市参与者，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三种股市参与者：第一种股市参与者只收取股息和红利而并不关心股市价格的变化；第二种股市参与者遵循保守的交易策略，他们根据对短期内经济与政治形势的预测进行交易；第三种股市参与者则由那些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组成。

德拉维加还将他所谓的“关于股票交易本身看法”的基本分析与技术性分析加以区分。他清楚地阐释了现代仍在通行的“根据谣传买入”以及“根据新闻卖出”的原则，即“对一件重大事件的期望比事件本身对交易的影响更深”。换句现代时髦的说法就是，“伟大的傻瓜理论”阐明了德拉维加“投资人不需要警戒过高的价格”这一理念（“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有多少人就会相应地有多少投机分子，总会有让你摆脱焦虑的买家……”）。现代术语“精明的投资”恰当地勾勒出了德拉维加认为“吸引了无数追随者”的那些狡诈的投机商们的嘴脸。

读过《混乱中的困惑》的人一定会有“在过去的300年里，证券交易的任何创新都是偶然的”这一鲜明的印象。在股票市场诞生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期货交易与期权交易就已经开始了常规的运作。对于零星的散户（odd-lotters）而言，当时还有一些幽灵般的“达克顿（ducaton）影子股票”，每一份达克顿虚拟股票的名义价值都只有实际股票价值的1/10。

在德拉维加的时代，证券管理者也已经出现。实际上，当时的证券管理者设计出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不再使用的打击市场操纵的办法。市场看管者们虽然禁止进行卖空交易，却没有费神劳力地执行这一规定，他们反而允许卖空交易的输家通过“求助于弗雷德里克”而拒绝履约。

知道“自己的利润可能被别人抢走”这一点似乎能够有效地阻止那些藐视法律的违规者们，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市场规则都无法完全消除股票投机商们恣意妄为的瞎搞胡来。交易商们通过结党营私以及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诡计来操纵市场，公然反抗对他们的遏制活动。德拉维加认为，空

多头交易商们到处散布谣言，通过冻结一切能够到手的保证金以挫败多头交易商，并且刻意压低政府债券的价格以煽动起人们对于战争和政治危机的恐慌情绪；而多头交易商们则发布虚假的报价，伪造买入指令，并且通过假装与空头为伍促使空头交易商陷入圈套。

德拉维加如此翔实地描绘了这些阴谋，以至于他差点儿将自己的论著题目定为《勾结之勾结》。按照德拉维加的描写，投资者的困惑主要不是疯狂或者妄想的问题，相反，市场的跌宕起伏反映出了不顾市场基本情况任意改变价格的精心策划的阴谋。由于突然回升或是突然卖空这些诡计并非依据事实，所以没有参与这项阴谋的人无法解释由此产生的价格走势的改变。

如今，和德拉维加时代一样，迷茫困惑的投资者们拼命想要从这混乱芜杂的表象之中理出头绪。被股票价格与股票基本价值之间的差异搞得晕头转向的投资者们开始自己研究价格变动的形态和规律。他们暗自推测：如果市场连续多日都在下跌，那么价格必定会转而回升；另一种情况则是，如果正在上涨的价格加速上涨，那么这其中一定大有名堂。

华尔街的至理名言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永远存在的两难困境有关，并且由于两难问题从未沿着其中的一个价格方向或者另一个方向得到过解决，所以投资的老油条们通过散布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至理名言而名利双收。一方面，投资者应该遵循某一条被普遍采用的规则，尽量减少损失、增加利润；另一方面，要提醒那些精明的老手们，“贪婪的人终将成为穷人”。还有一句老生常谈的玩笑话，“有牛市、熊市，也有猪市。”那么，现在的股市是牛市、熊市，还是猪市呢？投资者们是尽力抑制“能赚钱时就大捞一笔”的冲动呢，还是见好就收，拿了钱走人呢？

据记载，德拉维加的立场是把握好已经到手之物（德拉维加说“拿走所有的获利，不要惋惜损失的利润……”）。然而，一些市场的领袖人物则认为，在任何特定的关键时刻知道应该选择哪条道路还是容易办到的。要想做到这一点，只需要一个市场的技术人员能够轻松提供不会出错的可靠的交易体系。

依照该流派的见解,并非每个投资者都能发财致富的真正原因在于心理因素。人们有时可能会过度情绪化,从而导致他们违背自己的交易原则,而这种情绪化很有可能是孩童时期的心灵创伤留下的后遗症。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种治疗这种心理创伤的办法。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的话,至少有一类特殊的咨询人员很乐意为你诊治,不过他们是要收费的。这些咨询专家认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战胜非理性的冲动。

当然,这种心理咨询和诊治并不能保证你的交易一定能够盈利。事实上,有关心理咨询对投资者有效的临床证明甚少。举例而言,如果神智清醒和心理健康对于交易盈利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水牛合伙人”的负责人约翰·缪尔希伦(John Mulheren)所取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功呢?约翰·缪尔希伦不仅坦言他深受狂躁症的折磨,而且还专门开办了一家名为“疯子之家”(Crazee's)的冰激凌店以示庆贺与纪念。

《混乱中的困惑》虽然谈到了股市里人们的心理层面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德拉维加从未暗示说交易盈利只是一个战胜心理障碍的结果。毕竟,如果市场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非理性行为的话,那么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无济于事。德拉维加不太赞同那些认为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的人们,相比之下,他更认同那些认为“证券价格的起伏波动与那些万能的‘内部人士’有关”的观点。

现在,尽管操纵市场与内部交易受到禁止,但是市场一如既往地有一些阴谋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上。许多投资者隐隐约约地认为,如果价格的下跌没有明显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操纵价格。每当一只股票莫名其妙地突然上涨却没有官方新闻说明原因之时,“他们”总是知道一些别人不知晓的事情。也许投资者们有点儿妄想,但是投资者们相信他们的损失是一些卑鄙的阴谋导致的必然结果,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稍感释然。违法交易时有披露,足以证明投资者的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

德拉维加对于阴谋操纵市场的强调引起了很多投资者的共鸣。仔细阅读

《混乱中的困惑》，你会看到一幅不完全由全能的“合谋者”掌控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可信的市场全景图。德拉维加笔下的“群熊（空头们）”永远在与“群牛（多头们）”进行争斗，因此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使股价一直沿自己希望的方向变动下去。通常情况下，人们无法预见的经济基础的任何突变都会使得一方或者另外一方时不时地占据上风。

让我们来看一下德拉维加是如何分析1688年的股市崩塌的。在德拉维加看来，股市崩塌之前的波澜不惊是充足的信用、国际证券、有利的交易前景以及良好的人口统计数据交织在一起，并且最终形成一种看涨的交易前景的综合反映。随后，又纷纷传来诸如“交易机会增多”以及“发现了新的矿藏”等利好消息。形势一派大好，没人注意到“可能会有意外亏损”的报道。根据德拉维加的分析，投资者们已经将大众普遍预计到的但仍然会“让每一个人都感惊讶”的神奇的经济成就纳入他们的计算之中（虽然当今的市场评论专家和300年前的市场评论家们都不会为这种事情而困惑不解、大伤脑筋，但是只要简单的逻辑推理，就会发现这种事情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甚至大多数的空头受到多头牛气的感染，也转而看涨。由于他们不想卖空，所以在有关盈利下降的报告加剧了大量抛售以及催缴保证金的压力之时，市场缺少相应的技术支持。

在德拉维加的叙述中，直到此时，尚无引起困惑的原因。起初，市场价格基于最好的消息而上扬，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虽然根据作者提供的有限的资料无法判断，但也许到了某一时刻，投资者的预期开始变得走火入魔。不管怎么说，人们无法预先知道利空的情况。如果看跌的人们（空头）一边喃喃自语：“这又是一例非理性的偏执一隅和极端失控的实例”，一边卖空股票，那么他们很可能轻易地输个片甲不留。最终，看跌的人们会因为转做多头而遭受灭顶之灾。那些“他们”远非万能之人，尽管“他们”用尽一切伎俩，也无力任意操纵股价。单纯的股价波动也不能证明是投资者们失去了理智。在德拉维加看来，经济基础的改变势必导致价格的逆转。

1688年股市崩塌的结局让那些设想市场是理性的、交易是公平的人们不太放心。尽管最初已经有所估测，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获利还是十分出色，但有关战争以及为增加国防预算而提高征税的谣传使得股市非但没有继续上扬，反而下跌。据德拉维加说，空头们竟然设法吓坏那些曾经正确地怀疑战争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的人们，使之加入了抛售之列。任何一个没有参与空头的阴谋，但又戴着“有效市场”的遮阳眼镜看待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人都会对此大惑不解。如果现在查尔斯·麦凯依然健在的话，他一定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投资者们拉帮结伙地一起变得疯狂，但是他们恢复理智却很缓慢。

自从《混乱中的困惑》的首次出版以及150年之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面世以来，人性似乎没有多少改变。在今日全球出现的新型的证券市场上重新上演着昔日的教训。1994年末，墨西哥货币的突然贬值一下子扭转了1993年人们对于拉美发行的证券的盲目热情。显然，投资者情绪的急转直下不仅是约翰·劳与密西西比阴谋时期市场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市场的特征之一。事实上，约翰·劳后继有人，俄罗斯新生的起伏不定的股票市场已经造就出了新一代的约翰·劳们。

据说，谢尔盖·马夫罗迪（Sergei Mavrodi）因为向投资者保证每年3 000%的回报而在俄罗斯的富豪榜中排名第五。他的秘密武器是一种叫做“MMM”的神秘莫测的投资基金。“MMM”基金的股票不在任何一家交易所里交易，而是以基金的形式按照马夫罗迪设定的价格进行买卖。这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前数学大师在“MMM”投资基金首次发行还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将其由每股1美元炒到每股60美元。因为没有证据表明“MMM”基金拥有任何的有形资产，因而有人怀疑“MMM”投资基金及其丰厚的年回报率肯定又是一起“庞氏阴谋”。也就是说，他们推测，马夫罗迪用从后期“MMM”的买家手中得到的高价基金偿还“MMM”早期的投资者们，而当马夫罗迪不能继续买回先前已经发行在外的股票之时，“MMM”基金

发生了“自由落体运动”，“MMM”的股价陡然跌至每股46美分，与“MMM”卖得最火的峰点价格相比，跌幅高达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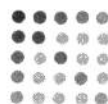
马夫罗迪运气不错，俄罗斯当时并没有制裁庞氏阴谋的相关法律。有举报人威胁马夫罗迪，说要指控他逃税，可是如同1992~1993年有人意欲指控马夫罗迪有罪一样，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当一位议员被黑社会枪杀以后，马夫罗迪扬言要竞选一直空缺的议员席位。竞选刚一获胜，马夫罗迪就宣称自己与指控的行为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者们似乎并不记恨马夫罗迪。一位雨中排队购买价格已经暴跌的“MMM”股票的年轻寡妇说：“我知道这是一起金字塔般的传销阴谋。”据她估算，当时十分便宜的“MMM”股票还会再次飙升。一位在“MMM”基金暴跌之前刚刚脱身并且净赚了5万美元的股票经纪人对于此事的看法非常具有哲理。他承认：“马夫罗迪自然是欺骗了许多人，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使这句名言广为流传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说这句话时，他的脑海里可能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与经纪人的看法可能迥异，虽然他极力倡导自由市场的理念）。总而言之，对于“MMM”的陡降，俄罗斯人虽有微词，但他们责备更多的是那些说“MMM”基金这一冒险事业坏话的政府官员，而非“MMM”的总裁马夫罗迪本人。

投资者们对于马夫罗迪的无限忠诚证实了永恒存在的德拉维加的“困惑”与麦凯的“幻想”。也许理论的发展的确能够让现今的经济学家们比其前辈们从市场的乱局之中感觉到更多理性的成分，但是理论家们无论如何必须说明：为什么那些投资者，在他们看来除了美化过的“连环信件”（庞氏骗局）之外啥也不是的阴谋之中，几乎亏空了全部家当之后仍然叫嚷着要购买新发行的“MMM”股票。只要如此愚蠢的行为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一个真正理性的投资者始终有望利用大众的疯狂为己谋利。

因此，《混乱中的困惑》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中描述的几个插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理所当然地会出现在推荐给投资者

的阅读书单之中并且为之增光添彩。21世纪的伯纳德·巴鲁克们毫无疑问地会对采访者坦言，他们将这两本书视为圣书，虔诚地查阅，并且从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今天的炒股新手们也会把德拉维加与麦凯的作品传给他们的后代，不是因为德拉维加与麦凯是先贤圣人，而是因为两人作品中的内容一如既往地引人入胜。



非同寻常的大众 幻想与群众性癫狂

查尔斯·麦凯
1841年

the owner or possessor of the
ities sold."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f
Representative Tucker of
man, listened

matter of trust."

His summation of the
effect of short selling in
market, under any condi
that this practice "so
ever affects

KEPT THE EXCHANGE OP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Would Me
Breakdown in Efficiency, He Decla

WALL ST. DISCUSSES SHORT STOCK SALES

Friends and Foes of Practice
Agree a Law Against It Would Cur-
tail Trading Sharply.

short selling was
th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brok
ers prefer a mar
can buy or sell at

TRADING PROVIDES CHECKS

Shorts "Smooth the Waves, but
Affect the Tides," He Say

PROBLEMS CITED

Reduced, Value of
in Exchange Also
Would Shrink.

With Bi
Membi

Blow to Tradin
Barring of short
crease the problem
change firms, whose
been reduced during
years by the decrease
tivity and the decli
prices. Since their comm
with the prices of sec
decline of more than 70
the average of stock
resulted in a large rec
these revenues. In Septem
more than c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

WASHINGTON, Feb. 24.
selling is essential to th
tenance of stock exchang
stock exchanges are nece
provide a market for i
Richard Whitney, preside
New York Stock Exchang
House judiciary subcomm
day.

Agitation in political and oth
cles against short selling in t
curities market.

SHORT SELLING OF

引 言

本书作者撰写下面内容的目的是将精神领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引发的流行疾病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例搜集在一起，用以说明普通民众是多么容易被引入歧途，说明人们是多么喜欢效仿他人，说明人类这种“群居动物”是多么喜欢从众，即使是在头脑发热与违法犯罪这种事情上也依然如此。

对于《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所谈到的某些话题，读者也许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作者希望读者在书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关这些话题的相当新鲜的细节，并且因此乐在其中。当然，为了对书中所涉及话题的公平，这些细节是不能完全避而不谈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对于“南海泡沫”以及“密西西比计划”的回忆比起其他书籍的描述更加完整也更加丰富多彩。“女巫狂潮”（Witch Mania）^①的前前后后也是如此，其中描写了“女巫狂潮”在德国展开的可怕经过。相对而言，在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爵士谈及这一可怕又最为有趣的话题的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著作《关于魔道与巫术的信札》（*Letters on Demonology and Witchcraft*）当中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

大众的幻想来得如此之快，传播得如此之广，历时如此之久，以致恐怕50本书尚难写完详细的过程，何况只是两卷或三卷本呢！把本书作为一本有关妄想的辑录可能比作为一部历史书籍更为恰当——它只能作为至今尚未完成的关于人类愚蠢行为的伟大而又令人生畏的鸿篇巨制中的一个章节。波森（Porson）曾经戏言，说他要为此撰写500卷的长篇巨著！穿插其中的是一些轻松的素描特写——人们昏头昏脑地效仿他人的令人捧腹的诙谐片段，而非

① 本页提到的“女巫狂潮”以及原著中提到的炼金术都与麦凯作品中的某些章节有关，但是本次再版时没有收入那些章节。本次再版只收录了那些与投机和金融市场直接相关的章节。

有关愚蠢与幻想的事例。

由于和本书无关，本书有意去掉了和宗教迷信有关的内容——单是列举宗教迷信的事例本身就可以占用一卷的篇幅。

作者打算在另一本书中收入这些内容，并且尝试用全面的观点彻底审视炼金术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哲学上的妄想，其中包括在过去年代里的蔷薇十字会员们（Rosicrucians of a bygone）[⊖]以及新世纪的催眠家们。

1841年4月23日

于伦敦

⊖ Rosicrucians是指17~18世纪一个致力于研究形而上学和神秘问题的社团的成员，该社团由Christian Rosenkreuz于1484年创建。——译者注

密西西比计划

约翰·劳 * 他的出生和青年时代 * 劳和威尔逊之间的决斗 * 劳从“最高法院”里死里逃生 * “土地银行” * 劳在大陆上的赌博倾向以及与奥尔良公爵的交往 * 路易十四执政结束后法国的状况 * 劳在那个国家发起创立的纸质货币 * 法国人民对于密西西比计划的热情 * 维拉斯元帅 * 为了与劳见上一面而采取的阴谋以及为此支付的贿赂 * 密西西比股票的剧烈波动 * 可怕的谋杀 * 劳首创金融方面的总审计员 * 巴黎各种各样装饰品的大甩卖 * 金融危机开始了 * 人们像瞎子一样盲目而又努力地挖掘着密西西比的宝藏 * 银行停止支付 * 劳被逐出内阁 * 以铸币的形式进行支付 * 劳和摄政王在歌声中被人们挖苦得体无完肤 * 几乎魂飞魄散、完全被毁掉的劳逃往威尼斯 * 王朝的末日 * 劳不得不重操赌博的旧业 * 约翰·劳客死威尼斯

南海泡沫

牛津的哈里·厄尔是始作俑者 * 交易所胡同热闹非常，一派激动人心的伟大场景 * 沃尔普尔先生 * 约翰·布朗特爵士 * 对于股票的巨大需求 * 无数的“泡沫” * 罪恶的计划和泡沫的清单 * 南海公司股票巨幅飙升 * 出人意料的暴跌 * 董事会开会 * 南海探险到达可怕的顶点 * 国会下院沸沸扬扬 * 骑士出逃 * 约翰·布朗特爵士的被捕 * 骑士在特里蒙特再度被捕 * 他的第二次出逃 * 与这一阴谋相关之人受到审查 * 他们各自遭受的惩罚 * 结论

郁金香狂潮

孔拉德·杰斯纳 ※ 郁金香从维也纳传到英国 ※ 郁金香在荷兰掀起了狂潮 ※ 它的巨大价值 ※ 一个水手和一棵郁金香的离奇轶事 ※ 正规的郁金香交易中心 ※ 作为一种投机工具的郁金香 ※ 郁金香价值的巨大贬值 ※ 郁金香狂潮的结束

密西西比计划



一些人秘密地纠集在一起，组成公司；
设立并且发行新的股票，进行着法外交易；
他们吹牛皮、说大话，利用空洞的虚名欺骗城里的人们，
先是哄抬股价，继而使之降低；
将子虚乌有之物分成许多的股份，
随意地摆布城里所有的人们。

——笛福 (Defoe)

“密西西比计划”的始作俑者约翰·劳的性格与生涯与1719~1720年的“伟大”阴谋是如此密切相关，以致没有什么比用素描对其一生加以概略更适合于介绍“密西西比计划”了。历史学家们在究竟是应该把约翰·劳视为一个骗子还是一个疯子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无论是约翰·劳在世时，还是仍然能够深刻体会到其阴谋所产生的恶劣后果之时，骂他是骗子与疯子的声音都不绝于耳，但是后人发现对他的指控有不合理之处，并且认为约翰·劳既非骗子亦非疯子，与其说他欺骗了世人，不如说他被别人欺骗得更多。他完全了解信用的哲理与原则，他比其同一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懂得钱这个东西。如果他所设计的体系突然崩溃，与其说是他的错，还不如说那些处在这

个体系中推波助澜的民众更加难辞其咎。他并没有想到全国上下竟然会如此贪婪，他也没有料到信任与怀疑竟然同样可以无限扩大，希望与恐惧一样都会过度而失去平衡。他怎么能够预见到法国人民会像寓言里的人一样，因为自己的狂热焦急而杀掉为他们生了许许多多金蛋的那只乖鹅宝贝呢！他的命运如同那个冒险渡河从伊利湖来到安大略湖的船夫。他驾船驶过的河流是如此的宽阔而且平稳，他的行程是如此急速而且愉快，谁又能阻挡他的前进呢？唉！瀑布就在眼前。等他看到为时已晚，那一路上陪伴着他，使他享受畅游之乐的河水转眼成为毁灭之水。当他奋力想要重返原来的航线之时，却发现这股湍流太急，仅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逆行，而且他越来越逼近那可怖的巨大瀑布。他被瀑布裹挟着一起越过巨大的岩石，然后跌下了深渊。他和他的小船一起跌得粉身碎骨、支离破碎，而陡然降落的湍流变得疯狂起来，撞成泡沫，经过片刻的沸腾与起泡之后，很快又像以往一样重新平稳地向前流动。对约翰·劳与法国人民来说，发生的一切亦不过如此。约翰·劳就是那位船夫，而法国人民就是那曾经给他带来了无穷乐趣，最终却又将他毁灭的滚滚浪涛。

约翰·劳1671年出生于爱丁堡，其父是法夫郡（Fife）地区一户名门望族的幼子，经营金铺生意与银行业务。他的父亲经营有道，从生意中积聚了可观的财富，这笔财富足以实现他和村民们一样的愿望，那就是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上一个代表领地的符号。为此，他在福思湾（Firth of Forth）和洛锡安（Lothian）的中部和西部的交界处分别购置了劳里斯顿（Lauriston）和兰德斯顿（Randleston）的地产，并且由此扬名，成了“劳里斯顿的约翰·劳”。我们这里要谈的主人公约翰·劳是“劳里斯顿的约翰·劳”的长子，他14岁时就去他父亲的账房里做事，在那儿辛苦工作了三年，得以洞悉当时苏格兰经营银行业务的基本原理。他总是表现出对于数字的热爱，并且因为幼年对数学的精通而被人们视为天才。到了17岁，他长得又高大又强壮，身材也十分匀称，虽然青春痘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疤痕，但他的相貌却依

然讨人喜欢，并且非常聪慧。



这时候，他开始忽视自己的生意，变得极度自负，沉溺于相当华丽夸张的华服之中。他颇受女士们的青睐，她们亲昵地称他为“美男子劳”；而男性同伴们则对他的轻浮与奢华颇为不屑，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茉莉花·约翰”。1699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这使他彻底地离开了已经变得如此令人生厌的课桌，他迫切地希望拥有父亲留下来的劳里斯顿的地产所带来的收益，他来到了伦敦，想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见见世面。

现在的约翰·劳非常年轻、狂妄自大、英俊潇洒、仪表堂堂，财产身家也还说得过去，并且十分缺乏自律、张扬肆意，因此，他一到伦敦就精力旺盛地投入到浮华奢靡的生活中去，这一点都不奇怪。他很快就变成了赌场里的常客，他根据某种深奥复杂的概率计算，制定出特定的计划，并且遵循计划行事，从而设法赢得了数目可观的赌金。所有的赌徒都非常嫉妒他的运气，许多人仔细观察他是怎样赌博的，并且把他们的赌注下在和他一样的地方。在追求女性方面，他同样如鱼得水、幸运非凡。最有品位的女士们都对这位英俊潇洒的苏格兰人报以高贵优雅的微笑。他年轻、富有，机灵过人，又乐于助人，但是，物极必反，所有这些成功都只不过为他的彻底改变铺平了道路。经过9年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无法自拔、不可救药的赌徒。随着他玩兴疯狂的增长，他对风险的谨慎和周到的考虑也逐渐消失。只有承担更大的风险、进行更大的冒险才有可能弥补巨大的损失。在某个倒霉的日子里，他的手气出奇的背，以至于赌输了全部家当。除了把他家中的房产拿来抵押还债之外，根本没有办法偿还这笔赌债。最后，他真的被逼无奈，走到了那个地步。就在同时，他的风流韵事也给他带来了麻烦。一桩与某位名叫维丽尔丝^①女士的恋爱事件，或者说小小的卖弄风情，引起了一位名叫威尔逊先生的怨恨与不满。威尔逊先生向他提出了决斗的挑战。约翰·劳接受了他的挑战，并且不幸地将自己的敌手当场射死。当天，他就被捕了，并且被威尔逊先生的亲人以谋杀罪提起诉讼，告上了法庭。后来，

^① 伊丽莎白·维丽尔丝小姐，也就是后来的奥克尼伯爵夫人（Countess Orkney）。

他被判有罪，并且被判处死刑。判决后来又被改成罚款，因为他所犯的罪行加在一起只不过是过失杀人而已。死者的一个兄弟提起上诉，约翰·劳不得不被拘留在“国王法庭”。不知怎么回事，约翰·劳成功地从“国王法庭”里逃跑了。

他究竟用了什么办法，又是如何得手的，这一切他从来没有解释过。人们组织了一个反对行政司法长官的活动，约翰·劳在一本名为《戈塞特公报》的杂志上被广泛宣传，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还为他入狱而为他颁发了一项奖励，对他进行补偿。他被描绘成：“约翰·劳大尉，一位苏格兰人，年方26岁；一位个子非常高、皮肤黝黑、精干而且没有赘肉的男人；相貌端正，身材匀称，身高6英尺^①开外，脸上长着大大的青春痘坑；大鼻子，说话声音又响又亮。”与其说这是对他的描写，不如说是为他画的漫画。据推测，这是人们为祝贺他逃走而写的。

他成功地到达了欧洲大陆，在那里，他游历了三年，并且将自己的大量精力倾注到自己经过的各个国家的货币和金融事务上。他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了几个月，对基金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投机。他把整个上午的时间用来研究金融和贸易原则，把整个晚上的时间花在赌场里。人们通常都认为他是1700年回到爱丁堡的。当然，他在那个城市里写出了《组织一个贸易委员会的目的和理由》。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和热情。

没过多久，他又出台了一项计划，要建立一家所谓的“土地银行”（Land Bank）^②。按照正常的收益率来计算，这家“土地银行”发行的票据绝对不会超过这个国家全部土地的价值；在特定时间里加上所有权的话，“土地银行”发行的票据将会等于土地的价值。这一计划在苏格兰国会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见解各异。一个被人称做“中队”的中立党派提出了建立这样一家银行的动议，而约翰·劳已经赢得了这个党

^① 1英尺 = 0.3048米。

^② 当时的智者将它称为一座“沙坝”（a sand bank），它将摧毁这个国家的船舶。

派的好感。国会最终通过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建立任何形式的纸质信用，并强制其流通，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次不恰当的、功利主义的行动。

这项计划宣告失败。在约翰·劳争取就杀害威尔逊先生的事件获得谅解与宽恕的努力落空之后，约翰·劳离开了苏格兰，重返欧洲大陆，并且重新操起赌博的旧业。接下来的14个年头里，他继续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足迹遍及佛兰德斯（Flanders，包括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部分地区）、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兰西。他很快就对贸易的范围以及各国的资源情况有了一个清楚而全面的认识，并且日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没有纸币的国家，是不可能繁荣富强的。在整个游历与思索的时期里，他似乎主要是依靠成功的赌博来维持生计的。在欧洲各国首都的每一个著名的赌场里，人们普遍认为他比当时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富有技巧，能够处理复杂深奥的概率问题，把握先机，因此，他在那里颇为出名，也颇受人赞赏。他的《自传》里记载说最初他被地方行政官员逐出了威尼斯，后来又被逐出了热那亚，因为那里的地方官认为，对于本城的年轻人来说，他是一个太过危险的观光客。在滞留巴黎期间，他自作自受，轻易就受到了警察局中将阿金森的制裁——阿金森命令他立刻从巴黎消失。不过，在接到驱逐令之前，他已经在沙龙里结识了万多姆公爵（Duke de Vendôme）、孔蒂王子（prince de Conti）以及光芒四射的奥尔良公爵，命中注定，后者后来对约翰·劳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很喜欢这位苏格兰冒险家身上洋溢的旺盛的活力和良好的感觉，而约翰·劳也非常喜欢这位注定要成为自己保护人的王子过人的机智以及和蔼可亲的样子。他们经常出席对方举办的社交活动，约翰·劳还抓住一切机会向这位命中注定与王冠仅仅一步之遥的公爵脑海中灌输自己的金融主张与信息。是的，这位公爵注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政府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在1710年，约翰·劳向审计官狄斯马里兹提交了一份财务计划。据称，路易十四曾经过问此事，想

知道这个计划的倡导者是否是一位天主教徒，当他得知约翰·劳不是天主教徒之后，他拒绝和约翰·劳扯上任何关系。^①

在遭受这次打击之后，约翰·劳来到了意大利，他的脑子里仍然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融资计划。他向“萨沃伊公爵”维克多·阿马迪厄斯（Victor Amadeus, Duke of Savoy）提议，在那个国家建立他的土地银行。公爵回答道，相对于执行这样如此伟大的一项计划来说，他的支配权实在太有限了，而他又是一个太过无力的当权者，太容易被毁于一旦，不过，他建议约翰·劳再到法国国王那儿碰碰运气，因为他确信，如果约翰·劳能够对法国人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法国人民会对这样一个既新鲜又似乎颇有道理的计划感兴趣的。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王位的继承者是一位年仅7岁的小毛孩。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在国王未成年之前承担管理政府事务的职责。现在，约翰·劳发现自己的处境有利多了。他事业的潮流已经来到了，这股潮流将会把他带入飞黄腾达之境。摄政王是约翰·劳的朋友，早已熟悉他的理论和抱负。此外，他还有意支持约翰·劳为拯救法兰西伤痕累累的信用所做的任何努力。在路易十四长期奢侈浮华的统治之下，法兰西的信用已经一塌糊涂。

专制的路易十四刚被埋进坟墓，人民群众对他压抑许久的仇恨便爆发了出来。路易十四的一生一直被阿谀奉承包围，身边的人们都肉麻地吹牛拍马，历史上恐怕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现在，他却被人们指责为暴君，一个心胸狭隘而又固执的人，一个掠夺成性的盗贼。他的塑像被人们打得变了形，他的画像被人们撕扯下来，为老百姓所痛斥，遭到世人的唾骂，就连他的名字都成了自私和压迫的代名词。他的军队昔日的荣耀被世人遗忘，除了他的倒行

① 这段轶事与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王的母亲德巴维尔夫人（Madame de Bavère）的信件有关。约翰·卢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在他的《从乌得勒支和平时期开始的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State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中对这件事提出了怀疑，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理由。毋庸置疑，劳向狄斯马里兹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而路易十四拒绝听取有关的报告，拒绝的理由与这位固执而又专制的统治者的性格颇为吻合。

逆施、奢侈无度以及残暴冷酷之外，人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国家的金融处于一种极端无序、混乱的状态。一个大肆挥霍、腐败堕落的统治者，他的挥霍与腐败几乎被所有的官员效仿，从职位最高的官员到级别最低的官员，几乎每个官员都竭尽所能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将法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国家的债务总额高达30亿里弗（Livres，法国一种旧的货币单位，1里弗相当于1古斤的金子或是银子的价格，而法国古代1斤合489.5克），而整个国家的年收入只有1.45亿里弗。仅仅是政府开支这一项，每年就要花费1.42亿里弗，只剩下300万里弗来支付30亿里弗债务的利息。摄政王关心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如此规模巨大的灾祸寻找一剂药方，而他也早已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来思考这个问题。圣西蒙公爵（Duke de St. Simon）认为，沉痾还需猛药医。除了一剂当时看来颇为大胆而又十分危险的药方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将法兰西从革命中挽救过来。他建议摄政王召集政府要员，宣布国家破产。诺埃利斯公爵（Duke de Noailles），一位坚持“通融”原则的人，一位成功的朝廷大臣，极其不愿意那些高明的见解给自己带来任何的麻烦或者苦恼，他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影响力，来反对圣西蒙的计划，他将圣西蒙公爵的权宜之计说成是虚伪的和灾难性的。摄政王的看法和诺埃勒斯公爵一样，因此这个孤注一掷的药方被否定了。

最终得到采纳的方案尽管口口声声承诺要保证公平，结果却不过是助纣为虐，使灾难更加严重。第一种方法，也是最不诚实的方法，对这个国家没有一丁点儿的好处，货币被奉命改铸了，通货的币值贬值了1/5。那些拿着1 000块金币或者银币来到铸币厂的人又拿回了与名义价值相同的硬币，只不过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4/5而已。通过这种计谋，财政部得到了7 200万里弗，而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业运作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况。政府用一点微不足道的税收减免平息了人民的愤怒与不满，为了一点点眼前的利益，可以预见的巨大灾难被人们忽略了。

接下来，政府组织了一个正义法庭（Chamber of Justice）调查贷款合同

签订方的营私舞弊行为和农场主的收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征税人员都永远不会受人欢迎，但是这个时期的法国税收人员却理当受到他所承受的一切憎恶与谴责。当这些包税人^①和他们下一级的所有的代理人（他们被称为税务员，Maltôtiers^②）被传唤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后果时，这个国家沐浴在前所未有的喜悦之中。主要为了这个目的而组建起来的正义法庭被赋予了极为广泛的权力，它由国会的主席和委员会、援助法庭（Courts of Aid）和请求法庭（Courts of Request）的法官以及会计署的官员组成，由财政部统一指挥。他们鼓励检举者提供证据，将罪犯绳之以法，并且承诺将罚款和充公的赃款赃物的1/5作为奖励奖赏给举报人，他们承诺将属于罪犯的所有隐瞒不报的财产的1/10用于寻找这些隐藏着的财产。

组建这个法庭的公告颁布实施，在那些与此关系最重大的人们之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这种反应只可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盗用的税款数额可能无比巨大，但是他们的惶恐却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同情，对他们提起的诉讼引起了他们的担忧。巴士底狱很快就人满为患了，容纳不下那些被送来的犯人，而全国各地的监狱也都已经塞满了罪犯或者嫌疑犯。所有的旅店店主和负责为旅客提供膳宿和驿马的人都接到了一道命令，不许向那些急于逃跑的家伙提供马匹。任何人都不许收容罪犯或者为其逃跑提供方便，违者处以高额罚款。有的罪犯被处以颈手枷刑，戴着颈手枷游街示众，有的则被送上囚船，罪行最轻的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人被判处了死刑，那就是萨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一个远离首都的遥远省份的富有的银行家兼包税人。这个家伙得到的非法收入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为了逃跑，情愿出价600万里弗，或者是25万英镑。在他管辖的地区里，他被人们视为残酷贪婪的暴君和压迫者。

他为逃命提出的贿赂被拒绝了，他受到了死刑的惩罚。其他的人或许罪

① 包税人预先向国家交一笔巨款，然后再去收税，至于再向老百姓收多少，国家便不管了。

② 源自Maltôte，一种强制性的收税。

恶更大，却比他走运得多，保住了自己的小命。由于违法者藏匿了赃款，充公的财产往往还不够缴纳罚款。政府面临的艰难局面有所缓和，对所有的违法者不加细分地征收了本该在税收名义下收取的罚款，但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是如此腐败，以至于国家从这些流入国库的资金之中虽有受益，却也实在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宠臣以及宠臣的妻子和情妇们得到了主要的战利品。一位包税人被征缴的税金与他的财富和罪行成正比，总额高达1 200万里弗。在政府中颇有点儿影响的某某伯爵，召见了这位罪犯，并提出可以努力争取免除他的罚款，只要他交给此公10万克朗宁（crowns，英国旧币制的硬币单位，1个克朗宁合5个先令）即可。“您来得太晚了，我的朋友。”这位金融家回答道，“我早就已经和您的妻子谈好价钱了，成交价5万克朗宁。”^①

大约有1.8亿里弗是以这种方式被征收上来的，其中的8 000万里弗被政府用来支付国家债务，剩下的钱财都被想方设法地弄到了大臣们的口袋里。就这一问题，梅塔隆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写道：“我们每天都听到摄政王给予一些新的赏赐，把那些从盗用公款的人手里拿回的钱派到这种用场上，使得人们颇有微辞，议论纷纷。”在不满与怨恨经过最初的爆发得到宣泄之后，人们对弱者普遍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之心。他们义愤填膺，认为政府是小题大做，为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人们看得出来从一部分无赖那里夺走他们侵吞的民脂民膏，并且用这些民脂民膏来养肥另一帮无赖，这其中有什么公平可言！

仅仅数日之内，所有那些罪行较为严重的家伙都已经受到了惩处，而正义法庭为了延续自己更加卑下的生命，四处寻找牺牲品。职业告密者在高额

① M. 德拉侯德（M de la Hode）在他的《奥尔良的菲利浦的生活》（*Life of Philippe of Orleans*）一书中谈到这一轶事。如果他给出了这一契约制定人的名字以及那位更加不诚实、更加不正直的官员的名字的话，这件轶事就会显得更加真实可信了，但是，M. 德拉侯德的作品就像与此有关的以及后来的绝大多数的法国回忆录一样，遭到了同样的异议。对于他们绝大多数人而言，一桩轶事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了，即使它是不真实的也无伤大雅，准确性则在其次考虑。

悬赏的引诱下，指控那些品行端正的生意人犯有欺诈和勒索之罪。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些无辜的人们不得不在这个法庭上公开自己的许多事务。一时之间，怨声四起。一年将至，政府发现制止事态进一步蔓延实乃明智之举。正义法庭被解散了，所有那些至此还没有受到指控的人都得到了大赦。

约翰·劳出现在这场金融混乱的舞台之上。没有人比摄政王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状况之可叹，但是也没有人比他更加不愿像个男人那样英勇无畏地用自己的肩膀阻挡前进的车轮。他不喜欢生意；他在未经适当审查的情况下签署官方文件，并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委托给他人。对他来说，他的高级公署必须关注的事务着实令人头痛。他知道，他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但是他缺乏采取行动的精力，也没有足够的美德去牺牲自己的安逸和悠闲来担此重任。由于这种禀性，无怪乎他会如此兴致勃勃地倾听这些庞大的计划，它们是如此的易于执行，又是自己早已熟识的聪明的探险家提出来的，而此人的才干又是自己所赏识的。

当约翰·劳在宫廷中出现时，他得到的是最最衷心的欢迎。他向摄政王提供了两份备忘录，在这两份备忘录中，他指出了困扰法兰西并使之衰落的罪恶之源，认为正是由于通货不足，才导致了法国货币屡屡贬值。他断言，没有纸币作为辅助和支持，单一的金属通货完全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需要。他还特别引用了大不列颠和荷兰的例子来证明纸币的优越性。他用许多强有力的论据来论证信用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恢复法兰西信用的方法。当时的法国是如此之衰弱，应当允许他开立一家银行，由这家银行来管理皇家每年的税收，并且在税收和不动产证券的基础上发行票据。他进一步提出这家银行名义上应当直接由国王管理，但是要受到议会指定的专员们的控制。

这两份备忘录尚在考虑阶段之时，约翰·劳将自己关于货币和贸易的论文翻译成了法文，并且使尽浑身解数，举国上下竭力宣传自己作为一位金融家的声名，很快他就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人物。摄政王的心腹知己们也四处

宣扬摄政王对约翰·劳的褒扬之辞，每个人都期盼着一睹拉斯先生（Monsieur Lass）^①的壮举。

1716年5月5日颁布了一份皇家布告，该布告授权约翰·劳与约翰·劳的兄弟一起，以约翰·劳公司（Law and Company）的名义成立一家银行，在支付税收时，要接受这家银行的票据。这家银行的本金固定在600万里弗，每股500里弗，一共是1.2万股，其中的1/4可以用金属铸币购买，剩余的部分则必须用政府公债购买。人们认为，除非有经验表明约翰·劳的提议是安全而且有利的，否则赋予约翰·劳在备忘录中所要求的全部特权就是不合适的。

现在，约翰·劳可谓吉星高照，平步青云了。他3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被用来指导其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他的票据全是见票即付的，在发行的时候就可以与等额的金属货币兑换。最后这一招可谓神来之笔，立刻使他的票据身价倍增，价值甚至超过贵金属货币。因为贵金属货币的币值不稳，在政府不明智的操作之下，总是有可能贬值。某一天，1 000里弗的银币可能相当于它的名义价值，而第二天，它的价值就有可能缩水1/6，但是约翰·劳的银行所发行的票据却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价值。与此同时，约翰·劳还公然宣称，如果哪位银行家在发行银行债券的时候没有足够的保证以满足所有的需求，那么他真是罪该万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约翰·劳的票据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窜升，而且，其价格比铸币还略高1%。很快，国家的贸易也感受到了约翰·劳所带来的好处。日见衰弱的商业开始好转，有些复苏。税款的缴纳也更加有章可循，并且百姓对纳税的抱怨与不满也大大减少了。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已经树立起了信心，相信这个体系不会崩溃，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的话，只会更加有益。仅仅一年时间，约翰·劳的票据就升值15%，而政府公债，或者说政府为穷奢极侈的路易十四所欠下的债务提供担保而发行的票据的价值折扣却不低于78.5%。这种鲜明的对比对约翰·劳而言大有

^① 拉斯先生是法国人对约翰·劳名字的特殊发音，以回避不雅的发音“aw”。在约翰·劳的计划破灭之后，爱开玩笑的人打趣说这个国家成了“Lasse de Lui”（他的拉斯），并且提议将来称约翰·劳为“海拉斯先生”（Monsieur Helas，哎呀先生）。

裨益，以至于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整个王国的注意，而约翰·劳的信誉也与日俱增。他的银行在里昂、罗谢勒（Rochelle）、图尔斯（Tours）、亚眠（Amiens）以及奥尔良的分支机构几乎同时开张营业。

对于约翰·劳的成功，摄政王似乎极为惊讶，大感意外，并且他也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纸币可以如此有力地支持金属货币，以至于它完全可以替代金属货币，他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与此同时，约翰·劳开始着手策划那个让他遗臭万年的著名计划，他向摄政王提出建议（摄政王现在对他已经是言听计从，唯其马首是瞻了），成立一家拥有与伟大的密西西比河及其西岸的路易斯安那州进行贸易的独占性特许权的公司。人们猜想，那个遥远的国度盛产贵重金属，富庶至极；而这家拥有排他性特权的公司，凭借其独有的商业机遇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必将成为唯一的税收包税人，成为唯一的金钱铸造者。正式的授权书颁布于1717年8月，这家公司应运而生。公司的资本金被分割成20万股，每股价值500里弗，所有这些资本金都可以用公债来支付，公债的价格按照票面价值计算，尽管他们在市场上的价格只有160里弗。

投机的热浪现在开始席卷全国，举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疯狂之中。约翰·劳的银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约翰·劳做出的任何他认为是合适的对于将来的承诺都会被人们奉为圭臬，绝无丝毫怀疑。摄政王每天都会赋予这位吉星高照的设计者更多新的特权，约翰·劳的银行获得了烟草销售的垄断权以及提炼黄金和白银的独有权，并且最终摇身一变，成立了法兰西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France）。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约翰·劳和摄政王都忘掉了自古以来圣贤大声疾呼的真理——在发行银行债券时，一个银行家如果没有必需的资金作为准备，他就罪该万死。约翰·劳的银行刚刚从一家私人银行变成公共机构，摄政王就敦促它制造总额高达10亿里弗的纸币。这是第一次背叛稳健的原则，约翰·劳则为此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当银行事务在他的控制之下时，他发行的钞票从未超过6 000万。约翰·劳是否反

对过这次不正常的增发钞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鉴于此事发生在银行刚刚成为一个皇家机构之时，为了公平起见，人们只好将对制度改革的指责归结到摄政王的头上。

约翰·劳发现自己生存在一个以专制统治为特征的政府的屋檐之下，但是他尚未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政府可能会对复杂微妙的信用系统带来多么巨大的恶劣影响。后来他从自己的切肤之痛中体会到了这种致命的影响，但为时已晚，他只能身不由己地在摄政王的敦促下去做自己的原则绝不允许的事情。因为一个最应受到谴责的弱点，他助纣为虐，帮助摄政王用纸币“水淹了”这个国家。这种纸币没有坚实的后盾，注定要一落千丈，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眼前异常的繁荣令他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以至于他看不到那迟早会降临到他头上的倒霉的一天——万一哪天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警报响起，他注定会大难临头。从一开始，议会就非常嫉妒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约翰·劳的影响力，此外，他们还对约翰·劳的计划的安全性非常担忧，充满疑虑。随着约翰·劳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对约翰·劳的憎恶与仇视也与日俱增。大臣德·阿古苏（D'Aguesseau）之所以被摄政王无礼地免去了职务，就是因为他反对大量增发纸币，反对国内金币和银币的持续贬值，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增加议会对约翰·劳的仇恨与不满。当德·阿金森（D'Argenson），一个全心全意为摄政王效忠，一心想投其所好的家伙被指派去担任阿古苏留下的职位空缺，并且同时被委任为财政部长的時候，他们的愤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位新上任的财政大臣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使铸币进一步贬值。为了彻底清除政府债券，阿金森下令，凡是将4 000里弗的金属铸币和1 000里弗的政府债券拿到造币厂的人都应拿回5 000里弗的铸币。德·阿金森常常向人夸耀自己是如何创造性地把4 000枚又大又旧的铸币改造成5 000枚又新又小的里弗铸币的，而对于交易和信用的原则无知到极点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对贸易和信用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伤害。

议会立刻看出这样一个体系的失策和危险所在，并且反复向摄政王进言

献策，规劝摄政王放弃这一荒谬的计划。摄政王不听他们的要求。此时，议会采取了一次大胆而异乎寻常的越权行动，下令在支付时只能接受符合原有标准的足值货币。摄政王勃然大怒，召集了一次审判会议，宣布上述命令无效。议会拒不服从，又颁布了另一条法令。摄政王又一次行使特权，宣布无效，直到议会采取了更加激烈、更加强硬的反对立场，于1718年8月12日通过了又一项法令为止。该法令禁止约翰·劳的银行与国库岁入的管理发生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并且以重刑威胁，禁止任何外国人以自己或者他人的名义插手国家金融事务的管理工作。议会将约翰·劳视为罪魁祸首，并提议将其移交法庭进行审判，如果他被判定有罪的话，约翰·劳将在审判法庭的门前被处以绞刑。

约翰·劳极度惊恐如丧家之犬，仓惶逃到皇宫，请求摄政王的保护，并且乞求摄政王采取措施迫使议会屈服。摄政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心，不只因为这件事情触动了他，还因为与曼恩公爵（Duke de Maine）和索洛斯伯爵（Count of Thoulouse）这两位已故国王的儿子的有关争论。最终，议会被镇压了下去，议长和两位议员遭到了拘禁，并被送到遥远的监狱。

于是，笼罩在约翰·劳的前程之上的第一朵乌云被吹散了。当约翰·劳不再为其人身危险担惊受怕之时，他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他那尽人皆知的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尽管议会一再阻挠，表示异议，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价格依然迅速攀升。

1719年初颁布的一项法令授予密西西比公司与东印度、中国、南海进行贸易的独家专有特权，并将科尔伯特（Colbert）创建的法国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的所有财产交由密西西比公司经营。在业务有了如此巨大的增长之后，密西西比公司认为将自己的名称更改为印度公司（Company of the Indies）更为合适，并且增发5万股新股以扩充资本。现在，约翰·劳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前景再辉煌不过了，他承诺对价值500里弗的每股股票每年派发200里弗的股利。对于那些以公债的名义价值购买的股票来

说，其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格不过是100里弗而已，因此，仅仅股利这一项的利润率就高达120%左右。

不断持续上涨的公众热情又怎能抗拒如此辉煌灿烂的前景的诱惑呢！实际只发行了5万股新股，而请求认购的数量至少有30万股。约翰·劳位于坎康普瓦大街（Rue de Quincampoix）的房子从早到晚，总是被前来认购新股的焦急万分的申请人围得水泄不通。由于并非所有的认购者都能如愿以偿地购得新股，所以约翰·劳足足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列出幸运的新股东的名单。公众的焦虑在这段时间达到了疯狂的顶峰。每天，公爵们、侯爵们、伯爵们，连同他们的公爵夫人、侯爵夫人以及伯爵夫人，在约翰·劳的大门前的街道上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等着打听认购的结果。最后，为了避免成千上万平民百姓拥挤（这些群众挤满了约翰·劳所在的那一整条大街），这些贵族老爷太太们租下了邻近的公寓，等候在财神庙的附近，以便新的财神爷出来散发财富之时能够抓住机会，及时知晓。每一天，旧股的价值都在增长，而全国上下的人们在耀眼的黄金美梦的吸引之下，发出了更多新的购买申请。这些认购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认为应当发行不少于30万股新股，每股500里弗，以便摄政王能够利用公众的热情来偿还国家的债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15亿里弗。国民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只要政府授权，3倍于此的总额也可以轻松地被预订出去。

约翰·劳现在如日中天，身处成功的顶峰，而民众则在迅速接近意乱情迷、昏天黑地的顶点。无论是最高贵的阶级还是最低下的阶级，全都对未来富裕的前景充满着信心与期待。除了圣西蒙公爵和维拉斯元帅，上流社会的名人没有不热衷于买卖股票的。无论男女老幼还是贫富贵贱，全都对密西西比证券的涨跌进行投机。坎康普瓦大街成了投机者主要的出没之地，这条街道狭窄而且很不方便，由于聚集的人群太多，造成的交通压力太大，交通事故频发。这条街上的房屋平时一年的租金也不过1 000里弗，现在却暴涨到1.2万里弗甚至达到1.6万里弗。坎康普瓦大街上的一位修鞋匠出租自己位于

大街上的一个摊位，他在那儿为经纪人及其客户准备好书写的工具和材料，靠此每天就可以净赚大约200里弗。还有一个故事更邪乎，一个驼背男人站在坎康普瓦大街上赚取了相当可观的收益——他的生财之道颇为有趣，竟然是将自己的驼背出借给那些心急火燎的投机人，作为他们的写字桌！聚集在一起做生意的一大群人引来更大群的投机者，而这些人又吸引来巴黎所有的小偷和道德败坏者，骚乱和混乱时有发生。每当夜幕降临之时，总要派遣一队士兵打扫街道、维护治安。

约翰·劳意识到自己居住的地方有诸多不便，于是搬迁到旺多姆广场，而成群结队的投机商们尾随其后，追至旺多姆广场。

原本空旷宽敞的旺多姆广场顷刻间变得像坎康普瓦大街一样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从早到晚，旺多姆广场像一个集市一样热闹非凡。售货小亭和帐篷拔地而起，为商务交易和餐饮点心的销售提供场地，赌徒们更是带着他们的轮盘赌桌在广场的中央位置安营扎寨，从成群的人们的口袋里攫取黄金或者纸币，赚得盆满钵满。林荫大道和公共花园无人问津，欢乐的聚会总是首先挑选旺多姆广场，使之成为休闲娱乐的时髦场所，同时也是行色匆匆的人们的集合之地。广场上一天到晚总是那么吵闹，以至于庭院位于广场当中的审判长向摄政王和市政当局叫苦不迭，抱怨自己根本听不清辩护人的辩词。当约翰·劳被牵扯进来的时候，他表示非常愿意提供帮助，将喧嚣嘈杂挪到别处去。为此，他与卡里格南王子（Prince de Carignan）就索伊森旅店（Hotel de Soissons）的问题达成协议。该旅店的后面有一块几公顷面积的花园，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约翰·劳以天文数字的高价买下索伊森旅店，而王子则为自己保留旅馆后面巨大的花园，作为新的利润来源。这些花园里有一些精美的雕塑，还有几座喷泉，布局和设计都很有品位。约翰·劳刚刚入住他的新居，就有一项法令公诸于众，禁止所有人在索伊森旅店花园以外的任何地方买卖股票。花园的树丛之间建起了大约50座大大小小的各式帐篷，为股票投机者提供便利。这些帐篷色彩各异、花色繁多，上面飘扬着艳丽的丝带

和旗帜。行色匆匆的人群川流不息，在这里进进出出。各种声音不断地在耳边鸣响，此起彼伏，人声的喧哗、音乐、群集的人们脸上的喜悦之光与交易进展交织而成的一种奇怪的混合体，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使这里弥漫着一种迷人的气氛，这种魔力使巴黎人狂喜不已。卡里格南王子在幻觉持续的那段时期赚取了不计其数的利润。每个小帐篷每月的租金都有500里弗，而旅馆花园里至少有500个小帐篷，仅此一项，他的月收入就高达25万里弗，或者相当于1万英镑。

正直忠实的老将维拉斯元帅目睹了这一场令其国民受到重创的疯狂之后，变得如此恼怒以至于每当他提起此事，从未心平气和过。有一天，当这位脾气暴躁的绅士乘坐马车穿过旺多姆广场的时候，他被人们发热的头脑弄得怒火中烧，以至于他断然命令自己的车夫停车，并将自己的脑袋探出窗外，向钱迷心窍的人们滔滔不绝、义正辞严、痛心疾首地大声宣讲了足足半个钟头，希望能够将他们从“令人恶心的贪婪”之中骂醒。对他而言，这并非明智之举，回应他的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表示反对的嘘声、大声的狂笑以及矛头直接指向他的无数笑话。最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一件实实在在的物体飞过天空砸向元帅的脑袋，元帅立刻落荒而逃，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重复过这样的试验。

两位素来头脑清醒、冷静、富有哲学思想的文人——M. 德拉莫特（M de la Motte）和塔拉森神父（Abbee Terrason）互相祝贺，庆祝彼此至少没有陷入这场奇怪的癫狂之中。可是没过几天，当那位了不起的神父正从索伊森旅店里面往外走时——他来此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他恰巧看到他的朋友M. 德拉莫特出于同样的目的走进索伊森旅店。“哈，”神父笑着问道，“是你吗？”“是的。”M. 德拉莫特回答说，边说边尽可能迅速地从神父的身边溜过，“可能是你吗？”下一次这两位学者再度相逢之时，他俩大谈特谈哲学、科学与宗教，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能鼓起勇气提及与密西西比公司相关的任何字眼，最后，终于提到此事时，他们一致认为，人们

不该发誓说绝对不做某件事情，没有哪一种放纵与奢华是人们所不能的，即便智者亦是如此。

在这期间，这位新的财神爷约翰·劳转眼之间已经变成了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人物。朝臣们不再团团围聚在摄政王的前厅里，贵族、法官、主教们一窝蜂地拥向索伊森旅店，陆军军官和海军军官、拥有头衔的时髦贵妇以及每一位因世袭的等级或者聘任的公职而拥有优先权的人物，都可以在约翰·劳的前厅里找到他们的踪影，他们无一例外地跑来乞求获得一份印度公司的股票。约翰·劳终日琐事缠身，以至于他所能接见的认购者还不到认购总人数的1/10。因此，为了见上约翰·劳一面，人们挖空心思，各出高招，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那些以往只要摄政王让他们等上半个钟头才召见就会怒火中烧，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害的贵族们，现在为有机会见到劳大人，可以心甘情愿地等上6个钟头。人们支付给约翰·劳的仆人数不胜数的小费，只要仆人们愿意在约翰·劳的面前通报一下自己的名字，高贵的夫人们出于同样的目的使出了浑身解数，抛出最迷人的笑颜，即便如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为了能一睹约翰·劳的风采，仍然不得不一天天地等待下去，往往要等上两周的时间才能荣幸地与约翰·劳会上一面。当约翰·劳接受邀请参加聚会的时候，他常常会被那些女士团团围住，要求在约翰·劳的新股东名单上署上自己的芳名。尽管约翰·劳素有英勇豪侠、怜香惜玉之名，但是碰到这种阵式，仍然不得不36计走为上策，一走了之。

为了能够与约翰·劳交谈几句，有人居然使出世界上最为荒唐可笑的诡计。一位女士一连几天都没能等到与约翰·劳面谈的机会，灰心丧气而又心急如焚的她彻底放弃了在约翰·劳的房子里见到约翰·劳的希望，转而把目光投向外面的广阔天地。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只要自己乘坐马车外出，车夫就必须严密监视，严阵以待，如果看到劳先生走过来，就一头撞向路旁的柱子，把她掀倒在地。车夫承诺服从命令，于是一连几天，这位女士乘坐马车在城里不停地东游西荡，心中默默祈祷着能够有机会翻身落地。她终于看见

了劳先生，于是向车夫大叫道，“快翻车！看在上帝的份儿上，现在赶快翻车！”车夫驾车撞向一根柱子，马车顷刻间翻倒在地，女士尖叫起来。约翰·劳目睹了这场车祸，赶紧跑到出事地点给以援助。这位狡猾机敏的女士被领到索伊森旅店，很快，她便认为自己应该从惊恐慌乱之中恢复过来。在向劳先生赔礼道歉之后，她坦白了自己的诡计。约翰·劳被这个小小的诡计逗乐了，将这位女士的芳名写入了他的股东名册，使她成为一大笔印度公司股票的主买。

另一则故事与德·波莎夫人（Madame de Boucha）有关。波莎夫人知道劳先生每天都在一家固定的餐馆用餐，于是乘车前往，并且谎报了火警。食客纷纷离桌而去，剩下寥寥数人，而约翰·劳正是其中之一。约翰·劳看见一位女士千方百计挤进餐厅，向自己走来，而其他的人却都在不顾一切地向外挤。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向另一个方向落荒而逃。

与约翰·劳有关的轶事数不胜数，其中有些即便有点夸张，仍然值得保存和流传，因为它们生动地折射出那一时期独特的世态人情^①。有一天，摄政王当着德阿金森、杜波瓦伊神父以及其他人的面提到自己很想对一位地位至少是公爵夫人的女士委以重任，照顾他那位在摩德纳（Modena）的女儿。“不过，”摄政王补充道，“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这样一位女士。”“我知道，”其中一位假装吃惊地回答道，“我知道在巴黎有这样一个地方，您可以在那儿找到所有的公爵夫人，您只要去劳先生家就行了，在那里，您会在他家前厅里看到每一位公爵夫人。”

M. 德希拉克（M. de Chirac），一位成就斐然的医生，在一个不走运的时候购买了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且急于出手，但是股票一连两三天不断地下

① 喜欢探究新知的读者可能会对那些焦急万分的法国女士们希望将约翰·劳留在她们身边的传闻轶事感兴趣，这些传闻有时令约翰·劳脸红，有时令约翰·劳发笑，脸红还是发笑完全取决于约翰·劳当时的心情是温和谦逊还是与此相反。有关这些传闻轶事的记载请参见《奥尔良公爵夫人：夏洛特·伊利莎白·德巴维尔信札》（*the letters of Madame Charlotte Elizabeth de Bavière, Duchess of Orleans*），第二卷，第274页。

跌，令他惊恐不已，惶惶不可终日。他的大脑完全被这个主题占据，就在此时，他突然被召去为一位自认为身体不适的女士看病。他到了女士家里，被仆人领到楼上，为女士把脉。“跌了！跌了！它在继续下跌！”他沉思着说道，而此时，病人正在抬头仰视他的脸，急切地想知道他的看法。“喔，M. 德希拉克，”她边说边站了起来，摇响铃铛寻求帮助，“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它又降了！它降了！降了！”“什么降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医生问道。“我的脉搏！我的脉搏！”这位女士说道，“我一定快要死了。”“不要紧张，我亲爱的夫人，”M. 德希拉克医生说道，“我说的是股票跌了，不是您的脉搏减弱了。事实上，在股票方面，我是个十足的输家。我的精神也因此备受打击，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股票的价格有时会在几个小时之内上涨10%~20%。许多生活不太富裕的下等人，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一贫如洗，而到晚上上床的时候已是腰缠万贯了。有一位大股东生病，他派自己的仆人去出售250股股票，每股售价8 000里弗，正是当时的交易报价。仆人奉命而去，当他抵达索伊森花园的时候，发现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价格已经上涨到每股1万里弗。250股股票，每股差价高达2 000里弗，总差价就高达50万里弗，约合2万英镑。仆人非常无耻地欺骗了主人，将差价据为己有，只将剩下的价款交给了主人，并且当晚就逃跑到了另一个国家。约翰·劳的车夫赚到的钱已经多到可以置备起一辆马车，并且向约翰·劳提出了辞呈。约翰·劳很欣赏这位车夫，恳请车夫在他离开约翰·劳之前帮忙另找一位和他一样能干的车夫来替代他，为此约翰·劳将感激不尽。车夫同意了，当晚就带来两位他以前的同事，让约翰·劳从中挑选一个，而他将接受约翰·劳挑剩下的那位作为自己的车夫。厨娘和脚夫也不时地碰上这样的好运，他们在如此轻松获得的财富面前得意忘形，自我膨胀，结果犯了最荒谬可笑的错误。这些股市暴发户们在对自己进行了全部包装，改头换面之后，却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有的言谈和举止，着实令人忍俊不禁，不但成为那些多愁善感的人们同情的对象、那些冷静庄重的人们鄙

视的对象，更是成了每个人取笑的对象，但是那些更上等社会阶层的人们的愚蠢癫狂与卑鄙自私却更加令人作呕。只需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侵蚀了整个社会的贪婪。这个例子出自圣西蒙公爵的记载。一个既没有地位又没有受过教育的名叫安德烈的人，颇为得意于其在密西西比证券上的投机，他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里赚取了不计其数的金钱。正如圣西蒙公爵所述：“他积累的黄金堆积如山。”

安德烈变富之后开始对自己卑微的出身感到羞愧难当，认为跻身于贵族之列是其当务之急。他有一个年仅3岁的女儿，他与落魄潦倒的贵族家族德·奥伊斯（D'Oyse）谈妥一笔交易，他的女儿将以一定条件为代价嫁给奥伊斯家族的某个成员。德·奥伊斯侯爵忍辱负重答应了安德烈的要求，承诺在那个女孩年满12岁时亲自娶她过门让她做自己的内室，只要这位做爸爸的支付给他总额为10万克朗宁的财产，并且每年支付2万里弗，直至婚礼举行为止，而这位侯爵当时已经33岁。这桩卑鄙的交易顺利完成，双方都讳莫如深，严守秘密。这位股票投机商人进一步同意在他女儿婚礼那天赠给她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作为嫁妆。奥伊斯家族的头面人物布兰卡斯公爵（Duke de Brancas）出席了整个谈判过程，并分享了全部的利润。

圣西蒙先生对此轻描淡写，笔法随心所欲，充分揭示出在他看来十分精彩的笑话令人忍俊不禁的地方。他补充说：“人们并没有对这桩美满的婚姻加以指责。”圣西蒙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几个月后，由于约翰·劳的倒台以及不可一世的安德烈大人的破产，这桩交易很快就破灭了。”不过，看起来，那家贵族绝对不会乖乖地交还那10万克朗宁的订金了。

这种事情固然丢人现眼，但是大多数带有滑稽可笑的色彩，而另外一些事情则要严重得多，也揭示出一些更加严肃深刻的内涵。因为大街上的行人都随身携带巨额的纸币和票据，所以街上每天都有抢劫事件发生，谋杀也时有发生，尤其是有一起案件引起了全法国的关注，不仅因为罪行极其恶劣，而且因为罪犯的地位与其所具有的高层关系。

德·霍恩王子（Prince D'Horn）的一个弟弟德·霍恩伯爵（Count D'Horn）与德·阿姆伯格（D'Aremberg）、德·莱恩（DeLigne）以及德蒙特莫伦西（DeMontmorency）这些高贵的家族有亲戚关系，是一位挥霍无度相当奢侈的浪荡公子，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没有任何节制。他与另外两位同样鲁莽的年轻人合谋，其中一个名叫米勒（Mille），是皮埃蒙特（Piedmontese）的一位大尉，另一个名叫德斯丹皮斯（Destampes）或是列斯唐（Lestang），一个佛莱芒人。德·霍恩制定了一个计划，打劫一位十分富有的经纪人，因为据说这家伙很不走运地随身携带巨额钱财。德·霍恩伯爵假装很想从那位经纪人的手里购得一笔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且为此与经纪人约定在旺多姆广场附近的一家夜总会或是一个低级的酒馆碰面。这位没有丝毫戒心的经纪人按时赴约，德·霍恩伯爵和他的两位同谋也准时到达，他将俩人作为自己特别要好的朋友介绍给这位经纪人。一阵寒暄之后，德·霍恩伯爵忽然跃至受害人的面前，用匕首向经纪人的胸部猛刺三刀，可怜的经纪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就在德·霍恩伯爵专心致志地翻弄着总额高达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证券之时，皮埃蒙特人米勒又一次次地把匕首刺向这位不幸的经纪人，以确保置之于死地，但是这位经纪人并未束手就擒，他的呼救引起酒馆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赶来援救。另一个帮凶列斯唐负责在一个楼梯间放哨，看到人们闻声赶来，他慌忙地从窗口跳了出去，逃之夭夭，但是米勒和德·霍恩伯爵躲避不及，被抓个正着。

这一起犯罪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是在像夜总会、酒馆这样的公共场所，整个巴黎为之震惊，人人自危。翌日开始审理这起凶杀案，证据确凿，俩人都被判有罪，处以车裂之刑，将被车轮活生生地撕成碎片。德·霍恩伯爵的贵族亲戚们无一例外地围聚在摄政王的前厅里，乞求摄政王发发慈悲，饶恕这位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并说这位年轻人的脑子有问题，神经不正常。摄政王尽可能地回避不见，他决心已定，对于一起如此野蛮，令人发指的案

件，正义应当得到伸张，但是这些神通广大的求情人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无理的要求，他们纠缠不休，并且最终设法出现在了摄政王的面前，哀求摄政王为他们的家族保留一点颜面，以免在公开行刑之中颜面扫地。他们暗示，德·霍恩王子与光芒四射的奥尔良家族结有联姻，他们又补充说，如果摄政王的亲戚死在一个普通的行刑人手上的话，摄政王自己也会没有脸面。摄政王不愧是摄政王，坚守了自己的信誉。他抵制住了所有这些求情与游说，并且用高乃依（Corneille）^①的话对他们最后的论点加以回复：

“Le Crime fait la honte, et non pas L'échafaud.”

大意是：“这起犯罪确实可耻，但还不至于上断头台。”

摄政王又补充说，无论受刑有多么羞耻，他都非常乐意与其他的亲戚们共同分担这种耻辱。日复一日，他们不断地跑到摄政王那儿，提出新的求情说辞，但是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最后，他们想如果能引起圣西蒙伯爵的同情——摄政王真心敬重的这位伯爵，他们也许可以达到目的。德·圣西蒙伯爵，一位彻头彻尾的贵族和他们一样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一位贵族出身的谋杀犯竟然会像贫贱卑微的重罪犯一样被处以相同的死刑。他向摄政王建议，得罪一个如此庞大、富有而且势力强大的家族实在是失策之为，而且德·阿姆伯格家族在德国拥有巨大的产业，根据法律，受车裂之刑而死的人的任何一位亲戚都不能出任任何公职，直到整整这一代人全部过世，子孙后代才不受牵连。为此，他认为对罪犯的处罚应当改为砍头，因为整个欧洲的人们都认为砍头比车裂的名声要好得多。摄政王为圣西蒙伯爵的这番话打动，正准备同意之时，对被害人的命运特别感兴趣的约翰·劳走了过来，他肯定了摄政王原来的处理办法，认为应当让法律伸张正义，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德·霍恩伯爵的亲戚们无计可施，不得不使出了最后一招。德·罗贝克·蒙特莫伦西王子（Prince de Robec Montmorency）在其他方法全都

^①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译者注

无效的情况下彻底绝望，他想方设法潜入关押犯人的牢房之中，交给德·霍恩伯爵一瓶毒药，恳请他体面地死去，以免家族蒙羞。德·霍恩伯爵脑袋一歪，拒绝了王子的要求。蒙特莫伦西王子再次对霍恩进行感召与游说，结果再一次被拒绝。在霍恩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之下，蒙特莫伦西失去了所有的耐心，恼羞成怒，转身就走，边走边愤怒地喊道：“那么，去死吧，如你所愿，你这个卑贱的东西！你只配死在绞刑手的手上。”然后就再也不管他了，让他听天由命去了。

德·霍恩本人也向摄政王求情，希望能被砍头，但是除了摄政王的老师——尽人皆知的杜波伊神父以外，约翰·劳对摄政王意志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他坚持认为，屈从于德·霍恩家族的要求有失公平与正义，而摄政王起初也持相同的意见。在德·霍恩和米勒的罪行被宣判的六天之内，俩人在格雷夫广场（Place de Grève）^①上被车裂而死。另一位谋杀犯，列斯唐，一直在逃，始终未能缉拿归案。

巴黎民众对这一迅速而又严厉的执法行动交口称赞，就连他们的M. 德坎康布瓦（这是他们对约翰·劳的尊称）也加入他们这边，支持摄政王铁面无私，对贵族不徇私情，不法外开恩，但是抢劫和谋杀的数量却有增无减。富裕的投机者遭到掠夺，没人对他们表示同情。以前就已经够让人触目惊心的公众道德的下滑，现在更加变本加厉，迅速散布到中产阶级的每一个角落，而此前的中产阶级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纯洁，介于上层社会公开的贪婪和下层社会隐藏的罪恶之间。对于赌博的热爱像致命的瘟疫一样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传播，在它面前，一切的公共道德以及几乎所有的个人美德都显得不堪一击。

在信心持续的那段时期，投机曾一度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一本万利，笔笔有赚。巴黎的人民尤其感受到了这种良好的效果。异乡的陌生人们成群结

① Grève是巴黎的沙滩广场，过去是行刑的地方，现在是巴黎市政府广场。——译者注

队地从四面八方涌入首都，他们不光来此赚钱，也来此花钱。摄政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统计了这段时期里人口的增长，来自各地的陌生人构成了涌入这个城市的滚滚洪流，总数高达305 000人。管家不得不在阁楼、厨房甚至是马厩里设置铺位，供投宿者栖身。城镇随处可见马车以及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即使在主干道上，它们仍然不得不放慢速度，唯恐发生意外事故。这个国家的纺织工人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生产，供应着花边、丝绸、宽幅布匹以及天鹅绒。这些奢侈品的价格增长了四倍，为纺织业主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为食品供给也带来了不少的好处。面包、肉类以及蔬菜的售价都远远高于以往的最高售价，而付给劳动力的工资也以大致相同的比例迅速增长，以前每天只能挣15个苏^①的手工工匠现在能够挣到60个苏。到处都在修建新的房舍，整座城市在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张。整个国家被虚无缥缈的景气普照，美景如此炫目，令全国人民眼花缭乱，以至于没有人看到地平线上那团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的预示风暴即将来临的乌云。

用“魔法棒”制造出如此令人惊叹变化的神奇魔法大师约翰·劳，当然也从这一普遍的繁华景气之中分得了好处。上等的贵族们围聚在他的妻子和女儿的身边，伯爵与王子家族的继承人纷纷登门造访，渴望能与她们结为秦晋之好。约翰·劳在法国的不同地区购置了两处金碧辉煌的房产，并且与萨利公爵（Duke de Sully）家族就购买罗斯尼侯爵领地（Marquisate of Rosny）一事进行了交涉。约翰·劳的宗教信仰是他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摄政王允诺可以让约翰·劳成为财务审计总长，只要约翰·劳愿意公开接受天主教的信条。正如其他任何一个职业赌徒一样，约翰·劳哪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他极其爽快地答应了摄政王的要求，当着一大群投机者的面，在默伦大教堂（Cathedral of Melun）皈依了天主教，坦森神甫（Abbé de Tencin）认可了

① sous, sou为法国低值硬币，1个sou为5个生丁。——译者注

此事^①。翌日，约翰·劳就被任命为圣罗奇（St. Roch）教区教堂的名誉执事，借此机会，他献上了总额高达50万里弗的礼物。对于慈善捐赠，约翰·劳一直都出手大方，但并非始终这样夸张显摆。他私下也施舍了一大笔钱财，任何真实的贫困事例，只要约翰·劳有所耳闻，就一定会慷慨解囊。

现在，劳成了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奥尔良伯爵非常相信约翰·劳的洞察力，对约翰·劳的计划的成功也充满信心，以至于每当遇到什么重大的事情，他都要向约翰·劳请教。约翰·劳绝没有被财富与幸运冲昏头脑，过度自我膨胀。和他在逆境中一样，约翰·劳一如既往，仍然是那个朴素、和蔼可亲而又明智的约翰·劳，他对女士的殷勤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约翰·劳的行为完全出自天性，是造化所为。他是如此的待人和善，如此的具有绅士风度，又是如此的受人尊敬，甚至没有任何一位情人会因为他对其他女士的殷勤而做出任何不愉快的举动。即便约翰·劳偶尔表现出一些自大的症状，那也只能怪那些对他卑躬屈膝的贵族们，因为他们的马屁拍得太过露骨，甚至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约翰·劳会经常捉弄一下那些贵族，并以此为乐，看看他们为了从自己这儿捞取一点儿好处对他的阿谀奉承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而当那些偶然来到巴黎的本国同胞登门拜访他的时候，约翰·劳的表现却恰好相反，极其礼貌、极其关照。当伊斯雷伯爵（Earl of Islay）阿奇宝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即后来的阿基乐公爵（Duke

① 下面的这首广为流传的讽刺小诗即以此事为蓝本：

“Foin de ton zèle séraphique, (点燃神圣热情干草的)

Malheureux Abbé de Tencin, (不幸的坦森神父)

Depuis que Law est Catholique, (自从劳变成天主教徒起)

Tout le royaume est capucin.” (我们就变得像卡布森修士一样一文不名了)

加斯坦桑（Justandson）在其译著《路易十五回忆录》（*The Memoirs of Louis XV*）中大致翻译如下：

“Tencin, a curse on thy seraphic zeal, (坦森神父，诅咒你的热情)

Which by persuasion hath contrived the means (通过说服，你的热情使得)

To make the Scotchman at our altars kneel, (那个苏格兰人跪伏在神坛脚下)

Since which we all are poor as Capucines! (自此以后，我们都像卡布森修士一样一文不名了)”

de Argyle)，来旺多姆广场拜访约翰·劳的时候，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设法通过约翰·劳那间被名流俊杰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接待室。这些名流显贵们全部都焦急而热切地等待着与这位伟大的金融家见上一面，并且力争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发股票的股东名单的最上端。约翰·劳则静静地端坐在书房里，给守候在父亲留给自己的位于劳里斯顿的房产里的园丁写着一封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有关一些卷心菜的种植问题。伊斯雷伯爵在约翰·劳的书房里与同胞约翰·劳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皮开特纸牌（a game of Piquet，一种两个人玩的纸牌）。伊斯雷伯爵离开旺多姆广场的时候已经完完全全被约翰·劳的安逸闲适、良好的理解能力和出色的教养折服。

在这批利用公众的轻信与盲从赚取了足以弥补以前千疮百孔的财务状况的大量钱财的贵族之中，不能不提到波旁公爵（Duke de Bourbon）、吉什公爵（Duke de Guiche）、佛荷斯公爵（Duke de la Force）^①、邵尼斯公爵（Duke de Chaulnes）和安丹公爵（Duke d'Antin）的名字，还有台斯特里斯元帅（Maréchal d'Estrées）、罗汉王子（Prince de Rohan）、伯依克斯王子（Prince de Poix）和里昂王子（Prince de Léon）。孟德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之子路易十四之子波旁公爵在对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之中尤其走运。他用投机所得的大把钞票重新修建了自己在尚蒂利（Chantilly）的皇宫，其华美的风格非同寻常，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对养马也具有异常浓厚的兴趣。他大兴土木，建造了一排排的马厩，在整个欧洲长期享有盛誉。他还从英国进口了150匹最出色的赛马，以改良法国赛马的品种。他还在皮卡迪（Picardy）购买了一大片乡村，从而几乎拥有了瓦兹省（Oise）和索姆省（Somme）之间所有有价值的地皮。

人们得到了这么多的财富，难怪约翰·劳会备受精明人士的推崇了，还

① 佛荷斯公爵赚得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他不仅炒股赚钱，而且还经营瓷器、香料等。巴黎议会为其作为香料商人的品德是否有辱其贵族身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结论是否定的。人们为他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佛斯公爵衣着酷似街上的搬运工人，背上扛着一大袋的香料，漫画的题词是“令人尊敬的佛荷斯公爵”。

没有哪个统治者比劳得到更多的褒奖与奉承。当时，所有的小诗人和“文学家”们都使尽浑身解数，对约翰·劳大加赞美。一时之间，如洪水一般，溢美之词铺天盖地地涌到了约翰·劳的面前。按照他们的说法，约翰·劳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是法兰西的守护神；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智慧，他的容颜洋溢着善良，他的一举一动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因此，无论何时，只要他外出，他的马车后面总是簇拥着一大群人，摄政王还为此派来了一队骑兵为他护卫开道。

据说，巴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随处可见高雅的奢侈品，从外国大量进口的雕塑、绘画和挂毯等奢侈品在巴黎十分畅销。那些法国盛产而且闻名于世的可爱的家具和装饰品也不再只是贵族们专有的玩物，在普通的贸易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家里已经可以发现大量的这类物品。名贵的珠宝和最受欢迎的貂皮价格昂贵无比，也被带到了巴黎，其中有一颗举世闻名的大钻石，摄政王将其买下，并且以他的名字为之命名。长期以来，大钻石一直装点着法国国王的皇冠，在皇冠上面熠熠生辉。为了购买这一颗巨大的著名的钻石，摄政王一共花费了3 200万里弗。可是，摄政王似乎并不像他的人民一样在炒股和贸易的狂潮之中赚到那么多的钱。当人们第一次向摄政王展示这颗美丽钻石的时候，尽管他对它的渴望超过其他的一切东西，他还是拒绝购买这种奢侈的玩意儿。考虑到他对自己所掌管的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不能任由自己从公众的钱袋里掏出这么一笔天文数字的金钱来购买这么一颗小小的宝石。这番慷慨陈词义正辞严而又受人尊敬，宫廷上下所有的女士为之震惊。一连好几天，人们听不到其他事情，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表示遗憾的话语——这样举世无双的一颗宝石就要被带出法国了，没有一个人富有到可以把它买下来的程度，真是可惜呀！人们不断地要求摄政王收回成命，但是直到德·圣西蒙伯爵（一个琐碎无聊的人）承担起这一重任，一切的努力都只是白费力气。约翰·劳紧随其后，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好脾气的摄政王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把寻找合适的方法来支付这笔巨款的任务留给了聪明的约

翰·劳。在约定的时间内，作为钻石的货款，钻石的主人有总额为200万里弗的证券，同时还有这笔总额的5%作为利息，此外，他还可以得到这块宝石在加工过程中切割下来的价值不菲的钻石碎屑。对于自己参与的这笔交易，圣西蒙在其回忆录中的记载也足见其洋洋得意。他描写到，这颗钻石大如青梅、状似圆形、洁白无瑕，重量超过500哩（grains，最小的重量单位，一哩等于0.065克），然后他以一声窃笑作为结束。他告诉世人“他为自己能够引导摄政王做成这样一笔杰出的买卖而引以为豪”。换言之，他为自己引导摄政王牺牲了他的职责和义务并用公众的钱财以一个极其奢侈的价格买下这么一个东西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于是，这个体系得以发扬光大，直到1720年的年初，议会的警告——过量的纸币发行迟早会令这个国家破产——被当做耳旁风置之不理。对金融学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一个带来了如此出色效果的系统永远不会失去节制。如果5亿纸币能够带来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另外再发行5亿纸币应当能够带来更多的益处。摄政王大错特错，而约翰·劳也并不打算向摄政王说明真实情况以消除他的错误看法。

民众异乎寻常的贪婪使幻觉不断升温。印度和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涨得越高，就需要发行越多的银行券来满足交易的需要。这样建立起的体系或许可以与俄罗斯挥霍无度的大老粗乡下人伯特姆金（Potemkin）所建造的金碧辉煌、光芒四射的宫殿相媲美。伯特姆金建造宫殿的用意是让他的皇妃惊喜，巨大的冰块被一块块地堆砌在一起，用冰块精心制作的爱奥尼亚风格^①的柱子巧夺天工、精美绝伦，构成一条雍容典雅的柱廊。用冰建造的圆形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阳光为屋顶镀上一层金色，却没有将它融化。远远望去，这座冰宫熠熠生辉，仿佛一座水晶钻石宫殿。可是有一天，从南方突然吹来的一股暖风慢慢融化了这座巍然耸立的宫殿，最后，宫殿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约翰·劳和他的纸币体系也是如此，只要受到群众不

① Ionic，希腊一种建筑，柱头有卷形饰物。——译者注

信任之风的吹拂就会坍塌崩溃，而任何人都不可能让它重新立起。

在1720年的年初，第一次警钟轻微地响起。孔蒂王子因为约翰·劳拒绝按照他的价格出售给他印度公司的新股而怀恨在心，派人来到约翰·劳的银行，要求银行用铸币兑付一笔巨大的票据。为搬运这些铸币，他不得不动用三辆马车。约翰·劳向摄政王诉苦，并提醒他关注可能带来的后果——一旦人们效仿孔蒂王子的做法，后果将不堪设想。摄政王心里非常清楚，他派人叫来孔蒂王子，表现出极端的不悦，以示对孔蒂王子的惩罚，并且勒令孔蒂王子将他从银行提取的铸币的2/3重新存到银行里去。孔蒂王子被迫服从这一专横的命令。谢天谢地，这件事情对于约翰·劳的信用体系并未造成威胁，因为孔蒂王子的人缘不好，每个人都指责他又小气又贪婪，并且一致认为约翰·劳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可是奇怪的是，这次死里逃生并未能让约翰·劳和他的摄政王意识到潜在的危机，没能让他们加强控制纸币的发行。很快，人们就发现有人由于不信任而效仿孔蒂的做法。尽管孔蒂本来是要报复，却为别人树立了榜样。更加精明的股票投机人正确设想了这样一个前景——价格不可能永远上涨。以交易资金量大而著称的伯尔登（Bourdon）和拉·理查蒂尔（La Richardière）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的纸币分成许多份兑换成铸币，每次兑换的金额较少，并且将铸币悄悄送到了国外，他们还尽可能多地购买便于携带运输的贵金属和贵重珠宝，并且将它们秘密地运往英国或者荷兰。一位投机商沃马立特（Vermalet）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他小心翼翼地弄到总额近100万里弗的金币和银币，将这些铸币装运到一户农夫的双轮车上，还在上面盖上厚厚的干草和牛粪，然后，他乔装打扮一番，穿上一身又脏又破的农民的大罩衫，带着自己的宝物安全地溜到了比利时。很快，他又设法将自己的宝贝从比利时运到阿姆斯特丹。

直到此刻，任何阶层的人如果想要弄到他们需要的铸币还没有碰到什么障碍，然而这个体系若要长期维持下去，而不引起铸币的短缺与匮乏是不可能的。各方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人们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很快便发现了症

结所在。委员会就采取何种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约翰·劳也应召前来发表意见。约翰·劳认为应当颁布一项法令，让铸币相对于纸币贬值5%。该法令很快被公诸于众，但是由于未能实现预期的目的，另一条法令紧随其后得以颁布，让铸币的贬值幅度由5%增加到10%。与此同时，银行的兑付也受到限制，每次只能支取100里弗的金币和10里弗的银币。虽然对银行现金支付的限制严格如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银行的信用，但是这些举措都无力恢复人们对于纸币的信心。

虽然政府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贵金属仍然源源不断地被运往英国和荷兰，留在国内为数不多的铸币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或者窖藏了起来，直到铸币的短缺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贸易不能继续顺利地进行。在此危急关头，约翰·劳铤而走险，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禁止使用一切铸币。1720年2月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试图重振人们对于纸币的信心，结果却事与愿违，无可挽回地破坏了纸币的信用，将整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著名的法令严禁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相当于20英镑）的铸币，违者不仅处以高额罚款，并且将所发现的全部铸币没收充公。除此以外，该法令还严禁人们购买珠宝、贵金属和珍稀的宝石，鼓励告密者检举揭发违反这一法令之人，并且保证以他们告发后所发现的总金额的一半作为奖励。这样的暴政闻所未闻，举国上下发出悲痛绝望的哀叫，令人深恶痛绝的迫害每天都在上演，家庭隐私被告密者及其代理人的入侵破坏。最正直诚实的人居然也被宣判为罪犯，因为据说有人看到他们的财产之中有金路易。仆人们纷纷争相背叛和出卖自己的主人，有位公民竟然成了邻居家的间谍。逮捕拘留和没收充公的数量成倍地增加，以至于法庭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应付接踵而来的无数案件。只要有人告发说他怀疑某人在自己家里窝藏了铸币，就完全可以立刻对此人发出搜查令。英国大使斯代尔先生（Lord Stair）说，现在人们已经不可能怀疑约翰·劳是否真正皈依了天主教；他将许许多多的黄金变成了纸币，这已经为他对变形的虔诚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而他随后又成立了审判异

端的宗教法庭。

人们出于仇恨所能想到的任何一句诅咒的话都被倾泻在摄政王和忧心忡忡的约翰·劳身上。只要超过500里弗的硬币就属于非法货币，可是人们又都尽一切可能拒绝接受纸币。人们无法晓得自己今天拥有的纸币到了明天还能值几文钱。杜克罗斯（Duclos）在其《摄政王朝之秘密回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中写道：“从未见过比这个摄政王朝更加反复无常的政府——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以如此冷酷强硬的手段推行过比这更加赤裸裸的暴政。对于那些亲眼目睹过当时的恐慌，回想起来仿佛做了一场恶梦的人们而言，当时没有暴发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约翰·劳和摄政王居然没落到人头落地的下场着实令人难以置信。约翰·劳和摄政王都生怕百姓起来造反，但是百姓只不过是抱怨而已，一种压抑而胆怯的失望和一种愚蠢的恐慌让所有的民众揪心。民众太软弱了，以至于不敢挺起胸脯进行一次勇敢的犯罪。有一次，好像有人在组织一次运动，墙壁上张贴着反对摄政当局的煽动性的策反文章，印在传单上的策反文章还被发送到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的家中。根据《摄政王朝回忆录》的记载，其中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在此提请你们注意，如果没有意外变化的话，我们将在周六和周日再次举行圣巴塞罗缪日^①（St. Bartholomew's Day）活动。无论是你们自己还是你们的仆人，最好不要瞎搅和。上帝保佑你们不被烈火灼烧！也请通知你们的邻居。时间是：1720年5月27日，星期六。”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数不胜数的间谍和奸细使百姓彼此之间互不信任。星期六晚上发生了一些不足挂齿的小的破坏事件之后，制造这些事端的那个微不足道的集团很快就解散了，但是巴黎的和平与安定却失去了保障。

路易斯安纳公司，也就是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迅速下跌。事实上，已经没什么人还真正相信曾经有人提到的有关那个地区具有无穷财富的神话了。为了恢复公众对密西西比项目的信心，约翰·劳和摄政王进行了最后的努力，

^① 巴塞罗缪是基督的12个使徒之一，圣巴塞罗缪日在每年的8月24日。——译者注

下令将巴黎城里所有的穷苦百姓都召集到一起。大约6 000名被社会遗弃的人被迫服役，就像战时征召入伍一样。政府为他们提供衣物和工具，将他们投入到新奥尔良的事业中去——那里据说有十分丰富的金矿。他们日复一日地被迫扛着自己的叉子和铲子游街示众，然后又被拆分成许多小的分队遣送到港口，以便运往美国。这些人中有2/3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是在途中开了小差，用他们的工具换取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又重新过上原来的生活。此后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在巴黎可以见到他们之中半数人的身影。不过，这场闹剧倒是的确使得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略微有些上涨。许多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相信新成立的戈尔康达（Golconda）公司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淘金活动，金锭和银锭很快会在法兰西重新出现。

为了重建公众信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必定会采取某些更加切实可行的措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在英国曾经由于相似的妄想而发生与此类类似的灾难与不幸，但是为了拯救灾难所采取的措施与法国却有着天壤之别。不幸的是，在法兰西，拯救灾难所用的药方是由灾难的始作俑者开出的。摄政王专制武断，他致力于挽救这个国家却使这个国家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他下令所有的支付必须用纸币进行，而就在2月1日到5月底之间，发行的纸币就高达15亿里弗，约合6 000万英镑。于是，警报再度响起，没有任何把戏能够使人们对那些不能兑换成贵金属的纸币产生一丁点儿的信心。巴黎议会主席M. 兰伯特（M. Lambert）当面告诉摄政王，自己宁愿要10万里弗的黄金或是白银，也不要这家银行发行的500万纸币。当他的这种想法成为人们的共识之时，纸币的过量发行只能使形势进一步恶化，使得流通中的铸币总量和纸币总量之间形成更大的失衡。摄政王原本打算使之贬值的硬币的价值反而随着每次新鲜出炉、意欲将之消灭的尝试而身价倍增。2月，摄政王认为皇家银行应当与印度公司合二为一，组成一家新的公司。于是，议会通过并颁布了这样一项法令，国家仍然是这家银行发行的纸钞的担保人，未经委员会的许可，不得继续发行新的钞票。皇家银行从约翰·劳的掌控中

被夺回，并转而成为一家国有银行，银行的所有利润也由摄政王交给了印度公司。该举措在短时间里曾经一度使该公司的路易斯安纳股票以及其他股票价格有所上扬，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却无力挽回公众的信心。

5月初国家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约翰·劳、德·阿金森（约翰·劳管理金融事务的同事）以及全体大臣都到场出席。此时，流通中的纸币总量被计算出来，是26亿里弗，而国家铸币的总值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对于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采取措施使通货平衡显然是当务之急。有人建议说，应当将纸币的数量减少到与铸币的价值相等，而其他人则建议将铸币升值，直到铸币价值与纸币相等。据说，约翰·劳对两种建议都投了反对票，但是他又提不出其他可行的办法。因此，议会达成共识，认为纸币应当贬值一半。于是，5月21日出台了一项法令，规定印度公司的股票以及银行的钞票将逐渐被贬值。一年之后，它们的价值应当只有名义价值的一半。议会拒绝通过这一法令，它激起了最为强烈的不满，国家政权变得岌岌可危。摄政王的顾问委员会被迫收回成命，在7天之内又颁布了另外一条唯一可行的保持稳定安宁的法令：恢复纸币原有的币值。

就在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停止兑付铸币，劳和德·阿金森都被逐出内阁。软弱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怯懦胆小的摄政王把所有的不幸都推到约翰·劳身上，可怜的劳成了众矢之的。当他来到皇宫请求觐见的时候，摄政王竟然拒绝他入内。可是夜幕降临之时，摄政王还是派人将约翰·劳召来，让他通过一个秘密的门进入皇宫^①。此时的摄政王使出浑身解数来安慰劳，并且用尽一切办法为自己不得不在公众面前对约翰·劳的声色俱厉进行解释，请约翰·劳谅解。他的行为反复无常，两天之后，他公然带着约翰·劳来到剧院。约翰·劳大大方方地坐在皇家包厢里摄政王的身边，当着公众的面，摄政王对约翰·劳更是礼遇有加。然而，人们对劳心怀怨恨，事后证明，这样的举动险些让约翰·劳丧命。当约翰·劳正准备走进自家大门的时候，

^① 参见杜克罗斯著的《摄政王朝之秘密回忆录》。

盛怒之下的一群暴徒用石块袭击了他的马车。要不是他的车夫机警地将马车赶到院子里面，仆人们眼疾手快立刻关上大门，他准保在劫难逃，早被拖出去撕成了碎片。紧接着第二天，他那乘坐马车从赛马比赛回家的妻子和女儿在途中也遭到暴徒的袭击。摄政王了解到这些事情之后，给约翰·劳派来了一队强悍的瑞士保镖。保镖们日日夜夜守护在约翰·劳的寓所四周，以确保约翰·劳的人身安全。最后，约翰·劳发现公众愤怒至极，即使自己的栖身之地有这么强悍的保镖护卫，依然危在旦夕，于是，他逃到皇宫避难，住进摄政王的宫殿。

由于反对约翰·劳的计划而于1718年被逐出内阁的财政大臣德·阿古苏(D'Aguesseau)现在被重新召回宫廷，帮助恢复信用。摄政王醒悟得太晚了。他承认，对于那个腐朽堕落的时代最能干的能人之一，或许也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一个正直诚实的公众人物，自己的态度苛刻、严厉，有失公允，而且缺乏信任。自从德·阿古苏忍辱含羞地回到自己位于弗雷斯尼斯(Fresnes)的乡间寓所之后，就一直退休在家休养。在家里，阿古苏沉浸在严肃艰深而又令人愉悦的哲学研究之中，早已忘却了那场毫无意义的宫廷阴谋。约翰·劳与摄政王的家属之一，骑士德·康弗兰斯(Chevalier de Conflans)，奉命乘坐四轮邮递马车赶往弗雷斯尼斯去恭迎这位前财政大臣重返巴黎。德·阿古苏欣然同意，竭尽自己所能帮助国家重建金融信用。他的朋友们建议他不要回去，他们并不赞成他接受任何召唤，认为他不应当重新回到约翰·劳掌权的部门中去。德·阿古苏到达巴黎之后，五位议会委员获准与这位金融特派员商讨重建信用。6月1日颁发了一项命令，废除那项将积攒、囤积硬币数量超过500里弗的行为定罪的法律，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拥有任何数量的铸币。价值2 500万里弗的新的票据被创造出来用以收回已经发行的银行钞票。新的票据以巴黎每年的收入作为担保，每年的收益率为2.5%。在维勒旅馆(Hôtel de Ville)门前，回收的银行券被公开焚毁。新的票据的价值为每张10里弗。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之时已经有

了足够的银币用以找零。

这一系列的措施带来了诸多好处。全巴黎的民众都急惶惶地跑到银行，用他们的小额票据兑换硬币。银子越来越少，于是，银行用铜币来兑换这些小额的票据。有人抱怨说，用小额票据兑换的铜币背起来太沉，可是仍然可以看到可怜的人们不断地背着沉甸甸的铜币汗流浹背、步履维艰地走在街上。他们背上的包袱实在太沉，远远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那都是些50里弗的零钱。银行的周围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几乎每天都会因为拥挤、踩踏而有一两个人丧命。7月9日，密集而喧嚣的群众迫使驻守在马扎林花园（Mazarin Gardens）门口的卫兵禁闭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异常激动和愤怒的群众隔着围栏向士兵们投掷石子。这样一来，士兵们也被激怒了，放出话来说要对人群开火。恰在此时，一个士兵被一块石头击中，他不由分说端起枪来，向人群扫射，一个人当场被击毙，另一个人身负重伤。针对银行的一场群体攻击一触即发。可是这时，马扎林花园却向群众敞开了大门，只见一队士兵荷枪实弹，寒气逼人的刺刀正等着他们，人群只好通过呻吟和嘘声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之情。

拥挤造成的伤亡如此惨重，以至于8天之内，在银行大门口就有15个人丧命。人群愤怒至极，多达7 000~8 000人的队伍用担架抬着3具尸体，向着皇宫花园挺进，向摄政王展示和证明他和约翰·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不幸。约翰·劳的车夫热情多于谨慎，此时此刻正在他主人停放在皇宫庭院里的马车厢上，他不喜欢这些暴徒辱骂他的主人，于是他用大得足以让好多人听到的声音喊道：“你们这些流氓无赖应该被绞死。”怒火中烧的人群立刻对他展开攻势，他们误以为约翰·劳也在马车里，于是把马车砸了个粉碎。这位鲁莽的车夫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小命。好在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一队士兵出现了。在摄政王答应用他自己的钱为这3具尸体举行体面的葬礼之后，群众才乖乖地离开。这幕闹剧上演之时，议会正在召开会议。议会议长自告奋勇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约翰·劳的马车已经被

暴徒砸得粉碎。所有的议员同时起立，用响亮的叫声表达内心的喜悦。就在此时，对约翰·劳的仇恨比其他人更加强烈的一位议员高声喊道：“约翰·劳本人呢？他也被撕成碎片了吗？”^①

毋庸置疑，印度公司的信用至关重要，它对这个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实在太多，于是，内阁委员会提议说，任何为使这家公司完成自己的职责所能够给予它的特权都会带来最为令人满意的结果。基于这种观点，他们提议说，应当保证印度公司对于所有海上贸易的排他性特权，并且以此为主要内容发布了一项法令，但是很不幸，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种举措将会毁掉这个国家的所有商人。举国上下都密切关注这样一个无限优先权的提议，议会收到一份又一份的请愿书，请求他们坚决拒绝通过这样一项法令，于是议会没有通过这项法令，而摄政王却说他们除了蛊惑人心、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之外，什么好事都没做成，并且将他们放逐到布劳艾斯（Blois）。在德·阿古苏的干涉下，流放地被改成了庞托艾斯（Pontoise），在那儿，议员们得到休整，他们决心蔑视摄政王的权威，做好一切安排，以使他们短暂的流放生活过得尽可能的愉快。议会议长将巴黎所有最快乐、最机敏的伙计请来，为他们准备了最为高雅体面的晚餐。每天晚上，都有为贵妇们举办的音乐会和舞会，那些一贯衣冠楚楚、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法官和议员们现在都聚在一起打牌，或者从事其他的消遣。在这几个星期之中，他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奢侈、最快乐的时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向摄政王表示，他们压根儿就不在乎被放逐的后果，并且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让庞托伊斯成为一个比巴黎更加可人的居留之地。

在为自己的悲哀歌唱、舔舐自己的伤口方面，法国人是世界上所有民族

① 奥尔良伯爵夫人对这一插曲的描述与上面的版本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个版本更加真实，在立法机构里这样公开表露情绪不太可信。根据奥尔良伯爵夫人的记载，议会议长喜出望外，他突然诗性大发，返身回到议会大厅，向大厅里的议员们高声宣读他的压韵小诗：“先生们，先生们！好消息！（Messieurs! Messieurs! Bonne nouvelle）
拉斯先生的马车被砸扁了（le carrosse de Lass est réduit en cannelle）。”

之中最负盛名的。有人曾经不乏真实地这样评价过这个国家：可以从这个国家的歌曲里，追溯到它的整个历史。约翰·劳把自己搞得臭名远扬、恶名昭著，当他那精心设计、巧夺天工的计划最终破灭之时，人们自然要对他极尽嘲讽之能事了。当他的肖像漫画出现在所有商店里的时候，大街上久久回荡着人们的歌声，约翰·劳和摄政王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歌中的主人公。这些歌中有许多都是极其粗俗的，其中一首特别提到他怎样使用他的那些纸币，当然是纸张所能做的最不雅的那档子事了。

不过，奥尔良伯爵夫人的信件中所记录的那首歌却是最出色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在巴黎的所有广场上，这首歌被人们吟唱了数月之久。这首歌的旋律十分欢快：

Aussitôt que Lass arriva	当拉斯先生（约翰·劳）来到
Dans notre bonne ville,	我们美丽城市的时候，
Monsieur le Régent publia	摄政王对大家说，
Que Lass serait utile	拉斯将
Pour rétablir la nation.	帮助重建我们的国家。
La faridondaine! La faridondon!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Mais il nous a tous enrichi,	他使我们成了暴发户，
Biribi!	哔哩哔哩！
A la façon de Barbari,	用粗野的方式
Mon ami.	我的朋友
Ce parpaillot, pour attirer	这个异教徒为了
Tout l'argent de la France,	搜罗全法兰西的金钱，
Songea d'abord à s'assurer	必须首先取得
De notre confiance.	我们的信任。

Il fit son abjuration,
La faridondaine! La faridondon!
Mais le fourbe s'est converti
Biribi!
A la façon de Barbari,
Mon ami.

Lass, le fils aîné de Satan
Nous met tous à l'aumône,
Il nous a pris tout notre argent
Et n'en rend à personne.
Mais le R' égent, humain et bon,
La faridondaine! La faridondon!
Nous rendra ce qu'on nous a pris
Biribi!
A la façon de Barbari,
Mon ami!

下面的民谣也在同一时期流传：

Lundi, j'achetai des actions;
Mardi, je gagnai des millions;
Mercredi, j'arrangeai mon ménage,
Jeudi, je pris un équipage,
Vendredi, je m'em fus au bal,
Et Samedi, à l'hôpital.

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骗子皈依了天主教，
啐哩啐！
用粗野的方式
我的朋友
拉斯是撒旦的儿子，
他使我们沦落到接受施舍的地步，
他把我们的钱全都拿走，
也没给任何人。
但是摄政王既仁慈又善良。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他归还了我们被骗去的东西。
啐哩啐！
用粗野的方式
我的朋友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到了钞票，
星期三，我安顿好一家人，
星期四，我布置起我的家，
星期五，我开了一场盛大的舞会，
星期六，我却像霜打的茄子一样
蔫巴。

在大量印发的讽刺漫画中（这些讽刺画将原本挺严重的事情加以轻描淡写，表明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场闹剧的荒唐之处），有一幅的摹本被收录进了《摄政王朝回忆录》中。漫画的作者这样描述这幅画：“股票女神”乘着她那由愚蠢之神驱赶的胜利战车。在前面拖着战车的，是长着一根木腿的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赛内加尔公司（Company of the West Senegal）以及各种各样的保障的化身。一直以来因为拥有长长的狐狸尾巴和机灵狡诈的面相而声名远扬的这些公司的代理人们唯恐这辆战车的速度不够快，使劲转动着车轮，车轮的轮辐上面标有几只股票的名称和它们的价值。这些股票的股价随着车轮的转动时高时低、变化莫测。地上堆放的是各种商品和合法交易的流水账本与分类账册，它们全部都被疯狂驰骋的战车碾得粉碎。战车的后面尾随着各个年龄层次的无数民众，无论是男是女，无论高低贵贱，全都争先恐后地扯着嗓子呼唤财富，奢求着“股票女神”能够慷慨大方地分给自己一部分股票。云端上面坐着一个正在向外吐着民众贪慕向往泡泡的恶魔。人们跃上彼此的后背，以便在泡沫破灭之前抓住泡沫。战车前进的道路上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挡住了去路。这座建筑物有三个大门，战车必须通过其中的一个门才能得以继续前行，并让紧随其后的民众继续追逐下去。第一扇门上写着“疯人院”（Hôpital des Foux），第二扇门上写着“医院”（Hôpital des Malades），第三扇门上则写着“乞丐院”（Hôpital des Gueux）。另一幅漫画的内容则是：约翰·劳坐在一口被群众烈焰燃烧的正在沸腾着的巨大的锅里，锅的周围挤满了正在将自己的一切黄金和白银倒入锅里的疯狂的人群。人群兴高采烈地得到兑换出来的纸币，而约翰·劳在他们中间大把大把地分配着纸币。



当人们的激动之情仍在持续的时候，约翰·劳十分小心，绝不在没人护卫的时候出现在大街上，他把自己关在摄政王的寓所里，以躲避一切可能的袭击。万一哪天不得不冒险外出，他要么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要么乘坐皇家马车，借助一支威武强壮的皇家卫队的护送和皇家这块护身符的庇护。有一则关于约翰·劳一旦落在对之深恶痛绝的人们手中将会落得怎样一个“饱

受凌辱”的可耻下场的趣闻轶事。故事的大意如下：一天，一位正乘坐自己的马车经过圣安东尼大街的名叫波尔塞（Boursel）的绅士被一辆挡在路中的轿式大马车拦住了去路，波尔塞先生的仆人很不耐烦地叫这辆轿式马车的车夫赶紧让路，结果却遭到对方的拒绝，一怒之下，波尔塞先生的仆人抡起拳头挥向挡路车夫的脸上。这场风波很快就引来大群的围观群众，而波尔塞先生则赶忙下车维持秩序，平息事端。轿式马车的车夫以为对方又有帮手赶来增援，而自己又将受到新一轮的人身攻击，情急之下，车夫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好办法，尽其所能大声地叫喊：“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约翰·劳和他的仆人要杀我呀！救命啊！救命啊！”听到呼救的人们拿着棍棒以及其他武器，纷纷从自己的店铺里跑出来。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人群也找好了石头，以便向这位臆想中的金融家宣泄自己满腔的怨恨。波尔塞和他的仆人运气不错，耶稣教堂（Church of the Jesuits）的大门此时正巧敞着，俩人眼看令人恐惧的厄运即将降临，立刻使出吃奶的力气向教堂狂奔而去，而人们穷追不舍。跑到祭坛前的他俩发现敞开的大门直接通往圣器收藏室，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进门去并立刻关上大门。否则，即使是在祭坛，他俩也一定会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接下来，经过闻声赶到的牧师们的劝说，愤愤不平、满腔怒火的人群才离开教堂。走出教堂的人群发现波尔塞的马车还在街上，便拿这辆马车出气，把它砸了个面目全非，痛痛快快地发泄了心中的不满与怨恨。

以巴黎城的市政收入作为保证的每年只有2.5%利率的2500万票据，在密西西比股票的大股东之间并不十分走俏，因此，证券的兑换相当困难。尽管约翰·劳的公司股票价值仍在下跌，许多人还是宁愿保留约翰·劳的公司股票，他们一直指望着有朝一日情况会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加快兑换的进程，8月15日通过了一项法令，命令禁止流通一切金额在1 000~10 000里弗之间的钞票，这些钞票只能用来购买年金和存入银行，或者用以支付约翰·劳的公司股票的分期付款。

紧接着，10月份又通过了另一项法令，该法令宣布：在接下来的11月份，所有的纸钞将被取缔，禁止流通，不管纸钞价值几许。印度公司也就是密西西比公司原来所拥有的经营造币厂、掌管国内税收以及其他的一切优势与特权全被剥夺，被降格为一家私人公司。对于约翰·劳设计的整个金融体系来说，这无疑足致命的一击。现在，这个体系已经完全掌握在它的对手手里。约翰·劳失去了他在金融委员会中的一切影响力，而约翰·劳的公司由于被剥夺了一切免责特权而遭到破坏，没有迹象表明公司还能继续履行自己的承诺。所有那些涉嫌在公众的妄想尚处顶峰之时谋取过不法暴利之人全被揪出来，并被处以高额罚款。还有一道先前发布的命令要求列出原始股东的名单，那些仍然持有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人必须将股票存在公司里面，而那些所持股票数量比自己名义持有的数量要少的股东必须以每股13 500里弗的价格从公司购回，而这些股票的市价实际上只有每股500里弗。股东们没有坐以待毙老老实实地购买这笔数量巨大而实际上已经贬值的股票，而是裹挟起自己所能带走的全部家当去国外寻找避风之港。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就有命令下发到港口和边境当局，要求缉拿所有试图逃往境外之人，在查明他们是否随身携带着贵金属或是珠宝，是否与最近的炒股有所牵连之前，将他们拘留起来。根据记载，只有为数甚少的人得以逃走，那些重被捉回的人中有的被处以死刑，而对那些留下来的人，政府则组织了最为专断的法律诉讼。

约翰·劳本人在暂时的失意的打击之下，决定离开这个生命已经没有保障的国家。起初，他只要求摄政王允许他离开巴黎，去他乡间的一处府邸。摄政王很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摄政王对于事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固然颇为不满，但他还是坚信不疑约翰·劳的金融体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他的目光只停留在他自己的过失上面；他一直期盼着在他的有生之年还会再有机会在一个更加安全稳固的基础之上重新建设法兰西的信用体系。根据记载，在约翰·劳与这位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晤当中，摄政王说：“我承认我犯过许多错误，我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我也是人，而所有的人都容易犯错，但

是我以最庄重、最严肃的方式向您宣布，我所犯的错误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出自邪恶或者不诚实的目的，我的一切所作所为之中没有丝毫的邪恶与不忠的成分。”

在约翰·劳离开皇宫的两三天之后，摄政王派人给他送去了一封言辞极其宽厚和善的信，允许约翰·劳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离开这个国家，并声明自己已经下令准备好了约翰·劳的护照。同时，摄政王还承诺，只要约翰·劳需要，可以为他提供任何数量的金钱。约翰·劳毕恭毕敬地谢绝了摄政王提供的金钱，在六名骑兵卫士的护送之下，乘坐一辆波尔本公爵的情妇普瑞夫人（Madame de Prie）所属的邮车向布鲁塞尔进发，之后又从布鲁塞尔转道去了威尼斯。他在威尼斯逗留了数月，那里的人民对他还有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相信他拥有无数的财富，可是没有比这种猜测更加荒谬愚蠢的想法了。对于一位一生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担任职业赌徒的人而言，劳的慷慨大方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在公众对密西西比股票的痴狂达到顶峰之时，他也没有以一个国家的牺牲为代价来为自己造福谋利，他从未怀疑过他的计划最终将成功地使法兰西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盛的国家，他将自己的全部收入都投资于购买法国的地产这一点也有力地证明了，他对自己计划的可靠性所具有的信心。他没有囤积任何的金银餐具或是珠宝，也不像那些不诚实的投机商一样将金钱偷偷运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约5 000英镑~6 000英镑的钻石以外，他所有的钱都投资在法兰西大地上；当他离开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几乎已经沦为乞丐，仅仅这一个事实就足以使他的记忆免受诈骗指控之苦，而这样的指控是如此频繁、如此不公正地对他纠缠不休。

约翰·劳离开法国的消息一旦被法国人民知晓，他所有的房产以及珍贵的藏书就立刻被没收充公。尽管在他权倾朝野、盛名远扬之时曾有一项特别法令明确宣称，不管怎样，个人的年金都绝不会被没收充公，但是他剩下的财产之中，妻子和孩子们赖以为生的一份20万里弗（相当于8 000英镑）的年金（购买的时候，他为此支付了500万里弗）还是被没收充公了。人们对约

翰·劳逃跑的不满溢于言表，无论是愤怒的民众还是议会都很乐于看到约翰·劳被送上绞架，即便是那些没有遭受这场商业改革之苦的少数人也庆幸这个骗子总算离开了法国，但是为数最多的而且财富受到牵连的那些人们却都深表遗憾，约翰·劳对这个国家的危难以及造成这种危难的原因所具有的深刻的认识没能帮助这个国家找到医治的灵丹妙药。

在金融委员会和摄政委员会共同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桌上摆放着很多种文件和票据，从这些文件和票据之中可以看出流通的纸币数量应当为27亿。摄政王被叫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纸币实际发行的日期与法令授权纸币发行的日期不符的情况。他本可以将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而这对他不会造成任何危害，但是他却硬要拖一个不在场的人下水，与自己一起承担这一罪名。摄政王声称约翰·劳自作主张，滥用职权，在不同的时间里发行了12亿纸币，而他自己看到木已成舟，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只好将授权增发纸币的委员会颁发的法令上的日期提前以便为约翰·劳遮掩。如果他当时就告诉人们整个事实真相，承认约翰·劳之所以被诱导着犯下错误，使投机超越了安全的界限，主要是由于摄政王自身的奢侈与缺少耐心作祟的话，本来能够为他带来荣誉的事情还不至于变成一件可耻的事情。那次会议还确定了1721年1月1日的国内债务已经超过31亿里弗，也就是说，超过了1.24亿英镑，而仅仅这些债务的利息就高达319.6万英镑。他们立即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这个国家的债权人的所有证券。他们将债权人划分成五个等级，前面四个等级的债权人包括那些用真实财产购买证券的人，而后面那个等级的债权人则包括不能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从事过的交易是真实而且合法的那些人。按照命令，后者的证券将被销毁，而前面四个等级的人将会受到更为严格也更吹毛求疵的检查。这个委员会的劳动成果就是一份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将这些证券的利息减至5 600万里弗的忠告。为使这项建议更有说服力，他们针对自己发现的各种各样的侵吞公款以及敲诈勒索的行为进行了一一陈述。于是，一份意思大同小异的法令得以及时地被国家的议会批准通过并公

诸于众。

接下来，以阿塞那办公室（Chambre de l'Arsenal）的名义组建起另一个特殊法庭，负责确认在最后那段令人不快的时期中金融部门发生的所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一位名为法罗内特（Falhonet）的主管、克莱门特神父（Abbé Clement）及其两位助手都被牵涉进各种侵占、挪用公款的事件之中，涉案总金额高达100万里弗。法罗内特和克莱门特神父被判砍头，两名助手也被处以绞刑，可是后来，对他们的处罚又被改成在巴士底监狱监禁终生。其他无数人的不忠行为也被挖掘出来，并且处以罚款或者监禁。

阿金森先生分享了那些与密西西比疯狂有关的人们对约翰·劳和摄政王的不满与怨恨，他被人们从内阁大臣的位置上赶下来，以便为阿古苏腾出位置，不过，他还保留着“掌玺大臣”（Keeper of Seals）的头衔，并且获准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参加政务会议。可他认为，离开巴黎，去他的乡村领地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可能对他来说是个更好的选择。然而，他并不适应退隐的生活。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急剧恶化，终日郁郁寡欢而又牢骚满腹，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就撒手西去了。巴黎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即使在他死后仍不放过他，将对他的仇恨带入他的坟墓。当他的送葬队伍向他的家族墓地圣·尼古拉斯·杜夏冬内来特教堂（Church of St. Nicholas du Chardonneret）行进时，一群暴动的民众将他们包围了起来。作为主要送葬者跟在棺木后面的阿金森的两个儿子迫不得已沿着小路飞马落荒而逃，以免遭受人身伤害。

那么约翰·劳呢，他有时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被重新召回法国，帮助法国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它的信用。1723年，坐在壁炉边和他的情妇法拉里斯公爵夫人（Duchess de Phalaris）促膝谈心的摄政王猝然去世，他的死熄灭了约翰·劳最后的希望之光。约翰·劳不得不重操旧业，干起赌博的老本行。他不止一次地被迫将他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与荣耀仅存下来的唯一的一件纪念之物那颗钻石拿去典当，不过，他那成功

的赌技总是能够帮他赎回自己的钻石。由于在罗马被债主追债与迫害，约翰·劳来到了哥本哈根，在那儿，他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居住，而对他“杀害威尔逊先生一事”所下的赦免令也于1719年送到他的手中。他乘坐海军上将之船回到英国，而此举曾在上议院引起过短暂的争论。科宁斯比伯爵（Earl Coningsby）抱怨说，一个曾经宣誓放弃自己的国家与宗教信仰的人竟然会受到如此的礼遇！他还认为，在英国人民被无法无天的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约翰·劳在英国的出现很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危险。为此，他提出了一项动议，可是上议院的其他议员对他那贵族式的担心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的认同，他的动议被迫流产。约翰·劳在英国呆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然后又去了威尼斯。约翰·劳在1729年于威尼斯去世，死时的境况异常窘迫狼狈，下面的墓志铭就写于当时：

Ci gît cet Ecosais célèbre,	一个著名的苏格兰人长眠于此，
Ce calculateur sans égal,	他的计算能力举世无双，
Qui, par les règles de l'algèbre,	这个人按照代数的规则，
A mis la France à l'hôpital.	把法国送进了医院。

约翰·劳的哥哥威廉·劳（William Law）曾经涉足约翰·劳的银行和路易斯安纳公司的管理业务，由于涉嫌贪污受贿而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却因为找不到证据给他定罪，又于15个月后被放了出来，并且成为一个家族的创立者，那就是至今在法国仍然颇有名望的劳里斯顿侯爵家族。

在下面一章里，我们会看到对于当时在与法国颇为相似的环境下的英国的人民中间蔓延的疯狂的描述。幸亏有立宪制政府的努力与良好的意愿，英国的这次疯狂事件所造成的破坏后果远不如法国那样严重。

南海泡沫

9

最后，腐败就像洪水猛兽一般泛滥，
将一切淹没；而贪婪却在蔓延、扩散，
仿佛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迷雾一般，将太阳的光芒遮蔽。
政客和爱国者一样也在从事着股票的投机，
贵族和管家们的困境相似，
法官们炒股，主教大人们也控制与侵蚀着这座城市。
为了半个克朗宁，大权在握的公爵们将纸牌堆砌，
不列颠沉沦在金钱卑鄙的诱惑之中，难以逃离。

——伯爵（Pope）

南海公司是由牛津著名的哈利伯爵（Harley Earl of Oxford）在1711年为了重建公共信用而创办的。创办的一个原因是，辉格政府（Whig ministry）的解体给英国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总额将近1 000万英镑的陆军和海军的债券以及其他一些流动债券提供清偿工具。当时，一家尚无名号的商业公司将这笔债务揽到了自己的肩上，政府则同意担保它们在一定期限内的年利率为6%。为了提供这笔总额高达每年60万英镑的利息，政府将永久性地把酒类、醋、印度货物、各种精致丝绸、

烟草、鱼翅以及其他一些商品的税收作为报答支付给这家公司。政府还赋予了这家公司从事南海贸易的垄断特权。这家通过议会的法案而组建成立的公司从此拥有了一个响当当的蜚声全国的名字。牛津的哈利伯爵对自己在这次交易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颇为自豪，对他阿谀奉承的人们也时常将这一计划称为“牛津的哈利伯爵的杰作”。

即使是在南海公司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南海公司和民众就已对于南美洲东海岸那无数的巨大财富形成了最富幻想的渴望。每个人都听说过秘鲁和墨西哥的金矿和银矿，每个人都相信这些金山、银山是永永远远挖掘不完、采之不尽的，只要将英格兰的产品运往大洋彼岸，当地的土著居民就会付给英国人价值百倍的金锭和银锭。有一则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迅速四处传播——西班牙很乐意做出让步，允许南海公司在智利和秘鲁的沿岸出于交通的目的使用西班牙所有的四个港口。这一消息增加了公众的信心。许多年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一直都炙手可热，深受公众的欢迎。

但是，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 V. of Spain）从来没有打算过让英国人住西班牙在美洲的港口从事自由贸易。谈判开始了，但是谈判的唯一成果就是阿西昂特合约（*assiento contract*），也就是说，在30年中英国具有为殖民地提供黑奴的优先权，并且每年可以运送一船货物到墨西哥、秘鲁或是智利进行贸易，而船舶的吨位以及货物的价值却是受到限制的。允许每年运送一船货物是建立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之上的：西班牙的国王将分享该船货物带来的全部利润的1/4，并且要对余下的3/4征收5%的税款。这种限制令牛津的哈利伯爵及其党羽非常失望，他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可喜可贺，反倒是其他人时常提醒他们：

“*Parturiunt montes, nascitur ridiculus mus.*”

但是，公众对南海公司的信心却丝毫没有动摇。牛津的哈利伯爵宣称：西班牙将同意在原先每年可以运送一船货物之外，另外再增加两艘货船运送货物。哈利伯爵还自作聪明地公布了一份名单，名单上面列明了西班牙对大

不列颠通商的全部开放口岸的名字。事实上，直到1717年才第一次开始一年一度的远航贸易，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年，由于与西班牙的绝交，双方贸易就此中断。

早在1717年议会的开幕式上，英国国王在讲话中就暗示过英国公共信用的状况，并且倡导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国债。在同一年5月20日召开的议会会议上，大不列颠两家规模庞大的货币公司——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南海公司请求将自己的资本规模，通过认购或是其他方式，由1 000万增加到1 200万，并且提出对全部金额所要求的收益率不是6%，而是5%。英格兰银行提出的建议，其条件同样十分优厚，颇具吸引力。议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辩论，最后通过了三项法案，分别叫做“南海法案”、“银行法”和“共同基金法”。通过第一项法案，南海公司的计划被接受了，而南海公司自己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增发200万新股，用以清偿安妮女王（Queen Anne）在位的第9个年头和第10个年头内国家发行的四批彩票基金的本金和利息。通过第二项法案，英格兰银行对国家欠它的1 775 027英镑零15先令设定了一个较低的利率，并且同意放弃甚至取消总额高达200万英镑的国库券，接受一份年利率为5%的10万英镑的年金，赎回全部的年金需要提前一年通知。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还有更进一步的责任与义务：在需要的时候，按照同样是5%的收益率的条件垫付一笔总额不超过250万英镑的资金，该笔债务可以由议会赎回。《共同基金法》则详细列举了各种各样的亏损数量，在上面提到的资源所派生的辅助作用之下，这些亏损将会有很大的好转。

这样，尽管南海公司与南美洲国家的贸易对公司每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南海公司的鼎鼎大名还是不断出现在公众面前。作为一家货币公司，南海公司照旧欣欣向荣、兴旺发达。当时，约翰·劳的密西西比计划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以至于迷惑住了法国人民，同时启发了南海公司各位同仁的灵感。诸位仁人志士认为自己可以仿效约翰·劳的做法，在英国故伎重

施，尽管他们早已料到自己的计划将会失败，他们还是一意孤行，铤而走险。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能够避免劳所犯下的错误，将自己的计划进行到底，认为自己能够将信用之弦绷到极限却又不会让它突然折断，分崩离析。

正当约翰·劳的计划达到广受欢迎的巅峰的时候，正当成千上万的人群拥挤在坎康普瓦大街用疯狂的热情将自己毁灭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在议会面前提交了他们著名的偿付国家债务的计划。无穷的财富交织成的美丽幻想不断涌现在欧洲两个最负盛名的国家的走火入魔般的人民的面前。虽然在开始挥霍生涯的时间方面，英国人比法国人要落后一些，但是一旦他们成为妄想的俘虏，他们就在劫难逃了。1720年1月22日，众议院将自己改组为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共同的委员会，考虑国王在议会开幕式上有关公共债务的讲话以及南海公司为赎回和减少公共债务所提出的建议。南海公司的建议十分翔实，而且分为几个方面。南海公司十分热衷于包揽总额高达30 981 712英镑的国债，保证将他们提出的5%的年收益率维持到1727年的仲夏，在此之后，只要立法机关乐意，就可以将全部的债务赎回，而年利率也将减少到4%，这一建议受到了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可是，英格兰银行在众议院里有许多朋友，他们都希望英格兰银行也能从很有可能产生的利益之中分得一杯羹。这些朋友代表英格兰银行的利益提出：在国家的处境最为艰辛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提供了了不起的、卓越的服务，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这笔公开的买卖能够带来什么利益的话，那么英格兰银行至少应当比一个从来没有为国家做出过任何贡献的公司优先受益。这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被搁置了五天。在此期间，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们提出了一项计划，而南海公司担心英格兰银行提出的条件比南海公司的更加优越、更加富有吸引力，于是重新审视了自己原来的建议并且对它进行了一些修改，希望自己提出的建议更易被人接受。对原先建议的内容所作的主要变动是：政府可以在四年之后，而不是起先提出的七年之后，赎回全部的债务。英格兰银行不甘落后，决定在这场不同凡响的竞价之中争取优势。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们重新考虑

了他们的第一份建议，然后提交了一份条件更加优厚的新的建议书。

这样，两家公司都分别提交了两份建议书，议院也开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了。罗伯特·沃尔普先生（Mr. Robert Walpole）是支持英格兰银行一派的首席发言人，而财政大臣艾斯拉比先生（Mr. Aislabie）则是代表南海公司利益的主要倡导者。议院于2月2日做出决定，认为后者（南海公司）的建议对国家更为有利。于是，议院接受了后者的建议而且还同意提交一项以此为主要内容的议案。

整个交易所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前一天还不过是130英镑的南海公司的股票，第二天就逐渐涨到了300英镑，而且，在这份议案尚处于分阶段讨论的整个时期之中，股票价格一直在以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飙升。沃尔普先生几乎是众议院里唯一的一个敢于直抒己见，大胆痛陈对南海公司计划不满的政治家，他以雄辩而又严肃的语言警告众议员，提醒他们警惕即将随之而来的灾难。他说，南海公司的计划将会导致“危险的股票投机操作，并且会将国家的精英人物从贸易和工业部门吸引到股票投机中去。而股票投机具有十分危险的诱惑力，它会使人们因为追逐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般虚幻的财富而丧失自己应有的劳动所得，并且诱使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家伙走向毁灭的深渊。这个计划的基础原理本身就是一场罪恶，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灾难。这个计划激发起广大民众的狂热并使这种狂热得以持续下去，并且通过向人们承诺从那永远也不可能满足需要的资金中派发股息和红利，从而人为地抬高了股票的价值。”沃尔普先生以一种未卜先知者的神情又补充说，如果南海公司的计划得以成功实施的话，南海公司的管理者将会主宰政府，在王国之中形成一个新的、绝对的贵族阶层，并且控制立法机构的决策。而一旦这个计划破产的话（沃尔普先生十分相信这点），将会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进而使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幻觉毕竟是幻觉，当灾难降临之时（灾难注定会降临），人们将会觉醒过来，就像从恶梦中惊醒一样，而且人们会问自己“这一切是真的么？”然而，沃尔普先生的一切雄辩都是枉然。人们将他视

为一个错误的预言家，或是把他比喻为一只声音嘶哑、喋喋不休地念叨着灾难的大乌鸦，因为他所预言的灾难是人们难以预料到的。只有当灾难降临到人们家中的火炉边，在人们的眼前活生生地上演之时，人们才有可能在惊恐之际，相信这一正确的预言。尽管在以前，众议院曾经严肃认真地倾听过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但是，当议员们知道他将就南海公司的问题发表看法的时候，大家纷纷离席而去。

在众议院审议了两个月之后，议案得以批准通过。在此期间，南海公司的董事及其狐朋狗友们，尤其是董事会的主席——著名的约翰·布朗特爵士（Sir John Blunt）——尽其所能地使股票价格一涨再涨。到处流传着关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所订立的条约的极度夸张的言论，据说，根据条约西班牙将赋予南海公司对西班牙的所有殖民地进行自由贸易的权利。波特西·拉·巴兹（Potosi-la-Paz）的丰富矿藏将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直到英国的银子变得几乎和铁矿一样充裕、丰富为止。而英国则可以用大量的棉花和羊毛制品与墨西哥的居民进行交换，墨西哥人将会为此耗尽他们全部的黄金宝藏。同南海公司进行贸易的这家商业公司将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富有的公司，投资于这家公司的每100个英镑每年都会为股东带来成百上千英镑的收益，这绝对是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最后，通过这些方法，南海贸易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到差不多每股400英镑。但是，在大幅振荡之后，南海公司的股价变成了330英镑，而这个价格一直保持到众议院以172票赞成，55票反对而通过南海公司的提案为止。

在上议院，这项议案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神速通过了所有程序。4月4日，该议案第一次被宣读；4月5日，对它进行了第二次宣读；4月6日，对它进行了审议；4月7日，对它进行了第三次宣读，并且获得了通过。

有些贵族激烈地反对南海公司的这项计划，但是，他们的反对性警告却受到了冷遇，人们对之充耳不闻、置之不理。正如投机的狂潮已经牢牢抓住了百姓，卷走了百姓的灵魂一样，这种狂热也已冲昏了议员们的头脑。诺斯

和格雷勋爵 (Lord North and Grey) 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这项议案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其后果将被证明是致命而无法挽回的,这项提案的目的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中饱少数人的私囊。沃顿公爵 (Duke of Wharton) 赞同他们两人的看法,但是,由于他的发言只不过是沃尔普先生在下议院里发表的长篇宏论的翻版之作,因此,他的照本宣科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甚至还不如诺斯和格雷勋爵。考博伯爵 (Earl Cowper) 也支持他们的立场,他将南海公司的提案比作尽人皆知的特洛伊木马——它像特洛伊木马一样被请进门来,人们用极度奢华、威风凛凛的排场与喜悦之情迎接它的到来。但是,它却一肚子坏水,包藏着奸诈与毁灭。桑德兰德伯爵 (Sunderland) 尽力回答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对于这个正在讨论中的问题,只有17位贵族表示反对,其余的87位贵族都对这个计划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就在该议案在上院获得通过的同一天,它也得到了皇家的许可,成为该国的法律。

看起来,当时举国上下的英国民众仿佛都变成了股票投机人。每天,交易所所在的巷子都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由于马车太多,阻挡了道路,康希尔 (Cornhill) 一带交通阻塞,无法通过。人人都跑来购买股票,“每个傻瓜都被鼓动着去当一名恶棍。”当时,一首被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广为传唱的民谣^①的歌词十分有趣:

“在更加自私与卑劣的下层人群之中,那时,

的确出现了星星和吊袜带;

他们买呀、卖呀,看呀、听呀,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争得头大。

最著名的名媛淑女们,每天坐在四轮马车里,

① 这首民谣名叫《南海歌谣》(A South Sea Ballad),或者叫作《对股票交易所街巷泡沫的愉快的评价》(Merry Remarks upon Exchange Alley Bubbles)。经过曲调修改,新的曲调又叫《伟大的长生不老之药;或是一块被发现的哲学家的石头》(the Grand elixir; or the philosopher's stone discovered)。

从远处赶来，
她们将自己的珠宝首饰拿来作为质押，
以便在股票交易所里赌上一把。”

对于收益的过度渴望折磨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即使是南海之水也无法熄灭这种渴望之火。最为浮夸的另一项计划又被搬上了历史的舞台。股东名册被迅速填满，股票流通易手很快，成交量极其巨大，幕后策划者使出浑身解数，要将股票的市场价格哄抬到一个人为的高度。

与所有人的预期恰恰相反，在南海公司的提案被皇室接受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股票不但不涨反而下跌。4月7日，南海公司股票的价格是310英镑，而到第二天，股票价格就下跌到290英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已经尝到了甜头，他们的计谋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是不会不尽力提高股价而平心静气地让股票回归自己本来的实际价值的。他们忙碌的密使立刻投入到工作之中。每一个对南海公司计划的成功感兴趣的人都极力地将一大帮的听众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向他们详细介绍南美洲海域所蕴藏的丰富宝藏。交易所里挤满了满腔热情的股民，任何一条凭着最坚定的信心编织出来的谣言都足以立刻对股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据说，斯坦霍普伯爵（Earl Stanhope）在法国接到一份西班牙政府建议用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洪港口（Port Mahon）去交换秘鲁的部分海岸以便保障并且扩大南海公司的贸易的建议书。南海公司获准派出任意数量的船只前往南美洲海岸，而不再受到与这些港口一年一船贸易的限制。此外南海公司不用再将贸易产生的利润的25%上交给西班牙国王，也不必向任何一个外国君主缴纳一个铜板儿。

“他们的前浮现出一幅画面：黄金白银堆积如山。”

南海公司的股价再次迅速飞涨。就在4月12日，也就是南海公司的提案成为法律5天之后，公司董事们打开自己的账簿，又发行了100万新股，价值100英镑的每股资金售价为300英镑。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汇集于此，争相认购，以至于人们发现：第一次认购的数量就超过了200万原始股。

对于每股面值100英镑的原始股，他们将分5次付款，每次60英镑。几天以后，股票价格涨至340英镑，而申购的费用则涨到首次认购费用的两倍。为将南海公司股票的价格哄抬得更高，在4月21日的一次董事大会上，公司宣布仲夏季节发放的股票红利将为10%，而所有认股的股东都将分得同样优厚的红利，这一决定与他们原先规划的目标是相互照应的。公司董事们为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热情，煽动人们购买南海公司的股票，打开账簿，决定再次发行100万股，以400%的溢价发行。各个阶层的人们对这些资金的投机活动充满高度的热情，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内，人们按照这一比例申购的数量就已多达150万股。

与此同时，数不清的合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大不列颠的各个地区拔地而起，而这些公司很快就被戴上“泡沫”的桂冠。“泡沫”是百姓所能想得到的最恰当、最相称的名字，老百姓津津乐道他们所起的这一绰号——没有比“泡沫”更合适的名称了。这些泡沫有的只持续了一两个星期就销声匿迹了；有的则比这些泡沫还要短命，甚至连一个星期的时间都不到，就寿终正寝了。每个夜晚，都会有新的计划被炮制出来；每个早晨，都有新的项目应运而生。在康希尔，最高贵的贵族与最孜孜不倦的证券交易商人一样热切地追求赢利。威尔士王子成了一家公司的总管。据说，他通过炒股净赚了四万英镑。^①布里齐沃特公爵（duke of Bridgewater）着手进行一项致力于发展伦敦和西敏寺的计划，而强德斯公爵（duke of Chandos）则开展了另一项计划。同时进行的不同的计划接近100多项，每一项都比以往的计划更加天花乱坠、神乎其神，欺骗性也更大。用《政治国度》（*Political State*）里的话来说，这些项目“被立刻上马，被诡计多端的骗子推动着，然后被众多贪婪的傻瓜们竞相追逐着，最后它们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那正是家喻户晓的‘泡沫’，一个骗局而已。”根据计算，在这种没有担保的操作中，大约有

① 请参见：考克斯（Coxe）的《沃尔普尔》（*Walpole*），它是秘书长克拉格斯斯（Mr. Secretary Craggs）先生与斯坦霍普伯爵的往来通信。

150万英镑从一些人的荷包流入另一些人的钱包里，在让许多蠢货倾家荡产的同时，又使许多流氓无赖摇身一变成为家财万贯的富豪。

这些名目繁多的计划之中，有的项目似乎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如果是在一个人们不是那么激动而且大众的头脑没有被金钱和投机冲得晕头转向的时期，那么，这些项目可能会比其他的项目优先受到人们的追捧。但是，策划者之所以搞出这些名堂来，目的无非是要抬高股票的市场价格。策划者抓住股票上扬的机会，在第一时间将手中的股票卖出，到第二天清晨的时候，骗局已经告一段落。麦特兰德（Maitland）在其《伦敦史》一书中严肃地告诫人们，在受到巨大鼓励与支持的项目之中，有一个是为了成立一家公司，“以使用锯木灰制做出松木板”。毫无疑问，上面的故事纯粹是虚构出来的玩笑，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有几十个计划纯属骗局，在被揭开面纱之前，骗局使成百上千的人倾家荡产。这些骗局当中，有一个项目是制造永动机轮——资金为100万，还有一个项目是“鼓励英国的养马事业，改良教堂的土地，修缮与再造牧师与教士的住房”。可是，为什么那些原本主要是对后一项计划感兴趣的牧师们对第一个项目也发生兴趣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个计划是由一群热衷于当时在英国颇为盛行的猎狐运动的牧师们提出的。这家公司的股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不过，在所有的名目之中，最为滑稽可笑、最违反常理，也最深刻地揭示出群体之极度疯狂的，还要数那个由一位默默无闻的冒险家提出来的计划。该计划自我标榜为“一家为了从事一项具有巨大优势的事业而成立的公司，但是却无人对它有丝毫的了解。”要不是有几十个可靠的证人出来作证，声明这是事实的话，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有人被这样荒唐的一个项目骗得云里雾里的。对公众的信任如此大胆而又成功地进行践踏与利用的那个“天才”其实什么也没做，只不过在自己的招股说明书中写道：自己的公司需要50万的资金，50万资金化成股票是每股100英镑，一共是5 000股。每一份股票只要先存入2个英镑，而每个存入2英镑的认购人每年都将有权获取每股100英镑的回报。当时，他并没有告诉认购人他将

用什么办法来得到如此丰厚的利润，而是承诺在一个月之后向股东们公布所有的详情，届时还将收取剩下未缴的每股98英镑的认购款。翌日上午9：00，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在康希尔开办了一家办事处，汹涌的人群将他的大门堵得个严严实实。当下午3：00关门大吉之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售出了不少于1 000股的股票，应该预付的存款也已全部交清，在5个小时里他赚到了2 000英镑。这位仁兄深谙“见好就收”之道，于是当天夜里，他脚底抹油，逃往欧洲大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再也没人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

难怪诗人斯威夫特会将交易所街巷比喻为南海中的一个海湾，高声吟诵：

成千上万的认购者蜂拥而至，
互相践踏、互相推搡，
每个人都划着自己漏水的小船，
到这儿来打捞黄金，结果却难逃命丧黄泉。

现在，他们葬身于大海深渊，
现在，他们又一次飘向天堂，
他们前后旋转、步履蹒跚，
就像醉汉一样，他们穷途末路，无计可施。

就在这时，在安全的加拉维（Garraway）悬崖之上，
生活着一群以落难船只为生的食人部落，他们野蛮，
他们躺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失事的船只，
等着将遇难者的尸体瓜分蚕食。

另一起大获全胜的骗局是所谓的“环球许可证”（Globe Permits）事件。“环球许可证”不过是一些上面盖着蜡封并且印着“环球旅店”（Globe Tavern，位于股票交易所的附近）标志的正方形的游戏卡片，卡片上面还铭刻着“航海帆布许可证（Sail-Cloth Permits）”。“环球许可证”的持有人从中

能够得到的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购买一家新的航海服装生产厂的股份。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一规划的设计师是个相当富有的家伙，但他后来却被牵连到了南海公司董事会挪用公款的丑闻之中，并且因此受到了惩处。在交易所里，这些许可证的售价高达60个几尼（guineas，英国从前的金币名称，1个几尼相当于21个先令）。

各色人等，不分男女老幼，都深深地陷入这些泡沫之中，不能自拔。男人们来到旅店和咖啡店，去见他们的经纪人；而女人们则为了同样的目的来到女帽商和理发匠的店堂。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都对他们认购的公司所提出的项目的可行性深信不疑。对他们而言，只要他们认购的股票价格通过投机炒作而迅速窜升，并且很快就能为他们带来相当可观的差价收益，他们就算是达到了自己的既定目的。他们将以最快捷的速度再将这些价格超过实际价值的股票转手卖给那些真正相信这些谎言的可怜虫们。交易所里的人们是如此的困惑和迷乱以至于同一个泡沫的股票在同一时刻竟然会价格迥异——在交易所巷子的一头，它的卖价要比巷子另一头的同一只股票的卖价高出10%。头脑尚且清醒的人们对大众这种奇异的狂热感到悲伤与遗憾，发出了种种警告。议会内外不乏具有远见卓识之人，他们清楚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沃尔普先生也没有停止他那令人灰心丧气的预言，他的忧惧得到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勤于思考的人的普遍认同，他们一起对政府施加了力度更大的影响。6月11日这天召开的议会会议上国王宣读了一份公告，宣布所有这些非法的项目都应当被视为公共垃圾，不但要对之进行相应的检举和起诉，而且任何股票经纪人禁止买卖这些公司的任何股票，违者处以500英镑的罚款。尽管这份公告已经被张贴在公众眼前，无赖一样的投机者照旧继续着自己的投机勾当，而上当受骗的人们也依然在推波助澜。7月12日，聚集在枢密院里的法官大人们召开秘密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命令，该命令要求取消一切专利权和特殊许可证，并且解散所有的泡沫公司。下面是一份命令的复本，其中有一张囊括了所有这些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计划的清单。在今

天看来，这样一份命令是不会被视为索然无趣的。时至今日，每隔一段时间，大众的脑海就会被太多的各式各样意欲进行类似的泡沫炒作的计划塞满。

“1720年7月12日，在枢密院的会议室——怀特礼堂里，法官大人们出席了会议。”

枢密院的法官们在会议上审议了那些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成立股份公司的计划给公众带来的诸多不便。国王陛下的许多臣民被迫放弃，股份公司的筹建者们为了确保获得专利权或是特许证需要支付的费用。为了防止类似的课税行为，法官们在这天下令：将几项请求和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御用律师以及总诉讼律师（solicitor-general）递交的几份报告一起摊开放在面前进行讨论。经过深思熟虑，法官大人们欣然接受了国王陛下的枢密院提出的建议，驳回以下的申请：

1. 有几个人申请获得专利证书以便借用“大不列颠伟大渔业”（Grand Fishery of Great Britain）的名义从事渔业贸易。
2. 英格兰皇家渔业公司申请获得专利证书，以便获得更大的权力，从而有效地为开展这项伟大的捕渔事业做出贡献。
3. 乔治·詹姆斯代表他本人以及与一家国内渔场有关的各色人等提出申请，申请成立公司的专利证书，以使他们能够从事相同的事业。
4. 几位商人、贸易商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的名字如下……恳请组建公司，以便恢复元气，并且发展对格陵兰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捕鲸事业。
5. 约翰·兰伯特爵士以及其他人士提出申请。他们代表本人以及许多商人，请求组成公司，以便开展对格陵兰的贸易，尤其是在戴维斯海峡从事捕鲸事业。
6. 另外一项请求对格陵兰贸易的。
7. 几位商人、绅士以及市民提出申请，请求组建公司，以便为出租或者货运的目的购买和建造船只。

8. 萨缪尔·安特里姆 (Sameul Antrim) 和其他人共同提出申请, 申请专利证书, 以便耕种大麻和亚麻。
9. 几位商人、船主、帆船建造人以及航海服装制造商提出请求, 申请组建公司的特殊许可证, 以便通过合股的形式开展并且推动他们所提的制造业。
10. 托马斯·宝艾德 (Thomas Boyd) 以及几百名商人、船主、船舶建造人、纺织业主和其他贸易商提出请求, 申请组建公司的特殊许可证, 以便他们有权借钱购买土地, 制做航海服装和精美的荷兰麻布。
11. 代表那些对已故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赋予的专利权享有权益的人们, 提出制作亚麻布和航海服装的申请。他们请求政府只确认他们现在拥有的特权, 不再向其他任何人授予制作航海服装的权利, 并且赋予他们额外的从事棉花和丝棉制品制作的权利。
12. 一家英国火险公司(对英格兰各地发生的火灾提供共同的保险)股票的承购方、几位伦敦的公民、商人和贸易商以及其他人士提出申请, 请求组建公司, 以便发展所谓的事業。
13. 国王陛下在伦敦城以及大不列颠的其他部分的皇室臣民提出请求, 申请注册成立一家保险公司, 以便对英格兰王国范围内的火灾损失提供保险。
14. 托马斯·伯基斯 (Thomas Burges) 和国王陛下的其他臣民, 代表他们自己以及其他人士认购120万英镑, 请求以哈伯格公司的名义注册成立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以便同英国国王在德国的领地进行贸易。
15. 爱德华·琼斯, 一位木材经营商, 代表他本人以及其他人士提出请求, 申请组建公司, 以便从德国进口木材。
16. 伦敦的一些商人提出请求, 申请特殊许可证, 请求准许他们组建一家公司, 以便开办一家盐厂。
17. 伦敦的麦克非德里斯船长 (Captain Macphedris), 一位商人, 代表他

本人以及其他一些商人、制衣匠、帽商、染坊主和其他贸易商提出申请，请求批准他们组建一家公司，使他们有权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去购买土地，以种植和培养一种称为茜草的可作染料的植物。

18. 伦敦的约瑟夫·加伦多 (Joseph Galendo)，一位鼻烟制造商，提出申请，请求为他在弗吉尼亚准备并且制作鼻烟所需的烟草发明申请专利，并且在国王陛下的所有领地内都享有相同的特权。

泡沫清单

以下这些泡沫公司，被一项命令宣布为非法，并且随后被取缔：

- 进口瑞典铁矿的泡沫公司。
- 为伦敦供给海煤的一家泡沫公司，资金为300万英镑。
- 为在英国各地修建及重建房屋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300万英镑。
- 为制作细薄棉布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开创并发展英国的铝业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卓有成效地殖民于布兰科和萨尔·塔塔加斯岛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迪尔城 (Town of Deal) 提供淡水的泡沫公司。
- 为进口佛兰德斯花边 (Flanders lace) 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改良大不列颠的土地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400万英镑。
- 为鼓励英国的养马事业，改良牧师与教堂的用地，并且修理和重建牧师与教士的住房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大不列颠制造钢铁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改良弗林特郡 (county of Flint) 的土地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100万英镑。
- 为购置土地并在上面建造房屋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做毛皮类生意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霍利岛（Holy Island）建立盐厂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买卖房地产并且提供抵押贷款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从事一项能够获取巨大利益的事业而成立的泡沫公司，但是无人知晓这一事业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 为伦敦铺设街道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在大不列颠的任何地方的葬礼提供服务设施的泡沫公司。
- 为买卖房屋并且放款以获取利息而建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500万英镑。
- 为发展大不列颠的皇家渔业而建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1 000万英镑。
- 为保证航海人员的工资水平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向勤勉之人提供帮助与鼓励而建立贷款办公室，该泡沫公司的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购买和改良可出租的土地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400万英镑。
- 为从北大不列颠和美洲进口沥青和焦油以及其他海军储备用品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成衣贸易、毡帽贸易以及浪形屋瓦贸易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艾塞克斯（Essex）购置和改善庄园领地以及收取产地使用费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对马匹提供保险而建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300万英镑。
- 为了出口羊毛制品并且进口铜、铁和黄铜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400万英镑。
- 为了开办一家大药房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300万英镑。
- 为建设厂房并且购买铅矿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改进制作肥皂的工艺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在圣特·克鲁兹 (Santa Cruz) 岛上修建居民区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德比郡 (Derbyshire) 挖掘矿井并冶炼铅矿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制作玻璃瓶以及其他玻璃制品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制作永动轮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100万英镑。
- 为改造花园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向儿童的财产提供保险并增加儿童福利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传统的房屋里面装卸货物并为商人从事业务洽谈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英格兰北部从事毛棉纺织制造业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从弗吉尼亚进口核桃树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制作曼彻斯特绳索与棉花等物品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制造“约帕”和“卡斯泰尔”肥皂 (Joppa and Castile soap) 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提高大不列颠王国的精炼熟铁和钢铁制造业的品质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从事花边、各种结实的粗麻布、细薄的棉布以及软洋纱等的交易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从事大不列颠王国的某些特殊产品的贸易和改进活动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300万英镑。
- 为伦敦市场供应牛肉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制作眼镜、马车镜等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在康沃尔 (Cornwall) 和德比郡从事锡矿和铅矿的开采工作而设

立的泡沫公司。

- 为制作菜籽油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进口水獭皮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制作硬纸板和包装用纸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进口毛纺织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油料和其他材料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改善和扩大丝绸制造业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能以股票和年金收入为基础提供贷款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按照一个小幅折扣对寡妇以及其他的人等支付年金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改进麦芽酒的制作工艺并发展麦芽酒的酿造规模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400万英镑。
- 为了建立一个庞大的美洲渔场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在林肯郡购置并改良沼泽地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提高大不列颠的造纸业水平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伯特姆里公司 (Bottomry Company)。
- 利用热空气将麦芽烘干的泡沫公司。
- 为在奥伦努可河上进行贸易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能够效率更高地在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 以及大不列颠的其他地区制造用做桌布的粗毛呢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购买航海的物资储备以及提供食物并且支付工人工资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雇用穷困潦倒的能工巧匠，用于为商人和其他人提供钟表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改良耕地和家畜的品种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改良我们的马匹品种而设立的另一家泡沫公司。
- 为马匹提供保险的又一家泡沫公司。
- 为了开展大不列颠的玉米贸易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所有的男女主人提供保险，使其免遭仆人为他们带来的损失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300万英镑。
- 为了收容并养育私生子而建造房屋或是医院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在不用火或不损失营养物质的情况下漂白粗糖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在大不列颠修建收费公路和码头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给偷窃和抢劫造成的损失提供保险的泡沫公司。
- 为从铅矿中提取白银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制作瓷器和彩陶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100万英镑。
- 为了进口烟草，然后再将之出口到瑞典和北欧而设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400万英镑。
- 为用坑煤炼铁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向伦敦和西敏寺城提供干草和麦秸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300万英镑。
- 为了在爱尔兰开办工厂用以制作航海用布和包装用布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提取压舱碎石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打击海盗而成立的购买和修理船只的泡沫公司。
- 为了从威尔士进口木材而成立的泡沫公司，资金为200万英镑。
- 为了开采岩石盐而成立的泡沫公司。
- 为了将水银转变为一种可锻造且有延展性的优良金属而设立的泡沫公司。



除了以上所列的泡沫公司以外，每天还有新的泡沫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尽管政府对这些泡沫公司采取的是谴责的态度而且人群中部分头脑清醒人士也对之嗤之以鼻，但是这些公司依然层出不穷，异常活跃。印刷店里比

比皆是的是讽刺漫画，充斥报纸的讽刺小诗和讽刺作品，都对当时流行病般的疯狂进行过深刻的揭露与无情的鞭挞。一位富有创意的扑克牌生产商制作并发行了一套“南海扑克”（这套扑克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上面除了印有一般扑克都有的数字与图案以外，还在扑克的一个角落印有关于一家泡沫公司的讽刺漫画，下面还有相应的韵文诗。在最负盛名的泡沫公司之中，有一家名为“帕克尔机器公司”（Puckle's Machine Company），该公司专门生产圆形和方形的加农炮弹和子弹，对战争艺术进行一番彻头彻尾的改革。因此，在黑桃8这张牌上印着对其深受公众喜爱背后的实质所作的总结与概括：

这个发明真是稀罕，
它要毁灭的是国内愚蠢的民众，而非国外。
我的朋友，不必害怕这台可怕的机器，
只有那些拥有它的股份的人才会深受其害。

红桃9上面则是一幅针对英国铜业公司的讽刺漫画，上面还印有以下这首韵律小诗：

那些梦想能够点石成金，用金币和银币换取英国铜币的轻率的家伙，
在交易所里会被证明是只用贵重金属换取掺假的黄铜的蠢驴。

方片8则隆重推出一家致力于殖民地事业的阿凯迪亚（Acadia）公司，并且附有下面这首打油诗：

他是一个富有的家伙，
他打算在北美花掉一大笔钱，
让他当个没头没脑的股东，去认购股份吧，
蠢驴的耳朵才会听他的话！

这套扑克里的每一张牌上除了以相似的风格揭露某项奸诈的欺骗计划之外，还对那些吃亏上当的傻瓜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根据计算，为推行这些泡

沫计划需要的金额总计高达3亿英镑。

不过，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那只吞噬了贪婪而轻信的人们的成千上万英镑的血盆大口——南海海湾吧。5月29日，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涨至500美元。约有2/3领取政府年金的人们把政府证券拿来交换，转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整个5月，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一直在涨。5月28日，南海公司的股票报价是550英镑。此后的四天之中，南海公司的股价异常迅速地大幅上扬，从550英镑狂涨到890英镑。现在，人们一致认为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会再涨下去了，许多人抓住机会，抛出了手中持有的南海股票，以便兑现他们的利润。许多国王麾下的正要陪同国王前往汉诺威的贵族及其他人等，这时也都着急上火地想要抛出手中的南海股票。卖家这么多，买家却寥寥无几。6月3日，交易所里供需明显失衡，这样一来，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刻从每股890英镑下跌到每股640英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大惊失色，他们给自己的代理人下达指令，命令他们买进南海公司的股票。董事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傍晚时分，公众的信心得到了恢复，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止跌回涨”到750英镑，然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只有轻微的波动，直到6月22日公司合上他们的账簿收盘为止。

详细地记录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为使公司的股票价格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所采用的各种伎俩，实在没有必要，而且也很索然无味。只要看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最终上涨了1 000%，就足以说明问题了。8月初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股票报价就已经这么高，随后，泡沫被吹到极限，开始振动摇晃，几欲爆炸。

许多领取政府年金的人们对南海公司的董事会表示过不满，指责董事们在各次认购股份的过程中罗列名单的时候有失公允。后来，当了解到董事会主席约翰·布朗特爵士连同其他一些董事们都已经卖掉了各自持有的南海公司股票的时候，人们的不满升温，对董事会提出进一步的谴责。在整个8月份里，南海公司的股票一路下滑，到9月2日的时候，它的报价只有每股700

英镑了。

现在，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已经敲起警钟了。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公众对他们彻底丧失信心，南海公司的董事会召开了一次公司全体股东大会，地点选在商人泰勒的礼堂（Merchant Tailor's Hall）里，时间是9月8日。8日上午9：00，大厅里人满为患，令人窒息；齐普赛街（Cheapside）挤满了无法进入的人们，一时之间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各位董事及其朋友亦云集于此。约翰·费洛斯爵士（Sir John Fellowes）——下级主管，应召前来主持会议。他向与会众人说明了召开本次会议的原因，并向大家宣读了董事会关于一些问题的决议，还为大家描述了他们的工作进展，以使大家对公司的业务有个大概的了解。此外，他还介绍了公司吸收可收回与不可收回资金的情况以及对资金的预定分配情况。接下来，秘书长克拉格斯先生做了一番简短的讲话，对董事们的作为进行了一番评价，并且敦促道，没有什么比他们内部的团结更为重要、更能行之有效地帮助这一计划的圆满实施了。他饱含深情地向董事会致谢，感谢他们谨慎而富于技巧的管理，并且希望他们以公司利益为重，继续按照他们认为的对公司最为有利的方式行事，以此，他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在众议院中，汉格福德先生（Mr. Hungerford）由于热衷于站在南海公司的立场上说话而饱受白眼与蔑视。聪明之辈甚至怀疑他知悉内幕消息，知道何时抛售可以大赚一笔。这一回，他滔滔不绝地吹牛说，他已经目睹过许许多多这种性质的团体的起起落落、兴衰沉浮；在他看来，从来没有哪个团体能像南海公司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做出了如此精彩的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帝王、主教、法官以及后人所无法企及的；他们将各方利益协调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利益之中；他们平息了（如果不是彻底地消灭的话）国内民众的不满与仇视。通过股价的上涨，富人的财富得以大幅增长，乡村绅士们的土地也在两倍三倍地增长。与此同时，他们也为教堂做好事、谋福利，一些牧师通过南海的项目获得一大笔金钱。总而言

之，他们使整个国家变得更加繁荣富饶，希望他们不要忘了自己，不要忘了为自己也谋取一些福利。在汉格福德发言的后半段，人们不时报以嘲讽的嘘声——这番夸夸其谈的讲话难免遭人耻笑。但是董事及其朋友们，连同大厅里那些炒股获利者，却对这番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波特兰德公爵以类似的论调发表了另一番演讲，表达了他对人们竟然会对南海公司不满的强烈好奇之心。当然，他从投机当中得到了好处，这情形有点儿类似《乔·米勒笑话集锦》（*Joe Miller's Jests*）中那位肥胖的长老议员，无论何时何地，每当他享用过一顿美餐之后，都会将他又肥又短的双手放在他那大大的肚子上面，并且大发宏论，怀疑普天之下怎么可能有饥肠辘辘之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几项决议，但这些决议对公众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就在当天晚上，南海公司的股票跌到每股640英镑，第二天股价又跌到每股540英镑。此后，日复一日，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持续下跌，一直跌到每股400英镑。在《沃尔普尔》中，考克斯记载道：9月13日，国会议员布罗德里克先生（Mr. Broderick）在给大法官兼上议院院长米德尔顿（middleton）的信中写道：“有各种各样关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为什么这么快就遭受乌云压顶之灾的猜测。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只要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去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已经将大众的信用大肆滥用到了极点，没有进一步发掘的余地了。铸币的数量已经支撑不了这种信用。他们用上当受骗的人们的损失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之中最声名显赫的人物已经从中赚到了数不清的财富。他们的头脑已被贪婪的欲望控制，妄想用防波堤之类的丘陵来建造高耸入云的山峦。成千上万的家庭将为此沦为乞丐。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人们的惊恐——人们的愤怒难以描述，情况恶化到了如此令大众灰心丧气的地步。以至于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计划或是方案像南海公司的一样，被不愿经受风吹浪打的人们所念念不忘、朝思暮想；以至于我想象不出接下来究竟还会怎样发展。”10天之后，股价还在下跌，他写道：“公司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因为他们身处如此危险的境地，他们搞不清楚应当转向哪一条

道路。最近，从城里回来了几位绅士，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位已经在任何一个国家人人喊打的南海公司委员的准确姓名。无数的金匠已经失业，而每天还有源源不断的金匠加入失业大军的队伍。我十分怀疑他们之中是否会有1/3，或者1/4的人能够经受得起这场灾难的考验，继续坚持下去。从一开始，我就将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建立在那个不容置疑的真理之上——1 000万英镑（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我们流通中的现金数量）——不可能在流通中额外创造出超过我们的纸币信用范围之外的2亿英镑。不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公理遭到怀疑，我们高尚的国家机器就必然不可避免地瘫痪，停止运作。”

9月12日，在秘书长克拉格斯先生万分恳请之下，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召开了几次会议。根据广为流传的一份报告，后者同意让南海公司600万英镑的债券流通。这一举措使南海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670英镑。但是，就在当天下午，当人们得知此事纯属空穴来风之后，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立刻应声而落，再次跌到每股580英镑，第二天又跌到每股570英镑，以后更是一路下滑，直跌到每股400英镑。^①

内阁对事态的发展惴惴不安。只要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出现在大街上，就会受到人们的羞辱与责骂，时刻都有危险的暴动事件发生。信使被派往汉诺威，恭请国王迅速回国。赋闲在乡间老家的沃尔普先生也不得消停——有人跑去求助于他，希望他运用他那众所周知的对英格兰银行董事们的影响力，诱导他们接受南海公司为流通自己的债券所提出的计划。

英格兰银行不想惹火烧身，不想把自己搅和进南海公司的事务中去。它很害怕被牵扯进灾难之中而不得脱身，显然极不情愿接受这些建议。但是，国民众口一词地强烈要求英格兰银行出来挽救大局。既商且政的每一位知名

① 诗人盖（Gay）在灾难深重的当时，从年轻的克拉格斯那儿获得一批作为礼物的南海公司的股票，并且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拥有20 000英镑。盖的朋友们曾经劝他卖掉这些股票，可诗人却梦想得到尊贵荣耀的地位，他不想挡了自己的财运。当时，朋友劝他卖掉股票，还能维持每年100英镑的生活水平。芬顿（Fenton）对他说，这样，你将保证每天有干净的衬衫穿，还有大块的羊肉吃。但是，诗人拒绝了这一建议。结果是，诗人损失惨重，连本带息一起赔了个精光，只落得个难以糊口。——约翰逊《诗人的生平》。

人士全被召集过来，为解决当前的紧急情况出谋划策。沃尔普先生提出的一份合约草案被完完全全地接受，作为双方进一步协商的基础，而公众的警惕却只是略有放松。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0日，南海公司在商人泰勒的礼堂里再次召开股东大会。这次会议做出决定，授权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同意英格兰银行或是其他任何人提出的与公司发行债券相关的任何事项，或者与英格兰银行达成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协议。一位名叫普尔特尼（Pulteney）的发言人说，他看到极度恐慌吞噬了每个公民的灵魂，让人失魂落魄。人们来回奔走，个个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想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四处蔓延，没人能够预见到这场灾难的形式与深度，也唯其如此，才更加令人惶恐。

如黑夜一般黑暗，

如十位复仇女神一般凶猛——像地狱一样可怕。

两天之后，在英格兰银行的一次股东大会上，银行的负责人向大家通报了南海公司就此召开的几次会议的大致内容，并且补充说，公司的董事们还没有就此事想出什么合适的解决办法。接下来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众人均未提出异议。这个决定授权董事会与南海公司就发行债券的有关事宜进行商讨，并与南海公司就发行债券的总额、发行条件以及发行时间等方面进行协商，在合适的情况下，可以同意南海公司发行债券。

这样，双方都可以在自己认为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采取自由行动。英格兰银行为支持公共信用打开账簿开始出售，按照通常15%的定金，3%的溢价和5%利率的存款条件，预购了300万南海公司的债券。上午刚开始的时候，人流如潮水般涌至，纷纷带着自己的钱袋来认购债券。当时，人们都以为当天就能完成全部的认购任务。但是在中午到来之前，形势发生了逆转。尽管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来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仍然迅

速滑落。人们对南海公司的债务太缺乏信心，甚至有一批最杰出、最知名的金匠和银行家纷纷出逃——他们之中有些人借给别人大量的金钱用于南海公司的股票投机，而现在，他们大难临头，不得不关门，卷起铺盖溜之大吉。

此前一直负责南海公司的主要出纳任务的剑刃公司（Sword blade Company）这时也停止了支付——在人们看来，这些不过是灾难的开端而已。这引发了大量的银行挤兑现象，银行现在不得不以比起上午收进人们认购债券的货币快得多的速度来支付货币。接下来的一天是节假日（9月29日），英格兰银行有了喘息的机会，遏制住了风暴的袭击；但是他们以前的竞争对手南海公司，却在风暴中遭受致命的打击，一命呜呼了——南海公司的股票跌到每股150英镑的低点，几经挣扎与振荡之后，股价跌到每股135英镑。

英格兰银行发现，在恢复公众信心、抵挡毁灭性潮流方面，自己已经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现在只有冒险一试，被迫按照自己不情愿接受的不公平的协议行事，但是这样一来，自己很可能与试图挽救的一方一起被滚滚洪流卷走——不但救人不成，而且白白地搭上自己的小命。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义务继续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那份所谓的英格兰银行与南海公司的协议只不过是一份协议草案而已，其中有许多重要事项都是空白，而且没有注明对中止协议的任何惩罚性的条款。用《议会史》（*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的话来说，“于是，人们看到那家神通广大的公司在8个月的时间里脱颖而出、迅速发展及至衰落的整个过程。这家公司神奇地成长、发展成一家令人艳羡，令整个欧洲为之瞩目的公司。但是，由于它的基础是欺诈、错觉、轻信与癫狂，一旦它的董事会为非作歹的行为被人识破，它就立刻轰然倒塌，跌入深渊。”

在危险的幻觉持续期间，在它如日中天的辉煌时期，国民变得相当的腐败和堕落，这一点非常容易被发觉。为找出渎职人员而进行的议会调查揭示出他们的声名狼藉、臭名昭著与令人不齿，其道德沦丧到与恶棍无异，而其才智平庸与他们已经脱离了的、从中崛起的周围的人们一样。调查的结果是

一大堆的丑陋罪行，而深入调查、研究这些罪恶却是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一个民族和一个公民一样，不能成为不可救药的赌徒而不受到相应的惩罚，他们迟早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与教训。一位著名的作家^①写道“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这样一个年代太过平淡无奇。没有任何一位理性而又富有想象力的读者会对这样一些交易的细节发生兴趣，并且从中得到乐趣。对这些交易不允许掺杂任何热情，不允许添油加醋，也不允许添枝加叶地进行修饰、加以美化。对交易细节的描述只能提供给读者一幅关于丑陋而卑劣的堕落行径的索然无味、缺乏生气的画面。”如果斯莫利特稍具一点儿幽默细胞的话，他会发现自己错了。与他的看法相反，这个话题对读者的吸引程度足以令一位小说家为之动容。对于一个遭受掠夺之人，他的失望之中难道没有热情可言吗？为成千上万被南海泡沫夺去财富，弄得一贫如洗甚至家破人亡的芸芸众生的悲哀所作的图画真的就没有生命、索然无味吗？关于昨日的巨富沦落为今日的乞丐的图画与记录会淡然无味吗？关于那些昔日大权在握、影响深远、炙手可热的人物如何沦落为逃犯，如何被放逐的故事，那关于声声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责与诅咒的记录苍白无力吗？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民族突然从理智的约束之中挣脱出来，为追求一个虚幻的黄粱美梦而疯疯癫癫的，拒不相信那一切并非真实，直到像一只受到迷惑的红色雌鹿去追逐一团鬼火一样被虚幻的目标引入一片致命的泥沼之中，你能说这是一幅沉闷无趣或者没有教育意义的画面吗？但是，按照斯莫利特式的错误观念来描述这一历史片段的记载实在是太多了，一文不值的宠臣为了博得更加一文不值的国王们的宠幸所设计的阴谋，或是关于谋杀式的战斗与围攻的种种记录都已经被人们用一切流利的风格和花样繁多的媚语，一遍又一遍地大肆渲染过了。但是，那些对当时人们的精神道德与物质福利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却被叙述者漫不经心地一笔带过，轻描淡写，既枯燥乏味又缺少浓墨重彩，当然不够热烈，不够激情，也不够精彩了。

^① 斯莫利特 (Smollett)。——译者注

在这一著名的泡沫事件发展的前前后后，英格兰各地出现了异常惊人的景象——公众的精神状态全部处于一种不健康的骚动之中，人们不再满足于按部就班、谨小慎微的行业所能带来的缓慢但却势在必得的利润。这种期盼使得人们好高骛远，不再小心翼翼，开始大手大脚，寄希望于一夜暴富，拥有万贯家财。前所未有的奢靡之风，带来了道德的懈怠。由于股票赌博而一夜暴富的无知的人们嚣张跋扈，目中无人，让那些在精神与行为层面具有真正绅士风度的人们为之汗颜。黄金竟有如此巨大的魔力，能使不名一文的小人跻身上流社会！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爵士称这些暴发户为“贱民”（cyphering cits）^①。在他们倒霉的日子里，这个称号被众人牢记在心里。在议会咨询会上，许多南海公司的董事之所以倒霉、遭殃，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挪用公款，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中的一位，以无知的富人所拥有的最露骨的傲慢说，他打算用黄金喂养他的骏马，而到头来，他自己却落得个用面包和水勉强填饱肚子的下场。每一张不可一世的傲慢面孔，每一次妄自尊大的无稽之谈，都被记录在案，并且得到百倍于此的贫困与侮辱的回报。

全国上下的事态紧张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乔治一世不得不缩短自己原定在汉诺威的逗留时间，尽可能快地赶回英格兰。他于11月11日一回到伦敦，就召集议会于12月8日召开会议。与此同时，在大不列颠王国的每个重要城镇也都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公众集会。会议接受了人们的请求，将那些通过欺诈将国家带到毁灭边缘的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绳之以法。好像没人想到，这个国家本身与南海公司一样，对这场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人站出来指责人们的贪婪与轻信；没有人指责人们对获利和收益的无耻的渴望，这种强烈的欲望已经吞噬了这个民族原来所具有的一切优良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也没有人指责人们的疯狂与热情，而正是这种狂热使得民众满怀激情地将自

① 本词组为法语，cypher即cipher，意思是：不重要的人或物，cits已经废弃不用，意思是：平民。——译者注

己的脑袋伸出，投入阴谋策划者为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事情，英国人民是单纯、正直和勤劳的人民，一群强盗毁了他们，这帮强盗将被送上绞架绞死，将被扔到水里淹死，将被五马分尸而没人为他们掉一滴眼泪。

这几乎是整个国家万众一心的感受。上、下两院也不能做出更加合理的处理。在南海公司董事会的罪行公之于众之前，严惩不贷是百姓唯一的呼声。宝座上的国王发表了一番讲话，表达了他的希望。国王希望他们记住，他们的谨慎、勇气与决断都是寻找和应用适当的药方来救治他们的不幸所必需的。在关于如何响应国王的演讲的讨论会上，几位发言人沉溺于对南海计划的指导者的强烈抨击之中，莫尔斯沃斯（Molesworth）大人尤为激昂。

有人说，没有法律可以惩治被人们公正地视为国家目前不幸境遇的始作俑者的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莫尔斯沃斯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应当效法古罗马人的做法——古罗马人没有立法以惩戒弑父之罪，因为他们的立法者认为没有哪个儿子会灭绝人性到将自己的双手浸没在自己父亲的鲜血之中。而当这种惨绝人寰的罪行发生之后，立法者立刻制定了一项法律，对这种邪恶的罪犯处以极刑。古罗马立法者决定，犯有这种罪恶的卑鄙小人应被缝进一条麻袋，然后被活生生地扔进台伯河（the Tiber）里。莫尔斯沃斯将极端恶劣的南海阴谋的策划者与执行者视同国家的弑父之徒，他认为应以同样的方式将他们缝进麻袋并扔到泰晤士河里去，方能大快人心。其他的发言人也同样呼吁勇气与谨慎。沃尔普先生更是谦和慎重。他认为首要的注意力应当放在如何重建公共信用的问题上：“如果伦敦遭受火灾，所有明智之人都会帮着灭火，以阻止火灾的蔓延。在扑灭大火之后，他们才会着手调查纵火者。现在，公众的信心已经受到非常沉重的打击，正躺在地上流血，我们应当迅速拿出治疗方案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公共信用，以后则有的是时间来惩罚这帮‘刺客’。”12月9日，作为对国王陛下讲话的回应，经过修改和增补的一篇演讲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同，对它的增补意见也得到一致通过。补充的内容是：议

院不仅决定努力寻求一种解决国家灾难的办法，而且决定对灾难的始作俑者给予应有的惩罚。

议会的调查进展迅速，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被勒令向议院提交一份关于他们全部行动的完整记录。下议院做出的决定大意如下：南海公司的灾难主要是股票投机者的邪恶伎俩造成的，要想重建公共信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制定一套法律来阻止这种声名狼藉的操纵行为。这时，沃尔普先生站起来说，正如他先前提到的那样，他已经为一项重振公共信用的计划花费了不少时间，但是这个计划的实施还有赖于一个基础。他认为，在他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以前，应当有人告诉他是否能够依赖和仰仗那个基础，也就是与南海公司签署的认购公共债务的协议、对财产要求的权利、货币申购以及其他的契约，在现阶段是否仍然有效？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259票对117票的多数通过了决议，所有这些契约应当继续维持现状，除非南海公司股东大会为解除合法权益人的痛苦而做出修改，或者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加以废除。第二天，沃尔普先生向代表全体下议院议员的一个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为重建公共信用而设计的规划。规划的内容是将南海公司900万的股票注入英格兰银行的账户，并且以一定的条件将同样数量的南海公司的股票注入东印度公司账户。下议院欣然接受了这个规划，只有少数人反对。议院发布命令，由这两家大公司提交各自的建议。可是无论英格兰银行还是东印度公司都不情愿为南海公司提供援助，在做出决定之前为了仔细商讨而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股东们强烈反对这项计划，但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最后，他们终于通过了自己为南海公司发行债券所提出的条件，并且向委员会提交了报告。在沃尔普先生的监督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法案，并且安全地通过了议会的审查。

为了对南海公司的董事、主管、下级主管财务的人员、出纳员以及职员进行管制，禁止他们离开大不列颠超过12个月；为了监控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防止他们将其运往国外或是私下转让，委员会提交了另一份议案，并且

得到下议院里所有最具影响力的议员们的支持。希彭先生（Mr. Shippen）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望秘书长克拉格斯先生，他相信那些关于这位大人在南海公司业务上做过手脚的伤人的飞短流长确有其事，因此决定深深刺痛一下克拉格斯先生。他说，他很高兴看到大不列颠的下议院恢复了最初的活力与生机并且为公众的利益而同心协力。“保障南海公司的董事及其高级职员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是必要的，但是，”他一边将他锋利的目光凝聚在克拉格斯先生身上一边补充说，“总有一天，他会毫不畏惧地说出上层机构里一些人的名字，这些人的罪行比起南海公司的董事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克拉格斯先生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如果这番含沙射影的话是冲他而来的话，无论是在下议院，还是在下议院以外，他都准备对任何怀疑他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复。立刻，从四面八方传来了要求肃静和秩序的大声喝令。在一片喧嚣之中，莫尔斯沃斯大人站了起来，表达了他的困惑——克拉格斯先生怎么胆敢向整个下议院提出公然的挑衅？他，莫尔斯沃斯议员，虽然有些老了——已经年过六旬，但是不论克拉格斯先生在下议院里说些什么，他都愿意接受克拉格斯先生的挑战。并且，莫尔斯沃斯相信，有相当多的年轻人站在他这一边，他们不会害怕在下议院以外与克拉格斯先生面对面地对峙。要求肃静和秩序的呼声再次从四面八方响起，议员们也应声站起，似乎每个人都要立刻大叫起来，发言人徒劳地呼喊着重肃与秩序。混乱持续了几分钟，在此期间，莫尔斯沃斯大人和克拉格斯先生几乎是唯一的两位仍然端坐在自己座位上的议员。最后，针对克拉格斯先生的喊声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他认为不能触犯众怒，而应当在下议院的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并且对他违反议会规定的言辞做出解释。他说，自己所说的要让那些在下议院里对他的行为冷嘲热讽，大加责难的人们如愿以偿并不是说他要打架，而是说他将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这件事到此暂告一段落，下议院紧接着为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对南海公司事件展开调查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是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委员会对此进行特殊调查呢，还是在下议院里精心挑选出一个特别

委员会担此重任呢？最后，下议院指定了一个由13个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该委员会有权传讯人员、调用文件和记录。

上议院对这件事情同样热心，像下议院一样迅速进行了处理。罗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说，南海计划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害。沃顿公爵（Duke of Warton）说，议院应当不徇私情，如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参与了南海计划的话，他宁愿把他的朋友交给公众去审判。国家已经被一些人用最无耻、最声名狼藉的方式进行了掠夺与剥削，他愿意与其他人一样积极参与到对罪犯的惩罚之中。斯坦霍普大人说，罪犯们占有的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无论是由董事还是非董事所占有），都应当被没收充公，以弥补公众的损失。

在此期间，公众自始至终激动异常。从考克斯的《沃尔普》传记中，我们可以得悉，南海公司每位董事的名字都被等同于各种欺诈和罪恶的同义词。人民的请愿书从大不列颠王国的每个角落（不论是郡、县城还是享有特权的自治城市）传来，要求为受到伤害的国民讨回公道，要求惩罚那些损公肥私、盗取公共财富的十恶不赦的坏人。那些在惩罚犯罪的问题上不走极端的中庸主义者被指控为罪犯的同谋，不断地受到人们的侮辱与刻毒的抨击。受到伤害的人们用匿名或公开的方式不断对中庸主义者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报复。对税务大臣艾斯拉比先生、克拉格斯先生以及另一位政府官员的指责之声十分响亮，以至于上议院决定马上对他们进行调查。1月21日，上议院发布命令，所有与南海计划有关的经纪人都必须向国会提交一份清单，列出他们自从1719年米迦勒节^①（since Michaelmas）以来为国库或者财政部的官员买入卖出，或是受其委托买入卖出股票或者申购股份的详细情况。当这份账目清单被递交到上院的时候，大家发现该账簿显示：大量南海公司的股票都已经转到艾斯拉比先生的账目上，供其使用。南海公司董事会中有5名董事，

① 米迦勒节在每年的9月29日，纪念大天使圣米迦勒，在绘画中，Michael多为身穿盔甲，手持剑与盾，长着翅膀的青年形象；Michaelmas也是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译者注

包括爱德华·吉本先生——声名显赫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被奉命囚禁在牢狱之中。根据斯坦霍普伯爵的动议，议员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南海公司的议案尚在悬而未决之时，为了政府部门任何成员的利益，或者为了国会上下议院中任何议员的利益，而由南海公司的任何董事或代理人代购股票的；或在接受股票并为股票提供信用时，没有实际支付有价实物或者没有提供充足担保的，均为十分恶劣而危险的贪污腐败行为。几天之后又通过了另一项决定，内容是：南海公司的一些董事和高级职员秘密地将自己持有的股票卖给了公司，构成了一起臭名昭著的欺诈案，破坏了信托关系，并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对公共信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艾斯拉比先生为此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并且自动从国会销声匿迹，直到立法机关正式着手调查其个人犯罪行为为止。

与此同时，南海公司的司库奈特先生（Knight，他知道公司那些不诚实的董事们一切危险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收拾起自己的账簿和文件，从英国逃走了。他乔装打扮一番之后，乘坐一艘小船顺流而下，然后又坐上一艘为逃命而租用的大船，顺利到达法国加莱（Calais，法国北部濒临多佛海峡的港口城市）。秘密委员会向议院通报了有关的情况，议会一致同意将两份报告一并上交给国王。第一份报告请求国王发布一份悬赏捉拿奈特的公告，第二份报告请求国王立刻发出命令，关闭港口，并且严密监视海岸，以防奈特或者任何南海公司的职员逃出大不列颠王国。这两份墨迹未干的报告被议院特意指派的代表梅休因先生（Mr. Methuen）送到了国王的面前。就在同一天晚上，国王颁布了一项公告，悬赏2000英镑捉拿奈特。下院命令将议院大门锁上并将钥匙放在桌上。秘密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罗斯将军（General Ross）告诉他们，他已经发现了一系列意欲毁灭一个国家的前所未有的罪大恶极的欺诈行为。在合适的时候，他会把这些罪行摆到议院面前。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挖掘这些罪行，秘密委员会认为非常有必要逮捕并关押南海公司的一些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员，并且占有他们的文件。于是，根据罗斯将军的提议，

秘密委员会提出一项动议并得到一致通过。既是议院议员又是南海公司董事的罗伯特·查普林爵士（Sir Robert Chaplin）、西奥多·詹森爵士（Sir Theodore Janssen）、索布里齐先生（Mr. Sawbridge）和艾尔斯先生（Mr. F.Eyles）被召来为他们的腐败行径付出代价。西奥多·詹森爵士和索布里齐先生应声而出，千方百计地要为自己洗刷罪名。议院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辩护之词，然后命令他们退堂。接下来，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动议，认为他俩违背信托契约，罪行十分恶劣，使国王陛下的许多臣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且极大地伤害了公共信用。由于他们抵触而且狡辩，议院发布命令，将他们赶出议院，并关进警察把守的监狱。四天以后才应召前来的罗伯特·查普林爵士和艾尔斯先生也被赶出议院。同时，议院还做出决定，请求国王向派驻国外的使节发出通缉奈特的指令，只要奈特向任何一个自治领域请求庇护，都将被移交给英国政府处理。国王立刻批准了这项提议，并且当晚就派信使分赴欧洲大陆的四面八方。

在被监禁的南海公司的董事之中还有被公众指责为南海阴谋的罪魁祸首的约翰·布朗特爵士。关于约翰·布朗特这个人，我们可以从波普写给艾伦·劳德·巴瑟斯特（Allen Lord Bathurst）的信件中略知一二。约翰·布朗特不信奉国教，但行为举止却很虔诚、严谨，还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信徒。

“上帝不会喜欢，”说这话时，布朗特的眼里没有一滴泪水。

“他饿死了，可怜虫，”并且虔诚地否认……

受到巨大伤害的布朗特！英国人民为什么会恨他？

关于他的命运，一个巫师用下面这些话告诉了我们：

“最后，腐败就像洪水猛兽一般，

压倒一切，在清醒的管理者都抵挡不住之际；

而贪婪，不断蔓延，

像从地面升起的雾气一般，

遮天蔽日、四处弥漫。

政客和爱国者一样，卖力地炒股，

贵族和管家们有着相同的困境。

法官们投机，主教们也对城镇下着赌注，

手握大权的伯爵们为了半个克朗而洗牌。

英国拜倒在铜臭的石榴裙下，难以自拔，

法国则对安妮和爱德华的权力进行报复！”

这不是宫廷徽章，伟大的书写者！

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吧，

这也不是贵族式的奢侈，更不是城市的收入。

不，这是正直的结束，

你羞于看到参议员们道德败坏，爱国者们各持己见，

他们高尚地希望平息党派之争，

于是买通了双方，给你的国家以和平与安宁。”

——波普致艾伦·洛德·巴瑟斯特的信

布朗特不停地抨击那个时代的奢侈与腐败、议会的不公、政党灵魂的脆弱无力，尤其，他以雄辩的语言揭露和批判大人物和贵族们的贪婪。他原本只是一个文书，后来不仅成了一名董事，而且成为南海公司最活跃的管理人物。这是否是他在这段能力出众的生涯中第一次向大人物的贪婪宣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亲眼目睹了太多大人物的贪婪嘴脸，才发出了最严厉的谴责与诅咒。但是，如果牧师能够超越他们自己所指责的邪恶的话，那么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他被从监狱带到上院的法庭，经历了一番漫长的审判。他拒绝回答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说自己已经通过了下院一个委员会的审查，不记得当时自己回答了些什么，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他拒绝在另一个法庭上再次回答这些问题。这番似乎雄辩的言论本身间接证实了他的罪行，从而在议院里引起了一阵骚乱。法官又一次以不容置疑

的语气问他是否曾经向政府的任何成员或是上下议院的任何议员出售过任何数量的股票，以使南海公司的议案得以通过，而他也再次拒绝回答。他说，他非常希望以尽可能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议院的提问，但是，他认为要让他做自我批评是十分困难的。在几次试图使他恢复记忆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他被重新带回了监狱。

在约翰·布朗特爵士的朋友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人断言，对于约翰·布朗特爵士这种既方便又省事的沉默寡言，管理者并不陌生。沃顿公爵含沙射影地指责斯坦霍普伯爵，而后者反应激烈，耿耿于怀。斯坦霍普异常激动，以至于热血沸腾直冲头颅，不知不觉头昏眼花起来。他非常难受，不得不离开议院，回到他的府邸休息。医生立刻用吸血杯替他放血，翌日上午又替他放了一次血，可是他的病情只是略见好转，谁都没有料到他会送命。接近傍晚时分，斯坦霍普伯爵昏昏欲睡，他把自己的脸压在枕头上，断送了自己的老命。这位政治家的突然去世引起国人巨大的悲痛，乔治一世更是悲痛欲绝，他将自己在密室里反锁了几个小时，为自己的损失而痛心疾首。

在列日（Liege）附近的特里蒙特（Tirlemont），南海公司的司库奈特先生被住在布鲁塞尔的英国居民利斯先生（Leathes）的一个秘书捉住，关押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城堡里面。英国政府几次三番地请求奥地利法庭将奈特先生遣返回国未果。奈特将自己置身于布拉班特（Brabant）公国的保护之下，要求在布拉班特接受审判。《自由宪章》（*Joyeuse Entree*）中的条约赋予布拉班特公国一项特权，即每个在布拉班特被逮住的罪犯都应当在该国接受审判。布拉班特公国坚持自己的特权，拒绝将奈特交还英国当局，英国政府也没有停止努力。但是，这时，奈特却从监狱里逃之夭夭了。

2月16日，秘密委员会向议院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声称他们的调查遇到了许多的困难和麻烦，他们审查的每个犯人都乐此不疲地对加在自己头上的罪行进行积极的抗辩，妄想左右审判的结果。在提交的账册之中，他们造了

许多的假账；在其他的账册里“钱”这一栏的下面对应的股东名字是一片空白；账册里经过涂改的地方随处可见，有几页甚至还被撕掉了。有些极其重要的账簿要么被销毁，要么被带走，要么被藏匿。刚开始调查的时候，秘密委员会就已经知道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范围极广，极富变化。许多人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被委派以各种各样的角色。因此他们宣称，自己经手的人数成千上万，处置的财产总额也上千万，因此，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毫无纰漏。他们发现，在《南海法案》通过之前，公司账簿里有一笔总额高达1 259 325英镑的账目，对应的股票账本上注明已经按照574 500英镑的价格售出。实际上，这批股票完全是伪造的，其用意是为了促进《南海法案》的通过。账簿上标明这批股票在不同的日期售出，价格各不相同，150%~325%不等。看到南海公司在尚未得到增资扩股许可的情况下已经处理了如此巨额的账目，秘密委员会大吃一惊，决定更加认真细致地调查整个交易过程。他们传讯了南海公司的主管、次级主管和几位董事，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秘密委员会发现，在制作这些账目的时候，南海公司并没有如此巨额数量的股票，他们有权处置的只是很少的部分，最多也不过3万英镑。沿着已经调查出来的线索深入挖掘下去，调查人员发现，这笔巨额股票是公司为某位子虚乌有的买家的利益而购入持有的，而双方并没有制定双边协议以确定双方何时交付与受让。没人为这笔巨额股票支付过任何金钱，公司从这位杜撰出来的股东那儿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的存款或是有价证券之类的担保品。因此，如果股票价格下跌的话，可以预期《南海法案》是没法通过的，而那些臆想中的股东也不会遭受任何损失。反之，如果股票价格上升（事实上，由于南海公司董事会的阴谋策划，股票价格也的确涨了上去），股价上涨所带来的利差就将落入假想的买方的荷包中。相应地，在《南海法案》得以正式通过之后，股票账户由奈特先生建立并加以修正与调整，而假想的买家则从南海公司的现金里得到差价。这种虚构的股票主要由约翰·布朗特先生、吉本先生和奈特先生处置，在几位政府成员和其他关系户之间进行分配。通过这种贿

赂，促进《南海法案》的通过。桑德兰德伯爵分得5万英镑的股票，肯德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Kendal）得到1万英镑的股票。普雷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Platen）分得1万英镑的股票，普雷顿夫人的两个侄女也分到了1万英镑的股票，秘书长克拉格斯先生分到了3万英镑的股票。财政部的一位秘书，查尔斯·斯坦霍普先生分得1万英镑的股票，剑刃公司分到5万英镑的股票。账目显示，斯坦霍普先生通过特纳·卡斯沃尔公司（Turner, Caswall and Co.）之手得到总额高达25万英镑的巨额股票差价收益，但是斯坦霍普的名字的一部分被人从账簿上擦去，改成了斯坦盖普（Stangape）。税务大臣艾斯拉比从这些记账股票中获取的利润更加令人憎恶。他在同一家公司开了一个账户，公司的特纳和卡斯沃尔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于是他拥有了总值高达794 451英镑的股票。此外，他还建议南海公司第二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应当是150万股，而不是100万股，他们自己授权，也不用任何担保，就增发了50万新股。第三次也是以同样非法的手段进行的。艾斯拉比的名下有7万英镑的股票，高管克拉格斯先生的名下有659 000英镑，桑德兰德伯爵的名下有16万英镑，而斯坦霍普先生名下有4.7万英镑。这份报告后面还跟着另外6份不太重要的报告，在最后一份报告的末尾，秘密委员会声称：掌握了主要情况，受托办理重要事宜的奈特先生的缺席使他们的调查工作难以进行。

议院要求委员会将第一份报告打印出来供第二天讨论。经过一番愤怒而激烈的争论，议员们通过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对南海公司的董事、与之有牵连的议会成员以及政府官员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且宣布：他们每个人都应当从他们自己的财产当中拿出相应的部分为他们给公众所造成的伤害进行补偿。他们的行为被定性为贪污腐败，性质恶劣，极其危险。为解救不幸的受害者，减轻他们的痛苦，议院命令委员会再提交一份议案。

查尔斯·斯坦霍普先生是第一个为参加这些肮脏的交易而付出代价的人。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强调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将自己拥有的

全部金钱存放在奈特先生的手里，不论奈特先生为他买了些什么，他都为之支付了相当多的报酬。至于特纳·卡斯沃尔公司为他购买的南海公司股票，他压根儿就一无所知。无论他们在这个事情上为他做过什么，都没有经过他的授权，他也不能对此负责，特纳和他的公司应承担起后一项的罪名。但是，恐怕任何一位没有偏见、公正无私的人都会认为斯坦霍普先生从那家公司手里以其信用为名所持的南海公司股票中获取了25万英镑收益的行为是十分恶劣的。不过，他还是以区区3票的多数被判无罪释放——他的朋友们极尽所能地包庇他。切斯特菲尔德王子和斯坦霍普大人运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演讲天赋，四处游说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诱使他们要么投票赞同释放查尔斯·斯坦霍普先生，要么自己不参加议会的投票表决。许多立场不够坚定，意志比较薄弱的乡村绅士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迷失了方向，因此，就有了这样的表决结果。斯坦霍普先生被判无罪释放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在举国引起极大的不满——义愤填膺的民众在伦敦的各个地区召开群众集会威胁政府，呼吁政府收回成命。议员们普遍担心发生暴乱，尤其是许多人预测，一个更加罪大恶极的贪污犯将有可能得到同样的审判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激起更大的民愤。艾斯拉比先生身处高位，身负重任，本应保持正直与忠诚，虽然国内的规定不够充分细致，但他还是被公正地判定为南海阴谋罪大恶极的首犯。他的案子是在斯坦霍普先生被判无罪释放的翌日审理的。人们的兴奋难以抑制，空前高涨，无论是议院的走廊还是马路全都挤满了急不可耐赶来探听审理结果的群众。对艾斯拉比罪行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天，几乎没人站在他一边：他的罪行实在太赤裸裸也太恶劣了，以至于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替他说话掩饰。最后，议会成员一致同意，认定艾斯拉比先生为了谋取个人的暴利，鼓动和促进了破坏性的南海阴谋的执行，参与了南海公司董事会的卑鄙勾当，与其一起进行恶性操作，破坏了大不列颠王国的公共贸易和公共信用。艾斯拉比罪行累累，应当被赶出下院，关押在伦敦塔里。并且，他要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在一整年里不许离开大不列颠王国，这种限制可能

延长到本届议会任期结束之时。他还必须为他的所有财产列出一个准确的账目，用来弥补那些由于他的恶意操纵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人们，减轻他们的伤痛。

对于艾斯拉比的判决真是大快人心，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夜里12：30判决的消息一经传出，立时传遍整座城市。有的人将房屋点得灯火通明，以此表达他们的兴奋与快乐。第二天，当艾斯拉比被送往伦敦塔的时候，愤怒的民众围聚在塔山（Tower-hill）上，对他起哄，扔掷石块与垃圾。他们的目的未能实现，便燃起一团熊熊烈火，围着火堆载歌载舞，表达自己的欢快之情。别的地方也燃起了庆祝胜利的篝火，伦敦城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人们互相庆贺，就好像刚从某种巨大的灾难中劫后余生一样。对于斯坦霍普的无罪释放，人们怒火冲天，没人知道这种怒火将会止于何处。如果艾斯拉比先生也被无罪释放的话，无疑也会引起同样的怒火。

为使公众更加满意，第二天，特纳·卡斯沃尔公司的乔治·卡斯沃尔先生也被赶出了议院，并被押送到伦敦塔。议院还命令他交还非法所得的25万英镑。

接下来审理的是秘密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桑德兰德伯爵的部分。桑德兰德伯爵和他的朋友们费尽心机地想要洗刷他的罪名。由于对他的指控主要来自对约翰·布朗特爵士强行逼供所取得的证据，所以，他们煞费苦心地使约翰·布朗特爵士的供词看起来不那么真实可信，尤其是一桩关系到一位枢密院议员的贵族名誉的事件。这位大臣在内阁的所有朋友都围聚在伯爵身边，全都报告说对桑德兰德伯爵判罪会使保守党内阁上台执政。最后，桑德兰德伯爵在议院以233票对172票的多数被判无罪释放。但是，全国人民都相信他有罪。于是，各地的民众都表达出极度的愤慨，示威的群众也再次聚集到伦敦。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与动乱。

就在这一天，老克拉格斯咽下了他的最后一口气，去见上帝了，而第二天本来是要审理他的案子的。人们都相信克拉格斯用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看起来，老克拉格斯更有可能是伤心过度而亡——他的儿子，财政部的一位秘书，在五周前因出水痘而英年早逝。白发送黑发，这对老克拉格斯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他非常疼爱这个儿子，为了这个儿子，老克拉格斯一直都在使用不正当和不诚实的手段聚敛财富；为了这个儿子，他出卖了自己的荣誉，玷污了自己的名声。然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个儿子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意外的变故犹如雪上加霜，使老克拉格斯不堪重负。最终，心力交瘁的老克拉格斯突发中风，撒手西去。他留下一笔总额高达150万英镑的巨额财产，这笔财产后来被没收充公，用来补偿那些在他一手策划与导演的不幸的迷幻骗局中遭受损失与伤害的人们。

南海公司的每位董事都一一接受了审讯，一共没收了这些董事高达201.4万英镑的财产，用以弥补他们带来的不幸。根据各人的表现和情况，每位董事都获得了一定的剩余财产，以便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约翰·布朗特爵士高达18.3万英镑的财产被没收后，只留给他5 000英镑；约翰·费洛斯爵士24.3万英镑的财产也只剩1万英镑；西奥多·詹森爵士24.3万英镑的财产仅剩5万英镑；爱德华·吉本先生10.6万英镑的财产充公后只剩下1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7.2万英镑的财产，也只剩下5 000英镑。对那些牵涉不深的人的处理要宽大得多。历史学家吉本的祖父爱德华·吉本先生被处以大量的罚金。小吉本在其《关于他的生活和作品》一书中对这一时期议会发生的事件做了生动有趣的刻画。他承认自己并非公正无私的证人；但是，因为任何作者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从各自的角度来看问题，来从那灾难沉重的年代所发生的事件中揭示一些警示意义的，因此，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描述具有额外的价值。如果基于“听取双方意见”（audi alteram partem）的原则，那么，他的观点就很值得考虑。“1716年”小吉本说，“我的祖父当选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之一，他的账本可以证明，在他担任那个致命的职务以前，已经独立拥有60万英镑的个人财产。但是，在1720年的海难中，他的财产转眼间烟消云散，30年辛辛苦苦挣到的财富在一天之中化为灰烬。关

于南海计划的使用或是滥用，关于我的祖父及其董事兄弟们的罪行或者说愚昧无知，我既非称职的法官，亦非没有利害关系。但是，现代的平衡法却必然会指责当时法庭对他们所进行的粗暴而专横的处理。这种处理使原本正当的动机也蒙上了耻辱，而本来就不怎么正当的理由就更加卑鄙恶劣。这个民族刚从自己的黄金美梦里苏醒过来，民众乃至议会就对它的殉难者叫嚣责骂。但是，所有各方都不否认，尽管这些董事有罪，这个国家却没有成文的法律可以制裁他们。议会并没有将莫尔斯沃斯先生提出的严酷的主张付诸实施，但是，他们却引入了一个既让人痛苦又具惩罚性的议案——一条具有追溯力的法律，用以惩罚那些在它生效之前就已经发生的罪行。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被立法机关监禁起来，不仅他们的人格已被打上耻辱的标记，而且他们将自己财产中的任何部分转移到国外的权利也被剥夺。他们要想重见天日，必须缴纳一笔巨额担保，而且他们不得不发誓将自己的一切财产统统交出。他们站起来反对这项惩罚性的议案。每个臣民都有权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们也请求为自己辩护，让人们倾听他们的诉说。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的压迫者不需要任何证据，也不要听任何辩词。最初，他们打算将南海公司董事们的财产留下1/8，以供董事们今后的生活与发展之用。但是，有人强烈地反对，认为他们的财富数量各异，犯罪程度各不相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惩罚的比例太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又太重了。于是，他们将各个董事的人品和行为拿出来分别加以掂量。可是，这一有失冷静与公允的法律调查使得33位英国人的财产和名誉问题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也使这项程序本身成了没有法律约束的一项大多数人的运动。而秘密委员会里最卑鄙、最自私的成员得以通过恶毒的语言或者无声的投票尽情发泄他们的坏脾气或私愤。人身侮辱加剧了董事们的伤痛，对他们大加侮辱之人开怀大笑的嘴脸令他们更加痛苦不堪，议院也轻率地将留给他们的剩余财产的数量变来变去。有一份含糊其辞的报告，说一位董事以前曾经参与过另外一项计划，而这项计划使一些不知名的人士损失了金钱。这样一份报告竟被拿来当做他

有罪的证据。一个人被毁掉，仅仅因为他发表了一通愚蠢的讲话，说应当用黄金来喂养他的马。而另一个人之所以被整得人人不鬼不鬼的，是因为他太骄傲了，以至于有一天在财政部里竟然拒绝对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做出有礼而有益的回答。所有这些人都是在自己没有出席，也不能为自己辩解的情况下被武断地处以罚款和充公的刑罚。仅这一项就将他们毕生积攒的家业的绝大部分席卷一空，只留下一点点可怜的零头。这些既大胆又无耻的压迫是不可能逃过全能的议会的眼睛的。我的祖父不能指望自己得到比同伴更加宽大仁慈的处置，他那保守党派的保守原则以及与保守党的瓜葛使他很容易受到掌权派的伤害——他的名字被可疑之人秘密上报给委员会，他众所周知的才干，也不能为他的无知或者失误辩护。吉本先生在对南海公司董事的第一次处置中第一批被投入监狱，最后的判决对他的罚款程度更是宣告了他的罪大恶极。他宣誓上交给下院的财产总额高达106 543英镑5先令6便士，祖先留下的财产除外。议院对吉本做出两种不同金额的折扣，一种是1.5万英镑，一种是1万英镑。但当问题真的被提出来讨论时，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全都赞成更小的那种折扣。在经历了这些摧残之后，我的祖父以他那议会无法毁灭的才能和信用东山再起，在成熟的年龄再次建起一座新的财富大厦。16年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我有理由相信，第二次的创业不会比最初的事业差很多。”

在对董事们进行了惩罚之后，立法者接下来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恢复公众信用。他们发现沃尔普先生的计划不够详细充分，而且已经声名扫地。1720年年底，人们对南海公司的全部股票进行了核算，发现总额高达3 780万英镑，而分派给全部股东的股份总额却只有2 450万英镑，剩下的1 330万英镑都是南海公司凭借公司的手段获得的，是他们从国民的淘金幻梦中得到的好处。这些利润中有800多万英镑被议会从公司手中夺来，分配给广大的所有人和认购者，每100股配送的股息和红利大约是33英镑6先令8便士。议会又做出进一步的决定——那些从南海公司手中借过资金，并在借钱时实际

转移了股票或是缴纳了担保品，或者因为公司要利用这些股票而将其出借给南海公司的，可以免去一切追索，只要支付借款总额的10%即可。南海公司以这种方式借出的款项多达1 100万英镑，而现在，他们所能收回的只有110万英镑了，南海公司此时的股价已经跌回到正常水平了。

但是，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公共信用都未得到彻底的恢复。像伊卡洛斯^①一样，企业被炒得过头，跌进了无垠的大海，当在海水的波动起伏中苦苦挣扎之际，才明白自己的存在有赖于坚实的土地。于是，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想再在天空翱翔了。

从那以后，在商业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曾数次出现过过度投机的倾向，一个成功的计划往往引发众多追随效仿之人。在一个贸易大国，从众心理总是抓住这样的成功典范，将其视为楷模，并将那些财迷心窍的人们引入难以摆脱的万丈深渊。在举世闻名的恐慌之年——1825年，也曾出现过像南海公司之类的泡沫公司，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那次事件就像1720年一样，骗子从贪财者手中攫取大把的钱财，但到算总账的那天，双方都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836年的计划也一度显得前景可悲，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谢天谢地，在情况变得更糟以前，人们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②

① Icarus，逃亡的伊卡洛斯接近太阳的时候，身上的蜡做的翅膀被太阳烤化，坠海而死。
——译者注

② 直到1845年，南海计划仍是英国有史以来大众疯狂进行商业投机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这部作品的第一版问世于1845~1846年暴发的铁路狂潮（Great Railway Mania）之前。

郁金香狂潮



如此疯狂的香葱。

——卢肯（Lucan）

据说，郁金香这个单词源自土耳其语，是指一种头巾，大约在16世纪中叶被引入西欧。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声称，是他使这种花在西欧大地上声名鹊起的，当然，他当时并没有预见到不久以后郁金香在世界上引起的骚乱。康拉德说，他第一次看到郁金香是在1559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一位声名显赫的赫瓦特参赞（Counsellor Herwart）的花园里。赫瓦特参赞在当时因为收集稀有的舶来品而闻名遐迩。这棵郁金香球茎是他的一位君士坦丁堡的朋友送的，郁金香在那儿早已是人见人爱的名花了。此后10~11年的时间里，郁金香一直是名流显贵竞相追逐的目标，尤其是在荷兰和德国，郁金香更是富人梦寐以求的东西。阿姆斯特丹的富人不惜一掷千金，派人直接前往君士坦丁堡抢购这些球茎，其出手之阔绰实属罕见。1600年，有人从维也纳带回并种植了英格兰的第一棵郁金香，从那时直到1634年，郁金香的声望逐年提高。那时，人们都已形成一种成见，如果哪

个有钱人家没有收藏这种奇花异草的话，那就说明这户人家的品位不高。许多名人雅士都对郁金香情有独钟，视同珍宝，其中包括彭贝叶斯·德·安吉利斯（Pompeius de Angelis）以及论文《德·康斯坦蒂亚》（*De Constantia*）的作者，雷登著名的利普修斯（Lipsius of Leyden）。很快，中产阶级也开始如痴如醉地渴望拥有这种神奇的植物。商人、店主，甚至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家，也都开始互相攀比，看谁家的郁金香品种更加珍贵，谁为它们支付的价格更贵。哈利姆（Harlaem）的一位商人之所以名噪一时，就是因为他为得到一块小小的郁金香球茎花掉了自己一半的家产，却并不打算转手获利，而是将它收藏在自己的花房里，以能拥有为荣。

人们很可能会猜想，一向以谨小慎微著称的荷兰人之所以将郁金香看得那么珍贵，必定是由于这种花本身具有某种神奇的特性。可是，它既没有玫瑰的美丽外表，也没有玫瑰那种沁人心脾的芳香，它的外表甚至还比不上“甜甜的豌豆”。除此之外，它的生命力也比不上玫瑰或是豌豆。考利（Cowley）却对郁金香大加称颂，他说：

紧接着，郁金香出现了，它浑身上下活力四射、色彩艳丽，
但是，它又过于繁茂，傲气十足，玩劲十足。
除了这里，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到这种染料般的花卉了，
不仅如此，通过新的组合，她甚至可以改头换面，紫色和黄色是她钟爱的颜色，
她喜欢穿针线最精美华丽的服饰，
她只潜心钻研如何取悦人们的眼球，
并且凭借自己的精致华美艳压群芳、独占花魁。

尽管不怎么押韵，也不太有诗意，这却是一位诗人对郁金香的描绘。而贝克曼（Beckmann）在其《发明的历史》一书中用更加写实的手法逼真地再现了郁金香的风采，并且他的散文读起来也比考利的诗更为悦耳动听。他

写道，“很少有什么植物像郁金香那样，通过偶然的事件、弱化或者疾病的发生而获得如此多的变种，如此丰富的色彩。在它尚处自然状态，未经人工培植之时，几乎只有一种颜色，长着大大的叶片以及长长的茎杆。当它经过人工栽培，失去稳定性之后，它在种花人的眼里变得更加可爱。后来，花瓣儿的颜色越来越淡，花瓣越来越小，色泽却越来越丰富多彩；而叶子的绿色则变得更加柔和。于是，它就成了人工栽培的杰出作品。它越是变得美丽，生存能力就越是脆弱，即使是用最高明的技巧，在最精心的照料之下，它仍然几乎不能移植，甚至使它存活都很困难。”

许多人鬼迷心窍，竟然会爱上这种给他们带来无穷麻烦的植物，就像母亲对久病缠身、痛楚而又疼人的孩子的疼爱总是要远远超过对那些健康后代的疼爱一样。我们必须在同一个原则的基础上来解释为何人们会对这种娇柔脆弱的花朵毫不吝惜笔墨地大加赞赏。1634年，拥有郁金香的狂潮席卷了荷兰，这股风潮是如此之强劲，以至于荷兰普通的产业都被人们抛到了脑后。黎民百姓，乃至社会最底层的渣滓，都兴致勃勃地从事着郁金香的交易。随着郁金香狂潮的不断升温，这些小球茎的身价也迅速攀升，直到1635年，据说，许多人拿10万弗罗林^①购买40块郁金香球茎。这时，在出售郁金香球茎时，人们必须使用一种比“格令或是哩^②”更小的重量单位佩里特^③，来精确计算郁金香的重量与价值。有一种被称为“可爱的里夫肯”（Admiral Liefken）的郁金香品种，400佩里特重的一块球茎就可以卖到4 400弗罗林；而一颗446佩里特重的“海军上将范德·爱克”（Admiral Vander Eyck）的价值是1 260弗罗林；一颗106佩里特重的“恰尔德”（Childer）价值1 615弗罗林；一颗400佩里特的“总督”（Viceroy）价值3 000弗罗林。而郁金香家族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品种要数“永远的奥古斯塔斯”（Semper Augustus），一颗200佩里特的“永远的奥古斯塔斯”如果售价为5 500弗罗林的话，买家

① florin是价值两个先令的硬币。——译者注

② 一个grain相当于0.065克。——译者注

③ 是比grain更小的重量单位。——译者注

一定会觉得自己拣了一个大便宜，就连一棵品质一般的“永远的奥古斯塔斯”球茎都可以卖到2 000弗罗林。为了得到一棵“永远的奥古斯塔斯”，人们神魂颠倒。根据记载，1636年年初的时候，整个荷兰境内只有两块“永远的奥古斯塔斯”球茎，而且都算不上质量上好。一颗被阿姆斯特丹的一位交易商占有，另一颗则在哈利姆手里。投机分子是如此心急如焚地想要得到“永远的奥古斯塔斯”，以至于有一个人提出用12英亩^①的建筑用地（任何身份的继承人都可以继承）来交换哈利姆的那颗郁金香球茎。阿姆斯特丹的那块“永远的奥古斯塔斯”也是身价不菲，为了得到它，买家出了4 600弗罗林，外加一辆崭新马车，两匹灰色的骏马和一整套马具。当时一位勤于笔耕的作家芒丁（Munting）就郁金香狂潮写下一卷长达1 000页的作品，其中保存着下面的这份清单，上面用各种商品的价值总和来表示郁金香的价值。以下所有物品都是拿来与一颗罕见的珍稀品种“总督”进行交换的：

2拉斯特 ^② （last）小麦	448弗罗林
4拉斯特黑麦	558弗罗林
4头肥壮的家牛	480弗罗林
8头肥猪	240弗罗林
12只肥羊	120弗罗林
2大桶（hogsheads） ^③ 葡萄酒	70弗罗林
4大桶啤酒	32弗罗林
2大桶黄油	192弗罗林
1 000磅奶酪	120弗罗林
1整套床具	100弗罗林
1整套衣服	80弗罗林

① 1英亩 = 4 046.856平方米。

② last (e) 在法语里是“北欧船载重量的单位”，约合两吨；在英语里是“谷物的容量单位”，约为80蒲式耳。——译者注

③ hogsheads是一种大的啤酒桶，相当于52.5加仑。——译者注

1只银质酒杯

60弗罗林

总计

2 500弗罗林

当那些当时不在荷兰的人回到荷兰时，很有可能正好赶上郁金香炒作的鼎盛时期，他们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

在布兰维勒（Blainville）的《旅游》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实例：一个富有的商人，为他自己所拥有的珍贵的郁金香而深感自豪。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来自莱文特^①的代销商品的机会。货到的消息是由一位水手捎来的。为了把好消息告诉给商人，水手来到账房，那里到处是大捆大捆各种各样的货物。商人为了奖赏和报答水手，慷慨解囊，准备了一道精美的红鲱鱼作为他的早餐。看来，水手对洋葱有着特别的偏爱——他看到这位大方的商人的柜台上搁着一个很像洋葱头的郁金香球茎，觉得把“洋葱头”与丝绸和天鹅绒放在一起很不协调，便毫不犹豫地认为一定是有人将“洋葱头”放错了地方。于是，他偷偷摸摸抓住一个机会，将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准备把它当成那顿红鲱鱼的配餐佐料。他带上商人作为奖赏给他的红鲱鱼直奔码头，准备享用他的早餐。商人一转身，发现自己那颗价值3 000弗罗林，约合280英镑的“永远的奥古斯塔斯”不见了。立刻，商人的整个府邸乱做一团。为了找到这块珍贵的球茎，他们搜遍屋子的每个角落，却连郁金香的影子都没看到。商人的沮丧心情可想而知。他们再次搜索，仍然一无所获。最后，有人想起来，还有一个人没被搜查过，那就是水手。

一听到这个假设，伤心欲绝的商人箭一般地飞奔出门，直奔大街。得到警报的商人家人也紧跟在他的身后跑了出来。头脑简单的水手压根儿就没打算躲藏起来，商人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安详平静地坐在一卷绳索上面，嘴里嚼着最后一瓣“洋葱头”。水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这顿早餐价值连城，

^① Levant是地中海东部以及爱琴海沿岸国家及岛屿。——译者注

足以让整条船上的水手过上12个月舒舒服服的日子。或者，用这个痛失瑰宝的商人自己的话来说，“足以为奥林奇王子（the Prince of Orange）和荷兰省长（the Stadtholder）的整个官邸举办一场豪华的盛宴”。安东尼将珍珠溶化在酒里，为克里奥帕特拉的健康干杯；理查德·惠灵顿爵士（Sir Richard Whittington）愚蠢地效仿亨利五世的奢华享受；当伊丽莎白女王开办皇家交易所的时候，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将钻石溶解在酒中，为女王的健康干杯。这位流浪汉一样的水手所享用的这顿早餐，比起上述名人大亨的奢侈浮华，毫不逊色。而且，比起那些极尽奢华的先人，水手甚至还有他自己独到的优越之处。王族贵人的珍宝并没有为他们的酒增添任何的味道或者营养，而水手的郁金香配上他的红鲱鱼，却平添不少美味。对水手来说，这笔交易中最不幸的地方是，由于商人指控他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在监狱里一口气呆了好几个月，这对习惯了自由的水手来说，实在是痛苦难耐。

另一个故事涉及一位英国旅行家，这则逸事比起刚才的故事毫不逊色，同样滑稽可笑，令人捧腹。这位绅士，一位业余植物学家，在一位富裕的荷兰人家的花房里偶然看到一颗郁金香球茎。根本不晓得球茎身价的这位仁兄掏出随身携带的铅笔刀，将这颗郁金香球茎的外衣削掉——他还打算拿球茎做实验呢。当他用这种方法将这块不知名的球茎削去一半外衣之后，又把它从中间一分两半，等分成两块，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对这颗无名球茎的奇特外表进行了细致的记录。球茎的主人突然猛扑过来抓住他，两眼燃烧着熊熊怒火，喝问他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位哲学家回答说：“剥一只非常特别的洋葱呀。”“Hundert tausend duyvel!”荷兰人说，“这是一块可爱的范·德·爱克！”旅行家一边说，“谢谢你不吝赐教，”一边掏出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这颗非常奇特的洋葱的芳名。旅行家接着又问：“这些可爱的东西在你们国家很常见吗？”“见你的鬼！去死吧，你！”荷兰人怒不可遏，抓住这位惊恐万状的科学家的衣领，“走，我们找市政官去，他会告诉

你是怎么回事！”尽管旅行家一再抗议，怒火中烧的荷兰主人还是把他强行拽到街上，一群看热闹的民众愤愤然紧跟在后面。直到旅行家被带到市政官的面前，他才惊悉，他用来做实验的那块球茎居然价值4000弗罗林！这下他惊恐万分，浑身直冒冷汗。虽然他绞尽脑汁为自己开脱，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行，他还是被扔进了监狱，直到他的家人筹措到足够多的担保来补偿对方的损失为止。

1636年，对珍稀的郁金香品种的需求变得如此旺盛，以至于在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鹿特丹、哈利姆、莱登（leyden）、奥尔科马（Alkmar）、霍恩（Hoorn）以及其他的城市都建起了专门从事郁金香交易的正规市场。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投机的症状。股票投机商一直对新的投机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他们大量交易郁金香，充分利用他们在股票市场驾轻就熟的各种手段操纵着郁金香市场，使郁金香的价格起伏不定、变幻莫测。起初，就像所有的赌博热潮一样，人们全都信心十足。每个人都从郁金香的交易中尝到了甜头，一个个的腰包都变得鼓鼓囊囊的；投机者对郁金香“股票”价格的涨跌进行投机，并且通过在价格上涨时卖出和在价格下跌时买进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许多人在一夜之间成了富翁富婆。金灿灿的诱饵呈现在人们眼前，以不可抗拒的魅力诱惑着芸芸众生。人们前赴后继，一个跟一个地冲进郁金香交易中心，就像一群群的苍蝇围绕着蜜糖罐子一样团团转。每个人都以为对郁金香的热情会永远持续下去，而财富也会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入荷兰，无论对郁金香开出多高的天价，人们都会毫不迟疑地掏出钱包照单全付。欧洲的富人都将云集在须德·兹海滩Shores of the Zuyder Zee^①，而贫困现象将从荷兰的国土上彻底消失。贵族、市民、农场主、技工、海员、脚夫、女佣甚至烟囱清扫工和年迈的洗衣妇全都下海来“赏玩”郁金香。各种各样的人们，不论高低贵贱，都将自己的财产变卖换取现金，然后进行郁金香交易。由于人们竞相出售房屋和土地，导致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有的时候，有人

^① Zuyder Zee是荷兰北部的湖泊，与北海仅有一堤之隔。——译者注

直接在郁金香交易市场上与人达成交易，将房屋与土地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换取别人手里的郁金香。外国人也被郁金香热浪烤得晕头转向，金钱的滚滚洪流从世界各地涌向荷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再次上涨，而且升幅可观。房屋和土地、马匹和马车，还有五花八门的奢侈品的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一连几个月，荷兰都好像是财神爷家的接待室——每个人都可以从这儿登堂入室，跻身富翁富婆之列。郁金香交易的范围如此广泛，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人们发现很有必要制定一条法律用以指导和规范交易行为。同时，还要指定公证人和办事人员，他们应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交易谋利中去。

公共公证员的称号在一些城镇鲜为人知，因为郁金香公证员的称号正在取代它的位置。一些小的城镇没有交易所，人们便选择当地主要的大酒店和大旅馆作为“展示的场所”，各色人等都在那里从事着郁金香的交易，并且是在奢侈豪华的娱乐享受之中确认交易的。有时会有两三百人同时参加这样的宴会，在进餐的时候，间隔一定距离摆放在餐桌和餐具柜上的一大瓶一大瓶盛开着的郁金香使用餐的人们心旷神怡。

可是，到了后来，行事比较谨慎的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了，他们认为这种风潮只是三分钟热度，不会持久。富裕的家庭不再将买来的郁金香种在自家花园里，而是转手以高价将之卖出，赚取差价。看来，注定有人是要接最后一根接力棒，并且要为此承担巨大的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判断，认为有道理并据此抛售手中的郁金香，郁金香的价格应时下跌，并且一跌不可收拾，永远也没有再涨起来。巨大的恐慌摧毁了人们的信心，使得每个交易者心乱如麻。A与B早已达成协议，同意购买10块“永远的奥古斯塔斯”，每块价格为4 000弗罗林，合同约定在6周之后进行交割。B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了要交割的货物，而此时“永远的奥古斯塔斯”的价格已经跌到每块300或者400弗罗林了。但是，A既不同意补足差价，将原定的价格与现价之间的差额支付给卖主，又不愿意接受这些郁金香球茎。在荷兰所有的城镇里，每天都被宣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违约事件。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有成百上千

的人开始怀疑了，他们发现自己太穷了，于是拿出郁金香球茎想要卖钱，可是没有人愿意买他们的郁金香球茎，即使他们的出价只有原来买价的1/4，仍然无人问津。这些现象引起那些未卜先知者的警觉，四面八方传来悲痛与绝望的呼声，每个人都在指责自己的邻居。少数已经设法发财致富了的人悄悄地将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英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基金中去，不让周围的人们发觉。很多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通过郁金香投机得以发财致富，摆脱了以往苦难的生活，过上小康的日子，可是郁金香泡沫的破灭又迅速将他们送回到以往的生活轨道中去，恢复了昔日阴暗与愁苦的日子。相当多的富家子弟都为郁金香泡沫的破灭所累，几乎沦落为乞丐。许多贵族家庭眼睁睁看着自己家族的财产毁于一旦而无计可施。

当第一声警报过去之后，一些城镇里的郁金香持有人召开了公众大会，讨论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最好地恢复公共信用。大家普遍认为，应当由各地选派代表前往阿姆斯特丹，与政府进行协商，以便找出治疗这场疾病的灵丹妙药。一开始，政府拒绝干预此事，不过，政府建议郁金香持有人在彼此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做出某种安排。为此，郁金香持有人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但是，看来大伙儿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满足被愚弄了的人们的要求与愿望，甚至不能对他们所遭受的不幸做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补偿。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抱怨、谴责、怨天尤人、痛恨一切。而这些集会全都成了人们暴风骤雨般发泄不满的最佳时机。不过，在几年的争执与恶意相向之后，郁金香持有人的代表大会终于在阿姆斯特丹达成协议——在郁金香热潮的巅峰时刻达成的所有合同，或是在1636年11月以前签订的所有郁金香交易合同都被宣布为无效，而在此之后签订的契约，买方也应当在支付给卖方10%的合同金额以后，解除购买郁金香的义务。这个决定并不令人满意——那些没能卖掉郁金香的卖主们当然不会满意，而那些原来已经承诺购买现在却避之唯恐不及的买主们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过去曾经卖到6 000弗罗林的一颗郁金香，现在却只能勉强卖到500弗罗林。这样，原价的10%（也就是600弗

罗林)已经比现在的实际价值(500弗罗林)还要高出100弗罗林。在荷兰所有的法庭里都上演着破坏合同、不守契约的闹剧,《合同法》的法律效力一再受到威胁。但是,法庭仍然拒绝审理赌博性质的交易。

最后,这件事情被指派给位于海牙的省议会处理,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个组织凭借自己的智慧找到可以恢复公共信用的良方。人们眼巴巴地盼着省议会尽快拿出办法,做出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却一直没有出现。省议会的议员们一周又一周地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最后,经过长达三个月的深思熟虑,省议会宣布:除非他们掌握到更多的资料,否则不可能拿出任何最终的决定。不过,他们在宣布此事的同时又建议说: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卖方原则上可以按照原来约定的价格卖给买方普通的郁金香,并且收取原定的金额。如果买方拒绝接受这些郁金香的话,可以公开拍卖,但是,原来的契约方有责任支付实际价格与契约标定价格之间的差额。实际上,这就是代表们曾经提出的办法,实践早已证明这种办法无效。在荷兰,没有任何法庭会强制支付。于是,这个问题在阿姆斯特丹又被提出来讨论。但是,法官们异口同声地拒绝干预此类事情,他们的根据是:在赌博中签订的债务契约不是合法的债务契约。

于是,这件事情又被搁置起来,找到恢复公共信用的良方已经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那些在郁金香价格骤然暴跌时未能及时出手,仍然持有郁金香球茎的人真是倒了大霉,他们只能尽量乐观地承担这一巨大的损失。而那些眼明手快、动作麻利的也获准保有自己的盈利。但是这个国家的商业却遭受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乃至多年以后,才从这场灾难中缓过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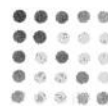
在一定程度上,荷兰人效仿的榜样是英国人。1636年,郁金香在伦敦交易所公开出售,英国的投机商也不择手段地将郁金香的价格炒到一个人为的高度,相当于在阿姆斯特丹时被炒到的价格。在巴黎,投机的股票经纪人也努力掀起一阵郁金香狂潮。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巴黎,投机的股票经纪人都只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榜样的力量仍使这些花儿大行其道。在特定阶层

人们的心中，郁金香从此拥有了比土地上生长的其他任何一种花朵更高的地位，更加为人所重视和珍爱。时至今日，由于他们对郁金香的偏爱，荷兰人仍然举世闻名，并且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为郁金香支付着更高的价格。就像富有的英国人总爱吹嘘自己的良种骏马或是收藏的名家名画一样，有钱的荷兰人也总是以自己的郁金香为荣，对它们倍加珍惜，引以为豪。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英格兰看来，这不免有点儿奇怪——一棵郁金香带来的金钱竟然会超过一棵橡树！如果有人能够找到一颗“举世罕见”（*rara in terris*）^①的话，它的价格将会相当于12公顷尚未收割的玉米。按照一位编辑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版的补编中的说法，在17世纪末的苏格兰，郁金香的最高价格为10个几尼。从那以后，郁金香的价格一直下降，直到1769年。在1769年的英格兰，最值钱的郁金香品种是唐·奎维杜（Don Quevedo）和瓦伦蒂尼（Valentinier），前者价值2个几尼，后者价值2.5个几尼。看样子，这样的价格在当时已经是最低价了。在1800年，一颗普通的郁金香球茎还能卖15几尼呢，而在1835年伦敦的一次公开拍卖中，一颗名为“范妮·开姆勃小姐”（Miss Fanny Kemble）的郁金香球茎能卖75英镑。更引人注目的是住在切尔西（Chelsea）国王大道的一个园林工人所拥有的那棵郁金香——在他的价目表里，这棵郁金香的标价居然高达200几尼！

① 一种极其罕见的黑色郁金香，就像黑天鹅的雏鸟一般珍贵美丽。——译者注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混乱中的困惑

约瑟夫·德拉维加
1688年

the owner of possession of the
ities sold."
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f
h Representative Tucker of
man, listened

matter of trust.
His summation of the
effect of short selling in
market, under any conc
that this practice "so
ever affects

WALL ST. DISCUSSES SHORT STOCK SALES

Friends and Foes of Practice
Agree a Law Against It Would Cur-
tail Trading Sharply.

PROBLEMS CITED

With Bl...
Mem...
Reduced, Value of
in Exchange Also
Would Shrink.

short selling wo
the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brok
ers prefer a mar
can buy or sell at

Blow to Tradi
Barring of short
crease the problem
change firms, whose
been reduced during
years by the decrease
tivity and the decli
prices. Since their comm
with the prices of sec
decline of more than 70
the average of stock
resulted in a large red
these revenues. In Septem
more than e

KEPT THE EXCHANGE OPEN

Government Regulation Would Me
Breakdown in Efficiency, He Decl

TRADING PROVIDES CHECKS

Shorts "Smooth the Waves, bu
Affect the Tides," He Say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

WASHINGTON, Feb. 24.
selling" is essential to th
tenance of stock exchan
stock exchanges are nec
provide a market for
Richard Whitney, presid
New York Stock Exchan
House judiciary subcom
day.

Agitation in political and oth
cles against short

SHORT SELLING OF

引言^①

不论是谁，只要他对约瑟夫·德拉维加的《混乱中的困惑》略知一二，就会立刻注意到他所关心的是人文领域的奇闻轶事。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由一位葡萄牙籍的犹太人用西班牙语写就，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本书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一种圣经般的、与历史有关的、神秘主义的暗示。不过，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还是有关股票交易方面的问题，并且早在1688年，这本书就已经问世。显然，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书中的精髓，需要对这样的一部作品进行大量的解释与说明。

I

让我们从辨识作者所属的种族群体开始说起吧。作者所属的种族群体是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Sephardic）社区。“Sephardic”这个单词指的是那些祖先曾经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与之相对应的单词是“Ashkinasim”，专指祖先生活在中欧或者东欧的犹太人。15世纪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教堂施加巨大压力，企图迫使当地居住的犹太人（以及摩尔人）皈依基督教，有些犹太人确实皈依了基督教，但是更多的犹太人只是虚与委蛇，与教堂周旋，而暗地里仍然秘密地保持着自己最初的信仰。1492年，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摩尔人）被赶出了西班牙，其中许多人逃亡去了葡萄牙。但是，到1536年的时候，葡萄牙人也引入了罗马天主教教会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刚刚移民至此的犹太人只好再度踏上了迁徙的旅程，到别处寻觅避难之所。许多纯粹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在西班牙被称做“新的基督徒”（christianos nuevos）^②，在朝圣的漫长

① 这是该书1957年以《混乱中的困惑》的书名再版时，赫尔曼·克莱姆本兹（Hermann Kellembenz）撰写的引言。

② 该词组为西班牙文。——译者注

旅途中加入了他们那些脊梁更加坚硬的同胞兄弟的队伍。关于第二次迁徙，有件事或许是真的——一些原本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被北欧的商业机会所吸引，移民到北欧的城市并在那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商业才能，成为当地企业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管怎么样，德拉维加家族大概是属于“新的基督徒”一类。德拉维加家族的老前辈们先是移民到了葡萄牙；后来，大约1536年以后，老一代的德拉维加家族又回到了西班牙；最后，一百年之后，也就是1630年左右，这个家族又移民去了低地国家。他们发现，大量的同胞早已在易北河下游和阿姆斯特河（the lower Elbe and Amstel）下游的两岸定居。当然，人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按照自己的传统无拘无束地自由生活。这种类型的移民第一次在这里出现是在15世纪末，接下来的16世纪，有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流向这个地区。实际上，到我们的《混乱中的困惑》问世之时，北欧的“西欧犹太人”社团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他们在那个地区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逐渐达到鼎盛。这些侨居异乡的同胞绝大多数都说葡萄牙语，因为那是他们宗教礼拜仪式上使用的语言。于是，非犹太教的人们开始将他们称为“葡萄牙人”或者“葡萄牙籍的犹太人”。不过，非常奇怪的是，这群人中具有文学抱负的人选择用西班牙语写诗、剧本，写法律方面的专题论文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品。他们当中可能有更多受过教育的人会说西班牙语，而不是葡萄牙语或者荷兰语。换句话说，每个“葡萄牙籍的犹太人”，不论他们的母语是什么，西班牙语都是他们共同的语言。

在阿姆斯特丹，“西班牙或葡萄牙犹太人”的移民获得了比在汉堡更多的经商机会，拥有的自由也比在汉堡时要多。没过多久，在阿姆斯特丹定居的“西欧犹太人”就超过了定居在易北河沿岸城镇的“西欧犹太人”。不过，关于阿姆斯特丹的“西欧犹太人”后裔得到更多自由的任何陈述，都必须放在17世纪欧洲生活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来理解。当地的教堂和行业公会向犹太人的活动强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举例来说，1632年3月21日的一条阿

姆斯特丹法律就禁止犹太人从事任何本来是由当地行业公会成员从事的职业；犹太人不能获得任何一家当地行业公会的会员资格；犹太人也不许贩卖商品或者开设零售商店。唯一一种没有纳入行业公会组织的行业——手工艺制作，是向他们开放的，符合他们的宗教礼仪与风俗习惯。按照这些例外条件，犹太人可以从事屠宰业，当家禽贩子，或是做面包师。此外，他们还可以在切割钻石这个手艺人当找到工作。不过，向他们开放的最重要的行业还是商品的批发贸易和运输。他们中有一定数量的人获准从事经纪人的职业，而另外一些人可以从事资金借贷、货币兑换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业。

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籍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曾经一直被学者夸大，不过最近，新的研究已经纠正了这种被夸大了的认识。犹太人财务状况的改善、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财富总额、他们所拥有的规模最大的产业与最大的“非西欧犹太人”的企业规模的比较情况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1631年、1674年和1743年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和税收返还登记簿上。我们从这些最近才被公开的资料中了解到：事实上，拥有最大的财富，并且从事着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的人都来自统治阶层和贵族家庭。不过，参与阿姆斯特丹经济生活的“葡萄牙籍犹太人”所占的人口比例的确超过了其他种族的人群。最近的调查同样表明，这些葡萄牙籍犹太人所获得的财富主要来自商品贸易——“从南方进口糖类、香料、盐、作为染料的木材、珠宝以及贵金属。与此同时，作为交换，出口北方原材料，尤其是价值很高的制成品。”^①

不过，这些“葡萄牙人”看起来有种很强的倾向性——他们喜欢参加城市里的金融活动，包括彻头彻尾的投机活动。当然，他们所遵守的文明规则至少是向着那个方向敞开大门的，但是同样存在着一个事实——作为秘密的基督教教徒（crypto Christians），犹太人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商品市场保

^① 本来，我们一直无从真正掌握关于“西欧犹太人”的商业规模方面的令人满意的知识，直到得到了保存在杰敏特档案馆（Gemeente Archief）里的许多阿姆斯特丹公证人的文件，才如愿以偿。现在，档案学家哈特博士（Dr. S. Hart）及其助手们正在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持着良好的联系。如果犹太人回归了他们原始的信仰，并迁徙到遥远的地方，他们可能很快就失去这样的合同。至少，当代的约瑟夫·德拉维加，一位学识渊博的“英国绅士”，在他于1701年创作的《荷兰概览》（*Description of Holland*）一书中写道：“在那种交易（股票投机）中，犹太人起着主要的作用。并且，据说在每20笔交易中就有17笔是由犹太人做成的。”这里的“交易”，指的是对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所进行的交易。根据上面这段文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作为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社区中的一员，约瑟夫·德拉维加能够成功地获取与那个城市中的股票投机有关的、令人满意的信息。

II

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德拉维加家族本身的第一份记录可以追溯到这个家族在西班牙的时候。我们的作者的父亲艾萨克·彭索（Isaac Penso）或者叫做艾萨克·彭索·费利克斯（Isaac Penso Felix），1608年出生于西班牙。当时，作者的父亲作为一名“纯粹名义上的基督教教徒”，生活在考德巴省（Cordoba）一处名叫艾斯贝约（Espejo）的小地方。他的家族一定是从葡萄牙迁徙到西班牙的，因为他们名字中的“彭索”（Penso）一词来源于葡萄牙人或者加利西亚人的名字，而在葡萄牙北部和加里西亚^①地区，有几个村庄的村民的名字都含有“彭索”一词。此外，艾萨克·彭索的身世还与另一个家族，“帕萨利诺”（Passarinho），有着很深的渊源。“帕萨利诺”这个单词出自葡萄牙语，意思是“小鸟”。事实上，看来在16世纪，有许多葡萄牙的“新基督教教徒”家庭迁移到西班牙（或者从西班牙迁出）。尤其当葡萄牙还是西班牙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更是有大量的“新基督徒”家族频繁出入于葡萄牙。

① Galicia原来是奥匈帝国的领土，一战以后归属波兰，后来又分属波兰和前苏联。——译者注

艾萨克·彭索迎娶了伊萨·德拉维加 (Esther de la Vega)^①，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继承了父亲的姓氏，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约瑟夫，也就是《混乱中的困惑》的作者，则继承了他母亲的姓氏——这是他们的民族传统。故而，我们这本《混乱中的困惑》的作者的尊姓大名，说全了应该是约瑟夫·彭索·德拉维加·帕萨利诺，有时甚至还得加上另一个姓“费利克斯”。不过，《混乱中的困惑》的作者通常还是使用那个简化了的名字，即约瑟夫·德拉维加。

约瑟夫·德拉维加的父亲艾萨克·彭索非常不幸——曾被宗教法庭判处入狱，在狱中蹲了一段时间。据说艾萨克·彭索曾经发誓，一旦他被释放，就回归祖先的信仰。当他终于被释放，重新获得人身自由之后，果然移民去了安特卫普，在那儿，人们允许他实现自己的誓言——皈依犹太教。直到17世纪，安特卫普仍然居住着相当多的侨居于此的葡萄牙人，他们主要是新基督徒的后代。此后，艾萨克·彭索又在汉堡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跟着移民去了那里。在1647年汉堡的记事簿上可以找到一个叫做“约瑟夫·彭索”的人的名字，那人或许是他的一个兄弟。值得一提的是，汉堡葡萄牙社区里的艾萨克·彭索，曾经被选为1655年的“Parnas”，也就是“长者”。不久，他又移居阿姆斯特丹。据推测，他在那里主要是从事银行业务，不管怎么说，他变得殷实富有，并且与犹太社区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当选了多个职务，并且敞开家门举办宗教会议，以自己的善举赢得了众人的赞叹，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众多犹太教法典“学会”之一的建设，这些学会专门研究《摩西律》(Mosaic Law)。^②

① 他们总共生了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虽然有两个儿子在阿姆斯特丹度过了他们的一生，其他的孩子都移民去了伦敦。通过与安特卫普的阿尔瓦里斯·维加 (Alvares Vega) 家族的联姻，孩子中的四个亲上加亲，而当艾萨克·彭索的一个女儿也嫁入同一个维加家族的时候，几个家庭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② 1683年，在艾萨克·彭索离世的时候，恰恰姆·阿鲍伯 (Chacham Aboab) 和萨法迪·德皮那博士 (Dr. Sarphati de Pina) 等知名人士都发表了纪念性的讲话，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诗人丹尼尔·列维·德·巴里欧斯 (Daniel Levi de Barrios) 和艾萨克·彭索自己的儿子，我们的约瑟夫，也在他 (艾萨克·彭索) 的葬礼上就他的为人、性格以及成就发表了演说。

III

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约瑟夫·德拉维加的出生时间以及出生地点。显然，他大约出生在1650年，也许是在他双亲还住在艾斯贝约的时候，不过，更有可能是在他们已经移居北欧之后。当约瑟夫·德拉维加还只是个小小伙子的时候，他在里沃纳（Leghorn），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随后，他又定居阿姆斯特丹，同时频繁地去汉堡拜访。很快，他就凭借自己的文学天赋引起众人的关注。1667年，在只有17岁的时候，他由于成功地创作了一部名为《满怀希望的犯人》^①（*Asire ba Tikwab*）的希伯来文戏剧而声名鹊起。这部被誉为开创了希伯来文诗歌的新纪元的作品于1673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

尽管德拉维加早年受到家庭方面的影响，曾经试图向犹太法学专家的方向发展，但是，事实上，约瑟夫最后却成了一个商人。他经营着自己的商业活动，他特别的经营方式却使他能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闲暇之时，他会写一些有关婚姻方面的诗歌以及赞美王子的诗作，还有一些小说、演讲稿以及有关伦理道德和哲学方面的论文。他成了“洛斯斯提邦多斯”学会（*Academia de Los Sitibundos*）的会员。该学会是1676年由西班牙居民曼纽尔·德尔蒙特先生（*Manuel de Belmont*）一手创建的，而德拉维加担任学会的评审委员会委员。这个学会的职责是对上交给它的诗作进行评审，并且对优秀的作品给予奖励。当尔蒙特先生在1685年创办一个名为“德·洛斯佛里多斯学会”（*Academia de Los Foridos*）的文学评论俱乐部的时候，德拉维加成了该学会的秘书。他先后短途周游了安特卫普、里沃纳^②（*Leghorn*），或许还去过艾斯贝约。安特卫普是德拉维加妻子的出生地，也是他好几部作品的出版地。这些旅行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智慧。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盛赞他的学识、他的多才多艺、他的语言天赋以及他在文学

^① 英文名为 *The Prisoner of Hope*。

^② 里沃纳是意大利西部一港口。——译者注

方面的非凡才华。

虽然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地列出一份德拉维加作品的完整清单。在他1683年出版的一部名叫《危险的旅行》^① (*Rumbos Peligrosos*) 的小说集的前言里写道，几年之中，他已经给王子们和朋友们写了200封信，信中谈论的是学生们感兴趣的历史话题和一些当代的问题。他把这些信件献给那些令人感激的人们、悲伤的人们以及那些不满意的人们、情人和同性恋者，献给布道的牧师、伦理学家和诗人。在他那些更加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部戏剧除外——还有为他父亲和母亲各创作的一部 *Oracion Funebre* 都于1683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约瑟夫·德拉维加在洛萨斯提邦多斯学会发表了一篇演讲，并将此文奉献给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汉堡的驻外代表曼纽尔·特克斯拉先生 (Manuel Teixeira)。就在同一年，他还向葡萄牙的代表摩西·库里尔 (Mose Curiel)，别名捷罗尼莫·牛尼斯达科斯达 (Jeronimo Nunes da Costa)，献上了一篇赞美神圣的《摩西律》的颂文。为庆祝维也纳反抗土耳其人的侵略并得到自由，他另外又撰写了一篇赞美诗，献给波兰国王简·索比斯基 (Jan Sobieski)。1683年，他的小说集 *Rumbos Peligrosos*，又名《危险的旅行》出版，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些小说是以意大利风格写就的，德拉维加设想这些小说会因所采用的崭新的不凡风格而熠熠生辉。1685年，德拉维加出版了他在德·洛斯佛里多斯学会上发表的演讲。接下来的几年，德拉维加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问世了，这部对话录是关于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运作问题的。这本引起我们浓厚兴趣的对话体著作名叫《混乱中的困惑》，出版于1688年。1690年，德拉维加向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奉上了一篇短文，而他为世人所知的最后一篇作品是献给葡萄牙驻海牙大使迪亚戈·德门多萨考特里尔 (Diego de Mendoza Corte Real) 的一篇演讲，上面标注的创作日期是1692年3月15日。人们推测，此后不久，这位文学天才便

^① 英文名为 *Dangerous Travels*。

与世长辞了。德拉维加和他的父亲一样，长眠在阿姆斯特丹河畔的欧德柯克公墓里。

IV

1688年5月24日，约瑟夫·德拉维加遵照当时的惯例，为自己有关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业务的“对话录”献上一份题词，将这部作品献给在那座城市的葡萄牙人社区里非常受人尊敬的荣誉成员德瓦特·牛尼斯德科斯塔（Duarte Nunes de Costa）。德瓦特·牛尼斯德科斯塔的祖父老德瓦特和他的父亲捷洛尼莫（Jeronimo）曾经在葡萄牙人复兴的岁月里一起在汉堡和阿姆斯特丹为国王约翰四世效力，担任国王的代表。捷洛尼莫属于阿姆斯特丹的教徒团体，该团体于1673年为那里的犹太教新会堂铺下了奠基石。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德拉维加曾在1683年为老德瓦特奉献过一篇颂词。现在，他的儿子德瓦特，在社区里被人们称为雅克布（Jacob）。又荣幸地得到了作为献辞的这本关于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运作情况的著作。人们只需读一下这篇献辞，就会对德拉维加引以为荣的华丽造作的风格一目了然，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篇献辞超越了与之同一时代的作家所惯有的浮华之风。德拉维加在这篇献辞里围绕着“acciones”（股票）这个单词展开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比较。他围绕“costa”（海岸）这个单词做着文字游戏，试图给读者某种暗示；他也玩味“paxaro”这个单词，而“paxaro”能使德拉维加回忆起他的祖先们。在下面的导言和后面的正文中，他继续沿用了这种风格，在一位哲学家、一个商人以及一位股东之间展开的四段对话，试图向读者展示一幅关于股票交易所生活的生动而全面的图画。这些对话不时地会被打断，而且稍稍在学术上有点儿故意偏离主题，将话题切换到神秘主义、哲学、旧约全书以及古典诗词的领域中去。德拉维加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形成“一种崭新的、没有模仿其他任何人的风格，从而也不会被任何人

模仿”的风格。但是，实际上，他走向了极端。他原先的目标是“文风文雅”（estiloculto）^①，可是，到头来却搞得错综复杂又矫揉造作，仅此一个原因就足以使他缺少同时代的模仿者，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风格的作品也是非常晦涩难懂的。

德拉维加在《混乱中的困惑》这本书的前言里强调，他创作这篇对话体的作品有三个动机：首先，是为了自娱自乐；其次，是为那些在股票交易中不够活跃的人们，他想描画这样一个行业——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所有行业之中最诚实也最有益的一个行业；最后，他想准确而全面地刻画出那个行业中的流氓无赖所惯用的阴险伎俩。关于最后这个目的，他的一部分打算是想警告人们不要参与投机。他警告的方法是让人们熟知骗子们的欺诈手段。但是，他的主要目的还是揭露为非作歹者的丑恶嘴脸。德拉维加把交易所里的交易比喻成一座迷宫，并向读者保证，自己一点儿也没有言过其实。他写的东西看起来可能会给人留下一种夸张或者过分的印象，但是事实上，他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了真实的环境而已。他之所以将这本对话体的作品称为《混乱中的困惑》，是因为：在所有那些交易行为与活动中，任何一项承载了过多非理性成分的活动都不会有理性的目标，任何一种阴谋诡计都会招致对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此，从事股票交易这个行当的人们仿佛行走在一个漆黑的世界，没有谁能够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一支笔能够真正全面地描绘出这个世界的复杂之处。

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德拉维加选用的这种文体——对话体——是十分恰当的。这种假想中的讨论使作者得以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的剖析，并且在这样的剖析过程中确实避免了直截了当的揭露可能会带来的沉闷与枯燥。这种形式还使德拉维加轻松自如地确定了自己与自己力图呈现给读者的众多素材之间的独特关系。他可以在采用并且保持一种表面上的客观态度的同时，通过书中一两个人物的讲述表达自己的观点。人们普遍认为，一般而

^① 该词源出西班牙语。——译者注

言，“股东”这个角色是传递作者自己的心声的传声筒。当然，事实上，到1688年的时候，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在圣经和古典文学作品中得到应用的对话体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而它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得到运用的最有名的例子或许还要数柏拉图的《对话录》。比较近期的例子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对话体，在文艺复兴时期被皮特拉克（Petrarch，意大利诗人，1304—1374）、伊拉斯谟（Erasmus，荷兰学者）和其他一些人竞相采用。如果德拉维加曾经读过西班牙作家的作品的话，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话体的例子。举例来说，在圣提拉纳侯爵（Marquess of Santillana）、胡安·德瓦尔德斯（Juan de Valdes）或者塞万提斯（Cervantes）的作品之中也不乏对话体的力作。塞万提斯的《狗的座谈会》^①（*Coloquio de los Perros*）过去曾是，现在也仍然是，一部响当当的文学作品。这个时期，即使是有很高技术含量的问题也经常以对话体的形式来表达，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1519～1520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战争的艺术》（*Dell' Arte della Guerra*）。

V

在德拉维加出版他的《混乱中的困惑》的时候，股票交易和股票投机的实践还不到一个世纪，而商品投机的历史却要悠久一些。早在16世纪中期，阿姆斯特丹人就已经对谷物进行投机了。晚些时候，他们又对鲑鱼、香料、鲸鱼油甚至郁金香进行投机，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正是进行这些交易的场所。起初，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只是一处位于沃尔姆街（Warmoestreet）的露天市场，不久之后，迁到“新桥”。这座新桥穿越达姆拉克（Damrak），然后又在欧德·科克（Oude Kerk）附近的“教堂广场”蓬勃发展。直到1611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才建起自己专用的交易所建筑。

股票交易与股票投机首次出现是在1602年，当原先从事对东印度贸易的

^① 英文书名是 *Colloquium of the Dogs*。

六家地区性的商业团体合并成一家综合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时候。按照官方的通告，联邦省会（United Provinces）的居民都有机会参股东印度公司。刚开始，首次付款所派生出的权利被称为“paerten”、“partieen”或者“partijen”——这些单词都出自在运输业中使用的“参加”（participation）这个英文单词。好像直到1606年，才开始有人使用“actie”（股份）这个单词。每位拥有股份的人都可以通过支付一笔手续费来转移自己的股份给另一个人——既可以全部转移，也可以部分转移。这一事实确保了对这些“股份”（participations）进行交易的可能性。阿姆斯特丹教士分会认购的股份总数超过了好几家教士分会认购的总额。而且，由于“所有权”比例得以继续保持，随后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异常火热，成为最繁荣的交易地区。

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的交易是如此的活跃，以至于在原始认购结束的几天之后，它们的价格很快涨到高出票面价值14%~15%的水平。并且，这种上升的趋势还在延续。到了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一位名叫伊萨克勒梅尔（Isaac le Maire）的人所组织的一群投机分子的操纵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跌到了票面价值的130%。这位梅尔先生的最终目的是成立一家同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竞争的法国公司。这些早期的股市“操纵者”不仅抛售了巨额的股票，而且还通过“卖空”和散布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利的谣言，来打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于是，1610年2月27日颁布了第一条禁止这种活动的法令，尤其禁止“买空卖空”（windhandel）^①。该法令允许公司股票的实际拥有者在将来交割自己现在出售的股票。1621年，在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之后，政府又不得不颁布了第二条禁止“空头交易”（wind trade）的法令，希望进一步禁止买空卖空。但是，买空卖空行为的泛滥显然未能得到控制。

看起来，股票的成交量是随着价格变动的幅度以及市场操纵手段的变化

① 交易卖方并不拥有的股票。

而有所不同的。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就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年头，人们就亲眼目睹了大量的股票投机。后来，1621年，在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之际，又出现了一次股票投机交易异常活跃的高潮。那时，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也开始被人们所交易，而在那以后的1621~164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以及30年战争引起的变迁使得商业保持着异常活跃的状态。接下来，是一二十年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这份安宁却被投机打破——这场投机导致了1672年的危机。大约在40年之后的1677年，一条竭力保护东印度公司股东权益的新的法令得以公布。

17世纪80年代，股票交易看上去再度大量增加，并且第一次有人十分踊跃地讨论股票交易所引发的问题。1687年，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律师尼古拉斯·穆伊斯范霍利（Nicolaas Muys Van Holy）感到自己责无旁贷，必须出版一本小册子来揭露空头交易的罪恶。他指出，在股票交易所里，有一些职业的股票交易商人迫不及待地使用各种伎俩打探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机密，以便利用这些所谓的“内部”消息从普通投资者身上获取利益。为了减少投机行为，尼古拉斯建议，不仅所有的股票交易需要登记，而且应当对这种交易征税。作者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即：“葡萄牙民族”在股票投机活动中，尤其是近来在对虚构的股票单位“ducaton”的投机上，正在扮演着主要角色。关于“ducaton”股票，作者的介绍更加简单，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不过，他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随后出版的几本小册子都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最后，阿姆斯特丹的地方行政官于1688年1月13日颁布了一项法令，当真对股票交易征收一项税赋。

德拉维加的著作正是在17世纪80年代这样的环境之下问世的。有内部证据显示，作者约瑟夫亲自参加过股票交易，对这个行业有着切身的体会。他曾经在一个地方以一种极为夸张的方式十分确信地说：通过股票投机，他曾赚到不少于五倍的钱，但是同样是通过股票投机，他又输掉了五倍的钱！如果人们能够洞悉或者了解这本书在文学造诣上的独特之处的话，他将会在书

中看到一个对整个股市合理的真实的描写。

德拉维加不仅使读者熟知交易所投机的历史，而且使读者了解那个时代股市中进行的形形色色的投机交易。我们惊讶地发现，尽管术语不尽相同，但是当今社会正在实行的绝大多数惯例，在德拉维加的时代就已被当时的人们所使用。我们还发现，像差价（difference）、延期（prolongation）、清算（liquidation）、限价（limits）、经纪人佣金（brokerage）之类的术语在德拉维加的时代已在使用，荷兰人用来从事他们的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表达方式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有的投机分子对股价的上涨进行投机，而另外一些投机分子却对股价的下跌进行投机，各种投机分子在经纪人中都有众多的追随者。

在《混乱中的困惑》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短语就是“求助于弗雷德里克”（appeal to Frederick）。这句短语现在已经不用了，它只在当时、当地有过短暂的影响。这句短语指的是在前面提到过的，从1621年开始出台的众多法规中反复出现的一句条文。实际上，它比斯塔德侯德·弗雷德里克·亨利（Stadholder Frederick Henry）所处的时代还要早些。（这个条款被写入1630年和1636年的官方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告示以及类似的法令之中，而这些告示与法令都是弗雷德里克·亨利在任期间颁布的。）根据这一法令，一份“卖空”合约的买方（也可能是其他人），可以拒绝遵守合约中的条款；也就是说，他可以不承认这份协议，而他的行动在法庭上将会得到支持。尽管法庭看起来对于可以被纳入自己保护范围的各类个人和商业交易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法庭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增加投机的危险性。从某种意义来说，“求助于弗雷德里克”这一条款可以被看做一种方法，用以贯彻并加强1610年的直接禁止从事“卖空”交易的法令，而且在后续出台的法令中也的确得到了反复的强调。

或许因为德拉维加并非律师，所以他对这些法令的处理是相当“含混不清”的，而这些又恰好揭示出了德拉维加作品的局限之一，那就是：现

代的读者能够从《混乱中的困惑》里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一幅有关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里上演的一幕幕情景的“比较合理”的真实画面。有的时候，德拉维加的叙述并不连贯，可能是由于他的一时疏忽（小说作者常常会犯这种毛病），也可能是他自己的思绪也很混沌。而有的时候，他又像戏剧作家那样，未免显得过于夸张，这或许是因为他力图增强作品效果的缘故。这本书的结构布局当然足以说明这些特性——或许还能提供这些特性的缘由。内部资料清楚地表明，德拉维加最初是想把它写成手册类型的，或许是为了供他的兄弟们以及那些移民伦敦的“葡萄牙民族”的人使用——他们可能非常渴望加入当时正在伦敦渐露端倪的股票投机中去。后来，德拉维加决定从起初那种冗长而又沉闷的文字中摆脱出来，创作一件“文学”作品。在删除了桃色（如果不是紫色的话）的段落之后，剩下的段落前后衔接得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令人称奇。也许我们这里提供的版本是非常接近最初的手册体版本的，尽管现在的结尾部分和原来的安排有所不同。最后，这本《混乱中的困惑》包含了一些来自特定环境的矛盾之处——从德拉维加动笔写作到他完成这部作品（或者是在对它进行修改校订的时候）期间，一场危机降临到东印度公司的头上。本书的第四段对话里就有一段很长的描述这个不幸的小插曲的文字。

鉴于以上这些因素，并且考虑到德拉维加所描述的交易极其复杂、所用的语言花哨华丽，因而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比较随意。为了明确特定的顺序和逻辑关系，完整的句子中会时不时地穿插一些带括号的词语和词组。有时，译者还可能对句子或者段落部分进行自由的表达与注释。虽然学者找不出对原来的西班牙语作品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也找不到后来德文版或是荷兰版作品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但是，译者依然用了最大的努力来表达和诠释德拉维加思想的真谛。

VI^①

要理解《混乱中的困惑》中与阿姆斯特丹投票交易所的操作有关的数据资料，就必须依靠下面这些对书中的说明或是暗示所做的解释：

1. 这里涉及的证券主要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组建于1602年，并且曾经盛极一时。相对而言，荷兰西印度公司就相当逊色了。西印度公司成立于1621年，略晚于它的对手——东印度公司，并且也不如东印度公司那么成功。1674年，西印度公司进行了重组，重组以后发行的新股票被人操纵的可能性较小。书中只提到过一两次政府债券，但是看起来，买卖公债在当时还是比较常见的。东印度公司有未清偿的债券，但是德拉维加却没有特意提及。

事实上，西印度公司的股票看样子只是在“发行的当时”被买入和卖出。荷兰国会（States General）于162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声称，“我们根据充足的证据得知，有些人甚至已经在出售即将获准发行的西印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需要付款、登记和过户，以便能在公司成立之后迅速交割。这类活动使我们的权威、我们的决定以及我们良好的意愿全部失效。”这种情况仅发生于第一家可转让股票的公司成立19年之后^②。

2. 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名义价值是500佛来芒镑（pounds Flemish），合3 000荷兰盾（guilders）。1688年的时候，它的报价已经大概是实际价值的580%了。与此相应，那时，一股股票的市场价值事实上已经超过了1.7万荷兰盾。或许，这种高昂的单位价格与新型股票投机工具的发展有关，这种新

① 由于接下来内容所具有的专业特性，并且为了通过美国的习惯表达方式再现这些素材取得理想的效果，我十分高兴能够大量地依据我的两位同事为我提供的习语集锦，他们是科尔博士（Dr. Cole）和雷德利克博士（Dr. Redlich）。

② 同样，这项法令还反映出荷兰人急中生智的创造才能，有证据表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买卖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将前面提到的法令中所规定的罚款也纳入了买卖合同，他们同意放弃向当局告发空头买卖行为的机会，从而获得了一定比例的罚款。

型的投机工具不必进行实际的股票买卖。

3. 当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它的股票被那个国家的几座城市的商人瓜分一空。这几个社区里的商人股东组成了不同的地区商会，由这些商会轮流进行公司的管理。阿姆斯特丹商会拥有的股票份数在总的股票份额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但是，在其他地方，人们拥有的股票经常转手，而且转手时的成交价格也与阿姆斯特丹的价格相去甚远，其中的价差大得惊人。不过，德拉维加把他的讨论几乎只限定在阿姆斯特丹的情况之下。

4. 阿姆斯特丹市场的基本要素如下：富有的投资人、偶然的投机人（主要是城里的商人）、永久性的投机分子（他们要么对货真价实的股票进行投机，要么对面值较低的替代品进行投机）、阿姆斯特丹银行、用股票作为担保贷出资金的人（他们作为个人，也可以被看做是“富有的投资人”）、各种类型的经纪人，以及“rescounters”，专门负责结算相对于真实股票交易的“差额”的对冲人。至少还有另外一种个体，直到1688年前的不久，他们一直进行着对虚拟股票交易的“差额”的清算工作。

5. 在阿姆斯特丹的市场上，存在着类型各异的交易：

(1) 当场支付现金的真实股票的买卖。

(2) 有一类买卖，其支付价款的资金是从其他人那里借来的，借款高达总价值的4/5。

(3) 有的交易确定了未来结算的具体日期，也就是说，其结算期限在通常的月度结算的日期之后。这些“期货”合约显然既是为了投机又是为了保值，既可以由投机者进行，也可以由放贷者以证券为担保放贷来进行。德拉维加暗示道，后一种人（以证券为担保的放贷者）通常借助于“期货”合约这样的手段来套期保值。抵押契约，早在1610年就已经在公告中提到过了。在远期合约到期之前，合同的卖方可以将证券用于抵押。^①双方还可以做出其他的安排，而且交易者相当频繁地采用这种方法，通过安排，“期货”

① 买方也可以抵押，参见原书的第5页和第24页编辑过的部分。

合约的到期日可以延长（只要合约双方有明确的意思表示，都同意这种延长），这种行为被称为“延期”。

在上述的“期货”买卖中，有很大比例的交易实际上是“卖空交易”（sales in “blanco”，或者称做“short sales”，我们在书中使用后一种说法），尽管这样的交易为国家以及当地的法律所禁止。

（4）还有期权合约。期权合约至少有“买入期权合约”和“卖出期权合约”两种类型。从此这些交易就一直存在并流传到今日。期权合约的交易方式如下：在“买入期权合约”下，一方同意，在特定的时间，如果合约的另外一方要求买入的话，他将按照合约规定的价格交付规定数量的股票；而与此相反，在“卖出期权合约”下，一方同意，在特定的时间，按照合约规定的价格和数量接受对方卖出的股票。（这些显然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期货合约）。德拉维加在一两处的文字中暗示道，当时已经出现了类似现在的“双向期权”的交易。所谓“双向期权”，即合约的一方同意，在特定的时间，按特定价格买入或者卖出特定数量的股票。但是，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十分明确。

在所有的“买入”或者“卖出”的期权协议中，拥有特权的买方都必须支付一笔“期权费”。期权费的数额取决于许多条件——合约有效期的长短、合约的卖方对合约所涉及的股票价格的变动趋势所做的判断（上涨的可能性大，还是下跌的可能性大），似乎，在同一时间里正在洽谈的同类合约数量的多少也会影响期权费的高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

有的时候，真正的投资者也会利用期权合约来进行套期保值。但是，期权合约更多地还是被用于纯粹的投机目的。一份“买入期权”合约（“买入期权”又叫做“看涨期权”）的买方（就像我们今天的商品交易所里的“期货”合约一样）的目的往往并不是为了在特定的时间以既定的价格真正地买入股票，而仅仅是对期权合约中规定的价格与合约规定的到期日之间市场上的价格差发生兴趣。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股票的市场价格上涨能够超过

合约中规定的“价格”，以便在到期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股票，同时在上以较高的价格卖出，从而获取其中的差价。或者直接在到期日之前买入一份“卖出期权”合约，轧平头寸、清算差价。那些将“期权”合约用于保值的目的，对接受或者卖出股票感兴趣的人来说并非同样如此。

(5) 除此以外，交易所里还对一种叫做“ducaton”的股票（虚拟股票）进行买入和卖出（这样的交易是在不久以前才出现的形式，它起源于1688年，并且实际上，已经在德拉维加写作本书之时，在荷兰遭受的萧条中，被人们废弃不用了）。仅仅根据德拉维加的描述，我们还很难对这种交易所达到的总的金额做出准确的判断。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们断言，“ducaton”股票是虚拟的股票，而非实际存在的股票。然而，德拉维加却很确定地说到了那些“买入大量股票并且卖出‘ducaton’股票”的交易商人，并且提到那些因为“抛售了大量的股票”而“买入‘ducaton’股票”的交易商们。在此，我们可以确定，德拉维加使用的词语“买入”和“卖出”其实是一种简化了的说法，它们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拥有一个多头头寸”或者“拥有一个空头头寸”。

不管怎么说，最出色的权威人士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交易中，“股票”的名义价值只有真实的东印度公司股票的面面价值的1/10。当然，没有谁真想实际交割“ducaton”股票，整个交易的关键在于，每月清算一次亏损和赢利。事实上，在交易双方进行的是涵盖交易内容的各种单据。在协议规定的清算日，由猜错了股价走向的一方向另一方支付预期价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差价。实际上，整个交易就是对股票市场未来走势的一种赌博，而“ducaton”股票的价格走势或多或少地与实际股票的价值紧密相关。

德拉维加描绘了人们出于清算的目的，如何在指定的日期确定虚拟股票的价值，也就是，由交易所涉及的双方宣告它的价值。在某一处文字中，作者提到，当虚拟股票的价格即将被确定并公布的时候，交易所里的人们有多么的兴奋，又有多么的困惑。显然，交易所的一位官员举起一根棍子作为宣告特定期间内的所有交易终结的标记。有的人希望木棍被晚点儿举

起，而有的人却希望它被举得越早越好。看来，投机者对木棍被举得是早还是晚的希望充分反映了他们各自对股票的愿望。

德拉维加还在一个地方指出，那些买不起也卖不起“ducaton”股票的街头投机商，转而对那些价值较低的股票进行这种买空和卖空的虚拟交易。但是，德拉维加在这一点上或许有点儿夸大其词。

6. 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许多当时的投机活动的性质与特点与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所熟知的投机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二者的理念是大不相同的。在美国，由于每天都要清算盈亏损益，所以，美国的交易者会从自己实际买入和卖出股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即使有的交易可以使用借来的股票，交易人仍然感到很大的压力。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实际上，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各地的投机商考虑的只是自己预期的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一个是交易者同意支付的价格（同意以此价位出售、在此价位交割股票或者在此价位接受股票），另一个则是在规定的时间点上的市价，而这两种价格的差额才是投机商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

按月清算的体制也为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个投机商可以采取多种行动——不但可以变动头寸，而且还可以用一些交易去平衡或者轧平其他的交易，与之对冲。

这种“清偿”方式的存在正是德拉维加所说的“rescounters”得以产生的根源。德拉维加将这些人描绘成这样一类经纪人，他们“将冲销或者履行（似乎是投机者）的义务以及支付并且收取差额作为自己的职业”。尽管根据报道，“对冲”可以上溯到17世纪，但是，德拉维加的描述却表明这种活动只是不久以前才发展起来的。

德拉维加在本书中还提到了由“财务总监”主持的同一种类型的操作——监控并记录与“ducaton”股票有关的合约。

7. 正如我们早已提到的那样，一月进行一次债务的清算。对于实际存在的股票，清算的日期是每个月的20号，而实际的支付则发生在每个月的25

号。至于虚拟的投票，清算日似乎是每个月的1号，尽管德拉维加在书中某处提到：对“ducaton”股票，每个月进行两次清算——每个月的月初和中旬各有一次。

8. 显然，为了提高支付的效率，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余额也被派上了用场。在谈到股票的时候，人们讲的是“可在银行支付”，而“期权”合约的期权费则可以“在银行被立即转账”。

银行还为自己的客户保留着德拉维加所说的“定期账户”。这种账户似乎是一种有关每月清算的程序、时间方面的协定以及政府为消除“卖空”所做的努力（关于这一点，后面将做详细的叙述）的半官方性质的记录。看来，卖方只需要将一份有效的通知交给阿姆斯特丹银行，就可以证明白己并没有卖空，而银行将会保留这份证明，直到支付实际发生为止。当股票购买人在购买股票时使用的钱有一部分是借款的时候，阿姆斯特丹银行也会保留一个类似的“定期账户”。

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不能直接转手交换——它并不是可以议付或者转让的票据，只有买方和卖方作为交易的双方一起出现在东印度公司的办公室里，由公司的秘书将相应的数据记入公司的账簿，股票的销售或者其他的过户才被视为有效。（这道程序曾经也是私人银行家或者早期的商业银行对其所持有的余额进行转账或者过户的时候所必需的程序。这个程序在大陆法系的“银行转账清算”程序中留下了自己鲜明的烙印，而且，在当代的支票术语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比如“付给指定人”或是“凭指令付款”（pay to the order of）等）。

9. 买入和卖出通常（并非必须）都是通过经纪人进行的，而经纪人又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一种划分方法是：将他们分成“宣誓经纪人（sworn brokers）”和“自由经纪人（free brokers）”。政府对“宣誓经纪人”颁发执照加以认可，限制其数量，并且禁止他们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自由经纪人”的数量就要多得多了。尽管“自由经纪人”不像“宣誓经纪人”那样受到政府的严格检查，但是事实上，德拉维加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将经纪人分为“多头经纪人/买空（bulls）经纪人”和“空头/卖空（bears）经纪人”。德拉维加不但没有说明“宣誓经纪人”和“自由经纪人”之间是否形成了同盟，更没有说清楚这种同盟为什么能够形成。德拉维加明确地表示，经常提到的空头与多头之间激烈竞争这一背景，可能对此有些影响。但是，“自由经纪人”为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交易可能也是“宣誓经纪人”和“自由经纪人”结盟的一大原因。有时，投机商可能发现经纪人是自己真正的同盟，可是，作者给出的经纪人改弦易辙的事例表明，他们之间的联盟并不是牢不可破的。

10. 交易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各种各样的场所完成的。通常，如果交易是在上午进行，那么地点就是靠近老水坝的一块特定的露天区域；如果交易是在下午进行，那么地点则是在交易所的大楼里。不过，作者举出的其他一些例子也表明，交易有时候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比如咖啡屋、私人住宅，甚至还有在床上成交的！

11. 事实上，对证券交易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看起来着实不太容易，这些约束主要有：

（1）如果一个人没有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那么，他将被宣布为破产；不过，那应当是真实的商品交易和土地交易等。

（2）一方面，为了防止股票经纪人——不论是“自由经纪人”还是“宣誓经纪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进行交易，立法机关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看起来，法律得到了充分的执行——“宣誓经纪人”遵守了法律，而“自由经纪人”有时却建立一些名义上独立的企业，来进行他们的投机活动。而在另一方面，德拉维加通篇都在暗示，有许多经纪人确实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股票投机。

（3）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看起来，为了消除卖空行为，法规制定者已经付出了真正的热情。早在1610年股票交易在荷兰开始的第一天，荷兰议会就颁布过一项法令，禁止所有这类卖空的协议。并且，这条法令被一

次又一次地重新颁布。自从1620年颁布的法令允许投机商“求助于弗雷德里克”（投机商可以拒不承认或是拒绝履行某些类型的合约）以来，已经出台了多部法令。

然而，要想执行法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得依靠市场自身的努力。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认为自己有义务进行干预。除了在法庭上如何断案（这些案例可能是由某个人生编硬造的）以外，德拉维加并没有举出任何人的官方行为作为例证。事实上，任何一个投机商，如果认为自己在技术层面上不符合法律的交易中摊子铺得太大，都可以“求助于弗雷德里克”。显然，有的投机商也确实这么做了。

直到1688年，不但各项法令所涵盖的交易类型仍不确定，而且法庭对各类案件的决定也不明确。德拉维加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致力于展示他要描绘的内容。显然，对ducaton之类的虚拟证券进行交易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法令对期权合约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即便是对实际股票的卖方而言，证明他们在远期销售中的操作的合法性（比如利用公司办公室里买方的“定期账户”）也是明智之举。这种早在1613年就确立了的保证金安排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免受那些选择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交易的股票持有人的起诉。

这些法令的总的目的看起来都是为了防止或者消除对股票市场价值的人为打压——用更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操纵市场”——当局通过禁止任何人出售自己并不真正拥有的东西，和允许交易的任何一方拒不履行属于严禁之列的各种合约，来对操纵市场的行为进行打击。实际上，1610年以及以后年份中出台的同样类型的禁令，最初都是用于商品市场的，而且不久就扩展到了股票交易的领域。

VII

最后，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很有价值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混乱

中的困惑》在当时有什么现实意义？与此相应的，这本书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所知甚少。事实上，这本书是用西班牙语而不是用绝大多数投机商或者其他与股市有关的人所必然使用的荷兰语写成的，而且书的形式也从原来直截了当式的手册变成了一部文辞华丽夸张的文学作品。以上这些事实必定会限制本书，使它不仅难以拥有广大的读者队伍，而且难以对与德拉维加同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或者立法目的产生广泛的影响。当作者还在埋头于这本书的写作之时，市场遭遇了危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政府又对发行证券征税。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在一段时期内挫败了投机商的士气，直到《混乱中的困惑》被人们所遗忘。在《混乱中的困惑》整部作品被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视为珍宝之前，这本书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曾经被翻译成荷兰语。

然而，对于经济学和商业史的学生，包括那些负责1939年的荷兰语译本的翻译人员来说，这部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首先，没有任何一本书像《混乱中的困惑》一样对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进行了广泛而全面地描写与分析；其次，在17世纪，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阿姆斯特丹一样有着如此成熟的股票交易行业；再次，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并没有被环境削弱。仔细阅读德拉维加的作品，人们可以了解股票交易是如何迅速变得复杂而又深奥的。而且从德拉维加的作品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荷兰人是在“葡萄牙民族”成员的帮助之下，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设计出股票交易的程序和交易策略的。而现在的市场操作者仍在使用这些程序和策略，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改进与超越。

赫尔曼·克莱姆本兹

1957年1月

于维尔茨堡（Würzburg）

第一段对话



在《混乱中的困惑》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商人谈到水星的象征意义——商人之神，从而为他的商人伙伴们的活动构造了一种美好的标志。哲学家根据“现金”和“银行”这两个词语以及其他的商业术语，运用机智的隐喻，在对比中强调和突出了一位博学之士生活的宁静与安详。而股东的加入，引导着讨论的话题转向一种特殊的商业形式，那就是股票交易，而哲学家针对股票交易提出了一个问题。

哲学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易呀？我常听人们谈到它，但是我既不理解，也从来没有努力地想要去理解它。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本与这个主题有关的而且能够帮我更容易地对它有所认识的书。

股东：我不得不说您是一个无知的人，我的朋友格里比尔德（Greybeard），如果你真的对这种曾经是欧洲最公平也最具欺骗性的迷宫一样的行业，这种世界上最高贵也最臭名昭著的行业，这种地球上最美好也最粗俗的行业一窍不通的话。它既聚集了学术研究的精华，也是欺骗行为的典型；它既是探测智慧的试金石，也是胆大妄为、目无法纪者的墓碑；它既是

有用的宝藏，也是灾难的源泉。归根到底，它既像是永不停歇的西西弗斯^①（Sisyphus），又像是被铁链锁在永动轮上的伊克塞恩^②（Ixion）。

哲学家：难道我的好奇心不足以让您为我简短地描述一下这种欺诈手段，并对这个迷宫进行简单明了的解释吗？

商人：那也是我的愿望，因为不断到来的指示、货物的运输和汇票的流通，对我来说都是如此的麻烦。这样沉重的工作压力迫使我去寻找获取财富的其他方法。哪怕这种方法存在风险，并且可能带来损失，我也愿意。只要它能为我免去这些沉重而又辛苦的工作就行。

股东：这个新兴行当最好的也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方面就是——人可以获得富有，却不必承担风险。事实上，你不必让你的资本受到威胁，也不必交际应酬，不必预付资金，不必拥有仓库，不必设置出纳员，也不必担心支付中止以及其他一切无法预见的偶发事件，就可以期待着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如果你在交易中运气不佳的话，只要改名换姓就可以了，就像希伯来人一样，一旦他们身患重病，就会改变自己的名字，以求祛病消灾。与此相似，对于那些发现自己身处困境的投机商来说，改名换姓就足以使他所有即将发生的危险和令人痛苦不堪的焦虑不安中解脱出来。

哲学家：他会改叫什么名字呢？是改成菲立普，还是列奥那多，抑或是迪亚戈？

股东：不，他没有必要为了自救而脚底抹油仓皇逃跑，或者像名言中所说的那样“接受维拉·迪亚戈的长筒袜”^③。他只要提一下弗雷德里克的名

① 西西弗斯是古代希腊的一个国王，因其作恶多端，死后坠入地狱，被罚往山上推石头，但是，石头推上去又滚下来，这样循环不息。——译者注

② 伊克塞恩是塞萨利安的国王，因其追求女神Hera而被缚于地府的旋轮之上。——译者注

③ 此处引用的西班牙谚语有两种形式：Tomar las de Villadiego或者Tomar las Calzas de Villadiego，意思是“仓皇逃跑”。维拉迪亚戈（Villadiego）是伯哥斯省（the province of Burgos）的一个地区的地名，居住此地的犹太人穿着一种及膝马裤Calzas，以便随时做好准备，逃避迫害他们的卡斯蒂里亚人（Castilian，译者注：Castile是古代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王国）。

字^①就可以逃过一劫，摆脱一切的追索了。

我将满足你们的愿望，告诉你们这种行当的起源。你们将会发现——股票不仅是为傻瓜而存在的，也是为智者而存在的。

1602年，一些荷兰商人组建了一家公司。这个国家里的最富有的人们都在这个公司里入了股，这家公司很快就募集到了641/3吨黄金（约合640万弗罗林还要多些，一个弗罗林为价值两个先令的硬币）的资金。公司建造了几艘轮船，这些船于1604年起航前往东印度进行堂吉诃德式的探险活动。这家公司的财产被分割成了几个部分，而每个部分（称做一个actie（即股份），上面附有对盈余或是利润采取行动（或者追索）的可能性）的金额都是500镑（佛莱芒镑），约合3 000弗罗林。^②不过，有许多人并没有认购一整份的股份，而是按照自己的财力、偏好或是对未来的预期而认购一整份股份中一个较小的比例。轮船出海之后一帆风顺，没有遇到风车式的假想敌，也没有受到巨型怪兽的蛊惑。轮船航行的成功、征服的胜利，连同它们带回来的丰富的货物都不仅意味着恺撒的“我来、我征服”已被超越，而且意味着他们创造了可观的利润。这些利润作为一种强大的驱动力量，促使人们进一步从事这项伟大的冒险事业。公司一直拖到1612年才着手对所创造的利润进行首次分配，以增加公司的资金。接着，管理层宣布发放57.5%的红利，而1613年发放的红利则为42.5%，这样一来，股东在收回全部的投资之后，将来还可以享受到无穷无尽的收益。

东印度公司的规模逐渐壮大，以至于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优秀、最出色的知名企业都被它甩在了后面。每年，东印度公司都会造出一些新的轮船，每年，这些巨轮都会从海外带回新的财富。公司的经营带来的巨额收入被作为利润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或者按照管理层的规定，作为开支（有时红利是用丁香支付的，有时则用本票或现金支付，只要董事会认为合适即可）。从

① 这里的名字指的是弗雷德里克·亨利，参见引言部分。

② 这里以及后面提到的“镑”指的都是“佛莱芒镑”。

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到我们现在谈话时为止，它派发的红利已经达到本金的1482.5%，而公司的资本金早已是原先的5倍了。人们将这座宝库（东印度公司）比作一株大树，因为它几乎每年都会结出果实。尽管它有几年一直只开花不结果，但是在其他的年份里，它却像乌拉巴^①地区的树木一样，每年都结两三次果实。并且，它还可以与西比莱恩（Sibylines）^②一较高下——西比莱恩拥有黄金的枝干和祖母绿的叶子。其他人则将东印度公司称为“善良与邪恶的认识之树”，就像天堂里的那种树一样——它总是能够掌握它的每根枝干上或是分支机构里所发生的每件与利益有关的事情。不过，我已经发现，它很像一棵生命之树，因为有无数的人躺在它的树荫下乘凉、生存。那些对已有的果实心满意足而不坚持拔起这棵大树树根的人们……将会承认他们在这个行当里做得相当出色。

哲学家：我想，我已经充分了解了东印度公司，领会了它的股票、它的宗旨、它的声望、它的辉煌、它的独特之处、它的进步、它的管理、它的利润分配以及它的稳定性的含义。但是，它与你所说的神秘的事业，与你所指出的诡计，与你所强调的困难与风险的彻底排除、名字的变更以及其他那些使我充满了窘困、狂喜与困惑的夸张和表达方式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股东：（让我回到我的论点上来）我干的这个行当是一个神秘的事业，虽然它是全欧洲最公平、最高尚的事业，但它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虚伪、最臭名昭著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认识到，这个行业已经变成了一种游戏，而（这个行业所涉及）到的商人也已经成了投机分子，那么，他就可以理解这个自相矛盾的表述的真实意义。如果只是商人变成了投机分子的话，危害本来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更糟糕的是，一部分股票经纪人变成了依靠赌牌骗钱谋生

① 乌拉巴（Uraba）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份。

② 天堂里长有金子枝干与翠玉叶子的大树。对西比莱恩（Sibylines）的评论可能源于一本有关旅行的寓言式的作品。这种文学体裁比较独特——在这类作品中，许多标本是按发现时的年代顺序被编排和出版的。——译者注

的骗子，虽然他们精通诡诈之术，但还是损失了不少的果实！^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值得一提的事实，我们应该注意到，可以将股票交易所里的人群分成三种不同的阶层。“交易王子们”属于第一个阶层，商人属于第二个阶层，而投机分子则属于最后一个阶层。

每一年，大的金融家和资本家都凭借自己继承的或是用自己的金钱购买的股票享受到丰厚的红利和股息，他们并不关心股票价格的涨跌起伏，因为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出售股票，而是在于由红利和股息所带来的收益。对他们来说，更高的股票价格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享受而已，这种想象源于他们“如果自己愿意卖出股票的话，真的可以获得一个高价”的想法。

第二个阶层由那些购买了一份（价值500佛莱芒镑）股票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将其转让过户的商人（因为他们期待着来自印度的好消息或者来自欧洲的签订和平协议的消息）组成。当他们的期待成为现实的时候，当股票价格因此而上涨的时候，他们就会抛售这些股票。他们也可能用现金买入股票，但是当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会尽一切可能立刻卖掉这些股票，以便在晚些时候进行交割（也就是说，对那一天的交割，已经出现过了一个更高的报价）。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害怕（政治或者经济）环境的变化，或者害怕（不利的）消息的到来。他们满足于用自己（暂时性的）投资资金获取（无论多少）收益。他们对自己的风险与收益同样重视，宁可少赚一些，只要那微薄的利润能够得到相应的保证，只要他们承担的风险仅限于清偿这份远期合约中的另外一方，只要他们除了那些不可预见的事件之外不必再为其他事情担忧，他们就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不太丰厚的收益。

投机商与赌徒属于第三个阶层，他们努力地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自己的收益规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已经转动起财富之轮。天哪，他们是怎样一种双重身份的交易商人呀！天哪，这些阴谋家们创造了一种什

① 作者在此沉溺于玩弄文字游戏。因为在西班牙语里，“flor”一词既表示“花朵”，也表示用扑克牌赌博进行骗钱的“诡诈之术”。

么样的生活秩序呀！克里特^①（Crete）的迷宫再复杂，也无法与这些阴谋家设计的迷宫相比。

他们购买1份或者20份的股票（后面这种通常被称做一份“大单”），每当每个月的20号（交割日）来临之时，只有三种可能的清算办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出售股票，并且相应的盈利与亏损取决于买价；第二种方法是将股票价值的4/5拿来作为抵押担保（即使是最有钱的人，这么做也不会危及他们的信用）；最后一种方法就是，买方将股票转到自己的名下，并且通过银行支付——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这么做，因为今天的一笔“大单”的价值比10万个ducat还多。

当清算日即将到来之时，如果买方没有接受这些股票，而这些股票又没有用于抵押担保的话，它们就必须被卖掉。对价格的下降进行投机的投机商（空头）十分了解这种压力，他们会（尽力）促使价格突然下跌，以使这些股票的卖出价格低于购买价格（这样，某些投机商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困境）。

那些身陷困境的人（当然是些不讲道德的人）中，有一些人知道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可以提出以下的主张：“买方没有义务支付那笔购买的款项”或者“我在购买时遭受了损失，因此，我没有义务付钱”。

哲学家：令人可怕的愚昧无知，闻所未闻的疯狂，令人害怕的愚蠢行径！……你断言说投机商没有义务支付他所购买的股票的款项，但是，我却不懂为什么没有这种义务，我怀疑他是否可以向诸如巴特勒斯（Bartolus）或者鲍尔达斯（Baldus）^②这样的司法权威求助。

股东：这正是整个证券业的关键和本质所在。即使是你们的泰利斯^③（Thales）也不可能对如此复杂的事物有任何的了解，从你们那些苏格拉底

① 克里特岛隶属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译者注

② 巴特勒斯（Bartolus，卒于1329年）和他的门徒鲍尔达斯（Baldus）是14世纪非常重要的法官，即使到了17世纪，依然享有极高的声望。

③ 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们那里我们所能学到的唯一真理也只是“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告诉你，雅典的立法者梭伦（Solon）并不是优秀法规独一无二的制定者。弗雷德里克·亨利，奥兰治·拿骚法院（house of Orange-Nassau）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出于明智的考虑），为这些省份颁发了一项法令。按照这项法令，一个人如果把没有登记在定期账户上的股票卖出，并且约定未来交割的话，他将面临以下的危险（因为他出售了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在约定的交割时刻到来之时，买方将会拒绝接收他所出售的股票。^①当投机商通过这种追索权（这种求偿权被称为“诉诸弗雷德里克”，这个术语出自那位大名鼎鼎的统治者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名字）寻求保护的时候，风暴便平息了，攻击也停止了，而骚乱也渐渐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操作发生在股市这个深不见底的危险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里游泳的人们认真地算计着，看水是否淹到了自己的脖子——万一淹到了脖子，他们最多也只能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小命。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毫不愧疚地抓住了自己所能抓到的第一根最好的救命稻草——“诉诸弗雷德里克”，并且大言不惭地宣称“游泳的艺术就是永远回避危险”，而（最令人捧腹的事情是：有时，那些在交易中吃了别人的亏，被别人赚去不少钱的人，在事情过去还不到6个月，就好了伤疤忘了痛，与上次让自己吃亏的人重新做起了交易。“他们在交易中输了钱”这个事实不但帮助他们建立起了从事新业务、新交易的信用，而且为他们损失更多的钱铺平了道路。当损失发生的时候，人们期望受损之人至少应他们将他们手头能够立即拿出的数目用来支付。鉴于他们的伤口还在流血，人们或许还会期盼他们不再遭受新的创伤。尽管那句谚语“那个曾经迷醉的人……”^②谴责这种做法，可是，人类情绪的力量是谚语所无法企及的，无论人们采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杜绝欺诈，也无法抵

① 参见导言。

② 作者在此引用的是一句西班牙谚语的一个片段，原句是“Quien bace un cesto , bara ciento”，意思是“一个人一旦做了某件事，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形成习惯。”

御诱惑。

我并不是说，这种轻率的举动非常普遍（这种举动指的是“诉诸弗雷德里克”和后面的更多的投机行为），有的人仅仅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求助于这条法令的庇护（根据这一法令，卖空合同没有法律效力）。我所说的“走投无路的情况”仅仅是指那些在操作中发生了不可预见的损失的情况。而其他一些人则是在倾家荡产、卖掉了家中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之后，逐渐还清了自己的债务，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且勇敢地面对不幸造成的巨大打击。但是，我也认识一位朋友，一个怪人——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平息和抚慰自己的损失所带来的伤痛。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唤醒像伊利亚斯一样死去的亡灵，而是为了埋葬在世的活人。在半个小时这样的独白之后，他一连发出五六声叹息，这些语调相同的叹息反映出他此时的情绪——更多的是一种解脱，而不是失望之情。当人们问他为什么如此高兴的时候（需要指出的是，他欠了债主一大笔债，对债主做出过某种类型的承诺），他回答说：“恰恰相反，此时此刻，我已下定决心，绝不赔付一个子儿，因为对我而言，我心境的平和与我自己的利益比我的信用和名誉更为重要。”请您相信，听完这个故事，听到他那不按常理出牌、出人意料的想法之后，我不由得捧腹大笑，眼泪差点儿笑出来。但是，事实上，有许多人……像乔纳斯^①（Jonas）一样，在危险之中还打着呼噜。虽然亚当为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耻，可是，在股票交易所里，却有人丝毫不认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去保住自己的金钱是可耻的行为。

哲学家：虽然我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偏好倾向，但是，我不否认，如果没有三重巨大障碍的阻挠的话，我是会去（交易所里）碰碰运气的。

第一道障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踏上这样一艘危险之船，对这艘船而言，每一阵微风都意味着风暴，每一朵浪花都意味着船毁人亡。

第二道障碍，凭借自己有限的资本，我可能会获胜……除非我（愿意）

^① 乔纳斯或叫约拿，是希伯来的先知，常常带来不幸的人。——译者注

轻易地放弃我的名誉。但是，我会感到屈辱……如果没有财富作为补偿的话，这样的一种想法只是徒劳枉然而神志不清的。

第三道障碍，在我看来，专心致志于这种交易对于一位哲学家而言是不值得的。进一步说，每个人都知道我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卑劣，所以，没人愿意信任我，因为他们会发现，我不能为我自己账户上的股票付钱。没人愿意看在我的面子上，像借钱给唐·胡安德卡斯特罗（Don Juan de Castro）^①一样借钱给我，除非我的人格像狄奥尼修斯^②（Dionysius）故事中的艾斯库累普^③（Aesculapius）一样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股东：我根本用不着去请教专业人士就可以打消你的顾虑……第一重危险已经被消除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轮船有绳索的保护，不至于倾覆沉没；有铁锚为轮船定位，使它们能在风暴之中岿然屹立。只要你支付了“期权费”，你所承担的风险就是有限的，而收益却有可能超越你的想象和希望。

有了这些小心翼翼的措施，第二道障碍也是可以跨越的。即使你没有从第一次的“期权”之中获得任何收益，也犯不着拿自己的信用去冒险，用不着使自己的名誉受到威胁——如果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支付“期权费”的话，一般来说，你在倾家荡产之前总会有机会碰上一桩走运的事情，而这件好事将使股价在几年之内保持稳定。由于合约的签订是因为要支付“期权费”，而“期权费”的支付者不仅因为慷慨大方而且因为远见卓识而赢得了声誉。你不断地延长合约的到期日期，并且不断地买入新的合约。到时候，你的一份期权合约就变成了10，而你的事业也将会有一个美好而简单的结局。如果你在交易中（自始至终）运气很背的话，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不可靠的。那么，你应当利用（彻头彻尾）的赌博弥补你在这个“期权费”业务上的缺陷。这种过程已经成了一种通用的惯例，因此，你将找到一个人来为你

① 在这里，德拉维加指的是出生于1500年，卒于1548年的葡萄牙的博学之士、探险家唐·胡安德卡斯特罗（Don Juan de Castro）。

② 古希腊的暴君。

③ 艾斯库累皮亚斯是罗马医神。——译者注

提供信用（并且在你困难之时给你支持，使你不必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就能获取胜利）。

至于第三个障碍，也就是一位哲学家不适宜做投机，这个障碍绝不应该影响你的判断。因为股票交易所就像埃及神庙一样，其中的每一种动物都会被人们供奉，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的确，在赫尔克里士（Hercules）神庙里，是找不到苍蝇的^①。但是，在股票交易所里，却有无数的人试图凭借赫尔克里士的神力去抓住漫天飞舞的金钱。为了这个目的，许多投机分子还到处撒播毒药，布下无形的天罗地网。

如果让我对“期权费”做（更进一步）的解释的话，（我要说）通过支付期权费用，人们支付了一部分费用以保证自己的股票安全，或者保证自己的利润。人们在利害攸关的关键时刻，把“期权”当做一次愉快远航所乘坐的帆船；而在风暴来临之时，又将期权当做保障安全的铁锚。

现在，（我们假定）每股股票的价格是580镑。在我看来，股票价格还会继续攀升到一个比580镑高得多的价位——因为可以预期，将有更多的货船从印度带来更加丰富珍贵的物产；因为东印度公司的生意红红火火、欣欣向荣；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商品信誉卓著；因为公司发放了丰厚的红利；因为欧洲局势太平。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不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因为我担心万一自己的计算被证明是错的，就会蒙受损失，并且遇到非常尴尬难堪的事情。因此，我求助于那些愿意出售期权的人，问他们“对于在未来的某天以每股600镑的价格交割的义务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码”。我与他们就期权费用问题达成协议，立刻在银行将期权费转账（到期权卖家的账户上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的损失不可能比期权费还多。而一旦股票价格上涨，涨到每股超过600镑，那么，我将稳稳当当地将这一大笔盈利揣进自己的腰包。

① 作者在这儿又玩起了文字游戏，因为西班牙语里的“mosca”有两种含义——一个含义是“苍蝇”，另一个含义则是“金钱”。

不过，如果股票价格不涨反跌，我既不必为股价的下跌担惊受怕，也不必为自己的名誉忧心忡忡，更不必因为恐惧的侵扰而失去宁静平和的心态。如果股票的价格在每股600镑左右徘徊不定，我（也可以）改变主意，承认公司和它的股票的前景不如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妙。（现在，我可以从两件事情中选择一件）我（可以提前）出售股票而不承担任何风险，于是，股价下跌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利润。（我也可以买入另一份期权合约，在前一份合约中）接受期权费用的人有义务按照协定好的价格交割股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将使我获得丰厚的利润，我损失的只有红利而已。因此，我现在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做一笔相同的买卖，如果我认为股价有下跌的趋势的话。我现在支付一笔期权费用，买入以特定价格交割股票的权利……在此期间，我还可以不断地抵补自己的头寸。通常，我都可以抓住股价走势的变化做成许多非常漂亮的套利买卖，而不是傻呆呆地等着运气从天而降。但是，在决定了的将来的某一天，接受期权费用的人才完完全全地获得了这笔“期权费用”。他同样承担着风险，在将“期权费”装进腰包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是十分的忐忑不安。

荷兰人将“期权”业务称为“opsies”，“opsies”这个术语来自拉丁单词“optio”，意思是“选择”，因为期权费的支付方有权选择：是向“期权费的接受方”出售股票还是（相应地）^①要求期权费的接受方向自己提供股票。既然著名的卡里皮诺（Calepino）^②从optare（它的含义是“希望”）中派生出了“optio”（“选择”），那么这里显示的是正确的词源。由于期权费的支付者总是希望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即使是在判断错误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避免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做出的选择。

① 如果不加上“相应地”，这句话就有可能被理解成所谓的“跨期套利/双向期权”（straddling），即，通过支付一笔期权费用所获得的选择购买或是出售期权的权利。不过，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不十分明确地提到过“跨期套利/双向期权”。所以，在这里，看来我们最好将这段话理解成描述两种形式的合同。

② 这里指的是出生于1435年，卒于1511年的意大利人安布罗西奥·卡里皮诺（Ambrosio Calepino），他是一部《拉丁：意大利字典》的编者。

第二段对话

2

股东：为了不让您得出“股票交易不可思议，一切都是捉摸不定、靠不住的”这样的结论，有必要提醒您注意并且请您认识到：在交易中，价格的上涨有三个动因，而价格的下跌也有三个动因，那就是——印度的情况、欧洲的政治和对股票交易所本身的看法。对于最后一个因素而言，新闻（之类的东西）往往没有什么价值，因为相互抵消、相互对抗的力量（可能）向相反的方向作用，结果是合力为零。

如果聪明的投机商热切地与印度方面保持联系，并且通过英国的阿勒普（Aleppo）以及其他的途径了解那里的局势是否安全，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进展得是否顺利，它在日本、波斯帝国和中国的经营情况是否乐观，是否有许多船只正在向祖国返航的途中，船上所载货物是否充足，尤其是香料的运量是否很大，等等。事实证明，尽管存在困难，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部信息都是可以搞到的。但是，一个人即使得到了这些资料，如果盲目地相信这些信息，并且据此进行投机的话，他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如果投机商超越自己的财力范围去进行投机，将塞尼卡（Seneca）的那句“适可而止，量力而行”的忠告抛在脑后的话，他势必由于背上沉重的包袱而栽下马来。而这个世界也

将从他的肩头坠落、消失——因为他毕竟不是阿特拉斯（Atlas）。

即使我们假定这些消息都是有利的、正确的（你只能试着从私人信件中获取这样的信息），并且这些捎来“轮船即将到达”的喜讯的信息也来得正是时候。可是，在消息到达你手里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在（东印度公司）对业务做出结论以前，这个不幸的事件可能破坏原来美好的蓝图，使你从满意变得沮丧。因为轮船有可能在海港附近沉没，而你的希望也就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是，即使与印度有关的一切事情都是鼓舞人心的利好消息，人们也仍然不得不详细打探欧洲的情况——眼下是否正在进行不安定的重整海军装备的活动？是否有某种联合正在引起欧洲的重视？是否有其他的（类似战争的）准备正在进行？它们是否会引起东印度公司股票价格的下跌？所以，我们看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投机商仅凭对印度方面的消息的分析就买入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而有些人则依据不太明朗的欧洲局势就卖出股票。在后一种情况下，要从进口获取（丰厚利润的）回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另一方面，随着税收的增加，（在欧洲）交易成本也增加了。即使你拥有了解王子们的最深藏不露的意图的最好办法（除非是征服巴比伦这样的事件，发生仅仅两天后，住在郊区的人们就都已经了解了有关的情况），投机商的行为却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决定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

在股票交易所发生的困难以及耸人听闻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总结……（投机中的）**第一条原则就是：绝不向任何人建议买进或是卖出股票。**因为，万一你的眼光不是那么准确和敏锐，最好的建议也会变成馊主意。

第二条原则是：见好就收，把握好已经到手的利润，切勿为尚未得到的好处而伤神。因为鳗鱼逃跑得可能比你想象的还快。享受可能得到的，而不奢求有利的局面延续不断，不寄希望于好运永远陪在你的身边，才是一种更加明智的态度。

第三条原则：交易所里的盈利就像喜欢恶作剧的妖怪们的财富——它们一会儿是红宝石，一会儿又变成了黑色的煤炭；一会儿变成了钻石，一会儿又变成了燧石；时而是清晨的露水，时而又变成了泪珠。

第四条原则：不论是谁，如果想在這種游戏中获胜，都必须具备耐心和资金上的实力。因为股票的价值几乎从来就不会老老实实在地保持稳定，股市里的谣传也几乎从来就是空穴来风。面对不幸的暴风骤雨仍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一点儿也不畏缩怯懦的人，就像面对闪电却勇敢咆哮的雄狮，而不像一听到雷声就落荒而逃的红色雌鹿。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永不放弃希望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之外，你还必须在开始拟定计划的阶段就保证充足的资金以供交易操作之用。随着情况的发展、形势的变迁许多人遭人耻笑，是因为：这些投机商里，有的以梦想作为其行动的指南，有的以预感作为其行动的依据；另外一些人则要么以幻觉为行动的指南，要么以情绪或心境为行动的前提；无数的人更是以妄想作为操作的根据。

商人：与这些诈骗有关的人（看起来）酷似那些相信自己体内有一个会给自己启迪和建议的神灵的英国教友派教徒[⊖]（English Quakers）。（根据你的描述）股票交易所里的人们愚蠢透顶，出尔反尔、变化无常，利令智昏、骄傲自大。他们会在毫无来由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卖出股票，也会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买进股票。他们会在自己没有（优点或者）缺陷的情况下发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他们会假想有神灵在劝说自己，但是这个神灵（看起来）有时是骗人的亚伯（Ahab），有时则是暴躁易怒的索尔（Saul）。

股东：你的推测无可争议，有个投机商人做梦梦见“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巴比伦国王，耶路撒冷的征服者）的塑像，因此立刻卖掉了所有的股票。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梦境的：因为有人用一颗卵石投向

[⊖] 是基督教的一支，不做正式的礼拜，反对在任何情况下采取暴力或者诉诸战争。——译者注

“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塑像，所以东印度公司将会失去与中国做生意的机会，当印度船只到来的时候，股市必将发生崩溃。

（另一位）投机商人走进交易所的大厅，他困惑茫然，不知道哪一种思想在误导着自己，也不晓得哪一种想法是对的。这时，他突然来了灵感，大叫一声“Vende los kirios.”^①（这是股票交易所里的一个术语，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的理性甚至比不上观察一朵白云的飘移或是观察街上经过的一队柩车时的理性。

另一位“斗牛士”出场了，他急不可耐地想让自己保持镇静。他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最好地保证盈利。他咬着自己的指甲，掰着自己的指头，闭上自己的眼睛，踱着自己的四方步。一边踱步一边还自言自语，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了四遍。他把手放到面颊上，好像牙痛的样子。他一脸深思熟虑的表情，伸出一个指头，刮了刮自己的眉毛。所有这些表情与动作都伴随着一阵神秘的咳嗽，好像他在用力摆脱命运之手的操纵一样。突然，他冲入人群，打着粗暴狂野的手势。只见他一只手打着响榧，另一只手的手指做着一一种傲慢的手势。他开始交易股票，就好像它们不是股票而是乳酪蛋糕一般。他购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节制，^②尽其所能地买入。他购买这些出现在他面前的股票并没有其他的动机或者根据，只不过是因为胜利的号角已经在他的耳畔响起。当他希望扭转局势，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之时，就会对股票交易所产生一种特殊的影响。因为交易所里的人们相信，他的号角既可以让他办傻事，有时也可能让他办点儿聪明事。

又有一位投机商走进了人群，看上去他好像十足冷静。突然，他开始流露出激动与兴奋的神色，开始不计得失地大量抛售自己的股票——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用手指捏着自己的衣服纽扣数数，结果发现纽扣的个数不是偶数。如果他赢利了，他会认为每一颗纽扣都是一朵玫瑰花蕾；而如果他输了的

① 荷兰语的版本为Verkoop de kirien。

② 德拉维加在这里用的短语是a resto abierto，在后面他又用圆括号插入一句“那是我们的纸牌作弊高手们（card-sharps）所用的术语”。

话，他会把这些纽扣都当成扎手的荆棘。

投机商们为这种过火的情况寻求着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在某些方面，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当股票价格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却突然上涨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找出名目繁多的理由来加以解释；而对于原本上涨的股票却突然下跌的现象，他们同样能够列举出千奇百怪的原因。通过“antiperistasis”^①，学者们认识到，对立面总是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当空气与火苗一起搏斗的时候，会有璀璨夺目的火花迸发出来，具有更大的热量……因为（投机商人们）害怕事情的结果（与他们的期望相反），所以，他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获取成功。

不过，有些时候，股票价格也会呈现出一种平静的状态，交易所既不为利好消息所蛊惑，也不为利空消息所困扰……突然，一朵乌云出现，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到来。准备卖出股票的人们兴高采烈，他们开始大谈特谈形势的变化无常以及可能出现的灾难。但是，多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抬高了股票价格，以抵挡即将爆发的洪水。他们抗拒人们对其智慧和能力的横加指责，他们就像在地狱（Hades）大门外遇到毒蛇以及半人半马的怪物一样丝毫不被焦虑麻痹，毫不畏惧地拔出自己的长剑。冲突在继续，直到最后，股票的价格变得比混战以前还要高，因为那些没有怀疑到会有阴谋，没有料到多头和空头双方会争斗，仍然按照常规操作的交易商们，被这场袭击惊醒。他们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件事中，并为自己的弱势地位而感到骄傲。于是，原先的障碍如今却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而原来似乎注定会把购买股票的多头扔进绝境（abyss）的力量反而成了鼓舞多头士气的因素。

尽管存在着这些荒唐、这些混乱、这些疯狂、这些对盈利的怀疑以及盈利的不确定性，人们仍然有办法打探到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们的政治观点或者他们对交易的看法。那些把刻意观察这些事情当做自己的事业，没有盲目的热情，也没有令人恼火的固执己见的人们，凭借这种素质，将会无数次

^① 出自希腊语，意思是“反作用”（counteraction）。

地发现正确的事情，尽管并不是每一次都准确无误。然而，在对他的观察进行总结的时候，他将会发现，没有什么透彻的观察可以使这场游戏神圣化，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科学性。既然，在形势不妙的时候，（交易所里的）有钱人也在寻找着相反的结果，既然交易所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亚洲人治疗麻疯病人的方法相同……也就是用毒药疗治……那么，利空的消息也不算什么要命的消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赌博这种地狱里面有两种典型的针锋相对的投机商人，他们所做的决策是针尖对麦芒，就像他们彼此对立的命运一样。第一类投机商人由“多头”或者“Liefhebberen”（在佛莱芒语里，它的意思是“情人”）组成。他们这类交易所的成员以购买股票开始自己的运作，就好像他们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以及东印度公司的情人一样。他们总是期盼着股价上涨，他们希望利好消息会刺激股市突然上扬，并且带动股价迅速攀升。第二类投机商人由空头或者“contremine”（人们这样解释这个名称的由来——印度被人们视为一座矿藏，而这部分人所做的正是努力挖掘这座矿藏，使之枯竭）组成。空头开始操作的第一步通常是卖出股票，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胜过雅典的泰门^①（Timon）——他之所以热爱阿尔喀德斯，只是为了分担他的使命，也就是说，成为他自己祖国的破坏者。人们必须像躲避瘟疫一样来躲避这些空头，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采取他们的立场，举例来说，为了抓住一只Bichile（荷兰的儿童用语，意思是“蝴蝶”）。最后这个术语是用来特指一个可以迅速获利的机会，如果你没有当机立断，迅速抓住这只“蝴蝶”的话，这个宝贵的机会就会从你身边翩然飞走。而且，如果你没有立即将它放入包里“据为己有”的话，它也会扇动翅膀从你的手心里逃得无影无踪。

多头就像长颈鹿一样，对任何事物都淡然处之，绝不会被任何事情吓倒。多头也像《科隆的选举人》（*Elector of Cologne*）中的魔术师，在魔术师的

^① 希腊哲学家，愤世嫉俗者。——译者注

镜子里，女士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比实际美丽迷人得多。多头们热爱每一件事物，他们赞美每一件事物，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夸大每一件事物。既然比亚斯人（Bias）在“普瑞之围”（the Siege of Priene）中用表层覆盖着小麦的一堆堆沙子欺骗阿尔亚特人（Alyattes）的大使，向他明示：如此富庶的城邦绝不会因为粮草枯竭而投降的，那么，多头也会如法炮制——他们让公众相信，他们的举动意味着财富，草垛上会长出来粮食。当他们受到毒蛇袭击的时候，会像印度人一样，将毒蛇视为精致而可口的美味……他们不会对火焰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不会被彻底的失败击倒。

与多头相反，空头们完全被恐惧、惶恐和紧张所控制。在他们的眼里，杯弓蛇影——野兔成了大象，帐篷里喧闹的宴会成了造反闹事，昏暗的阴影简直就是混乱来临的前兆。但是，如果有人将非洲的绵羊拿来当驴子使唤，甚至有人把阉割的公羊拿来当马乘骑，那么每个侏儒在空头看来都可能像巨人一样高大，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尤迪卡斯（Eudicus）告诉我们，在一个名叫海斯地奥地斯（Hestiaetis）的地方，有两口水井，一口水井的名字叫“塞伦（Ceron）”，另一口水井的名字叫做米兰（Melan）。如果喝了第一口井里的水，绵羊就会变成白色；如果喝了第二口井里的水，绵羊就会变成黑色；而如果绵羊们既喝了第一口井里的水又喝了第二口井里的水，那么，绵羊的毛色就会五彩斑斓，各不相同，有趣而又赏心悦目。^①如果你希望在交易中获得成功，就不要一个劲儿地喝“多头”井里的井水，因为“变白”不会给你带来好处。但是，你也不要一门心思地只喝“空头”井里的井水，因为变得像乌鸦一样黑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利益。简而言之，你既不要永远做多头，也不要总是做空头，而是应该顺其自然，始终对上涨进行投机，偶尔对下跌进行投机。因为经验证明：多头往往是胜利者，而空头却常常认输出局。

^① 这个故事出自普里尼（Pliny）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第31卷第九章。对于此处的尤迪卡斯（Eudicus），普利尼并没有指出它的出处，他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东印度公司就像一棵（神话中的）不死之树，每当旧的枝干被砍断，它总会出人意料地（迅速）长出新的枝干。因此，（永远）没有理由担心东印度公司的经营状况，因为它会凭借新的发展迅速战胜困难与险阻。

因此，你所要做的就是，遵循这些信号灯的指示，亦步亦趋，这样将可证明你的前途一片光明，不论你的行为是诚实还是虚伪。如果你的动机不是那么单纯，那么，在形势变得对你不利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弗雷德里克·亨利的法令。一位诚实的买家既可以接受股票的交割，也可以将它们抵押，而（最终），（交易中的）利润几乎是确定的。只有一场战争（但愿上帝能够阻止这场战争），并且只有一场激烈的战争，才足以使交易操作处于危险之中，并且使我们感到恐惧。

你必须费心留神各种潮汐，并且按照风向来调整你的船舵。在此之前，有20位投机商人控制着股票交易所，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情况也能对股票行情产生影响——由于人们有某种忧虑，股票价格下跌30%；由于一封来信，又下跌了50%。今天的投机商和商人（对商人来说，玩这场游戏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娱乐，而不是出于贪婪，这一点区别很容易看出来）一样多，他们由于错误和不必要的恐慌而饱尝痛苦。由于这个缘故，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股票视为珍宝，一旦发生实际的损失，他们就会发现，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加让人痛心的事情了。但是，对威胁感到恐惧意味着双重的悲哀和痛楚——一次在事发之前，一次在事发之后。

股票高昂的价格引起众人的注意，对于如此高价位的股票，他们还没有司空见惯。但是，有理性的人并没有必要为此担忧，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头寸与日俱增，而荷兰这个国家也变得愈发富裕昌盛。来自固定利率的收益正在减少，因为难以找到投资的渠道，正常贷款的利率一年只有3%。如果借贷者收取担保的话，年收益率就只有2.5%了。因此，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不得不买股票。当股票价格已经下跌的时候，有人甚至都不抛售，就是为了避免损失。但是，当股票价格上涨的时候，他们同样不会抛出（以保护自

已获取既得收益)，因为他们不知道除了股票以外，还有什么投资能够更好地保证他们收回本金。此外，在这种投资中，他们可以通过最迅速的（可能的）方式收回自己的资金，因为在（股票交易所里）生意保持活跃状态的情况下，人们总是可以控制自己的资金。

迅速变现的可能性通过下面的方式提升了股票的价值——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里，东印度公司股票的要价比在所有其他的交易所里都高，^①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这些省份的其他地区都不存在投机活动。对于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而言，除了费用较低外，股票的红利与外省的商会都是一样的。不过，西兰德（Zeeland）商会的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报价比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报价要低150%，比因克修森（Enkhuysen）商会低80%，比霍恩（Hoorn）商会低75%，比鹿特丹商会低30%，比戴尔夫特（Delft）商会低70%。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股票）千变万化的价格没有（必要）遵循莫林河的流向（莫林河由西向东奔流两周之后再由东向两奔流两周）。瞬息万变的股票价格与波斯的水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波斯水井里的井水上涨30年，接下来的30年又会下落。股票价格的下跌不需要有一个限度，同样也可能无边无际地上涨。当一位商人在印度的果阿（Goa）买到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并且将它从印度带回欧洲之时，法兰西国王厉声责骂他道：“你怎么可以拿自己的全部家当在这块石头上面冒险呢？”这位商人礼貌而机智地回答道：“我只不过是时时刻刻把陛下您放在心上罢了。”因此，你没有必要为过分高昂的价值而担惊受怕。从来就不缺少痴迷股票的“交易所王子”和“操纵之王”。你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投机分子，也总会有买家从你手中买下你急于出手的股票，解除你的焦虑。

对一件事的期望比这个事件本身对交易所的影响更深。每当人们期盼将会分配丰厚的红利，或者期待着大量进口货到来之时，东印度公司股票的

① 荷兰几座城市的股东组建了所谓的商会（chambers），并且通过选举官员的方式来参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不能将一个商会里出现的股票过户给另一个商会的会员。

价格就会上涨。但是，如果这种期待变成了现实，股票的价格通常都会下降——因为对振奋人心的进展的欢欣和对幸运眷顾的欢呼都已一股脑儿地被抛在脑后了。这个现象有其天然的机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情况紧急，空头都会害怕经历风雨，他们不敢亲身尝试。与此同时，多头对交易状态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些事情总是令人欣喜的；他们是如此充满（不假思索的）信心，以至于那些不太有利的消息也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更不会引起他们的紧张与焦虑。但是，如果有轮船到达或者发放红利的消息传来，空头们就重新焕发出勇气。他们推测：在几个月之内，买家，即多头，都不可能指望还有什么非常有利的事件发生了。因此，最轻柔的微风也足以使树叶颤动，最小的阴影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恐慌——因此，难怪股价下跌了——因为它们被一方抛弃的同时又受到另一方的攻击，在这样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股票价格除了下跌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聪明的人会用娴熟的技巧，巧妙地利用命运所赋予的优越条件。……因为，如果发生突然的变故，（投机分子）几乎不可能将自己的双脚（从火中）拔出。处在巨大困难之中的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股本，全身而退就算万幸了。

商人：（从你的描述中，我得出的结论是）股票交易所里使用的语言并非精挑细选的。我注意到，股票交易所里所用的语言是在希腊语之上嫁接了阿拉伯语，即使是最有经验，阅历最丰富的人也需要借助一本新的字典的帮助才能弄明白它们的含义……这里的术语和表达没有一个不是像上帝一样晦涩难懂。当我在股票交易所里听到多种语言的交叉融合，听到各种声音混杂其中，我真的以为自己置身巴别塔[Ⓐ]（Tower of Babel）里。有时，他们使用像“opsie”（期权）这样的拉丁单词，有时则用“bichile”（蝴蝶）这样的荷兰单词，而有时又使用像“surplus”[Ⓑ]这样的法语单词。

股东：至于交易所里语言的混乱，我可能承担什么责任。行话之所以

Ⓐ 《圣经》里提到的因为语言混乱而未建成的通天塔。——译者注

Ⓑ “surplus”（盈余）用以指合同结算时的差价。

被创造出来，完全是做生意的需要，随后，它们被约定俗成，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我以“成本价”兜售这些短语，不赚一分一厘的“利润”，既能省下发展这些股市习语的精力，也无需对它们加以解释。

哲学家：（让我们还是回到股票交易所的惯例上来吧，我有一个问题，你提到）由于出人意料的消息的到来，那些认为消息对己有利的人买进股票，而那些认为它不那么有利的人则出售股票。（对于初涉股市的新手或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人而言）在与买方交流也与卖方交流，并且权衡双方的观点和理由的努力之后，再参加最有利的课程的学习，（以便）从事这一类最有前途的业务，才是尤其明智的。（这种观点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相悖）我想问一句，投机商们是否有义务告诉我他们的秘密，换句话说，投机是否可以建立在对这样一番交流的希冀之上。当你眼睁睁看着一个发财的机会眨眼之间消失得踪影全无时，浪费时间去与别人交谈怎么会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呢？

（但是，在你回答那个问题以前，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举例来说，看起来）这有悖于“当空头做空的理由不复存在之后，空头就不应当抛售”的哲理——因为哲学家们教导我们说：当原因消失的时候，其影响和结果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空头继续固执地不断抛售，那么，即使在原因消失以后，其结果仍然存在。此外，虽然哲学教育我们：不同的结果源自不同的诱因，但是在股票交易所里，根据同一条消息，有人买进，有人卖出。因此，在这里，一个原因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不过，（在股票交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并不违反我的哲学，其中的一项活动就是多头对空头的进攻所采取的顽强抵抗。你对此已经做了精彩的描述，结果就是，即使危险巨大，股价仍然上涨。……我也不奇怪，双方会用语言、用手、用脚来交战，他们还会殚精竭虑，以自己的财产作为赌注，冒险一搏……（既然情况如此，我认为我不应当）奇怪的是，有的投机分子会认为某条新闻有利可图，而其他的投机者则会认为同一条新闻无利可图。境由心生，同样的事实会随着心境的不同而发

生改变，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东西。

你建议大家少做交易，这一点我很认同——它符合我的脾气。此外，哲学教导我们……贪多嚼不烂……（因此）满足于（有限的）利润是非常明智的，即使一个人没有得到所有（可能到手）的财富和好处也不必惋惜。在股票交易所里，投机者将失败称为“脸上挨了一巴掌”。我认为那些让自己挨上这样的几个巴掌的人是傻瓜。

最后，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总是倾向于股价的上涨，尽管我也会与空头交谈，他们始终是悲观论者。我希望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不会受到傻子的干扰。

股东：我决定将这些对话翻译成法语，以使有关股票交易的知识^①得到普及，成为常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写过有关的东西。我认识到，有许多以双关语为基础的段落无法翻译，因此，我认为应当加入一些传闻轶事和陪衬修饰，以便使用一种文雅而和谐的表现方式来表达晦涩难懂的知识 and 深邃的思想。

因为股票交易所里的笑话——只要这些笑话不会令人讨厌的话——是这个行业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方面，所以，在对交易所的描述中提到各种暗讽并非不合时宜。我并不打算冒犯哪个人，我只是在描述，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我是在无的放矢。因为我的攻击并不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个人，所以，我的乱箭也不可能射中任何一个特定的目标。

我已经答应过要对股票交易所进行一番实事求是的描述，可是，如果没有对事实真相准确无误的复制的话，我是不可能做到真实地描述的。严厉的批评家们也许会回答说：“不是那些掩盖真相的人们，而是那些篡改真相的人们违背了真相”，而我在这儿请你们相信，我绝对不会隐瞒我所知道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细节。因此，只要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是不体面的，我就会虔诚地恪守这一义务。

① 普林西姆（Pringsheim）在其介绍德拉维加著作的德文译本的《导言》中声称：“作者的这一说法不是十分的准确，因为在1642年和1687年出版过一些涉及股票投机的小册子。要么作者根本不知道这事儿，要么作者认为这些小册子太不切题，因此没有提到它们。”参见Die Verwirrung der Verwirrungen……，第89页。

第三段对话

股东：在这个辉煌壮丽的世界大舞台上，人类上演了众多的戏剧，并在其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其中最伟大的喜剧是在证券交易里完成的。在那里，投机家们以奇特无比的方式斗智斗勇，在阴暗的角落进行着他们的交易，比如欺行霸市、争吵、挑衅、闲谈、用尽心机地捣乱、冲突、碰撞、欺骗世人、出卖朋友，甚至上演更多的悲剧。霍勒斯（Horace）在一首歌中赞扬一个傻子甜美的梦想，他梦想自己常常坐在一个美妙的剧场里，所有的演员都围在他的身边取悦他，跌宕起伏的剧情使他身心愉快。

Qui se credebat miros audire tragedo

In vacuo Laetus sessor, plausoque theatro. [⊖]（即便是瞎子也能在剧院里听悲剧。）

⊖ 这句话摘自《霍勒斯诗文》（*Horace's Epistulae*）第二卷，第二册，第129页。

没有什么比观看喜剧更让人开心的了——它让皇家学会院士的天才得到充分的表现。

这样，整个证券交易所在戏剧《混乱中的宫殿》中得到了再现，股市里的多头在戏剧《越是想赚更多的钱，吃的苦头越多》中得到了再现，股市里的空头得以在戏剧《野兽、闪电和石头》中再现，对股市漠不关心的平民百姓出现在戏剧《傻瓜的游戏》里，本领高超的赌徒们出现在戏剧《只要荣誉不要命》里，弗雷德里克之类的法学家们在戏剧《名字的幸福与不幸》里有了代表，走运的投机商们在戏剧《愿圣子赐福于你》里有了化身，而不走运的投机商们在戏剧《命运的转折》中得到了再现。最后，尽管我准备演出《奉献所有以及无所奉献》，我还是想让你演出《刮目相看者》。因为我把一切我所知道的都已经教给了你，但我又确信，在我准备给你任何东西时，我又不能给你任何东西。^①

哲学家：好吧，那么我将出演《一夜之间》^②，因为就在昨天夜里，我平和的心房被打乱了，我心乱如麻；我的安宁镇静变成了绝望；敬畏变成了讥笑；学识变成了愚昧无知；冷漠变成了狂热；尊敬变成了忤逆。一个投机商欺骗了我，一个叛徒出卖了我的声誉。

碰巧，有几位朋友谈到了股票，据他们说，股票的现行价格是576镑。对于胆子小的人来说，这个价格过高；而对于爱冒险的人而言，这个价格恰好合适。听到我的看法得到了肯定，我很高兴。这是因为清楚地记得别人

① 德拉维加可能在这里列举了一些确有其事的西班牙戏剧，不管怎么说，前面五部可能是安东尼奥·米拉德阿姆斯丘（Antonio Mira de Amescua, 1570—1640）所写的《这座错乱的宫殿》（*El palacio confuso*），盖乐诺姆·德维雷赞（Geronomo de Villayzan, 1604—1633）创作的*Sulfrir por querer mas*，佩德罗·卡尔德龙德拉巴卡（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 1600—1681）创作的*La Fiera, el rayo y la piedra*，弗朗西斯科·德罗亚斯 Y. 泽瑞拉（Francisco de Rojas y Zorilla, 1607—1648）创作的*Entre bobos anda el juego*以及胡安·伯里兹德蒙太班（Juan Perez de Montalban, 1602—1638）创作的*No bay vida como la bonra*。

② 安东尼奥·科乐（Antonio Coello, 1600—1653）创作了一部同名戏剧，它的西班牙语剧名为*Lo que pasa en una noche*。

建议我买进上涨的股票，而且因为我想支持那些热爱国家和东印度公司的派系。我想以586镑的价格从正在宣称这个国家即将毁灭的空头那儿买进股票，来表明我的态度。我刚刚报出价格，迅即就有人兴奋地告诉我说股票已经是我的了。此时，噪音、叫喊声以及其他玩家因为我的胆大妄为和他们的焦虑而纵情大笑的声音振聋发聩。我的脸颊发红，不是因为我的愚蠢，而是因为我的愤怒与羞愧。

整整一夜，我夜不能寐。这一晚总算熬了过去，可我还一个劲儿地惦记着他们从我口袋里拿钱。一大早，我就打听我买的股票的价格，一个无赖通知我（我不知道他是严肃认真的呢，还是故意让我难过），这只股票已经跌到（5）64镑了，而且很快会跌到（5）20镑。当时我没有倒地而亡，甚至没有感到头晕目眩，真是一大奇迹。

商人：恶棍说，我们肯定是被有毒的大蜘蛛咬了（因为我们兴奋过度），将话题转到了“期权”方面。^①他们发现我愤愤不平，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的哲学家（朋友）的苦恼。在怒火的驱使之下，我问：“在10月份以每股（5）80镑交割的期权费用是多少？”其中一个坏蛋狡猾地回答说，他不会束缚自己，指定任何一个确定的价格，而是估计期权费用的变动幅度大概是20个百分点。我的还价是15个百分点，对此他表示接受，但是他补充说，他冒这个风险是对我的一种恩惠。虽然，我当时对他的这番好意感激不尽，可是今天有人告诉我，期权费用的变动幅度最多也不会超过9个百分点。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令人不开心的事情，我还是安慰自己。我不会像我的哲学家朋友那样从高处跌下，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怎么赔，其范围都只不过是6个百分点，而我的哲学家朋友已经赔进去了十几个百分点，而且不知道今后还会跌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久。^②

① 这里商人使用代词“我们”，表明他是这个团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团体也就是那“很少的几个朋友”，哲学家在前一天晚上和这些“朋友”一起聚会过。

② 这种说法似乎同相应情形中的愚蠢所造成的损失的数量有关，哲学家为这种股票支付了586镑，而当时的股价只有576镑；所以一开始，他的票面损失就有10个点。另一方面，商人本来可以按照上下不超过9个百分点的期权价格交割，但他却以上下相差15个百分点的期权价格给出报价；因此，由于缺少知识或是粗心大意，他一下就赔了6个百分点。

股东：为了不让你过于自吹自擂，我想告诉你：他摆脱苦恼的速度比你要快。在证券交易所里有一个不可违抗的惯例做法（一度还只是一种习惯），那就是：如果一笔没有按当天价格成交的交易所含的误差范围在交易平价的10%以内，出错的交易方就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万一有意外的消息到来，不择手段的交易商可能按照高于或是低于当天的价格自行定价，并且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吸引更多的买方和卖方。但是，一旦交易的对方发现自己出错，就有必要对交易加以确认，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有利。尽管面对无法预见的新闻，市场的反应（事实上）可能差别很大，但是惯例做法已经引入了前面提到的确定的规则。所以哲学家不但可以不被强迫以高于576镑的价格取得股票，而且他还可以拒绝执行交易。另外，因为这笔交易是他的第一次交易，而且根据一般的常识就能断定他不会是一个商人，所以要取消这笔交易并且避免损失是相当容易的。

（诚然，交易所里有一种普遍的诚信和探险的氛围。）比如说由于意外消息的到来而交易股票并仓促售出是非常值得的。不会有人改变他在一时冲动之下所做出的决策，即使有的时候价格相差50个百分点，商人们仍然能够严守已经许下的承诺。而且，尽管商人们在没有从中斡旋的经纪人的见证的情况下做成了巨额的交易，也不会发生混乱和争吵。

这种诚信、合作和准确是值得钦佩和令人惊讶的。但如果你要履行未被列入证券交易所规则的支付义务的话，你的信用不会受到威胁，你的信誉也不会降低。这不是宽容和大度，而是神志不清；这不是守时，而是浪费；这不是勇敢，而是堂吉诃德式的愚蠢。

可以将交易所里的交易比作一场博弈。其中一些玩家的行为像是王子，他们将力量和细致融合在一起，让亲切随和与智慧相互交织；但是也有一些失去信誉的游戏参与者；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在游戏开始之前就对交易失去了热情。

一位观察了交易所的运作并且研究过其中状况的见证人认为，证券交易

所里的赌博和死神一样，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

（我还想说的是，）股市中20%的跌幅不算很大，也不能被看成是什么巨大的打击……你没有必要绝望，也没有必要哀叹你的命运——因为股票可能在一夜之间下跌20%，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上涨50%。

（但是，一个人最好还是永远不要被卷入股票投机里去。）假设“一个人可以（暂时）从交易所中全身而退”是大错特错的，认为“你同其他投机商停止接触以后可以获得一种平和的心态”也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厄运总是追随着你，那么即使是在高山峻岭中，厄运仍然能够把你找到，而在那里，闪电可能将你击中，野兽可能将你袭击……另外，认为“你在证交所中尝到甜头后见好就收”的想法也是十分愚蠢的，一个人一旦进了证券交易所这个迷宫，就会身陷囹圄，永久处于亢奋状态。而开启牢门的钥匙在大海的深处，你永远也别指望打开牢房的大门。

商人：我对您的一些看法表示反对，不过，暂且把它搁在一边。我现在想请您解释一下“西方”和“东方”的含义。

股东：“东方”和“西方”是荷兰语的缩略语。直到目前，我们提到的“公司”都是指“东印度公司”，因为它的业务在东印度。另外，还有一个公司，称做“西印度公司”，它的活动领域在西印度。

后一家公司（西印度公司）创立于1621年，所投入的本金总计达120~130吨黄金。由于它的贸易发展得很快，股票价格很快就与“东方公司”持平了。西印度公司的股票是稀罕的宝贝。可是命运多舛，丁香不见了，巴西脱离了殖民，财运和繁荣消失了，信誉受到了重创，大众舆论陡转直下——股票跌到31/8个百分点。即使如此，卖方还是害怕损失进一步增大。

为了弥补损失和避免迫在眉睫的崩溃，在1674年，Bewinthebberen（荷兰语，意思是“董事们”，这一头衔被两家公司采用）提出重组“东印度公司”的建议。通过重组，在利益各方的捐助之下，处于危险境地的资金将会得到增长。这种援助办法被称为“a Bijlegh”。那些不同意重组方案的人士

由立法当局强制命令他们出售股票，但他们达成了某种妥协，这些股票可以在缴纳少量转让费之后转让给其他成员。

东印度公司有三种责任：第一，对股东负责，无论股东所持的股票是从“原始认购者”那儿继承的，还是买到的；第二，应让“待偿存款所有人”满意，“存款所有人”是指那些以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公司的人，他们虽然富有，却对这种利息心满意足；第三，对未清偿的以船只作为抵押的冒险的贷款负责，这种贷款是用于拓展贸易的。

在重组过程中，股东必须缴纳4%的现金，按照旧股名义价值的15%换取新的股票。存款所有人必须再追加8%的现金，才能收到相当于其求偿权名义价值30%的新的股票。旧的海洋贷款被细分为新的贷款，老股东必须缴纳8%的现金才能收到30%的股票，而近期的贷款人可以收取50%的现金和50%的股票。

为了完成重组，整整花掉了70吨黄金，这还是在完成了以上步骤之后才进行的。其中，股东受益最少，因为他们既关心公司的盈利，也与公司的亏损有关；而存款所有人由于享有的利息比较低，而且公司的盈利和亏损与他们也都没有关联，因此相对而言他们流动性更高的债权的损失也较少。可是，以船只作为抵押的贷款因其日期比存款距离目前更为接近而得到了更多的优待。出于与此相同的原因，老的债权和新的债权所享受到的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这点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经过这样的重组，东印度公司重获新生。但是，在过去的14年中，公司派发的利润是如此之少，以致全部的股息和红利还没有超过26%。股票价格之所以能够维持在110%的位置上，仅仅是因为人们期望着从几内亚（Guinea）和卡拉索（Caracao）返回的船只能够带回大量的货物。尽管合约（即将被提到）当中也有一些不足，人们还是相信，业务发展前景光明。

这份合同（公司最重要的（目前的）业务是以这份合同为基础的）规定：几个荷兰商人有义务按照设定的价格，从几内亚海岸带到卡拉索尽可能多的

黑人奴隶。由于这些商人又把这些黑人奴隶卖到（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所以，他们赚的钱并不比东印度公司少——为了运作这样的生意，公司会委派代理人驻扎在西班牙，并代表公司向西班牙国王纳税。

这种安排为这些股票的投机提供了主要的基础，股票（的价格）可能会受到由于运输风险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在所难免的）税收增加……等不利因素所造成的欧洲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利影响。

（我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尽管每个公司都关心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仍然存在一些特定的因素，使两只股票受到不同的影响，从而上升或是下降。另外，还出现了一些集团（这些集团通常被称为“卡巴拉斯”（Cabalas），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否是由“cabal”^①或者“cabiloso”^②演化而来）。通过这些集团的操纵，“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有可能免除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以加强自己在“西印度公司”中的力量，反之亦是如此。如果证券交易所放弃一只股票，转而喜欢上另一只股票，或者如果为了推动第二只股票上涨，而大量卖掉第一只股票以套取现金并且直接买入第二只股票，或者通过股票质押的方式向其他的投机商人贷款的话，投机商就会担心第一只股票的突然下跌。由于害怕遭受进一步的打击，他们变得更加紧张，从而也更加迅速地卖出股票。人们失去了对股票的热情，股价也就自然下跌了。

“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不像“东印度公司”的股票那样以500镑（名义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易，而是以1 000镑为基础进行交易。（准确地说）尽管它们的价值，大大低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如果不是它们的交易风险也低于后者的话，曾经在短时间内，它们还是以500镑被买卖的。但是，某些贪婪的商人要求经纪人削减一半的经纪费用（交易的每一方只有1.5荷兰盾，而不同于“东印度公司”的3荷兰盾）。经纪商们反对这种要求，并且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了干同样数量的工作能够赚取6荷兰盾，每份合同的金额不能少

① 这个西班牙语单词的意思是“完成、结束”。

② 这个西班牙语单词的意思是“参加阴谋活动的人”。

于1 000镑。尽管乍一看费用很高，但是考虑到股票的价值，再考虑到签订合约的便利，可以想象得出一些经纪人对他们的委托人是多么得忠心耿耿，经常将他们的委托人称为主人。经纪人是多么得勤勉敬业，多么得热心活动，多么得充满热情，多么得谨慎警惕，即使经纪人只有一点儿（得到认可的）忠诚，他们的客户也能享受到“物超所值”的服务。

不过，既然这项业务里使用了与对“东印度公司”贸易时一样的诡计，既然对这些股票的交易也是诚实和欺诈并存，我们下面要继续关注的是这个城市里最常见的，也是享誉世界的第一类交易诡计。

商人：如果不会给我们的朋友造成太多麻烦的话，我想了解一下证券交易的地点、方式以及交易是如何完成的。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创新以及混乱，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和交易的种类有关的情况。

股东：交易太频繁，连续不断，很难确定它究竟会走向何方。丹姆（Dam）和交易所是人们最常光顾的地方。在丹姆，交易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二点。而在证券交易所，交易是从上午十二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

丹姆是一个正对着宫殿（市政大厅）的广场。在荷兰语中，丹姆是指防范洪水泛滥的堤坝。人们在丹姆建起水坝，防范阿姆斯特河对城市的冲击，流经此地的河因此而得名。事实上，阿姆斯特丹原来的名称是“阿姆斯特·丹姆”（“阿姆斯特水坝”的意思）。

在丹姆广场上，交易从早上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证券交易关门^①的时候。那时，大批人们急匆匆地赶来，谁都不想因为迟到而被罚款。关门之后，交易在证券交易所继续进行。即使疲劳到了极点，人们也不肯放下交易的利器；即使兴奋到了极点，也不允许自己稍作休息。

证券交易所是一座周围有许多柱子围绕着的封闭大楼（一些人倚靠在这些柱子上面，而另一些人则躲在柱子后面）。解释“交易所”这个名字可以

① “关门”在这里的意思是“只有支付罚款以后才给开门”。

通过以下的事实：它像一只钱包一样，将交易商们包围起来；或者说因为在这儿每个人都心急火燎地努力要把自己的钱包塞满。因为“钱包”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皮肤”，（也许并不令人诧异的是）无数的“股票玩家”被交易所刮去一层皮。

交易所里交易的方式和交易游戏本身一样滑稽可笑。在列文特^①Levant)，人们点头表示同意一个合约。而在这里，表示同意的方式是握手或拍手。可是这样多疼啊！许多人为了胜利而努力争取击掌，他们只有遭到命运的打击才会哀叹。

证券交易所的一位成员伸出手，另一位迎上前去击掌，这样就以某个固定价格卖出了一批股票，为了确认起见，还需要再击掌一次。一次新的握手，相当于出价，接着是报价，这样击掌、握手，一次又一次，手都被打红了（请相信，即使是最受尊敬的人也以这种方式做生意）。握手之后就是大叫，大叫之后就是侮辱，侮辱过后是粗鲁无礼和更多的辱骂、更多的大喊大叫、更多的推推搡搡和更多的握手击掌，直到交易完成为止。我在《圣经》里读到：在庆祝的场合或是因为吃惊，一个人才会拍手。可是，在这儿（在证券交易所里），人们一起拍手是因为高兴或是吃惊。一些人为欺骗成功鼓掌，而另一些人因为意外的损失扭绞着双手。他们鼓掌如同在看一幕喜剧，他们为（希望的）破灭而惊恐地扭绞着双手。

（哲学家插话进来，将股东的生动描述同古典绘画相提并论。接着，股东继续说。）

为了使我的演说更受欢迎，我想描述一下投机商的紧张状况以及他们在交易过程中一刻也不停歇的行为。我想，他们应该被冠以“行动家”的称号，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行动……他们的活动是如此深刻地留在他们的幻想之中，以至于（据说）在梦里也念念不忘他们的交易、行动和争吵。

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同枕共眠。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的脑袋，把脑袋都

① 列文特是位于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沿岸的岛屿或国家。——译者注

打肿了。挨打的朋友大叫一声，推醒了打人的朋友。打人的朋友向同伴保证：他刚刚完成了一笔交易，所以猛击了一下。这个投机商简直就是第二个毕达哥拉斯^①（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是被公鸡唤醒的，而投机商是被敲醒的。而在葡萄牙语里，公鸡和敲击都被叫做“gallo”。

投机商们一开口，谈论的话题一定是股票；如果他们跑腿，那一定是股票在驱动着他们；如果他们站住不动，那是股票像缰绳一样将他们牢牢捆住；当他们看东西的时候，眼里看到的都是股票；如果他们绞尽脑汁，那么股票一定是他们努力思考的对象；他们吃饭的时候，股票就是他们的食物；如果他们沉思或者研究，股票就是他们钻研的对象；在他们头脑发热的时候，脑子里充斥的全是股票；即使是在临终的病榻之上，他们最后担心的还是股票。

可是，比这些罪孽更过分……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因为这些事情看起来更像是彻头彻尾的幻想，而不是过度的夸张）这样的事实：投机商在同自己的理性作战，同自己的意愿斗争，同自己的希望作对，同自己的安慰与舒适对抗，而且与自己的决定闹别扭……在许多时候，每个投机商似乎都有两个躯体，以至于旁观者会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在同自己搏斗。比如说，一则新闻可能促使投机商买入股票，而当时交易所里四处弥漫的气息是逼他卖出。他的理性在同另一种理性作战——按照到来的信息，他应该买进；而按照当时交易所的行情，他却应该卖出。

商人：我们已经知道了证券交易的方式、地点以及证券交易永无休止的本性。可是，我们还想知道，证券交易是如何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股票又是如何转移和支付的。

股东：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在证券交易所里有三种类型的交易商人。第一类是那些大资本家，或者是“交易所里的王子”；第二类是商人；第三类是那些职业的投机商们。

① 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卒于公元前497年。

资本家们依靠巨大的财富所产生的利息为生，在股票交易中保持着王子般的尊贵地位。为了避免在交易中遇到各种麻烦，他们自己从来不光顾证券交易所，而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给经纪人下达命令，让经纪人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命令。有时，当预想的行情果真出现时，经纪人就会以最敏捷的方式执行交易。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当狡诈的商人觉察到资本家的意图时，商人就会给交易带来麻烦，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利和困难。

有一些商人，像伟大的金融专家一样，也不去证券交易所，而是向经纪人下发指令。他们认为，让交易所中的相互攻击、辱骂和大喊大叫来干扰自己的情绪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为了摆脱所有这些不快，他们要避开交易所里拥挤的人群。但也有一些商人，他们每天都去证券交易所（同投机商一样），他们表明：较之尊重，他们更加看重好处；较之体面，他们更加看重利润。他们这样做有五种原因。第一种原因，他们不想向经纪人支付费用，所以他们直接同圈子里的其他商人交易，这样可以减少麻烦并且减少工作。第二种原因，他们喜欢享受握手的快乐，因为他们是热情型的，他们喜欢努力伸出双手。第三种原因，（如果他们决定使用经纪人，那是因为）他们同经纪人有某种个人接触的好处——他们始终可以获得，比他的经纪人的同事能够提供的，多半个百分点的好处。这是因为这个经纪人把这些商人视为可靠的客户，而其他的经纪人却未必会这么想。第四种原因，商人亲临证交所，可以了解到价格的走势——股价是上升还是下降。而且，既然交易所里所有的人群都围聚在这批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的身边，以便参与他们发起的交易，那么，商人就可以很容易地察觉到其他操作人员的意图，也能很容易地及时核对新的消息，获得联络的优势。第五种原因，他们自认为他们的大脑能够捕捉到最佳的获利机会——不仅因为他们是交易能人和经商老手，而且因为没有人能够使出比他们更加高明的招数来。

一个谨慎行事的人会建议你：“留意那些你关心的事情。”经营有方的人都听从这种建议，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关心自己的利益，也

没有人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掌握财富。

有些投机商人，虽然并不贪婪，却不下达指令给别人——经纪商——无疑这些经纪商会热心、诚实，而又准时地执行他们的指令，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我所抱怨的是，有些投机商在交易中为了取悦经纪人，同经纪人非常友好（实际上，他们并非真正想向经纪人提供优惠）。他们给经纪人下达指令，让经纪人买入一只或者几只股票，但是在执行交割的关头，他们自己却在交易所里抛头露面，而且出价比他们先前指派经纪人买入的价位还要高。这样，他们哄骗了他们的经纪人。如果在同一时间，凭借手段来阻碍指令的执行，那么当初下达指令又有什么作用呢？为了防止更高的出价，股票被交割给投机商本人的可能性要大于被交割给经纪人……投机商对待经纪人既友善又虚伪，既欺骗又真诚……难道这一点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们已经说过，有三种类型的股票交易。但是，你也应该知道，还有三种结算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划拨”。为了进行直接划拨，出售股票的人必须走进位于一幢豪华大楼里的“西印度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将按照要求将股票转移到买方的账户下面（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即使是最富有的商人也采用这种不危及自身信用的质押股票的办法）。在他付款之后，银行的官员要审核付款是否正确（我们把这整个过程称做将“股票兑换为现金”）。^①这个过程的细致程度要取决于买主对股票需求的急迫程度或者卖主对得到现金的急迫程度——因此，有时会有人抱怨交易的仓促，有时则抱怨交易的粗枝大叶。

第二种证券交割的方式是在结算日交割。在这种交易方式下，你要（或者至少应该）明白，交割股票是在交易发生所在月份的第20天，而交款支付是在同月的第25天。但是，在这种交割方式中可能会发生疏忽、无序和混乱，因为一个人可能在他应该交割的时候不交割，应该付款的时候不付款。有一些被称为“对冲者”（rescounters）的经纪人，将买入业务和卖出业务尽可

^① 参见普林司海姆（Pringsheim）对德文版译著的介绍，在第135页。

能地对冲，而他们（只是）支付或者收取差价。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些人从拖延和含糊中寻求利润。因此，在同这些人做生意时，要紧的是看管好自己的优势和利益，而不是对他们客气和彬彬有礼。

第三种交割方式发生的日期更晚一些。通常，股票必须在合同规定月份的第20日交割，付款必须在25日完成，除非有人要启用合同中的延迟条款。但是我不赞同使用延迟条款，因为这样会损坏信用（要求延迟一方的），并且危及申请方的声誉。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经纪人使用事先印好的合约格式，上面载明了一般的规定和交易条款等事项。格式中留出了一些空白，仅仅用来填写姓名、日期和价格。如果两份合约都被填好，并且签上了名字，这两份合约就可以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交换；（之后）在对冲经纪人确定了交易的利润或是亏损以后，签字的双方再次交换合约。

对期权交易而言，还有另外一种格式的合约。这种合约上载明何时、何地支付期权费用，签名者承担什么责任。期权质押证书的格式也有差异，它们使用的是盖有戳记的纸张，上面载明有关股息和红利的条例以及其他细节，以使交易各方对此十分明确，以免引起歧义和争执。

至于投机性的交易采取差额支付的结算方式，你最好注明是现货交易，因为法规^①对此并没有加以规定。但是，在远期交易中允许使用“采取差额支付”的结算方式，只要卖方在两周之内将股票划拨到买方的定期账户上面。到那时，买方必须买进股票，否则就必须宣告破产。

尽管当时流行的看法是，这个法规不是针对卖方而是针对买方的，但这是由糟糕的惯例导致的一个错误。律师声称，卖方和买方都可以提出抗辩——这是弗雷德里克·亨利法规所规定的。

公众也认为，如果股票的卖方将股票买回（从某个较早买到股票的人手中），那么，该法规对此没有约束力。这种看法无疑也是一个错误。比如如

① 接下来的段落里提到的“法规”是指弗雷德里克·亨利的法规，参见《导论》部分原文的第8页。

果我以40镑的价格买入一只股票，又以20镑的价格把它卖掉，而且在见证人面前声明刚刚卖掉的股票是用来结清以前所买的股票的账户的，那么我就可以不受该法规的约束。通过这种方式，我声称我是这20个百分点面值差额的债务方。所以，我不能诉诸该项法规，因为我已经承担了债务。我必须支付差额部分，否则就必须破产。但是，如果我以40镑的价格从某人手中买入一只股票，而且此后，我在没有声明的情况下，以20镑的价格卖给他另外一只股票（在这两种情形中，卖方都不实际拥有股票），这样，我没有必要声明我破产以免除我的债务，也没有必要逃之夭夭。

至于这个法规是否适用于期权合约，专家的意见分歧很大。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后续法规的政策，尽管针对许多具体的案例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所有的法律专家都认为这个法规既适用于合约的买方，也适用于卖方。但是在实践中，法官经常做出不同的判决，常常让买方免责，而让卖方受合约的制约。如果法规既适用于卖方，又适用于买方的话，那么我收到看涨期权的期权费用，在交割日有卖出股票的义务。或者，我作为看跌期权的期权费用的接收者，在交割日必须买进股票时，就可以求助于这项法规了。如果恰恰相反，法规只是针对卖方，而我作为看涨期权的期权费用的接收者，又想寻求保障的话，这个法规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我在这儿实际上是卖方。但是，如果我收到了看跌期权的期权费用，作为股票的买方，这个法规会有助于我。但是，说到看跌期权的期权费用，人们的看法又有很大的分歧，因为，虽然学者们认为，由于这样的规定，（在法律上）不能（有效的）实施求偿权，但是，法院却做出了相反的判决。这样，法律和司法意见、法规和判决理由之间就产生了矛盾。理论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人们说不清楚司法究竟会倾向于哪边。

但是，如果“卖出期权”的期权费的支付者在合同协商的当天拥有股票，从而可以交割给我而且（在）发出交割意向后的两周（之内）将股票划入我的账户，那么，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令我感到狼狈，但我要诉诸这项法规还是

不太可能。根据一些人的看法，如果期权费用的支付方，在他宣布（自己准备）交割的交割日，而不是在达成期权费用合约的那一天，拥有了股票，那么他完全可以使一切以这项法规为依据的反对无效。

至于股票的质押问题，同样存在判决的不确定性。虽然人们通常假设，如果股价跌至作为贷款基础的价值以下时，抵押人就必须偿还其差额部分或者宣布自己破产；但是，一些非常投机的商人争辩说（由于支持他们观点的事实匮乏，他们的质疑并不确定），如果在质押协议启动之后的两周内股票仍然未被划拨到作为贷款人的我开立的定期账户上面，而且如果直到偿还贷款之前，股票仍然留在（借款人的）账户下面，那么我就可以（根据法规）提出反对，以保护我的利润，并且避免可能受到的损失。^①

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看到两个经纪人围绕同一笔交易互相争斗，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对客户应有的尊敬不见了，所有的忌讳也不回避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粗鲁，辱骂越来越激烈，握手越来越别扭。一个经纪人出价500镑，而另一个接受了（这个报价）（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语言，这是Ser pilladas）^②。或者，一个经纪人报出某个具体的价格要买股票，而另一个经纪人对此进行猛烈地回击，“它们是你的”（这句话在证券交易所里的含义是“被俘虏了、被抓到手了”）。无论股票是被“抓到手”了还是被“偷走”了，交易所里围在四周的人们互相争吵起来，好事之徒制造出的噪音如此之大，似乎地狱之门已经开启，狂怒的人们开始斗殴。

有两种经纪人。一种是由市场当局指定的，这类经纪人称做“宣誓经纪人”，他们已经发誓不为自己做生意。他们的人数十分有限，只有在他们当中有人去世了或者通过某种特殊授权，他们的数目才可能发生变化。这样的头衔很难被授予。另外一类经纪人被称为“自由经纪人”，或者称“雄

① 这里，德拉维加似乎是根据法律上的构想来展开议论的：由于担保品的价格已经下降，低于贷款时的作价，因此仍然握有股票的借款人就有“根据虚构的基础借取资金”之嫌。类似的还有空头以及没有实际可供交割的股票却买入期权准备出售的交易商。

② “ser pilladas”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即将被拿走的”或者“被席卷一空”。

蜂”……这样称呼他们是为了说明他们从其他经纪人那里攫取了蜂蜜——他们的利润。如果一个“自由经纪人”受到起诉的话，他们必须为损害了（宣誓经纪人）的收入而缴纳罚金；但是，只有在某人想要报复的时候才会采取起诉，一般而言，与那些宣誓经纪人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同，人们对这些经纪人还是仁慈和纵容的。

自由经纪人数不胜数。这份职业（在许多情况下）是贫苦商人唯一的出路，也是那些事业毁灭的人最佳的避难所。股票交易异常火热而且十分普及，因此，尽管有无数的自由经纪人吃着同一碗饭，却都能赖以为生，他们既不用去当为了杀人而吃饭的强盗，也不必当为了吃饭而去猎杀的猎人。他们活着，而且都在进步。他们都想标新立异，都想干大的事业。他们对自己的客户是如此忠诚，以至于他们通过热情来弥补自己所欠缺的声望，通过对交易的奉献尽职来弥补（由于有形资产不足而）欠缺的保证。

哲学家：（还有另外一件关于证券交易所的事情，你还没有提到。）那些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带给我痛苦的可怜的人们提到过虚拟股票，如果你不把它的意思讲清楚，我是不会满意的。

股东：有些职员发现，投机于普通的股票（它们被称为“大单股票”（large shares）或是“已付股票”（paid-up shares））对他们这些资金有限的人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所以他们开始玩一些小的股票。因为对大股票而言，价格每上升或是下降一个百分点所产生的盈利或者亏损是30荷兰盾，而对小股票而言只有一个达克顿（ducaton）（3荷兰盾）。一种叫做“虚拟股票交易”的新型投机方式起源于1683年。一种简单的交易结算模式需要借助于一位被称为“财务总监”（general cashier）的人的担保。这个财务总监将所有的合约放在一个账本里，在此之前并不使用书面协议，而是口头协议。对于每份签订的合约，财务总监可以从合约的各方分别得到一个普拉卡（placa[⊖]）。在每笔交易最终确定下来之前，财务总监要同合约双方进行交流。在这样的

⊖ “placa”是西班牙单词，意思是“小额硬币”，对应的荷兰语单词是“stuiver”。

一笔交易中，很少有人会同意交易的执行时间超过一个月，因为交易涉及各方的资源并不足以支撑这么长时间。在每个月的第一天，当交易所的时钟指向下午一点三十分时，两位公正的交易所工作人员就会通知财务总监“大单股票”的价格，根据这些汇报，财务总监确定出“小单股票”的价值。这种方式被称为“举起棍子”，这是因为在过去出纳总管要举起一根棍子，直到后来因为每次举起棍子所制造的噪音而放弃这一习俗。价格确定下来之后，接下来是交易的结算（只要在当月没有结算的话）。支付是以现金方式完成的而且比大股票还要准时。这样一来，即使是最资深老道的商人也参与小单股票的交易，因为在准时的诱惑下，老道的商人往往忽视交易的可疑之处，并且（以他们的行动）认可同意。

在过去的五年里，交易的这一分支（主要随着一类既喧闹又急智的团体）不断得到发展，以至于男男女女、老人甚至孩子都参与进来。因此，本来是为了减少风险而设计出的交易方式，实际上反而使危险蔓延。投机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有人大笔大笔地交易（虚拟）股票，仿佛它们只不过是火柴一样。我担心，有朝一日，那些参加这种交易的人们会引火烧身，被彻底毁灭。^①

在一面镜子被摔碎之后，破碎了的每块镜面仍是一面镜子，唯一不同在于：小的碎片映射出的是缩小了的容颜，而大的碎片映射出的是大的容颜。股票如同镜子一般，至少可以算做一种特殊的镜子——要么镜中映射之物仿佛悬在半空，要么能让照镜子的人因为看到镜中自己凌空飞去而惊讶得目瞪口呆。股票也像“亚该亚魔镜”（mirror of Achaia）一样，当它被人在喷泉上挥来挥去时，它既能预测到一个人的生存，也能预测到另一个人的死亡。恐惧的人们将这面镜子（“东印度公司”的“大股票”）打破，并将其切得支离破碎——将每份500镑的大单股票拆分为5 000个小单股票。他们想以此方便交易，但只不过是把一笔交易拆分成了许多笔交易，将一面镜子切成许多

^① 参见下文有关1688年废止这类投机的部分。

块小的镜子。

几乎所有的（投机商人）都急切地参与小股票的交易，其原因在于，大股票的买家企图将它们以小股票的形式售出（因为在月初，小股票的价格要高于大股票的价格）。^①由于通过这种操作能够获利，所以他们既不讨厌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劳动量的增加，也不会考虑这种交易是否值得、是否会有危险。

将股票从一批投机商的手里转移到另一批投机商的手里（这是这些股票经历的唯一转手）是不够明智的，这样做会增加结算日那天本来就已充斥股市的噪音、喊叫和拥挤。（在工作日，结算是在交易所（大厅）里进行的，而在星期日和节假日，则在大街上进行结算。）噪音是如此之大，甚至一些平头百姓认为会受到攻击；而另外一些人则担心别人会谋害自己。那些买进大股票又卖掉虚拟股票的人拼命想让棍子一直保持在很低的位置（也就是拖延时间，让交易再持续几分钟）以便从小股票中赚取利润的同时继续交易大股票。那些因为（已经卖空）大股票而吃进虚拟股票的人却希望棍子高高抬起，尽快结束交易，以保护自己的利润，在自己大股票交易结束时获得更多的利润。

托马斯德维加描述了一个傻瓜的行为：他请求外科医生允许他在湖里游泳。但是，当他发现水漫到他的喉咙时，他重新恢复了理智，也恢复了健康，并一直保持了下去。啊！事实上，在股票交易所里赌博的人们，有多少人同这个傻瓜一样，将他们自己投入投机的汪洋大海之中，当海水浸到他们脖子的时候，才想到要返回陆地。但最糟糕的事情是，他们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漩涡之中。据说，鳄鱼是从最小的蜥蜴长成的最大的蜥蜴。股票投机商们就像鳄鱼一样，从一开始的只玩虚拟股票发展成为最狡猾的投机商人。他们没有人会为自己的狡猾而感到不自在，更不会为此而道歉。

投机商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不做大额股票交易，就可以躲过难以逃脱的

^① 两者之间的差异来自于每月交割日期之差。

厄运，从而从股票赌博中脱身。但是，他们会发现，虚拟股票交易只不过是延长了他们的痛苦……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投机商进行无数的交易是为了不使每笔交易承受过多的损失……虽然有人从我们的眼中可以看出我们正在亏损，可是我们却越陷越深。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失去所有的东西。

赌博的快乐与日俱增，以至于人们不再愿意用一个硬币赌一个点。甚至那些不谙世事，口袋里没有几个钱的年轻人也认为，大额股票上升或下降一个点等于小额股票的一定数量的金钱。如果一个人领着一个陌生人沿着阿姆斯特丹大街行走，问陌生人是在什么地方，陌生人会回答，“置身于投机商人之中”——在这些地方，你根本找不到一个不谈论股票的角落。

介绍这只股票投机（也就是虚拟股票的投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因为经纪人的贪婪，其二是发明了赌博的人们的需要。为把这个问题交代得更清楚一些，应该说明的是，经纪人贪婪有三个原因，他们已经因此而毁掉了自己。第一个原因是，他们想挣经纪费；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想通过自己的交易从价格波动中快速致富；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想活得舒适一些。

(1) 如果他们想一次性的获得所有这些好处，那么他们很容易遭到失败。为了得到一大笔经纪收入，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提供或接受大批股票，这样他们很容易被“套”住（或者在荷兰语里称为“吊”住）。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十分依赖新闻，而且一直面临着风险。

(2) 那些试图通过价格变动来快速获取收益的经纪人，也就是说，他们从顾客手中接到有关大额股票的指令，在执行这些指令的时候以自己的账户进行广泛投机的人，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因为，为客户买到股票以后再自己持有，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不可能预知未来可能突发的意外情况，持有股票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3) 经纪人十分投入地进行股票交易，在发挥智慧和勇气的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大的满足和越来越强的攻击性。但是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总是

处于风险之中，总是处于担惊受怕的境地。

为了从上述三种方式中（的第二种）受益，经纪人必须在证券交易所里拥有好的人缘。因为在交易结束时，顾及到客户的情况，他们会需要一个好朋友来帮助签订合同、掩盖事实。这种隐蔽交易指令的方式一直在蔓延，以至于有些商人也使用这种方法进行操纵，尽管这会损害到那些没有骗人的交易商们。

当商人开始知道某个事件注定会导致股价的变化，他们就会转向经纪人，指望从价格的变化中获得收益。但是，他们只给那些在执行交易之前不会泄露他们名字的经纪人下达指令。这是因为，如果经纪人泄露了委托人的名字，就可能引起交易对方怀疑委托人的资信，从而使价格在交易执行之前就发生了变化。

如果一个经纪人从这种人的手中接到交易指令^①，他并不敢执行这项交易，以免别人注意到这笔交易，从而（将来）指责他执行了这笔交易。他也不想引起不友好的人们注意，从而对价格造成不利的影响。他担心，通过进一步的询问，别人可能会知道他的委托人是谁，这样就不会有人再卖给他股票。因此，他的自私自利同忠诚进行着斗争，他的雄心同胆怯进行着斗争，利润同良心进行着斗争，直到最后，经纪人决定同一位朋友探讨一下，而这位朋友以自己的名义卖掉好几千股虚拟股票，从而使他们能置身幕后。

虽然经纪人是这种赌博的始作俑者，即使地处偏远的人也参与进来，但最后的事实是，赌博所得利润的大部分花在了赌牌、掷骰子、美酒、宴会、礼品、女人、马车、豪华服装以及其他的奢侈品上。不过，也有无数的人只是为了体面地养家糊口而进行这种交易。

一些人赌博是为了好玩，一些人是为了打发空虚，许多人从中找到了职业乐趣，另一些人则是为了谋生。如果他们受到了厄运的困扰，而且无法阻

① 德拉维加在这里预先知道他的解释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这个经纪人同多头有关联。德拉维加还给出了特例，说明哪种行为对股价有抑制作用。

止自身的败落，他们最起码也要努力保住自己的面子。他们收取期权费，退回已经投资的资金，支付差额，他们的麻烦少了，他们的冲突没了，所有的攻击也被击退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跳入这场漩涡的原因。我们很容易清楚地看出，不做虚拟股票交易的人比做虚拟股票交易的人要少。

第四段对话

股东：在第一段对话里，我谈到了股票交易所的起源，“交易所”一词的词源考据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财富……谈到了范围广泛的股票投机以及期权交易的含意，与此同时，我还揭露了一些骗人的伎俩。

在第二段对话里，我向你们解释了价格的不稳定性及其原因，并且对成功投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指出了价格起伏波动的原因，谈到了空头的胆小怕事和多头的勇往直前。谈到了多头勇敢大胆行动和空头胆小怕事处理所产生的不同结果，谈到股票价格波动的种种现象以及这些现象是多么的令人摸不着头脑，谈到投机的疯狂和愚蠢，谈到了交易所里使用的语言以及那些约定俗成的五花八门的短语。

在第三段对话里，我开始向你们解释多种多样的交易，告诉了你们一些（游戏的）规则，并且说明了一些行业惯例，谈到了合约的公平性、交割的时间、股票过户的地点、交易发生的场所、（交易所里）不体面的行为、骚

乱与波动、粗暴、握手、交易所里无法摆脱的疯狂、西印度公司、虚拟股票的投机原理、交易所里的三教九流、账户清算的延期、形形色色的经纪人、他们的良心、他们所面对的风险以及他们的鲁莽。那么，现在我需要向你们说明的就只剩下了一个部分，那就是这个行当里最具投机性质的部分，它是股票交易所里各种交易的高潮，是交易所运作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交易所这个迷宫里面最高明、最复杂的诡计，它要求你尽可能的狡猾。

（举例来说）10个或者12个人在交易所里凑到一块儿，组成了一个集团（这被称为一个“cabala”，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这个集团认为应当抛出股票的时候，会深思熟虑，仔细研究各种方法，以便小心谨慎地实现他们的目的。只有当他们能够预见到行动结果的时候，才会主动采取行动。因此，除非有不幸的意外变故发生，他们可以稳稳当当地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空头集团）通过期货抛空打出他们的第一记重拳，而将现货留在手上，留待更大的灾难降临时再用。他们卖空各个（远期）月份交割的期货金额高达5万镑，经过这番操作，股价下跌的趋势已成定局。跌势蔓延开来，于是空头集团又从其他的投机商人那里得到帮助。显然，在这么多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他们（所策划的）目的必能实现。这种阴谋操纵的领军人物可以被称做“有尾巴的王子”（princes of the tail），就像萨瓦伊的阿马蒂奥一世^①（Amadeo I of Savoy）因为有无数的随从跟在身后而被人们称为“有尾巴的公爵”一样。这个短语之所以适用于空头的领袖，是因为他们有无数的追随者，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追随者依附于他们，又或者是因为这些“随从们”会拖起领袖的裙裾。因为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追随流行的观点，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一小部分人变成了一个集团军。（而绝大多数的人）只想别人做什么自己也做什么，人云亦云。

（空头集团的）第1个花招是：为了防止合同无限制的延期——伟大的“金融家们”通过合同的延期，现金购入股票之后再卖出股票期货，满足于

^① Savoie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份。——译者注

能够获得（一个相当于）投入资金的利息的（价差）——空头集团在安排出售股票期货的时候，将其售价定在与现货的售价一样的位置上。为了得到期望中更加丰厚的利润，他们并不在乎利息的损失。他们就像《伊索寓言》中的那只狗一样，之所以放过那块肥肉不吃进肚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是因为那块肥肉的影子在它看来显得更大、更诱人罢了。

第2个花招是：一位深得空头辛迪加信任的经纪人得到指示，从一位（宣称自己是）多头的人那里秘密买入大量的股票，而不暴露自己实际委托人的身份。但是，他们出售这些股票的时候却是大张旗鼓的公开进行的。这时人们会大叫道，“连多头也在抛售股票了”。既然这位经纪人打算将他从一位多头那里买来的股票出售给另一位多头，那么，在后面这位多头看来，有关前面一位多头正在抛售股票的传言就是真实可信的了。第二位多头顿生疑窦，警惕的他很快也抛出了自己的股票。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一般被恐惧所笼罩。每个人都试图先发制人，抢在别人的前面卖掉自己的股票，并且将任何买入的建议都视为欺骗。我们称这样的恐慌为“备受摧残”，^①随后，无数的（交易商）争相抛售手中的股票……此时，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儿怀疑也会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第3个花招是：空头辛迪加将一些巨额股票以现货的形式出售给某个依靠股票抵押为生的富裕的家伙，这位阔绰的证券抵押商（理所当然地）会立刻将这些买入的现货股票出售并约定远期交割。空头辛迪加命令其经纪人（他负责整个阴谋的实施）在（当天）收盘以前，非常秘密地将这个消息传递到（交易所里代表）各个证券公司的代理人那里。这番私下进行的交流很快就会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那个大资本家得到了重要的新闻，打算抛售股票。后来果然有大量股票被人抛售，这番骗人的鬼话似乎得到了印证。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恐慌的情绪四处蔓延，股价暴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如果知道，投机商怀疑他们的保护人会改变想法并且发现自

^① 原文中的西班牙语短语是“tener calcetas”。

己的基础开始动摇，那么就很容易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恐慌了。

第4个花招是：在战役刚开始，空头辛迪加将股票交易所里所有能借到的钱都借了过来，并向众人表明，他们打算用这些钱去买股票。可是后来，他们实际执行的却是大量抛售。这样，他们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首先，交易所里的人们将会相信，最初的计划由于重要的消息而发生了改变；其次，多头也无法寻找到资金来抵押他们的股票。因此多头不得不抛售股票，因为他们没有钱购买股票（否则的话，他们就会陷入第七步阴谋所描述的陷阱之中）。

（空头辛迪加的）第5个花招是：尽可能多地出售买入期权，（显然是）想（通过吸收一切可以到手的贷款资金来）对那些期权保险费用的支付方施加压力，如果他们买入期权的话，就不得不被迫抛售股票。

第6个花招是：买入尽可能多的卖出期权，直到卖出期权的卖方（假定他们是多头）不敢（主动）买入更多的股票。（他们的手脚基本上被束缚住了）因为他们有义务接受（已经支付了期权费的期权卖方的）股票，（如果期权卖方要求他们买入的话）。因此，对股价下跌的投机势如破竹、畅通无阻，几乎注定会获得成功。我们说，那些通过一份“远期买入期权合约”买入，并按既定的条件（在将来）售出的人，或者那些通过一份卖出期权售出股票，并按已经确定的条件（在将来）购入股票的人“对冲了他们的投机过程”。但是，由于（他们选择的程序）可能是错误的投机（方式），从而错过了正确的投机方法，所以，人们很少采用（这种对冲程序的做法）。

第7个花招是：要充分认识到，多头需要股票以摆脱困境，于是（空头）为他们提供资金。接下来（空头）再次出售那些被抵押的股票，他们从出售所得与贷款之间的巨大差价中获取利润，足够进一步从事期权买入和卖出操作之用。^①

① 上述译文是按照西班牙语的原著翻译的，但是德语版的译者却相信，德拉维加在这里犯了一个双重的错误——在第一个句里，他应该写的是“资金”而不是“股票”，并且，德拉维加应当认识到，他谈到期权的买入和卖出操作，实际上引入了一种不必要的、有些不相干的思路。

这是一种极其邪恶的阴谋诡计，它注定要令人永世难忘，而且注定要带来灭顶之灾。从表面上来看，空头通过借钱给多头（当他们收取多头购买的股票作为抵押时，也就相当于为多头融通了资金）为多头提供了一线生机。实际情况却是，（空头集团转手就将这些股票抛售一空，以至于多头不得不）再次购进自己已经拿去抵押的股票。

尽管空头缺少股票，但是他们却能够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做出股票充足的假象。股票在他们手里频繁转换，经常仅在一个星期中换手就多达50次，就像（游戏中玩的）球一样升起又落下。但是，这样的易手只能表明股票行业的没落与毁灭……空头购得一份股票，然后又在同伙的保护出售10份股票，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空头接受作为抵押的股票只是为了立刻将它们转手卖出的话，那么这种交易又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如何能够压抑自己内心（对于这种情形的）焦虑，又怎样避免痛苦呢？……学者们会认为（下面的说法）有失偏颇吗？——我不能把“在购买一份股票的同时出售四份股票”的行为视为一种（诚实而善意的）购买，我也不能将任何一笔“接受一份股票必须同时售出十份股票”的交易视为（真正的）交易。

（空头辛迪加的）第8种诡计如下：如果传播一条由投机商们自己炮制的消息是非常重要的话，他们会写一封密信，并且在适当的场合（做出安排，以使）信件好像是不小心被遗失在那儿。发现这封密信的人必定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得到了一个宝贝。而事实上，他得到的不过是一封“尤里亚（Uriah）之信”，这封信将把他引向毁灭。拾到信的人自作聪明地把信的内容告诉了自己的密友们，并且指出如果辛迪加获悉这一消息必会抛售的缘由。如果当天股票交易所里果真也发生了风暴的话，这条消息看上去就更加真实可信了，人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人们的忧虑也得到了解释。

第9种阴谋诡计是：空头辛迪加鼓动一位判断力得到众人赏识的、为人处世令人敬重的、从未做过股票交易的朋友去出售一两批股票，这时，损失的风险已经被空头集团炮制出来了。（隐藏在这种举动背后的）信号是一种

信念——一定发生了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这个人（出售股票）的决定将在人们的心里制造恐慌，并带来严重的后果。

（辛迪加的）第10种阴谋是：对一位密友耳语（但是要足以被静候在暗处偷听的人听到），告诉他如果想赚钱的话，就应当抛掉手里的股票……先知说过“石头会说话”，谚语也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我们的阴谋家们知道，这一真理将会得到无数经验和事实的验证。如果他们的秘密被散布出去了，那么（当）他们显然是在大量出售股票的时候，他们的建议（看来就会）得到广泛的支持与认同，（看来）墙壁和石头的确会说话；人们努力搜寻这种（低声耳语所传递的）断言的不可告人之处，人们无比感激他的暗示。由于人们认为，他不可能欺骗自己的亲密朋友，所以这种伎俩屡屡奏效。鱼儿乖乖地吞下了诱饵，网里满是自投罗网的傻瓜鱼儿。这场胜利值得庆贺，空头集团顺顺利利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得到了巨大的利益。

第11种阴谋是：康特马恩（Contramine）（也就是辛迪加）采用下面的伎俩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只用他们的舌头或是语言（被预言家杰里迈亚（Jeremiah，也是杞人忧天者）比喻为利箭）去伤害他们的敌人，不满足于只用他们的牙齿……和争吵去和他们的敌人斗争。为了巧妙地暗示自己的主张是建立在严肃缜密的思考之上的，而且并不只是针对东印度公司的，空头们抛售政府债券。于是，这一举措使多头相信这个国家正被不和与冲突主宰着，而且有理由保持警觉并且注意可能爆发的战争。对于（股票）行业来说，这种求助于出售长、短期政府债券的方法看上去也许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不论是谁这样想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投机商们（多头）被自己的股票交易弄得麻痹大意，（保护）政府债券（市场）的义务更令他们头破血流，（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空头集团大肆宣扬的关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情况、威胁着东印度公司的危险以及股票市场将要崩溃之类（的无稽之谈）。

最后，空头集团使出了第12个花招。为了透彻地了解市场的走势，即使

是空头（在开展大规模操纵行动之前）也会从购买和接受一切（提供给他们）的证券上着手。如果股票价格上涨，他们就将这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如果股票价格下跌的话，他们会以亏损价位出售，但是他们也很有满足，因为这一结果证实了市场走软的趋势。此外，怯懦的公众对他们的交易结果所抱有的浓厚兴趣对他们也是极为有利的，公众会想，连他们这样的投机商都亏损、出局，可见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要想影响动摇不定的公众，左右他们的行动，这种示范效应无疑是可以采取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如果（胆怯的人们）看到空头买进股票的话，他们不知道空头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以后再卖掉这些股票（这在交易所用语里被称为“寻找弹药”），还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由空头变多头，真的希望买进股票？如果康特马恩决定采取这种障眼法的话，他们会提出比当天价格更高一些的买价（我们将此称为“哄抬”价格）。他们以这种方式影响价格，是为了在更高的价位卖出（卖空）股票，以便在最后关头谋取利润。上帝对着亚当吹了一口气，就将生命注入了他的身体，而这里的空头们对着（股票）价格吹了吹气，就夺走了许多条生命。

商人：难道可怜的多头没有办法对这些诡计进行自卫和还击吗？

股东：他们当然有办法自我保护。对于最胆大妄为的攻击，他们也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即使是杀伤力最强的诡计，也有克制它的办法。不过，由于双方为达到各自目的所用的手段几乎一样——实际上就是那些早已剖析过的空头的手段——恐怕，我想这种双面的阴谋会面临（和刚才描述过的）同样的境地（也就是，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所以，为了避免啰嗦和重复，对于多头所用的伎俩，我将一笔带过，不再赘述；（不过）我会告诉你们少数狡猾的经纪人惯用的伎俩。这些经纪人，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厚颜无耻的话，他们将会发现自己得到了热情的掌声。⊖

⊖ 在这句话里，德拉维加指的是那些所谓的“自由经纪人”，“自由经纪人”为自己的账户而投机。

举例来说，一位经纪人接到一个卖出20份股票的委托命令，如果他是代表多头利益的，那么在接受这份委托指令后将会吓得倒吸一口凉气并且怒火中烧。因为，如果首先出售那些为自己购买的股票的话，他生怕这种行为会被别人发现，那样的话，他将被被告上法庭，被诉以（进行欺诈性的操作）之罪。而如果他留下自己的股票不卖，却有按照委托指令卖出客户的股票的话，他又担心价格在大量抛售之后一路下滑，以至于他只能损失惨重地处理掉自己的股票。最终，他决定做一个而诚实又正直的人……仅仅是由于害怕（被人发现）而试图放弃自己的利益，以便更好地执行委托给他的指令。（但是）人们嗅出了这（一类）障眼手法；空头辛迪加再次受到了鼓舞；有人开始大叫，“海岸附近出现了海盗”；另一个人也跟着叫嚷，“张三或是李四一定是吃了泻药了。他为秘密客户尽可能多地出售股票”；第三个声音说，“他有腹泻的麻烦”；另一个人嘲笑说，“他还下蛋呢”；接着，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说，“他在给交易所下毒”。这些惯用的表达方式都是我们的投机商们在这样的突发情况下使用的习语。在这些偶发事件中，这些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这一切并没有给这位沉默寡言的经纪人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既然他已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执行了这份委托指令，那么如果这份指令在被执行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的话，他也（只会）觉得这事太气人了。但是，这还不过是一点虽然疼却无伤大雅的皮外伤而已。这件事情并没有刺痛他的心灵，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的施恩者。

我们谈论的这些经纪人之所以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取丰厚的利润。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接到了一份委托指令，而执行这样的指令将会使他受到约束，并且走向与自己的交易背道而驰的方向的话，他的心就会颤抖不已，他的表情会发生变化，他的声音会充满恐惧，他的呼吸也将停止，除非他能够……运用巧妙的技巧逃脱困境与危机……否则的话，他就会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像个傻瓜一样可怜巴巴地死去……为了逃避这种悲惨的命运，我们的经纪人会秘密地卖掉自己的股票。他试图杀死缠绕在

某人脖子上的蛇而不伤害到那个人——他努力在不违背特定的委托指令的同时避免损害到（自己的利益）。他最好是（只为客户进行交易）以便躲避麻烦，避免伤害自己的心灵。如果他牺牲自己的信誉去谋取什么利益的话，他将丢掉自己的经纪人饭碗，而如果失去了经纪人饭碗，他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财富。这么说来，他赚那点钱（假设他的确赚到了点儿什么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一位大公无私的经纪人满腔热情地执行了一笔大额的委托指令，执行得既明智又机灵，那么我们就更得注意了。因为如果他想购买股票的话……，他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直接、迅速地获取某些股票，并且寄希望于通过幸运的讨价还价保证后面剩下的股票（都按照一个合理的价格成交）。为了掩盖自己的意图，他有时会为一大笔（股票）报出卖家价，而有的时候，他又会寻求别人的报价。如果这时候有人将股票推到他面前的话，他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如果一个人试图从他手里购买股票的话，他（事实上）已经买到了（他负责购买的大量股票），在不影响（股票交易所）价格的情况下，获得了双份的经纪费用。^①他以令人赞叹的敏捷四处挥舞着他的宝剑，他的表演是如此令人愉悦，以至于人们会为他不能一帆风顺地常胜不败而感到惋惜。

即使是在交易所的环境不容乐观的情况下，（经纪人的）聪明和胆识（有时候）也能让他们获得成功，因此，这种成功更加令人佩服。

另外，如果一位经纪人已经在自己的账户上对股票的下跌进行了投机，而这时又接到了一份卖出股票的委托指令，那简直是太好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加令人开心的消息了！此时此刻，这位经纪人恐怕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了。

我们的投机商频繁地光顾一些被称做coffy-buysen或是咖啡厅之类的场

① 可以假设，这位经纪人可以对他的委托人（因为给出虚假的卖出指令，并且在委托人的要求之下收回这项指令）要钱，也可以对下达了实际被执行了的购买指令的委托人要钱。

所，因为那里供应一种荷兰人称为“coffy”，列文特人（地中海东部以及爱琴海沿岸地区的人）称为“caffé”的饮料。在寒冷的冬季里，热气腾腾的房间为投机商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逗留之地，并且那里也不乏各式各样的娱乐与游戏。你在那里会发现书籍和棋类游戏，并且还可以碰到一些有见地的造访者，你可以与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人吃着巧克力，其他的人喝着咖啡、牛奶和茶水。几乎每个人都在一边交谈一边抽着香烟。这里的東西都不太贵。当一个人获得消息的时候，他会与别人洽谈生意，进而成交。

当一位多头在交易所的营业时间走进这样一间咖啡厅的时候，在场的人们会问他现在的股票价格如何。多头会在当天股价的基础上加上1%~2%，并且拿出一个笔记本假装记下各种委托指令。于是，人们购买股票的欲望被勾了起来；而这种购买意愿的提高又让人们认为股价会进一步上涨。（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很相像：当价格上涨的时候，我们认为它会飞上云端；而当它们已经飞上云端的时候，我们又会认为它们会从身边溜走，从而赶紧买入这早已被高估的股票。）因此，热情洋溢的人们将买入的委托指令交到狡猾的经纪人手里。但是，为了巧妙地达到他的目的，经纪人会对众多的客户说，自己已经接受了这么多的委托指令，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位客户的委托了。提问者天真地相信了他的鬼话，认为他真诚无比，因此更加强烈地希望购买股票。于是，他们会向另一位经纪人下达一份没有限价的委托。一旦（第一个）狡猾的家伙获悉这一情况，就会匆匆忙忙地赶回交易所，以高于当天市价的价格卖出股票。原来对股市不感兴趣的另一个经纪人则在更高的价位上买入了这些股票，因为他相信，价格发生变化，从而提高了人们投资的愿望，必然是由于出现了某些新的未知的理由。有时，价格的上涨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骗子获得了成功，而原本似乎是疯狂的行为却显得十分聪明。

在这些圈套中最纯粹的诡计就是，一些多头装扮成空头。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对手（真正的空头）会想象，如果他们（能够）从那

些退缩隐蔽起来的人们手中购买到一只股票的话，就说明另一方（多头）已经改变了主意，不但不用银子为他们铺路搭桥，而且努力把他们拖垮……现在，多头使股票价格发生了变化，迫使空头们为自己已经抛空的（试图战胜多头的）股票支付高昂的代价。于是，多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这样通过伪装战胜了自己穷凶极恶的敌人，并且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欺骗了那些试图欺骗他们的对手。

其次，这些投机商反复运用这样的诡计是为了在突然到来的紧急关头能够大量地抛出股票而不引起恐慌。由于这些（特定的）投机商毫无疑问地属于空头辛迪加的行列，于是，多头们会愤怒地围在周围以便购买第一群人售出的股票。多头这样做是基于以下的假定：他们不得不坚持他们的观点，并且为这种坚持做出牺牲。

有人（经纪人）试图知道交易所里的某一堆人正在做什么，于是他们会把自己的脑袋伸到集团成员的手臂下面，探头探脑地张望（毫不介意散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气味），从中获悉有人报出了每股8（588）镑的卖价，却没有人接受这个价格。于是，经纪人走开了，钻进了对立集团，不但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而且假装接受了一个对价格没有限制的委托指令。他开始报出每股8.5（588.5）镑的买价；随后，有人鼓起勇气，报出每股9（589）镑的价格；最后，这种做法带来了成功，引起一片欢腾，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如果你在一群死鱼中间放入一条电鳗的话，死鱼在电鳗的电流冲击下也会运动起来。（与此相仿，）在这位经纪人用他的声音、他的谎言以及他的勇气将多头们惊醒、使他们复活之前，这些多头（看上去）就像死鱼一样死气沉沉。这位经纪人对所做的每件事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而且是以活泼多变的方式。这位生动而活泼的恶棍甚至能让死人复活。在看到狼群的时候，羊群会变得非常安静；青蛙在被人们看到的时候颜色会变得很淡。而在这种时候，空头会安静下来，脸色苍白，这个现象多么有趣啊。

有三种（常用的）启动股票买卖的方式。（出售者声明：）“我按这个价

格把它们卖给你”，或者他只说“我以那个价格把它们卖掉”而不做进一步的解释。或者你可以说：“我以这个价格把它们让给任何一位希望拥有它们的人。”（此外，还有一些不常采用的表达方式——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危险了。）无论是谁（如果只是简单地）说“我卖掉它们”，那他就无法摆脱按照对方要求的价格卖出股票的厄运。如果后来，这人为自己如此便宜地卖掉股票而感到后悔的话，他也不能凭借与对方的交情而免除交付股票的责任。除了祈祷、抱怨和忍受痛苦的折磨之外，他别无选择。而任何一个说出“我将它们卖给任何一位需要它们的人”的人都将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因为的确有人指望靠这种没有约束的要约为生，就好像他们依靠买这种便宜货去赚几个面包钱一样。由于这种人的地位、微薄的资金、低俗的名声和有限的可信度广为人知，所以他们不敢尝试规模较大的交易。但是，如果他们听到了我们这位吹牛家报出的这样一种慷慨大方的要约的话，他们会迅速地用“它们是我的了！”的呼喊将其置于尴尬被动的境地。于是，这个“大方”的人为自己的过度自信受到了惩罚，他活该为自己的轻率与莽撞抱憾不已。

如果一个人只说“我卖”的话，他的目的是很暧昧的……他的愿望并不是卖掉股票，而是引起价格的变动。如果有人表示要买，（这位交易商）将会立刻回答说：“我卖，但是，我不卖给你。”因为他没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事情负责——严格地说——他所说的只是“我卖”，他总是在用一把双刃剑和一把双筒手枪作战。

对于一些经纪人（如果他们的知名度足够高的话）在他们的合约上连署，签上“某某按委托的指令执行”（N.N. by order），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热衷于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他们选择这种连署的方式，正是为了向别人表示，这笔生意只是按照某个客户的委托办理的。由此可见，他们不但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贪婪，而且知道怎样掩藏自己的愚蠢。

更加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某些胸怀大志的经纪人已经在运行

着（两套体系）——一套是货真价实的经纪业务，而另一套则是为自己的账户进行的证券交易。在他们已经指定自己为委托人的股票交割中，名字的变更是实质性的变动。一个男人和他的老婆在旅馆里想只付一个人的房钱，因为按照上帝的说法，丈夫和妻子是一体的。但是，当房东意识到他俩在利用诡辩占自己便宜的时候，他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求这两口子支付11个人的房钱，因为，如果两个是一个的话，那么，数字“1”肩并肩地放在一起，岂不就是“11”了吗。看来，前面提到的那个精明狡猾的经纪人所用的花招与房东的诡辩实在是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象自己占着五个位置，同时扮演着五种角色——经纪人、商人、合约签订人、律师，还有法官。

不过，如果保护交易所里（每个）派系、影响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经纪人离开他们的话，理所当然地，交易所的任何派系都将陷于一片沮丧与惊慌的境地。这样的经纪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只为交易所里那些最精英的、最富有的、最富于进取精神的人们提供服务。多头是他的客户；他不失偏颇的热情所追求的目的永远是：为他的委托人谋取最高利益。一天，一个机灵的空头意识到股价开始动摇。为了刺激价格，使之更加迅速地下降，他对一位（诚实的）经纪人下达了指令，命令经纪人在不透露委托人真实姓名的情况下卖出10份股票。这位经纪人忠实精明而又小心翼翼地完成了这份委托指令，因为他想要的只是赚取经纪费用，尽管他显然正在给他的朋友们（多头）带来伤害。他的追随者们大吃一惊，连忙问他是否为老主顾出售这些股票，是否得到了什么最新的消息。对此，他一概不予回答。他们还想知道他是否必须卖掉许多股票，他依然保持沉默。因此，为了给他制造麻烦，也为了防止他再执行一次有利可图的销售，他原来的拥护者们（对他的变心和背信弃义怒不可遏）哄抬股价，并且痛斥他的忘恩负义，指责他竟然丝毫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当那个被精心隐瞒的真相最终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发出委托指令的那个空头早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已经在交易所里成功地播下了不和

谐的种子，引起了价格的变动，并且为自己获得的彻底胜利大吹特吹。

无数的（经纪人）在炮制（相关阴谋的）时候都不知疲倦、花样繁多。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多头们散布与股票有关的成千上万条谣言，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使股价上涨。康特马恩集团也炮制出了上千个阴谋以使交易所里人心涣散。不过，如果碰巧，他们炮制的假消息中竟然有一些真的成了事实，得到了证实的话，真实的情况可能远远不如（所预期的）那样后果严重。举例来说，如果人们了解到，情况并不像空头所担心的那么有利的話，那么尽管情况有所恶化，价格却是不跌反升。另一方面，当某个利好事件不期而至时，也可能引发（价格的）下跌（正所谓“利好尽头是利空”吧）。

当某位（对价格上涨感兴趣的）狡猾的经纪人必须购买（价值）2 000 镑（的股票）的时候，他首先只会购买（价值）1 000 镑的股票，以便给人留下下面的印象：他将买入（价值）至少为20 000 镑的股票。一旦他看到另一位（经纪人）购买股票，不论这人是学他的样子，还是为了迎合他，他都会走到这个经纪人的面前，用一种压低了的沙哑的嗓音对他表示自己的不满（但是这种声音足以被那些努力偷听他讲话的人们所听到），他恳请对方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破坏他的好事，不要影响股票的价格，因为他还要照料一大笔股票。如果出现混乱的话，他的交易将会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并且不可避免地将会招致损失。现在，交易所里的人都将这个诡计当成一个严肃的话题，认真对待。立刻，每个人都开始买入股票，以获取这笔按照（推测的）趋势可以预期的利润。虽然这个鬼把戏能否成功还很难说，但却值得一试。邪恶之神诱劝夏娃去吃禁树上的禁果，这样她就可以获得永生。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邪恶之神就不会告诉她了，因为他之所以会提供建议，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我们的股票交易所里的邪恶之神也是如此，不过，如果他们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游说自己的朋友不要购买股票，并且要求朋友们不要影响股价，以便他们自己买入股票的话，实际上，他们正在（以某种方式）改

变着价格，这种诡计带些近乎神话的意味。

当一位慷慨大方的经纪人想为某位亲朋好友谋取好处时，他（可能不得不）与对方接洽100多次，然后才（真正）能够将必要的信息告诉对方，而不被那些一直守在旁边伺机窃取（这种他们认为有用的）信息的人们偷听去。为了避免此类意外的发生……他通常会使用一些省略语，而这种权宜之计难免会惹出不少误会，因为对方往往把这些省略语理解成了相反的意思。一天，我向一位正忙于自己事情的绅士请教他对后市的看法。他兴奋地回答道：“Ven。”^①我以为他叫我跟他走，于是，我就跟他走，看到他在一家酒馆买进了许多股票，却没有对我说其他任何事情。因此，我认为“Ven。”的意思是让我跟随、效仿他的做法，自己也应当学他的样子买入股票。我对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非常满意，风风火火地赶到交易所，在那儿买了为数不多的一些股票。这时，我突然注意到，我的“顾问专家”一次就卖掉了八份股票。我被（这种显而易见的背信弃义）激怒，抱怨说，他已经邀请我加入他的运作，但却以一种非常令人气愤的方式骗了我。但是，他却向我保证（并且以进一步的抛售加以证实），他只不过是利用自己秘密买进的股票来动摇敌人的阵营。他说他通过反复对我说“Ven”，已经给了我足够多的建议，告诫我应当卖掉股票。而且他也不能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否则就会被别人听到。

（少数一些）经纪人（以表面上的顺从与殷勤来掩盖他们真实的意图，这种人）的做法可以用卑鄙、自私和无耻来恰当地概括。尽管人们认为他们的做法可鄙、不地道，他们还是会采取下面的手段：虽然他们实际持有的是一个买入的委托指令，他们却会建议一位亲密的朋友卖掉股票。更加可恶的是，他们还通过别人对有关人士施加影响，以便促成这笔股票销售，就好像要欺骗一位毫无怀疑之心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似的。

① “Ven”是两个西班牙语单词“venir”和“vender”中很显眼的成分，“venir”和“vender”的意思分别是“来”和“卖”。

商人：我们想请您看在我们如此认真倾听的分儿上，告诉我们（最近）股票价格发生前所未闻的下跌的原因，这次下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导致了一场令人扼腕的股灾。

股东：我十分乐意为你们解说这场崩溃的原因，请你们更加用心、更加安静地听我解释。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价格又从下跌到的低位每股365镑回涨到了每股465镑，并且保持在这个水平。但是，请你们注意，邪恶之神已经在多头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陷阱……在《约伯传》中，邪恶之神对上帝说他已经周游过整个世界了。我相信，在我们倒霉之前（这同一个邪恶之神）已经造访过了海洋和陆地，因为不好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并且成为这一致命事件的起因。在陆地上，到处都是和平与安宁；在交易所里，人们可以得到充足的资金和信用供给；出口的前景非常看好；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努力实现着自我）；精锐的军队在名将的统帅下（保卫着我们的国家）；还有鼓舞人心的利好消息，无与伦比的商业知识，不断增长的人口，强大的舰队以及优越、有利的同盟。所以，人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心，没有一点一滴的怀疑，他们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的乌云，也看不到一丁点儿的阴影。

好望角的统治者（通过法国的船只）从海上捎来一封信。信中包含这样的消息——在印度，每件事情都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进行着，而且来自印度的船只满载着最为丰盛的货物，已经到达了（好望角）。之所以会有如此值得庆幸的可喜局面，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发现了新的矿藏。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期盼着良好的收获，期待着将要出现的可喜的经济形势，期待着一个了不起的、令人惊叹不已的幸运的到来。

只有一个情况与这些美好的前景背道而驰。有消息说，在从好望角开往巴达维亚的返程船队中，载重量最大的轮船中的一艘因为船上载有一系列的危险品已经不能继续航行了。但是，就连这样恼人的消息也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艘船将会在第一批船队离开后的几个

月，和那舍盆（Naa Schepen）一起起航，也就是与两三艘较小的船只一道离开巴达维亚。第一批船只一般都装载着价值4吨（黄金）的货物、书籍、账本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供（荷兰的）董事们使用。在第一批船队到达前的几天里，（一则与前面的消息大相径庭，但是）显然十分可靠的消息传来，说这个船队在沙滩上搁浅了，不过已经脱离了危险。进一步有消息传来，返航的船只实际上已经在军舰的护送下起航了。这样的消息正中多头的下怀，而且对于股息和红利至关重要，它唤醒了（交易所里）“亚伯”^①（Ahab）和撒旦的幽灵。每个没有加入欢庆活动的人都被视为傻瓜，每个出售股票的人都被看成是和自身利益固执的作对。每次出售行为都被称为蠢事、疯狂之举，甚至被视为犯罪。

货轮安全地到达了港口码头，董事们也看到了来信的一部分。又有谣传说，船货（（在印度）购买的货物被称为“Inkoop”）只有34吨（黄金）的价值，而去年的船货价值50吨黄金。这时，人们的情绪大变，乐观的期望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空头辛迪加没有像多头那样对股票的上涨进行投机的话，这次冲击本来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由于受困于光辉灿烂的前景，空头们一直未敢对多头宣战。假如空头集团卖（空）了大量的股票，当价格第一次下跌20%的时候，（如果空头购买了股票进行抵补的话，）本来还是可以赚到足够多的好处并获得利润的。（在股市破灭的整个过程中）股价下滑本来不至于如此严重的。但是，由于有的人希望通过抛售股票来避免（比他们注定遭受的损失）更大的损失，其他的人想要避免一切损失，还有的人则想赚点儿什么，于是，遍地刮起了抛售之风，沮丧的情绪也接踵而至。那些（由于合约中规定的股票交割日期较早而）被迫接受交割的人们，又将股票卖出补仓。拥有质押股票的人，因为它们的价值已经跌到（为了持有这些股票）所借资金的金额之下，而将股票抛出。持有早先购买的股票的人急着抛掉这些烫手的“山芋”，以免损失更多，他们还会卖掉更多的股票以弥补（早先的）损

^① 《圣经》里邪恶的以色列王。——译者注

失。少数早就（蓄意）卖空股票的人在卖空所得利润的刺激下勇气倍增，进一步打压股价，他们努力抓住运气，奋力一搏。最后，人们拿着股票（本来就不过只是股票）四处乞讨糊口，就像是在乞求（未来的）买家的救济一样。人们心中充满了恐慌与一种无可名状的震撼，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大地即将沉没，天空即将坍塌。

当公司的第二批信件被公之于众时，整个市场的气氛才开始有所缓和。看来，（今年进口的）价值34吨黄金的货物销售所得的利润，（由于售价更高，）将与去年价值50吨黄金的货物所带来的利润不相上下。于是，为了不给多头以喘息之机，空头们聚在一起，四处散布谣言，说战争一触即发。（他们说）他们了解许多秘密进行战前预备的情况，对于战争即将到来的说法，人们绝对没有必要怀疑。接下来，税收将会像雪崩一样迅速增加，人民的负担将会变得无比沉重，整个欧洲将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都会看到凄惨、恐怖和毁灭的场面。就连那些早已对空头集团精心设计的阴谋有所察觉的人也被这些谣言吓着了。（结果是）空头们能够完全彻底地控制市场价格。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整个局势，以至于他们强忍着不出售股票兑取现金只是为了避免款项的暂停支付，同时希望一些有偿付能力的人生存下来。因此，股票交易所陷入我刚刚描述过的悲惨境地，就连那些原来被视为颇具实力的人物也不得不求助于为过分扩张的购买者们提供的选择权的保护（他们寻求弗雷德里克·亨利法规的庇护）。这儿的情形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至理名言——像索尔（Saul）一样，你常常去戴维的床上找他，却只找到了一尊塑像。交易所里也是如此，在这儿，人们看到的是一堆堆的石头而不是人，交易所最强有力的支柱如同弱不禁风的细棍儿一般轰然倒塌了。

在虚拟股票的投机中，股灾造成的损害更加令人心烦。（法庭判决（这些想象出来的股票单位的）投机只是一场游戏或是一场赌博，因此，对这些虚拟股票所进行的交易不具备真实交易的性质。）因此，要想拒绝支付虚拟股票的价款根本不必求助于弗雷德里克·亨利的法规。

在这种偷盗行为中，每（价值）500佛莱芒镑（的股票，相当于3 000荷兰盾）之中就有300荷兰盾消失了，后来，连500荷兰盾也不见了。投机商的行为各不相同：一些诚实体面的人为每样东西掏腰包，其他的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码还支付一部分费用。但是，也有一些人，在突然的交易暂停（没人对此有更多的议论）的影响下，一个子儿也不支付，不过他们也不要任何东西。有一群经纪人不付钱是因为他们完全丧失了偿付的能力；而有的人不得不拒绝付款则是因为，他们的业务联系减少了，而且财力也不够。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以自己能够中止付款为荣来自我吹嘘，甚至还厚颜无耻地说他们以土当钱来欺骗债主。如果这些人稍微懂点儿礼貌，没有这么厚颜无耻的话，他们本来至少可以说“人是用尘埃做成的，既然他们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情来让债主满意，就应该将他们自己，也就是尘土，交给债主，因此，他们将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其他的東西，奉献给债主……”。

（结果是，东印度公司的）进口成绩卓著。但是，在这儿……光明似乎仍然隐藏在一只缸里（就像吉迪恩的军队一样）。人们只知道进口的数量，却不了解它们的价值。胆大的投机商（就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没有看到交易光明灿烂的一面，而只看到了遮住光明的盖子。在对（来自印度的）最近商业信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之后，人们得出了结论：货物销售的收入十分可观。容器被打破了，光亮透出，清晰可见，但是就在这时，空头吹响了号角，叫嚣着宣告战争即将开始。

这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情——这些交易所的破坏分子不仅散布将要发生的事实，而且散布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空头们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联合的各个省份将会发动战争，对他们来说，这种猜测足以为他们宣告战争即将开始提供依据。不过，我（对他们的预测）并不感到意外，我所吃惊的是“当战争还只是可能爆发的时候，他们已经认定战争必然爆发……”这一事实。

我的朋友们，这些就是我不得不说的有关交易所里（最近发生的）不幸

事件的全部，尽管我的表述没有向你们呈现出一幅浓墨重彩的画面。

每个人都参与了投机。在投机开始的时候，交易所里呈现出一幅玫瑰色的乐观画面；投机结束的时候，则是一片悲观的景象……那句“命运总是帮助大胆的人们……”的格言并不适用于（东印度）公司，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股票交易，胆大妄为者并未大获全胜，而是被打倒在地。

虽然有以上这些困难，但是我仍然奉劝你对上涨进行投机，而不要对下跌进行投机。我推荐的东西使我吃了亏，我认为不错的东西使我不名一文，这种结局证明我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心实意的。我之所以奉劝你们做多头，正是因为我自己遭遇的不幸……你们或许也看到了，股票交易所已经复苏了。我提醒你们注意以下事实——由于担心战争的爆发而下跌了180%的股票，在战争爆发以后又反弹回升了100%（按照票面价值计算）。

最让我伤心的是虚拟股票投机的突然结束，因为为数众多的体面人物以及财力微薄的芸芸众生都是依靠投机虚拟股票为生的。这棵大树已经将其众多的根须深深地根植于土壤之中，以至于没有人会料到粗壮的树干会经不起第一场暴风的袭击，同样没有人会想到高高在上的股价会突然跌落。……果然，伤痛犹如一场灾难，一下子就将名誉、梦想、人物、财富以及声望涤荡一空。

朱利叶斯·凯撒（Julius Caesar）在数学家索斯哥尼斯（Sosigenes）的帮助下，将不连续的月亮计年法（阴历）转换成了一年365天零6个小时的连续的天体计年法（阳历），而且将春分和秋分的日子固定了下来。因为必须改变所有节日的日期……并且加进去两个闰月，所以，转换计年法的过渡年通常都被称为“困惑之年”。虚拟股票的投机商们认识到，9月1日，他们的交易必须完成清算。他们也希望有一位天文学家来改变季节，希望9月（的结算）被推迟到10月，以期价格能够反弹，并且期盼回升的价格能够为他们排忧解难。虽然他们没有确保实现这一目的，但是却取得了与日历变更

同样的效果——对于许多不走运的投机商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困惑之年”，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眼下的危机是迷宫中的迷宫、恐怖中的恐怖、困惑中的困惑。

痛苦吞噬着我的心灵，我的叙述就暂告一个段落吧。看在我们的友谊的份儿上，我请求你们接受我在向你们描述这家显赫的公司时所带有的那种感情。继一些船只于1594年首次起航后，1602年，按照荷兰国会的命令，东印度公司成立（正如我已经向你们指出的那样）。尽管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冲突，东印度公司仍然可以享受（事实上也确实享受到了）征服众多王国的快感，享受着无数君主的进贡。

在地图册上，未知的地区都被人们用点线圈出，并且冠以“未知地区”的名号。在股票交易所里，也有许多秘密的交易与运作是我未能发现的。不过我也利用了地理学家们的妙招，在新的调查给予你们新的知识之前，我已经用细线将这些东西标记出来并且指给你们看。作为朋友，我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在表达上的不足之处，作为学识丰富的学者，我希望你们对我的错误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商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感谢你的指教。我尊重商业交易，但是痛恨赌博。我认识到，我的能力应付不了如此复杂深奥的交易。如果我丧失了理智而希望了解投机知识的话，你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交易所里的交易行为，我有可能成为股票持有人，而且可能以一种诚实、正直的方式从事（股票）交易，但是，我非常确信的一点就是，我绝对不会做一名投机商人……

哲学家：我太老了，不能对危险熟视无睹去勇敢面对，我也不能再经受风暴的洗礼。因此，我将继续持有自己的股票，直到上帝开恩（在最近的价格下跌之后），让我平安从中解脱，因为我只求自保，不求敛财……所有的哲学派系都教导我们，灵魂比肉体更加高尚，生命比死亡更加高尚，存在的

比不存在的更加高尚。但是，对股票交易所来说，我赞同那位柏拉图式的音乐家似非而是的看法——不存在的比存在的更好。我认为不做投机商人是件更好的事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所想的是真正的股票投机，而不是老老实实的股票交易，因为在老老实实的股票交易中原本是公平的东西，放到股票投机里却令人生疑。

参 考 文 献

- AMZALAK, MOSES BENSABAT, *Joseph de la Vega e o Seu Livro "Confusão de Confusões"* (Lisbon, 1925), 16 pp.
Includes a list of Vega's writings.
- *As Operações de Bolsa Segundo Joseph de la Vega ou José da Veiga Economista Português do Século XVII* (Lisbon, 1926), 32 pp.
- "Joseph da Veiga and Stock Exchange Oper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in Honour of the Very Rev. Dr. J. H. Hertz* [London, 1944], pp. 33-49).
- BARBOUR, VIOLET,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50), 171 pp.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r. 67, no. 1).
- BLOOM, HERBERT IVA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of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illiamsport, Pa., 1937), 332 pp.
- COLE, ARTHUR HARRISON, *The Great Mirror of Folly (Het Groote Tafereel der Dwaasheid)* (Boston, 1949), 40 pp. (The Kress Librar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ublication no. 6).
- DILLEN, JOHANNES GERARD VAN, "Isaac le Maire et le Commerce des Actions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X (1935), pp. 121-137.
- "Termijnhandel te Amsterdam in de 16de en 17re Eeuw", *De Economist*, LXXVI (1927), pp. 503-523.
- EHRENBERG, RICHARD, "Die Amsterdamer Aktienspekulation im 17. Jahrhundert",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rd ser., vol. 3 (1892), pp. 809-826.
- JONGH, J. DE, *De Nederlandsche Makelaardij . . . met een Voor Woord van P. A. Diepenhorst* (Haarlem, 1949), 262 pp.
- KELLENBENZ, HERMANN, *Unternehmerkräfte im Hamburger Portugal- und Spanienhandel, 1590-1625* (Hamburg, 1954), 424 pp.

- LASPEYRES, ETIENNE, *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Anschauungen der Niederländer und ihrer Literatur zur Zeit der Republik* (Leipzig, 1863), 334 pp. (Fürstlich Jablonowski'schen Gesellschaft zu Leipzig, XI).
- SAMUEL, LUDWIG, *Die Effektenspekulatio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Berlin, 1924), 192 pp. (Betriebs- und Finanzwirtschaftlich Forschungen, II. serie, heft 13).
- SAYOUS, ANDRÉ EMILE, "La Bourse d'Amsterdam au XVII^e Siècle", *Revue de Paris*, 1900, vol. 3, pp. 772-784.
- "Die Grossen Händler und Kapitalisten in Amsterdam gegen Ende des Sechzehnten und Während des Siebzehnten Jahrhundert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46.bd., heft 3 (1937), pp. 685-711; 47.bd., heft 1 (1938), pp. 115-144.
- "La Spéculation sur Marchandises dans les Provinces-Unies au XVII^e Siècle", *Bijdragen voor Vaderlandsche Geschiedenis en Oudheidkunde*, vol. IV, 3 (1903), pp. 24-36.
- SMITH, MARIUS FRANCISCUS JOHANNES, *Tijd-Affaires in Effecten aan de Amsterdamsche Beurs* (The Hague, 1919), 234 pp.
- VAZ DIAZ, A. M., "Over den Vermogens Toestand der Amsterdamsche Joden in de 17^e en de 18^e Eeuw", *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 vol. 51 (1936), pp. 165-176.
- VEGA, JOSSEPH DE LA, *Confusion de Confusiones . . . herdruk van den Spaanschen Tekt met Nederlandsche Vertaling, inleiding en toelichtingen door Dr. M. F. J. Smith; vertaling door Dr. G. J. Geers* (The Hague, 1939), 297 pp. (Nederlandsch Economisch-Historisch Archief. Werken, 10).
- *Die Verwirrung der Verwirrungen; Vier Dialoge über die Börse in Amsterdam. Nach dem Spanischen original . . . übersetzt und eingeleitet von Dr. Otto Pringsheim* (Breslau, 1919), 233 pp.
- VERGOUWEN, J. P., *De Geschiedenis der Makelaardij in Assurantiën hier te Lande tot 1813* (The Hague, 1945), 155 pp.

译者后记

2005年6月的股改催活了中国的股市。上证指数在20个月的时间里涨幅达200%，居全球之首。2007年开年股市一路走高，呈现三高景象：沪深两市股指猛涨，交易额不断刷新历史纪录，开户数更是涨得比股指还快——截至2007年5月1日，股票账户数已达9 280万，相当于我国成年人中每10个人就有一个股民。投资者的入市热情越来越高，股民大军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大有全民皆股的势头。即使已过下午3点，北京某证券公司柜台前依旧有不少人在排队开户。股民大军中既有孕妇、老人，也有小学生和大学生。为了炒股，有人当家产，有人押房子。A股市场持续火热，B股市场也不甘寂寞，截止到2007年4月29日，B股开户数已经达到了173万。

投资者的预期普遍乐观，看到的都是收益，完全不顾风险。然而股市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火热的股市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受2006年盈利的鼓舞而期待着在2007年大赚一笔的股民们却遭遇了2007年2月沪深股市的暴跌，继而上扬，再次暴跌以及4月中旬股市的涨跌振荡，股民生动地受到了一次“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的经验教训。只要是股市，就有涨有跌，只赚不赔的股市是没有的。只要是股市存在的地方，就有贪婪、投机与欺诈，尤其是在国内外股市一片红红火火之时。一些股评机构靠向会员推荐股票骗

取钱财；空壳公司编织股票陷阱骗走退休老人50万元人民币；“造林”陷阱吞噬了投资者16亿元；还有未经中国证监会审查备案的非法境外私募基金“瑞士共同基金”宣称450天赚300%。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人类的某些天性却是恒久不变的。财富积累的过程就像登山，一开始走得稳健的人往往能登上更高的山头。而许多人不愿意通过辛勤的劳动积累财富，一门心思想在投机生意里牟利，那些踏实干活的人反而因为收入上升不快而遭到耻笑。“不必通过辛苦的劳动就能变得更加富有”对某些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世界范围内有很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股市故事，本书主要包括查尔斯·麦凯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与约瑟夫·德拉维加的《混乱中的困惑》。两本书中直接涉及投机与金融市场的章节，不仅向读者提供了有关财富、贪婪、欺诈与金融创新历史的知识，而且带给读者在今天不太常见的许许多多令人捧腹的戏剧般的情节，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吸取教训。

马丁 S. 弗里德森为此书撰写了具有现代视角的绪论，彼得 L. 伯恩斯坦也为此书撰写了推荐序。《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由密西西比计划、南海泡沫和郁金香狂潮三个部分组成，密西西比计划、南海泡沫和郁金香狂潮分别讲述了发生在法兰西、英国与荷兰的一些股市的炒股闹剧。《混乱中的困惑》由商人、哲学家、股东之间展开的四段对话组成。德拉维加借股东之口将股票交易所里的人群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通过对话这种文学形式介绍了股市以及股票交易的起源；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公司宗旨、声望、它的辉煌与独特之处、公司的进步、管理、利润分配以及稳定性的含义；去交易所碰运气面临的三重巨大障碍；交易所里价格涨跌各自的三个动因；投机的四条原则；三种结算的方式；两种经纪人；虚拟股票投机及其两个主要原因；经纪人贪婪的三个原因；空头集团的12个花招等。

密西西比计划里有仅靠出租小帐篷每月收入就达1万英镑的索伊森旅店花园和靠出借自己的驼背给投机人作为写字桌用就能谋生的股票交易圣地坎康普瓦大街。还有原先十几块钱一斤如今成为茶叶市场宠儿，售价高达十几万

元一两的云南普洱茶，从2007年4月8日开始，盛产普洱的云南思茅市也正式更名为“普洱市”，这与郁金香狂潮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的股民无论是购买方式还是了解股票信息的途径都便捷了许多，可以看相关的电视节目，可以借助于电话、网络等通信工具，但是从众心理依然严重。市场不好的时候，人们一个比一个悲观，听到的都是坏消息，而市场好的时候，大家听到的都是好消息。传销集团利用人们想要发财的狂热心理、网络红人的大行其道、追星一族、考研一族等除了与一窝蜂的从众心理不无关系之外，幕后推手的炒作也不可小觑。散户可能搜集好了资料，做了冷静的分析，也想清楚了是买是卖。一个人独处时容易保持理性，但到了人声鼎沸的市场，听这个说有消息，听那个说肯定要涨，就没了主意。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预期过高时进行投资往往不太能够保持理性。股市暴跌是市场运行的规律。股市有泡沫并不可怕，就怕人们陷进文化泡沫。应该进一步改善国内股市的生态文化，放弃“碰运气”和“与庄共舞”的赌场心态。无论是监管方、上市公司、民众，还是分析师、会计师、评估师、保荐人以及股评家都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本书除了现实意义、指导意义与娱乐意义之外还有鲜明的语言特色。

其一，多种语言参差其间。除了英语、古英语，书中还有几首法语小诗，多见古法语，也不乏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因为《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成书于1841年，自然使用很多现在不常见的旧式英语和法语。

其二，严肃的股市知识和习语与风趣幽默的趣闻逸事并举。中国有术语“一手”，而本书出现的“a regiment”表示20份股票。股票交易所里的语言是多种语言的交叉融合，像拉丁词“opsie”、荷兰词“bichile”。趣闻逸事有为了见上约翰·劳一面而挖空心思使出各种高招的德·波莎夫人、命令车夫看到劳先生走过就一头撞向路旁的柱子并把她掀倒在地的女士、M. 德希拉克医生，也有因被民众误作劳追赶而狼狈逃窜的波尔塞（Boursel）绅士。

其三，大量使用货币计量单位。比如，法国旧的货币单位livres、法国低值硬币sou、英国旧币制的硬币单位crowns、价值两个先令的硬币florin、最小的重量单位grains、用以精确计算郁金香的重量与价值的比grain更小的重量单位perit、谷物的容量单位last (e)、相当于52.5加仑的大啤酒桶hogsheads；合3 000 guilders的pounds Flemish。

其四，涉及很多名人、古希腊神话与历史典故。Pythagoras、Nebuchadnezzar、English Quakers、Jeremiah、Ahab、希腊建筑风格Ionic、行刑地、St. Bartholomew's Day、Michaelmas、Icarus、Sephardic、Ashkinasim、Sisyphus、Ixion's wheel、Ixion、Sibylines、Hades、Harpies以及《圣经》里提到的因为语言混乱而未建成的通天塔巴别塔 (Tower of Babel)。

当然，书中也有疏漏之处，比如第88页的“doggrel”应为打油诗“doggerel”，118页“Zuyder Zee”现在写作“Zuider Zee”，第167页“bears should sell after the reason for their sales has ceased to exist”应为“should not”。

江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马国建老师、程发新老师和财经学院的孔玉生院长、陈海波老师以及侯青老师对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 娟

一段关于财富、贪婪、欺诈与金融创新的精彩历史。

——《与天为敌》作者 彼得·伯恩斯坦

尽管媒体有多种说法，但几个世纪以来，金融市场上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改变。
——《福布斯》

这是一本关于大众心理的最重要的书，大而言之，也是关于金融市场的最重要的书。每一位认真研究市场的学生，每一个对人类的极端行为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CNBC

本书以清晰的思路引导现代投资者深刻地认识到，从众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西雅图时报》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 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www.wiley.com

丛书微博：<http://t.sina.com.cn/hzclassic>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收藏性：★★★★★

实战性：★★★★☆

专业性：★★★★☆

阅读提示



华章网站 <http://www.hzbook.com>

网上购书：www.china-pub.com

上架指导：投资·证券·股票

ISBN 978-7-111-30243-8



9 787111 302438

定价：36.00元